

守望·薪火

成都中医药大学故事

从成中医创业史、奋斗史、发展史中积淀而成，流淌于成中医人血脉中的精神力量，永远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开创未来。

◎主编 刘毅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守望·薪火

成都中医药大学故事

◎主编 刘毅

◎副主编 张希 董蕾 王其奇

◎编委 汤良平 郭洁 霍文巍

徐倩 任翔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薪火：成都中医药大学故事 / 刘毅主编.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4
ISBN 978-7-5727-0516-8

Ⅰ. ①守… Ⅱ. ①刘… Ⅲ. ①成都中医药大学－校史
－文集 Ⅳ. ①R2-4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58720号

守望·薪火
成都中医药大学故事

主编　刘　毅

出 品 人　程佳月
策划组稿　钱丹凝
责任编辑　税萌成
特约编辑　万亭君
装帧设计　杨璐璐
责任校对　方　凯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38号新华之星A座
　　邮政编码：610023　传真：028-86361756
成品尺寸　185 mm × 260 mm
印　　张　20　字　数　40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5.00元

ISBN 978-7-5727-0516-8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成都中医药大学（简称成中医）的历史，是艰苦创业的故事，是青春奉献的记忆，更是成中医人65年拓荒前行、激流勇进的精神积淀。

2021年，是成都中医药大学建校65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的第65周年。在这65年历史的惊鸿一瞥中，中医药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初创维艰、曲折发展到重返正轨，再到改革发展、跨越发展、内涵发展、高质量发展，中医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磅礴历史。成都中医药大学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四所中医学院之一，65年来成中医人始终无惧风雨，无惧困难，勇毅前行，我校的成长之路就是成中医人永不懈怠、开拓进取精神的积累和沉淀，也是中医药高等教育伟大事业发展浓墨重彩的一笔。

历史的脚步是匆忙的，有些精彩还未绽放出光彩夺目的一面，就在时间流逝中渐渐淡去，尘封在历史的某个角落。但是，历史又是鲜活的，一个画面、一段时光、一抹记忆，星星点点，像是来自历史的呼吸，虽是一瞬，却总是被铭记，最终汇集、凝聚成一种奋斗精神、进取精神，闪耀星河。回顾历史，我们能感受到，成中医的岁月里流淌着一股连续不断、传承不断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催人奋进，让我们遇挫不折，在初创艰难中开拓前进、刻苦钻研；正是这种精神，励志前行，让我们在立德树人中以仁义寓大爱，为国家中医事业培养、磨砺人才；正是这种精神，书写情怀，让我们在传承知识和历史中意识到了责任和担当，这是对初心的呼唤，也是成中医人共同的价值追寻。我们越是更多地走进历史，感受成中医人的奋斗精神、前进精神，就越能体会到岁月的温暖与历史的珍贵。

历史昭示未来。唯有铭记历史，把隐藏在岁月中的精神财富挖掘出来、传承下来，踏着前辈们的足迹，中医药事业才能走得更远、更好。我们很幸运，

征集到了许多湮没在历史中的成中医人的精彩片段与宝贵记忆，作者们记录历史、留存记忆，以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书写了几代成中医人对“家”的共同记忆，也述说了一种在没有路的道路上探索前行的奋进精神。早年间学校初创，历经艰辛，成中医人肩负振兴中医药之使命，从一开始就有着一股子“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筚路蓝缕，栉风沐雨，著书立说，临床求真，培育人才，健全机构，誓要闯出一条成中医发展之路。故事里，他们敢于担当、乐观奋斗、无私奉献，以仁行义，以仁爱铸大爱。时代变化，形势变化，中医事业发展也有了新目标，但不变的是成中医人坚守初心的执着和奋勇前行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新时代成中医人更要传承、总结、发扬，赋予成中医精神更多丰富的内涵，让成中医的历史、成中医精神深深融入成中医人的未来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讲，走得再远也不能忘了来时的路，我们要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并非一帆风顺，我们的开创者、奋斗者们艰辛探索，奋发图强，流过汗，流过泪，甚至流过血，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第一次”，为成中医奠定了坚实发展根基。今天的成中医已经站在省、部、局共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新起点。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建校65周年之际，我们选取65篇文章集结成册，以此纪念岁月、追忆历史，告慰先驱、缅怀前辈，也借此激发和鼓励中医后辈传承成中医精神，接续前行！

本书的作者分别来自不同时期、各个岗位的成中医人，他们亲历或见证了成中医的发展，通过自己的视角观察和讲述一段往事。本书对涉及重要历史事件的相关文章尽量查阅权威资料进行佐证，但由于时间久远，难免出现部分细节有出入的情况，请大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我们将在再版时予以修正。

最后，再次感谢为本书积极撰稿的各位老师及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祝愿成都中医药大学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守望历史，传承薪火，致知笃行，再谱华章！

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刘　毅

2021年8月6日

目录

创办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最初岁月…… 周月玲 / 1

回顾先辈创业历史…… 李继娟 / 12

吴老“献图”与“说难”的故事 …… 陈先赋 / 16

我们从小小四合院走来…… 赵明俊 / 19

建校选址…… 吴丽娜 / 22

建校初期的教材建设…… 吴丽娜 / 25

三枚奖章…… 吴丽娜 / 29

我的大学生活片断回忆…… 张之文 / 32

早期教材建设，一条责无旁贷的漫漫长路…… 万德光 / 40

成都中医药大学早期药圃的记忆…… 万德光 / 46

高山实习—— 一条中医药特色育人之路 …… 万德光 / 51

建校初的四台车…… 王　军 / 60

学校防疫小组赴眉山防治血吸虫病…… 蒲昭和 / 62

这是成都中医学院第一张院报（刊）吗？ …… 蒲昭和 / 66

严师益诲——忆李斯炽先生…… 陆干甫 / 71

我的中医历程…… 李明富 / 73

杏林名师　永远铭记…… 郑士杰 / 77
有关成都中医学院的老故事…… 艾儒棣 / 81
成都中医药大学校牌字体的来历…… 谢克庆 / 87
我爱母校我爱党…… 谢克庆 / 90
盛世奇缘　天从人愿…… 谢克庆 / 96
我校首批巡回医疗队亲临记…… 张之文 / 100
中药标本馆建设工作中的逸闻趣事…… 卢先明 / 105
记忆深处的“百沸汤” …… 王　军 / 110
校园里的三亩水田…… 王　军 / 112
一盘石磨三口大锅的故事——记学校药厂的创业者…… 王　军 / 114
我和成中医的第一间实验室…… 宋开源 / 117
花团锦簇忆故人…… 邓世铸 / 121
小中见大、奥妙无穷：膏丹丸散治急重危病 …… 邓世铸 / 125
岐黄学子的怀思…… 张发荣 / 128
忆我的从医之路…… 李祖伦 / 131
教育部重点学科——耳鼻喉科成立始末…… 熊大经 / 135
我校中药鉴定学特色教学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的三个故事…… 卫莹芳 / 139
我校领衔创编全国第一版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中药鉴定学》…… 卫莹芳 / 156
针刺麻醉实验在成中医的起源…… 宋开源 / 162
龚锦文老红军带队峨眉山中药实践 …… 曾一林 / 165
“培土生金”治肺病——开门办学中的故事…… 郑士杰 / 168

创办校报　三次献礼…… 陈先赋 / 170
《成都中医药大学报》历史沿革…… 陈先赋 / 174
二郎庙——天降神车运水泥…… 陈先赋 / 177
带着照片上北京…… 陈先赋 / 179
听凌老师讲课有感…… 曾德昌 / 183
忆陈达夫教授…… 文琢之 / 186
忆恩师陈潮祖…… 宋　兴 / 188
冉品珍医事小传：人参败毒散加减治疗顽固性水泻…… 陈丽平 / 191
我的恩师——“药王菩萨”徐楚江教授 …… 胡昌江 / 194
首批中医眼科研究生的杏林之路…… 张济南 / 198
四十年磨一剑——记中医养生学科开创之路…… 马烈光 / 205
学校成人教育发展路程…… 傅春华 / 213
我校第一个独立科研机构——中医古籍文献研究所…… 傅春华 / 221
为中西医结合影像学的发展尽微薄之力…… 余朝俊 / 228
我与成中医：从图书馆到外事组…… 范家永 / 234
振兴中医的一方阵地——记《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公开发行…… 陈先赋 /237
文琢之与其著作《医林人物剪影》…… 陈先赋 / 242
从十二桥走上中医传播路——一位成都中医药大学老校友、
　老员工、老报人的龙门阵 …… 毛嘉陵 / 245
我校在中医院校率先成立五官专业…… 熊大经 / 255
外语教学随感…… 黄嘉陵 / 258

我的针灸人生…… 罗永芬 / 263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曹泽莉 / 269
校庆那些事…… 马晓蓉 / 275
画册里的成都中医药大学…… 常湖川 / 281
养生花开遍寰宇——忆我的国际学术交流之旅…… 马烈光 / 288
峨眉山游学之旅开启我校特色短期留学生培训班…… 黄庆娴 / 296
在以色列创办雷德曼中医学院…… 方显树 / 300
养生有了世界舞台——记世界中联养生专委会成立…… 马烈光 / 305

创办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最初岁月

讲述人 / 周月玲

万事开头难

1955 年初夏的一天，我的丈夫张华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尽快移交重庆七医大（今陆军军医大学）的工作，赶到成都的中医进修学校当校长，为筹建成都中医学院[①]做前期准备。

当时，我正怀着老四，怕经不起长途折腾，张华就要我暂留在重庆，由他带着三个孩子先走一步。几个月后，我带着刚出生的老四来到成都。一家人在经历短暂的离别后又团聚了。

此时，省里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成立了由时任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潘阳泰挂帅的“成都中医学院建院委员会”，张华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负责筹建的具体工作，办公仍在中医进修学校。

当时，我对工作调动有些想法，不像张华那么热情积极，原因有两条：一个是舍不得离开部队，对到地方工作有些不适应；另一个是自己想学西医，现在要来学中医也不大情愿。

张华看透了我的心思，专门抽时间给我讲他在北京开会的精神，告诉我会上传达的毛泽东主席对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要我的思想尽快转过弯来。还在重庆时，我为报考四川医学院，就挺着个大肚子参加文化课补习，为准备考试吃了不少苦。眼看就要有些眉目了，张华又要我和他一起学中医，对“改行”确有一些不愿意。但看到张华没日没夜地忙，我担心他的身体照这样下去会吃

① 1995 年成都中医学院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下同。

不消，手术后他只留下半个肺，身体一直很虚弱，上楼梯都要喘粗气，每天这么个跑法，累得犯了病那就麻烦大了。

冷静下来一想，我们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这本身就是一次人生的重大转折，同时又要从零开始筹建新中国的第一批中医药大学，张华是顶着双重压力在这个新的领域、新的岗位上工作，而且必须完成这个新的更加艰巨的使命。说什么我也不能再给他的思想上添堵了，要尽可能支持他工作，照顾好家庭，为他排忧减压。于是，我对张华说了两句话：一是转弯子不掉队，二是要搬家少受累。

对前一句话，张华听了很高兴，而对后一句话则有些不理解。我就跟他解释，现在我们住的地方离上班的地方那么远，每天把时间浪费在路上不说，联系工作也不方便，把家搬到离学校近一些的地方，有利于工作也有益健康。张华觉得我说的也在理，通过学校协调，就把家搬到了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院子里。这比一般的四合院稍大些，已住了不少人家。我们住在后院的三间小屋里，院内有一口水井，安装了手摇压力泵，还有一个公共厕所。这让我们初来乍到的一家人感觉相当不错，至少张华上下班不用再跑那么远的路了。

学校在成都的四道街，当时还是一个僻静的巷子。进入校区，和我们在重庆工作的七医大比起来，条件可就差多了：连个像样的教学楼都没有，食堂旁边有个篮球场，院坝里一个草房当作运动室，只能放一个乒乓球台子，后面还有一个臭水坑，周边堆了好多垃圾。

新调来的一些同志见此状况，都觉得不像是办大学，而且还是周总理亲自批准创办、直属国家卫生部的高等学府。发牢骚的人不少，有的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对中医有偏见，工作中有临时观念，有的则直接提出来想调走。记得在召开全院筹建工作动员大会上，张华拿着一张报纸对大家说：“这是1954年10月20日的《人民日报》，我为什么要拿这份老报纸？这是我到成都报到的时候，四川省卫生厅的潘阳泰厅长给我的，要我好好学习上面登的一篇社论《贯彻正确的中医政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党报上为中医撑腰打气。为什么要为中医说话？因为我们的领袖毛主席说话了，提出要‘重视中医，学

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中医学院的原因所在，意义所在，也是责任所在！”

张华讲的这番话，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住了，解决了筹建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思想问题。在此基础上，张华动员全体干部职工从整治环境做起，自己动手清理垃圾，打扫卫生，特别要求转业干部拿出部队的好作风，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起好模范带头作用，以整洁干净的环境迎接学院的成立大会和开学典礼。

回到家里，张华又专门给我提出要求，思想认识要端正，打扫卫生要带头，当不了模范，也不能拖后腿。筹建初期调来的人员中，结构比例不合理：一方面医药卫生干部多，但干过大学工作懂教育的干部少，请来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名老中医，治病救人堪称大家，但多数没有在大学当过先生，缺乏现代教学的实践经验，仍习惯传统中医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另一方面搞行政和后勤的干部多，熟悉党的组织工作特别是会做思想工作的干部少。

张华在来成都之前，曾在第七军医大学任临床部、干部部的部长，还在贵阳奉命接收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医院，成为新建的贵州军区总医院的首任院长。这些经历让张华有了一些与曾在欧美国家留过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交往的经验，同时还初步积累了办大学、管干部、培养人才的经验，使他成为学院筹建班子中唯一一个有过医科大学领导工作经历的党员干部。那时张华常对我说，地方懂教育、懂中医的干部很多，为什么组织上要调我这样一个军队干部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加强党对筹建工作的领导，贯彻好党的教育方针和中医政策，把人心聚起来，把工作干起来，把学院办起来。

张华在工作中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依靠名医专家，拜他们为师，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再就是依靠教职员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李斯炽先生家，他说李斯炽先生早年师从成都名医董稚庵，李斯炽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是四川国医学院的院长，在到中医进修学校之前，还是四川国医学院中医教学的学科带头人，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是办中医药大学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一方面我们要向李斯炽先生多请教，把他和其他老先生的真知灼见，转化为筹建办学的财富和资源；另一方面少让事务性的工作打扰

他们，保证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

张华常跟大家说，万事开头难，眼前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也是暂时的。在上级的重视和关心下，新校址初步确定在城东的猛追湾，政府同意拿出400多亩上好的农用土地来办学校，规模与同时筹建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差不多，这让大家对学校的建设增添了信心。

秋天到了，筹建工作也终于有了收获。1956年9月1日，在四道街成都中医进修学校的原址上，举行了成都中医学院成立大会暨首届年级的开学典礼。大会上宣读了由周总理签署的国务院任命书，李斯炽先生任院长，张华任副院长。

按理说，这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我却一直高兴不起来。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国家和省里的财政状况不太好，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给学院盖房子，调整了原来已经审批过的建设规划，提出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办学方针，这让我心中一直向往的那个像模像样的“新大学”没有了。当时不仅是我，包括很多干部职工听说后都有一点失落感。二是刚刚成立的中医学院除了抓好首期中医专业6年制大学班的教学，也就是后来大家经常说到的1962级；同时还受卫生部委托，开办一期三年学制的高级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张华要我放弃报考四川医学院，到这个“西学中”的研究班学习，我转业后连做梦都想上川医的人生目标就这样被改变了。说实话，前者毕竟和我们个人关系并不是很直接，但后者就不同了，关系到我眼前的工作，甚至关系到我一生的发展。我为此想不通，认为张华只考虑他的工作而不替我着想，一时转不过弯来。

张华白天忙学院的事，晚上回家就做我的工作，颠过来倒过去，都离不开那三条：一是态度要坚决。办“西学中”研究班要抽调一批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卫生部的中医研究院已经在1954年先办了起来，现在中央又定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天津、武汉举办6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作为党员干部一定要齐心协力把这个研究班办出水平来。二是领导要带头。现在仍有一些同志看不起中医，认为不该办这个“西学中”的研究班，而应办

“中学西”的研究班。但毛主席说了，现在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作为一个有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一名从部队上下来的军医，关键时候一定要跟上形势，思想上不能掉队。三是处理好家务。大女儿刚上小学，老二4岁，老三2岁，老四还不满周岁，孩子们都小，需要大人照顾，川医离家远，交通又不便，而“西学中”这个班就在本院，学习生活都容易，于己于公都有益。

经张华这么几番开导，我琢磨着也是这么个理，眼看开班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也给张华表了一个态：尽管自己医学的底子薄，但经过部队卫校的系统学习，尤其是在野战医院救治伤病员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而在老家时受爷爷在乡下行医的影响，对中医还有一些粗浅了解，力争在学习中不给他这个院领导的脸上抹黑。

第二年的秋天，学院又招收了一批6年制中医本科学生即1963级，还招了一批3年制的专科学生和半年制的进修班学生，加上已有的1962级和我们“西学中”研究班，在校学生和教职工人数已近千人。行政和教学机构也相继建立，虽说与上一年相比有了一些进步，但学院还处在初创时期，各种困难问题仍然很多。为了加强领导，经四川省委批准，学院正式建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张华担任书记。

在第一次院总支扩大会议上，张华说：“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是从部队上下来的，当年我们打仗攻山头，冲在前面的都是共产党员。现在办学校，就像当年攻坚克难，但只要党组织坚强就不难，党员带好头就不难。”那段时间，张华找每一个党员干部谈话，希望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同时，张华还登门拜访每一位中医老师，走得最多的就是李斯炽院长家。因为李斯炽院长不在学院坐班，家住在院外的地方，凡涉及办学的重要事项都要先去听取他的意见。我听张华在家里和院办主任许允安谈话时就多次说过，学院处在创业阶段，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教书育人的根本，也是上级党委对我们的政治要求。同时，还要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特别是那些名老中医的工作，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把精力集中到教学上来。院办要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为老先生们尽可能提供好的工作条件。

最让张华伤脑筋的是现有办学条件限制了学院的发展，上面要求继续扩招，但四道街校区就那么大，不要说教学和办公场所，就连人的吃住都是一个问题。眼看着张华的身体一天天消瘦，而我的学习压力本来就很大，看到那一大摞讲义，有的课程听都没听说过，如内经节要、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这些说明中医治疗规律的基础理论非常深奥，并不像我原来想得那么简单。有的课听下来感到很难消化，还需要找老师或请班上学习好的同学帮我补习，时间非常紧张，根本顾不上家，我曾有过打“退堂鼓”的想法。我对张华说：“不是我不爱学习，也不是害怕困难，在冀鲁豫军区卫校上学时，我刚刚生了老大，一个人带着孩子，那是什么条件，都坚持下来了，学习没有耽误，毕业时还被评为优秀学员得了奖。现在我是担心你的身体，担心几个孩子，这个学咱就不上了吧？”

张华没有简单地批评我，而是耐心地开导我：“说什么咱都绝不能当逃兵！”这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现在学也开了，课也上了，就像过去行军打仗，冲锋号都吹响了，你要停下来往后撤，你说能行吗？在这个班上，论学历你不如其他人，但要论革命资历，其他人都不如你。咱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要当学习的模范，不能掉队，更不能当逃兵！”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张华和我商量把几个孩子送到幼儿园，还请了一个保姆，帮我分担一些家务，让我能够更好地集中精力学习。

学院建设发展很快，张华在那段时间不断到省里、市里去反映问题，希望上面能够从根本上尽快改善目前的办学条件。不久就有了消息，省市两级领导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最后决定将成都医士学校并入中医学院，学院搬至医士学校新址。这就是现在的成都中医药大学的老校区，地处十二桥外的新罗路。当时这就算是出城了，往西走都是农田。

为了在新学期开学之前完成搬迁，1958 年的寒假全院都没有放假。虽说紧张劳累，又赶上寒冬腊月，但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毕竟新校园比四道街好多了。过春节时，我们家已从四道街搬到新罗路，家属区共有 4 幢 2 层楼房，每幢 5 个单元，每个单元上下各四间房，有一个公共走廊将其一分为二，中间是一个完全无遮挡的开放式小院，每幢楼之间有一条东西走向、七八米

宽的人行道。我们家与院办许主任和膳食科科长张艺一家同住在 1 幢 3 单元。许主任和张大姐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年龄和资历都长于我和张华，为人真诚厚道，特别是张艺大姐性格开朗，深受我和张华的尊敬和孩子们的爱戴。

那年春节，也是我们一家到成都后过得最好的一个春节，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搬了新家，也是因为多数教职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都有了改善，学院的各项工作也开始步入正轨，这让张华觉得这两年付出的心血终于见了成效。

要走自己的路

工作中并非都能顺心如意。学院领导、中层干部和老师来自各个方面，在大学工作过的却没有几人，现在要办一所中医药大学，无论国内国外都无先例参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干部、老师对如何办学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可以走川医（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路子，认为川医有 40 多年办学的老底子，形成了一整套的东西，拿过来用就是了；另一种意见是坚持走“中医”自己的路，认为华西虽好却姓“西”不姓“中”，应该学习借鉴，但不能生搬硬套。

见此现状，张华作为学院主要领导特别是党组织的一把手，没有简单化地处理矛盾，而是从调查研究入手，耐心征求李斯炽院长和各位专家名师的意见。他们把个人学医行医的经验体会告诉张华，中医药反映的是我们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是一个具有自己传统和独特理论以及技术方法的完整体系。中医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是中医的特色所在，又是培养中医药人才必须下功夫学深悟透的基础课、基本功。张华在了解了老先生们对办中医药教育的倾向性意见后，又联系自己在贵阳和重庆与一些在国外留过学的医学专家交往的经历，特别是联系自己做肺切除手术根治结核病的感受现身说法，让大家对中医、西医这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都要有一个正确认识：照搬“川医”的模式不妥，排斥“华西”的理念和经验也不对。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听说毛主席到成都来了，并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不久，毛主席在“成都会议”的讲话精神就传达下来了，张华听了以后显得很兴奋，他对我说，毛主席在会上专门讲了对苏联的那一套规章制度不能照搬的问题：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

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这对我们统一思想，端正认识，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办学路子太及时了，太有意义了。

张华在和党总支一班人在认真学习毛主席讲话的基础上，又专门把这个讲话的主要精神向各位专家名师传达，并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他说，毛主席讲的虽然都是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但对教育战线也很有针对性，特别是对我们中医学院来说，这是新中国的新事物，在如何办学的问题上，就是要照着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去做。对西医的理论，还有川医的模式，应择其善者而从之，否则就会出现毛主席批评的那种情况：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这样就丧魂失魄了。

尽管那个年月，学院的教学秩序常会被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干扰，如“钢铁元帅升帐”，学院的操场坝上也被迫建起了“小高炉”。张华内心充满矛盾，不炼钢不行，不上课也不行。他不时地和李院长商量解决“工学矛盾”的对策，给院机关和教学部门提出了“两个尽量和两个不停”的原则思路，尽量减少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人员实行轮换，时间安排在课后和晚上，尽量对老师特别是老先生们的备课时间给予保障，做到教学不停，炼钢也不停。

正在这个时候，北京又传来喜讯——由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举办的全国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圆满结业。学员们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学习了16门业务课程，参加了临床实习，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毛主席对此作了肯定性的重要批示。这让学院上上下下特别是我们参加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的老师和同学们深受鼓舞，谁都没有想到毛主席对办好这个班如此重视，并且作为一件大事摆到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上，大家都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个研究班的学员感到十分的荣幸，同时也感到有一种责任落到了肩上。

自从“大炼钢铁”以来，张华一直感到压力很大，现在毛主席的批示让他如释重负高兴无比。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在党总支会上提出要大力宣传和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批示，确立了借东风促教学，用研究班带本科班的方向推动全院工作有序进行。

辛苦结出硕果

正是凭着这股子劲头，我一边要承担家务，照顾张华和四个孩子，一边要完成繁重的学业，每天晚上都要熬到深夜。我感到最难的，就是啃那些中医药的古籍善本，遇到搞不懂的问题，我就向张华请教。他说："你这个人怎么不开窍呀，咱家的左邻右舍都是名医大家，而且都是给你们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授课的老师，这不是近水楼台吗？"我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张华接着又批评我："求学要求真知，半瓶子醋不行，似懂非懂不行，不懂装懂更不行，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有一种刨根问底的精神，老先生们对这样的学生不仅不会责备，可能还会高看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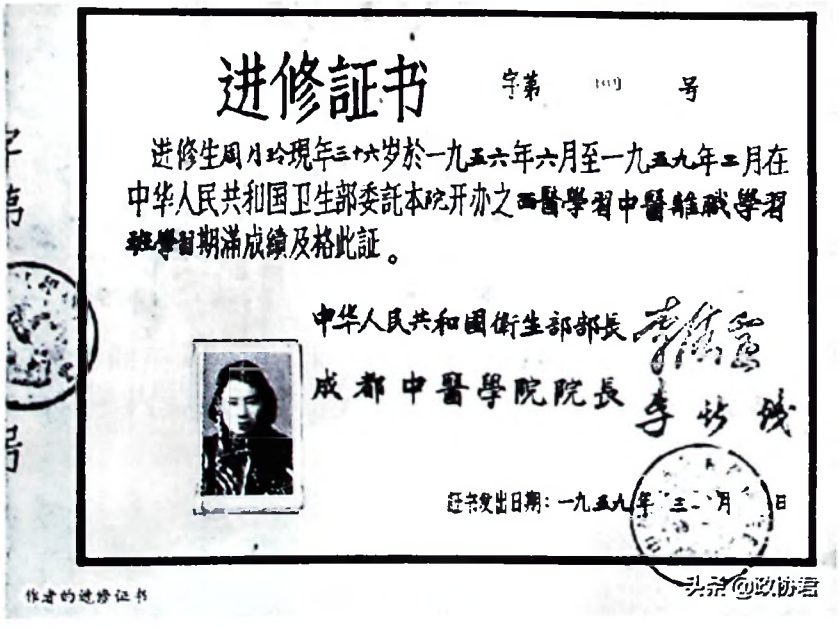
经张华这么一开导，我心里也就踏实了，鼓足勇气登门求教。我们家在1幢3单元，西邻一单元住着学贯中西的李院长，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是天府名师、桃李天下，如今亲自担任我们的班主任，给我们讲"内经"，有时还批改我们的作业。2单元是享有"邓伤寒"美誉的邓绍先副教务长。4单元是针灸教研室主任蒲湘澄老师，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随父蒲松荣前往大巴山为红军治病救人。2幢3单元是我们进修班的常务副主任侯占元同志，4单元是在成都有"卓半城"美誉的妇科教研室主任卓雨农，3幢2单元住着得"子午"和"灵龟"针法秘传的针灸教研组主任吴棹仙老师，3单元的王渭川老师对《金匮要略》造诣尤深，5单元的刘耀三老师则对脏腑病机有独到见解。这些赫赫有名的中医大师，其高超的医术早就誉满省内外，过去虽也时常见面，但多少有一种距离感。现在作为学生与他们近距离接触相处，才感受到每一位老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宽厚仁心。他们对中医药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学养，对悬壶济世祛除百姓的病痛有着菩萨一样的慈悲心肠，而对每个求医的或求教的普通人都能够平等相待一视同仁，显示出了大医生的风范和大先生的境界，让我对他们更加崇拜和敬仰。

这样一来，我和张华与这些老先生不仅是一种工作关系，又多了一层师生之情，彼此往来交流就更融洽和随意了。那时候人们来往没有那么多的忌讳，

无论地位、职级和年龄有什么差异，都不会妨碍影响彼此交流，相互之间都很友善和谐。就是在那样一个政治氛围浓厚、学术研究务实、人际关系真诚、崇尚传统美德的校园环境里，我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许多帮助，克服了学习中遇到的诸多难题，顺利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

到附院实习，头一回把课堂上学到的东西用于临床，我开始有些紧张，不是说理论知识没学好，而是面对患者，你要通过望、闻、问、切做出病情诊断，特别是在开方子的时候，用哪几味药、用多大的量，更需要稳准细实，轻了治不好病，重些就可能适得其反。好在李院长亲自给附院的刘杰院长交代，要给研究班学员安排最好的医师搞好传帮带，凡遇到疑难杂症，患者离开后老师还要专门进行病例分析，让我们增长见识，积累经验。

1959 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学院举行了隆重而又简朴的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结业仪式，当我从老院长手中接过由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和成都中医学院院长李斯炽共同签名的进修证书时，看到上面印着醒目的三行字："进修生周月玲现年三十六岁于一九五六年六月至一九五九年二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委托本院开办之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学习期满成绩及格此证"，并且盖着带有国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大红印章，我的心情非常



作者的进修证书

周月玲的进修证书

激动。同时我还得到了以李德全部长名义颁发的奖状，奖状上方印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下方也是盖着带有国徽的卫生部大红印章。面对这崇高的荣誉，特别看到进修证书上还印有我的年龄，更加触动了我的思绪：从1942年投身革命，人生一路走来，无不渗透着党的教育培养，特别是有幸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批中医药大学从无到有的创业实践，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之路的先行者。见证了历史，也无愧荣光，我愿倾其一生报效国家、服务人民！

本文由周月玲口述，子女整理。

讲述人简介：

周月玲，女，1922年9月出生在豫北农家。1942年11月参加革命，1943年4月参加八路军，194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调至冀鲁豫军区一纵一旅卫生处，1947年7月到军区卫生学校军医训练队学习，1949年12月任贵州军区总医院军医，1952年10月任第七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军医，1955年授予上尉军衔，获得国防部颁发的独立自由奖章和解放奖章。同年转业至成都，任职成都中医学院筹建办公室，后参加首期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学习。毕业后留校，先后任附属医院医务部主任、学院科研科科长。1983年离休前任省计划生育研究所党总支书记。2021年1月20日病逝，享年98岁。

回顾先辈创业历史

撰写人/李继娟

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喜迎建校65周年华诞之际，不由得让我忆起先祖父为中医事业贡献了他一生的精力和心血，更激起了我对他老人家深深地怀念和敬仰之情，勾起对先祖父为维护和弘扬祖国医学的艰难历程及其辉煌成就的回顾。

先祖父李斯炽，1892年生于四川成都，在他23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并留校任理化助手，在此期间还兼任了成都市几所中学教职工作。

在先祖父青少年时，目睹庸医误人，深感痛惜，在名医董稚庵先生的启发影响下，立志学习中医，发扬国粹，以改进中医药为己任，他把自己主要的精力，倾注于中医事业，为实现“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愿望，开始了他从事祖国医学研究的艰苦岁月。当时正值成都地区军阀混战，伤亡载道，无人救护和掩埋，先祖父见义勇为，联合成都地区部分医务工作者，组成红十字会，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掩埋死者，此举在成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即“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强烈反抗，面对这一扼杀中医强大的政治恶浪，是退缩？还是迎战黑风恶浪？为了捍卫和挽救中医药的存亡，先祖父的回答是：“中医不可废，矢志岂能挠！”他以“誓与国医共存亡”的决心，毅然辞去所有教职，团结组织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同道，积极投入到继承发扬中医药事业的工作中。1930年春，先祖父辞去了理化教师职务，创办了康寿药室，正式挂牌行医。先祖父仁心仁术，凡劳苦群

众前来就医，无力负担医药费用者，均一律为病人免费服务，送医送药。当时成都市内有“三福堂”“从心斋”等民办慈善团体，先祖父以名医身份，经常参加慈善堂的义务医疗工作。每年夏秋疾病多发季节，康寿药室都要免费赠药1 000余剂（那时称为“施药”），使一部分患急症的穷苦病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1932年秋，成都霍乱流行，死亡惨重，丧声不绝，先祖父以极大的同情心和责任感，约集中医同道10余人，组成“壬申防疫队”（当年岁次壬申），由私人出资，采用民间验方，制成了“防疫避瘟丹”“甘露午时茶”有效中成药。深入城墙边、御河边等穷苦民众聚居之地防疫治病，免费治疗病人，并同时捐资印发卫生防疫资料，发动群众灭蝇灭鼠。经过40余日的苦战，最终控制了疫情蔓延，对防治疫病，减少死亡，起到了积极作用，收到了良好效果。

1936年，国民党政府再次下令取消中医中药，再一次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的反抗和斗争，先祖父联合在成都的中医界同仁们，请愿呼吁，四处奔走，为维护中医事业而斗争，积极策划，组织成立了“四川医药改进会”，创办了《医学改进月刊》。先祖父亲任社长，同时又与同道赖华峰、邓绍先、何伯埙等人筹资兴办了四川国医学院，并任其校董事及教务主任。在办学过程中，由于国民党政府横加阻挠，不许学院立案注册，并多次勒令停办，先祖父为争取学院合法地位而四处呼吁，不辞辛劳，并通过法律途径，请律师，上法庭，据理力争，奋斗不止。又因办学经费不能解决，先祖父就与同道们采取社会筹募，个人捐献，义务上课，借贷典当等办法，把他行医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投入到了办学之中，自己却负债如山。尽管有各方面的压力和困难，也丝毫没有动摇先祖父坚持办院培养中医人才的信心和决心，将四川国医学院坚持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抗战期间，先祖父带领四川国医学院师生，迁移城郊，冒着危险，坚持教学，表现了师生献身中医事业的坚定信念和顽强精神。从1936—1949年的10余年中，四川国医学院培养了大批优秀中医药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别在各中医院校、医疗单位、科研部门担任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绝大多数成为各所在单位的技术骨干，为祖国卫生保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成都解放了，中国共产党给中医事业带来了光明，先祖父也获得

了新生。1950年春，先祖父当选为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同年8月作为四川中医界代表，赴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1951年到1954年，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先祖父还清了他办四川国医学院欠下的所有债务，先祖父倍感党和政府对中医事业的重视和对他本人的关怀，工作更加不遗余力。此间与同道等人筹备成立了“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并任宣教部长，同时担任成都中医进修学校一、二、三、四班班主任。

1954年，先祖父参加首届四川省中医代表大会和首届成都市中医代表会，提出“按照成都市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对医学遗产有计划地加以整理、研究，使之逐渐系统化、科学化”的建议。同时筹备成立中华医学会成都分会，并任常务理事。为继承发扬中医药事业，团结中西医，先祖父即参加四川医学院的工作，组建了四川医学院中医教研室。1955年正式聘任为四川医学院中医教研室主任，从此便结束了康寿药室的行医生活，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研究工作中。为成都中医学院的成立，准备了基本的师资力量。1956年5月先祖父加入了农工民主党，任该党成都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9月，成都中医学院成立，1958年3月，先祖父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成都中医学院院长。抚今追昔，先祖父感慨万千：是中国共产党拯救了中医，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健康，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关怀备至，令他百倍感激，更激发了他对中医事业的热情和信心，更加坚定了要为祖国的中医药事业贡献一生的决心。先祖父曾多次受到党和政府表彰，在政治上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曾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选入主席团。1959年，由于先祖父对中医事业的突出贡献，获得国家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1978年，先祖父被授予我国第一批中医教授。在荣誉面前他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一如既往的态度，无论在教学研究、学术思想还是临床科研等方面，都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曾撰写和发表了教学讲义及学术文章数十篇，晚年时由儿子李克淦（我的先父）帮助整理编写出版了《李斯炽医案》一、二辑，给我们后世学子留下了宝贵的临床经验和学习财富。

先祖父的一生，勤奋进取，不怕艰难，不畏权势，热心公益，热爱集体，关心群众，且医德高尚，平易近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兢兢业业，为弘扬和发展祖国的中医药事业贡献了他毕生的心血。今天，我们迎来了建校65周年，

更加缅怀先祖父老一辈对中医事业的不朽业绩。回顾创业历史，看今天桃李满天下，成都中医药大学生机勃勃，校园春意盎然，莘莘学子定不负先人厚望，中医药教育事业在党中央和校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定会硕果累累，中医药事业更加发扬光大。

本文摘自《成都中医药大学报》（2016年）550期第四版，略作编辑。

撰写人简介：

李继娟，女，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小受祖父、父亲的中医思想熏陶，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热爱中医事业，十几岁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在父亲李克淦教授的指导下认真地学习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1985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在学校期间一直从事教务管理、中医教学和中医临床工作，于2001年移居海外，至今仍然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吴老“献图”与“说难”的故事

撰写人 / 陈先赋

在全国中医界中，有一幅令人瞩目、广为人知的照片，这就是著名中医医经学家、针灸学家，我校吴棹仙老师向毛泽东主席献图的照片。

1955 年底，吴老时任重庆市第一中医院院长，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会议期间，吴老回忆解放前民不聊生，中医受歧视打压，自己和同仁们为兴学校、办医院，历经艰辛的往事，心潮起伏、夜不能寐。特别是当他听到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得知党和国家要创办四所中医学院时，更是欣喜无比，振奋万分。老人思绪万千，想到中医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拼力奋争、梦寐以求的夙愿即将变为现实时，对党和毛主席的衷心感谢难以言表。

赴京之前，吴老同重庆市中医界代表及他的几位老友商定，要把自己多年精心研究的针灸成果——“子午流注环周图”献给毛主席。以示个人和重庆中医界对新中国的热爱，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恩。



吴棹仙老师向毛泽东主席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

当时，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拍下了吴老向毛主席献图的一幅珍贵照片，会后发表于《人民日报》，《中医杂志》做了转载，图片说明文字是：重庆市第一中医医院院长、中医吴棹仙向毛主席献"子午流注环周图"。

此后，吴老献图被广为传诵，国内同道驰书请益，络绎不绝。1956 年成都中医学院创办后，吴老调任医经教研组兼针灸教研组主任。

"子午流注"是针灸取穴的一种古传学说。以人体十二经中五俞穴为基础，配合日、时的天干、地支变易，来推算经脉的气血盛衰、开阖情况，决定某天、某时取用什么穴位，疗效更佳。吴老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向针灸大师许直初学习"子午流注"和"灵龟八法"两种古传取穴理法，获得称赞。加之吴老娴熟于针灸经典《黄帝内经·灵枢》，故能掌握《灵枢》补泻迎随之妙，在临床上根据患者病情轻重、体质、寒热、脉象等，详细辨证，分别采用时辰进针和不同手法治疗，取得良好效果。抗战初期，日寇在重庆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轰炸，罪恶滔天，市民躲到阴暗潮湿、卫生很差的山洞里避难，饥寒交迫，蚊虫滋生。当年疾病大作，市民不堪其苦。吴老以针济世，运用"子午流注"之"烧山火""透天凉"针技，辨证施治，活人无数，故有"神针"之誉。

为便习者临床运用和经验交流，吴老经过多年潜心研究，遂绘成"子午流注环周图"，按图方法推算，即可获得用穴时间，十分便捷。此图公之于世后，为了回答海内外同道有关若干问题，1957 年，吴老与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合著《子午流注说难》二卷，上卷着重解释"子午流注环周图"，并载 81 个穴位部位、证治、针灸法，每穴多有本人体会的按语；下卷专论手法，并附部分医案。此书 1958 年 4 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深受欢迎。

吴老尊古而不泥古，他根据临床经验，在运用针灸纳甲法（按：环周图属纳甲法）时，认为当与"灵龟八法"结合运用，更为全面，可补闭穴的不足。因此，该书 1965 年第六版时，补充了"灵龟八法"。

吴老强调，针灸之道，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为，非尽解《灵枢》，则无以成就；只谈理论，不精实际操作，亦无以成就。吴老不仅深悟《灵枢》之奥，而且几十年如一日地亲自操作，从不间暇。晚年，吴老操作

不便，也要亲自诊示，一一指点，毫不马虎，待人获救，心乃得安。吴老又指出，针灸亦非万全之策，当针则针，当灸则灸，为巩固疗效，还需服用中药，以补针灸之不足。

吴老于1976年去世，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就请学院针灸教研组著名专家余仲权等校阅该书，对外发行。此次校印，对原著推算日干支方法尚不详处做了补充，附日干支推算法，更臻使用。至1991年，《说难》已印行九次。

“子午流注”是祖国医学宝库的一份遗产，不少著名针灸专家都对其深入研究。如上海中医名家陆瘦燕先生，曾在1958年一次全国针灸经络研讨会上，为与会代表作针刺补泻手法的表演：做“烧山火”手法时，使受试者感觉发热；做“透天凉”手法时，使受试者觉得发凉。其精湛表演得到与会代表的喝彩。陆老还与上海中医学院生化教研组协作，对“烧山火”“透天凉”手法进行了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烧山火”“透天凉”手法不仅有人体客观的感觉变化，而且有实际发热、发凉的生理过程的物质基础。

“子午流注”这份宝贵的中医文化遗产，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有志研究者的心，相信随着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和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神奇奥妙之处，终将揭示于世。

撰写人简介：

陈先赋，男，1941年生，重庆市人，医学史专家、新闻学者。196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74年调成都中医学院工作，历任《成都中医学院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报》）主编、《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常任编辑，并任成都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医史文献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成都市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高校校报研究会秘书长、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地方志编委会特聘编辑等社会职务。出版著作有《四川医林人物》《四川名医传》（上集）、《成都中医学院发展简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和新闻作品数百篇。个人事迹录入《中国知名专家学者辞典》等人物辞典。

我们从小小四合院走来

讲述人 / 赵明俊

成都中医学院最开始选定的办校地址是在成都市四道街，那里原来是一个被没收的军阀公馆—— 一个小小四合院，这个四合院被划为两半，进门的左手边拟作为学院使用，右手边拟作为附属医院使用。我们要在1955 年下半年至 1956 年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校园基础设施的改造任务，这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给我们的时间也是相当紧迫的。

时任学校总务处处长的罗福基同志是咱们的好当家，学院前期筹备工作的资金使用全靠他带着大家艰苦奋斗、勤俭持家节省出来的，这部分资金在极其有限条件下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大家开玩笑称呼他为“铁公鸡”“铁算盘”。当时百货商场的东西很贵。他为了节省开支，不管是教学用品还是生活用品，都让采购员在保质保量且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郊县去买。在学院改造的过程中，罗福基也会前往各个施工现场检查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正是靠着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我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学校相关改造工作。1956 年 9 月，在四道街校址上，成都中医学院正式成立，迎来了中国第一代中医大学生和第一代西学中高研一班研究生。

当时学制为 6 年制，1962 级为 1956 年第一批进入学校学习的学生。今天看来，大部分 1962 级学生已成为学校各个专业的开拓者，成为中医药战线的大家，中医药事业经他们发扬光大。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医大师郭子光、刘敏如等。而西学中研究班的同学，无论留校，还是回到原西医院校，开设中医课，

从事教学、临床、科研，他们都成为中西医结合名家。

学院刚成立时，我们没有体育场，学校就发动全体师生员工利用假期投入到修建体育场的劳动中，校领导也带着锄头一处一处地挖，再一担一担地挑着泥巴去填平学校里的池塘。在修建过程中，不少人的手心被磨出了血泡，却没有一人喊苦喊累，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劳动着，在第二个学期开学以前基本上完成了任务。有了体育场地，打篮球、排球等运动都在这进行。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学校的文娱活动还开展得很热闹，记得当时我和刘敏如还演了一个话剧，名字叫《榆树林》，受到观众拍手欢迎。

1958年是学校发展至关重要的一年，国家和学校这一年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搞建设。当时教师总共三四十人，人虽少，但资深名人多。我记得油印室的同事们常常加班到深夜，他们马不停蹄地刻蜡版、油印，再把印刷好的教材装订成册，很是辛苦。为缓解这一状况，学校后来成立了印刷厂专门印刷教材等。这一年，在国家财力、物力的大力支持下，药厂、教学大楼、实验大楼、图书馆、中药苗圃、实验动物房先后拔地而起。在师生的积极参与下，学校也从四道街搬到十二桥，至此成都中医学院十二桥校区的教学行政机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

在困难时期过后，学校发展又重新回归正轨。由时任成都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的吴敬同志带头，利用周末、假期组织师生去龙泉驿植树造林，和农民朋友一起劳动，增强了师生与劳动人民的感情。有一年，茶店子下了冰雹，谷子被打在了稻田里，学校还组织师生去帮助农民把谷子拣出来。

改革开放初期，后勤工作非常辛苦，工作累，收入低，我们在不违反规定、不影响整个工作的情况下组织大家搞生产创收。后勤人员利用自己晚上和周末的休息时间生产鱼饲料，批发给小商店，客户用了后效果很好，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有时候，后勤处处长孙灵根等给校报投稿，所获取的稿费就用来招待到我校参观调研的兄弟院校同志作一些闲茶淡饭开支。总之，我们后勤生产创收的所得全部都用于支持学校的教学建设。

作为一名老职工，我看到成都中医药大学如今的发展，感到非常欣慰和开心，我希望现在这一届的领导班子能继续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学

的精神，带领全校广大职工为中医药事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而努力奋斗，多立新功！

本文由赵明俊口述，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整理。
采访时间：2019年5月10日
采访地点：赵明俊家中
文字整理：陈欣怡　孙雨萱　任　翔

讲述人简介：

赵明俊，女，1934年3月出生于四川南充，1951年7月参军，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7月—1952年12月为川北军区军医学校学员，1952年12月—1955年2月由成都军区卫生部从部队选拔参加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学习。毕业后，从部队转业到四川省卫生厅工作，1957年3月到成都中医学院工作，历任团委副书记、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基础部党支部书记、总务处党支部书记兼副处长、后勤党总支书记等职务。

建校选址

撰写人 / 吴丽娜

1956 年 5 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了全国中医学院筹建会。随后，由四川省卫生厅负责筹划，先后调派张华、刘洁、许允安、罗福基等同志，借用原成都中医进修学校地址于 1956 年 7 月 5 日成立了“成都中医学院建院委员会筹备处”。1956 年 9 月，学校借用成都中医进修学校校址正式开始招生办学，校址选择工作同步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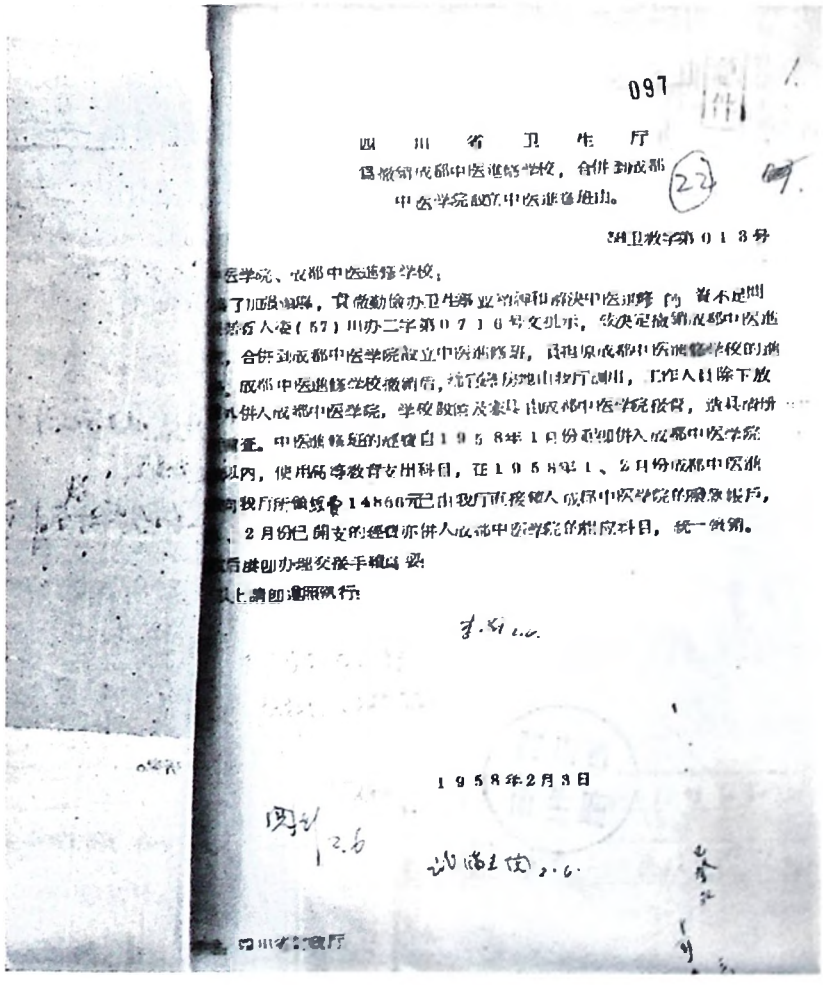
为了顺利展开建校工作，建校筹备处组织人员前往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重庆第一中医院（现重庆市中医研究所）、重庆第二中医院（现重庆市中医院）、第七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和附属医院等单位参观房屋设计、内部设备等，同时去函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中医学院及其他医校获取建校有关资料，为建校工作提供有力的帮助。



原成都中医进修学校校址

根据中央最初要求，中医学院须在五年内实现学生名额达2 400名，附属医院床位达600张的任务，建校筹备处负责联系、选择、确定校址工作。成都市城建委先后提供了四处基地。一是北门外城隍庙西面，面积够用，但缺水电设备且系洼地，环境不佳。二是北郊魏家花园附近，建设条件具备，只是面积不够用。三是城内春熙路东段以北，处于繁杂地区，又涉及大量搬迁，不适教学使用。四是东北郊环沙西路以北，处于住宅区内，有水电设备、交通便利、距城区1 000多米，且环境亦较幽静、土地亦较平坦，适于建校之用。

后经卫生厅、城建委及建校筹备处一同前往实地勘察研究，最后决定在东门外环沙路附近约290余亩（1亩≈666.7平方米）进行勘测。于1956年11月初完成了地形测量、绘制并报城建委核实规划建筑红线，初步确定建院范围。但是，后因中央要求将任务缩减为学生名额1 400名，随即重编计划任务书，



097

四 川 省 卫 生 厅

撤销成都中医进修学校，合并到成都中医学院设立中医进修班。

川卫教字第013号

医学院、成都中医进修学校：

为了加强领导，贯彻勤俭办卫生事业的精神和解决中医进修的资本问题，根据省人委（57）川办二字第0710号文批示，决定撤销成都中医进修学校，合并到成都中医学院设立中医进修班，我厅原成都中医进修学校的领导关系，成都中医进修学校撤销后，即行经房地由我厅收回，工作人员除下放外併入成都中医学院，学校设备及家具由成都中医学院接管，具体清理移交。中医进修班的经费自1958年1月份起即併入成都中医学院内，使用高等教育支出科目，在1958年1、2月份成都中医进修学校我厅所领经费14866元已由我厅直接拨入成都中医学院作预拨报销，1、2月份已开支的经费亦併入成都中医学院的相应科目，统一报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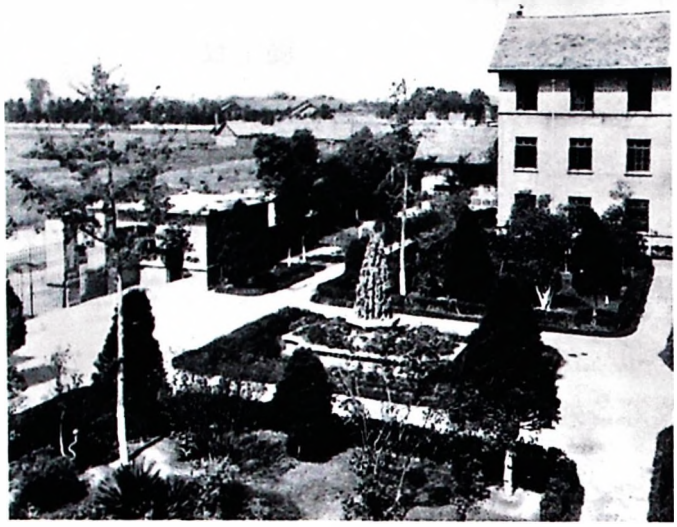
望即办理交接手续为要

以上请即遵照执行

1958年2月3日

四川省卫生厅

1958年2月3日，四川省卫生厅发文《撤销成都中医进修学校，合并到成都中医学院设立中医进修班》



建院初期的校园

修改工程投资概算和物资调拨申请工作。1957年国家物资紧张，12月4日接中央指示明确基建任务暂缓，全部申请工作停止进行。

按照省政府统一规划，1958年2月成都中医进修学校正式并入成都中医学院。原四道街校址交予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使用，同时成都中医学院迁校于成都市通惠门外新罗路13号原成都医士学校旧址，即现在的十二桥校区。

撰写人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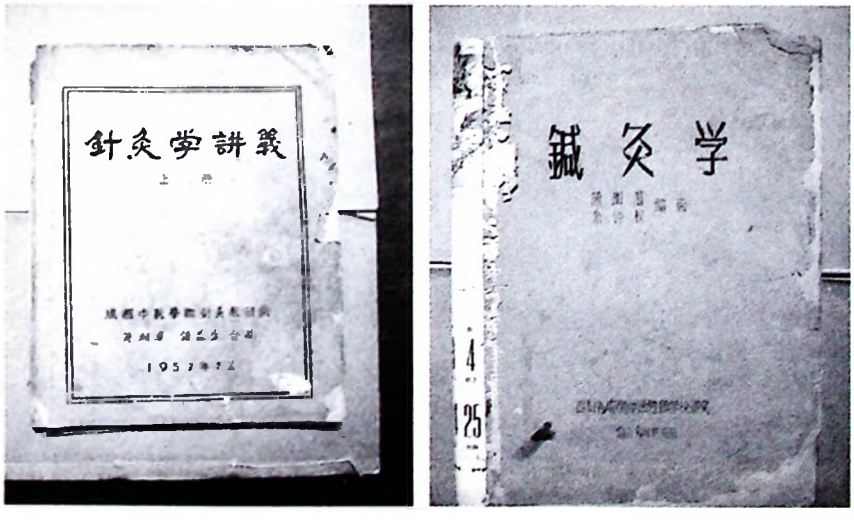
吴丽娜，女，汉族，1982年1月出生，籍贯浙江金华，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就职于成都中医药大学档案馆，长期从事高校档案管理、档案学基础理论及校史相关领域的研究，发表论文10余篇，取得副研究馆员职称。

建校初期的教材建设

撰写人 / 吴丽娜

建校头十年是成都中医药大学艰苦创业阶段，也是教材艰辛建设的十年。成都中医学院成立后，从省内陆续聘请了一批学有渊源、术有专长的知名中医药专家来校工作。教师有了，校址教室有了，然而教学中必不可少的教材怎么办？

当时全国四所首建中医院校均系初建，无可借鉴，所有教学大纲和教材讲义都得靠组织教师编写。为了保证 9 月 1 日开学时有教学大纲和讲义，1956 年 7 月 13 日，学校建成了“教学大纲和讲义编辑室”，下设伤寒论、内经、中国医学史、中医病理、诊断等编辑小组。教师们冒着酷暑，认真学习讨论卫生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拟订的教学计划体系及编写教学大纲和讲义的要求，昼夜奋战。8 月 27 日，各编辑小组终于完成了原定任务，全部完成了



1956 年，1957 年，成都中医学院组织编写针灸学教材和针灸学讲义

伤寒、医学史、中医病理、中医诊断等教学大纲及部分讲义的初稿，并报卫生部同意试用。

开学后，因人力不足撤销了编辑室，讲义编辑工作由各教研组负责，采取边编辑边讲学的办法进行教学。教师们既承担教学又担任科学研究工作，还要进行前所未有的中医药教材编写，任务极其繁重。但是开拓中医药，发展中医药高等教育的炽热事业心激励着他们。他们从大量的中医药古籍文献中收集，整理，边研究边写，边教学边提高，通过不断的实践过程，编写出教材大纲 15 种，讲义 54 种，教材 12 种，初步建立起学校的教材体系，适应了教学的需要。



1960 年 5 月，成都中医学院参加卫生部组织的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的编写，承担主编《伤寒论》《中医妇科学》和《中药学》3 门教材的任务

当时的针灸教研组在文献整理研究中心，对针灸历史记载穴位及主治、操作手法等做了系统的收集、整理和考证研究。蒲湘澄、余仲权、钟益生等老师编写了《针灸学》《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教研组在凌一揆老师的主持下，通过对历代医方及本草文献的研究整理，结合临床及民间的用药经验，主编了第一、第二版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中药学讲义》。妇科教研组在卓雨农老师的主持下，完成了全国中医学院第一、第二版试用教材《中医妇科学讲义》的编写任务。邓绍先老师负责主持了第一、第二版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伤寒论讲义》，并撰写了《伤寒论要义总述》。李斯炽院长撰写了《治疗瘟疫（钩端螺旋体）的初步总结》和专著《素问玄机原病式探讨》《医学三字经简释》等，邹仲彝老师著有《金匮义疏》《医学源流论评议》等，吴棹仙老师出版著作《子午流注说难》。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学校还组织力量编著出版了《中医常用名词简释》《中医滞漏治疗图解》《中药方剂临床手册》《中医内科临床手册》《中医



1961 年 5 月 13 日，组织教师参加全国中医中级教材审编会议



1963年，组织教师参加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的修订工作

妇科临床手册》《中医外科临床手册》《中医儿科临床手册》《针灸临床手册》等书籍。这些工作为中医药教材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时中医药界认为：这些教材具有“既全面，又简明的特点，同时也增强了中医理论的系统性”。

撰写人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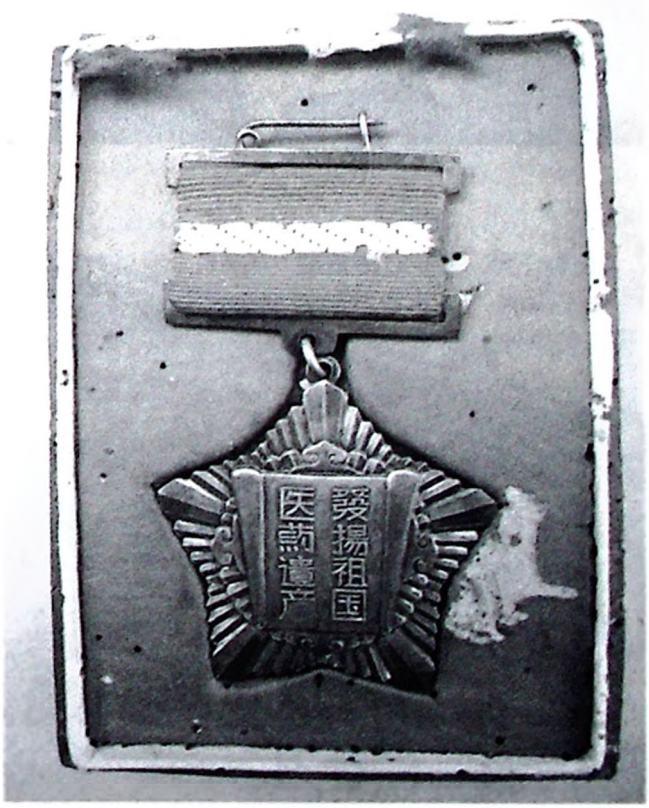
吴丽娜，女，汉族，1982年1月出生，籍贯浙江金华，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就职于成都中医药大学档案馆，长期从事高校档案管理、档案学基础理论及校史相关领域的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取得副研究馆员职称。

三枚奖章

撰写人 / 吴丽娜

在成都中医药大学有几枚特殊的奖章，见证了成中医前辈的辉煌，记录着他们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事业中创造的突出成绩。

朴实、厚重、制作工艺简单，让正中“发扬祖国医药遗产”八个字格外醒目。这是一枚散发着历史气息的奖章，你需要“穿越”到20世纪50年代才能感受它的品质与温度。



20世纪50年代卫生部为我校教师颁发的金质奖章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卫生部开始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除了一般在职学习外，以培植医疗、教学和整理研究中医学的骨干为重点，进一步广泛推动西医学习中医，组织了离职学习班六个班。第一个西学中研究班是1955年12月由中医研究院创办的。



成都中医学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典礼



成都中医学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学员

1956年6月，成都中医学院在筹备期间，受卫生部委托，在云、贵、川、陕、甘、青海等省招收了3年制高级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学生39人。6月4日中医研究班正式开学，李斯炽任班主任，侯占元任副主任。39名学生中来自四川19人，陕西8人，甘肃2人，青海1人，云南6人，贵州3人；学员原任职务有主治医师以上者12人，医师助教25人，原做卫生行政工作的2人；最大年龄54岁，最小年龄24岁；党员4人，团员7人。

为了推广西医学习中医药学的学习班经验，卫生部号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积极举办西医学习中医班，大力培养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务工作者。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为了奖励在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方面有突出成绩的单位，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事业中创造了突出成绩的中西医务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布嘉奖令，决定授予特殊贡献者奖章与奖状；授予一等个人奖金质奖章和奖状；二等个人奖银质奖章和奖状；三等个人奖奖状。

因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成绩卓著，1958年，我校蒲湘澄老师荣获卫生部金质奖章，1959年，李斯炽老师荣获卫生部金质奖章，邹仲彝老师荣获卫生部银质奖章。

撰写人简介：

吴丽娜，女，汉族，1982年1月出生，籍贯浙江金华，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就职于成都中医药大学档案馆，长期从事高校档案管理、档案学基础理论及校史相关领域的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取得副研究馆员职称。

我的大学生活片断回忆

撰写人 / 张之文

我是1957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医学系本科的，学制是6年。为什么选择中医？因为在中学时期我生了两场大病，是中医给治好的。这位中医就是李斯炽院长长子李幼斯的国医学院同学，在他的建议下我走上了中医求学之路。在入校途中结识了第一位学友黄天文，我们结伴而行。当抵达成都走出火车北站时，心情格外激动，但环顾四周却没有发现我校新生接待站，于是花了一角钱请一位小弟弟做向导，拎上简单行李，穿过田间溪径，大街小巷，寻找四道街。原以为四道街是成都四条主要大街，经过一番折腾，终于进入一条挂有成都中医学院牌子的小巷。老成都人说，长顺街是一条蜈蚣虫，向两侧辐射出若干细足，四道街就是其中的一条。没料到一所直属中央卫生部、由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准建立的高等中医学府会坐落在偏僻的里巷，心中浮起丝丝不悦。进入校区，仿佛置身于一所小学，没有像样的教学楼，紧邻食堂有一篮球场，旁边是一茅棚运动室，仅可安放一台乒乓球桌。其后是一臭水坑，周边堆满垃圾，周末师生义务劳动将其填平。学生佩戴的校徽仿制于四川医学院（即后来的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白底阳文，楷书白字，曾有路人好奇地望着我们问："你们中医学院招收小学生或初中生？"我脸上一时火辣辣的。一个周末外出游玩，穿过通惠门，看到路边耸立着一幢耀眼的新大楼，悬挂着成都医士学校牌子，心中又暗生几分不平：大学为何不如中专？不过领导常给我们讲，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而美好的，新规划的校舍在东郊猛追湾，其规模与同时建校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差不多，我们憧憬着未来。一个学期很快结束了，新校

建设没有丁点消息，但得到通知，今年不放寒假，学校搬家。真有这么巧，迁入的地址正是我曾经因羡慕而生醋意的成都医士学校。1958 年春节前夕完成了挪窝，就是现在的老校区，十二桥路 37 号。

现在老校区这栋灰色的大楼已很陈旧，可在当时却是集办公、教学、实验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楼。因面临干道，地处交通要冲，自然成了我校标志。其后是运动场，规模不大，有两条小河从南北边沿穿过。再其后则是宿舍，呈东西两侧对称分布，东侧四栋，西侧四栋，习称“老八楼”，现在的老人还不时念叨着我原住在老八栋某某处。西侧住教职工，东侧则住学生。东西两侧间隔较宽的林荫道，种植芙蓉，花开绚丽。林荫道南端与小桥相接，桥上葡萄架攀满茂密的枝叶，下置条凳，供休闲小憩。这里早晚倩影依依，书声琅琅。教师宿舍用砖墙围起来的。1968 年我校承担了“710”（中医药防治钩端螺旋体病）战备科研，建动物饲养房和实验室需要砖块，拆除了教师宿舍的围墙，利用了砖头。宿舍两层楼，木质结构，厨房在楼下，与卧室紧连，可住学生一人。老八栋东侧尽头是女生宿舍，面临药圃，花香扑鼻。据说老八栋是原商业厅的宿舍。现在的运动场、学生公寓大约相当老八栋位置。以后陆续增建教室，包括阶梯教室和茅屋教室，另建起三层楼学生宿舍一栋，逐渐改善了办学条件。新建的办公楼第一层供后勤使用，二楼是行政办公室，三楼是教研室。那时没有“保安”，校门口设收发室和值班室，收发室由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张兰英一人收发全校的信件和分送报纸，师生亲切称她张大姐。武保申大爷日夜值班守护大门，还赶着马车运送生活用品，尽职尽责。校园西侧与成都市传染病医院相邻，一条小溪将两单位分隔，修竹尾尾，潺潺流水，平添几分幽静。后来传染病院迁走，附属医院逐渐将其改建，增建了住院部和门诊大楼，当时急需建材，领导派我赴甘孜州炉霍县林场为工人和领导看病，希望为我们医院配送优质木材。没想到医院发展很快，这栋门诊大楼已拆除重建，代之而起的是现在新型多功能门诊部，这都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

我们的领导都是老资格，院长李斯炽先生在全国享有崇高威望，历任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几乎每届都是主席团成员。党委书记张华同志是部队转业干部，副院长卢耀西是国务院来的，院办主任许允安，总务处长罗福基，党办主任蒲布，人事处长彭鹤鸣等，多是“三八式”干部或老红军，他们经常给学生做报告，或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或思想政治教育。老领导侯占元，当过科长、处长、副院长，是中医发展战略研究的专家，高屋建瓴，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享誉中医界，几乎成了我校名片。侯副院长平易近人，关心学生，时与学生活动在篮球场上。我刚毕业办理有关手续时遇上了麻烦，学生时借用的被子和蚊帐已破烂不堪，甚至不知其下落，打报告请求用第一个月工资买新的偿还，侯校长当面在报告上批示注销所借物品，嘱我尽快到总务处办理，作为穷学生的我顿时一股暖流淌入心田。学长赵立勋老师手术后不能躺卧硬板床，侯院长将自己的软床让出，供赵立勋使用。主管教务的是1958年从华西医科大学调来的医学教育专家魏云祥，他儒雅严谨，和蔼可亲，为中医药教育呕心沥血。欢送他调离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没想到若干年后，他曾经领导的单位并入我校，又成为一家人。魏老已90多岁，近几年数次来老校区与他的老部下及学生小聚，参加人员如周邦靖、付少明、曾诚厚、陈淑芬、陈维斯、王宗伟（曾任科研处长）等，我和我夫人张天秀作为学生多次参与，我们也曾到魏老人南生殖学院宿舍拜访他。

读书期间，我们参加了上山下乡“除害灭病”，由老红军龚锦文带领，足迹遍及北川、平武、青川、江油等县，1960、1961年一段时间分赴雅安各地治疗水肿病，教务科长刘希诚（后任副处长，抗日干部）任领队。有个农忙季节，我们接通知步行到温江县万春公社抢收抢种，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刘光华老师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周末例行环境大扫除，推着“鸡公车”运送垃圾。

我们年级开设的课程较多，公共课如哲学、政治经济学、语文（不是医古文）、俄语、拉丁语、世界医学史、中国医学史、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包括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胶体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中医课程有内经，伤寒论，温病学，各家学说，中药学，方剂学，中医诊断学，针灸学，中

医内、外、妇、儿，眼科学，骨科学等，还有气功课。未开设《金匮要略》，有关内容融入中医内科学。邹仲彝老师是著名的《金匮要略》专家，我们没有机会聆听他的讲课，深感遗憾。西医课程有生理学、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寄生虫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内科学基础、外科学总论、X 射线诊断学、骨科学等。

中医老师朴实敦厚，是我们中医知识的启蒙者和导师。他们不少是从基层“访贤”上来的，原是一方名医，临床经验丰富，不乏饱学之士。学生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对老师抱着强烈的期待。老师们深夜挑灯写教案、查资料，极尽操劳，但因缺乏教学经验，真有“茶壶装汤圆”——倒不出来的感觉。他们尝试自编讲义，上课前油印成几页分发给学生，课程结束时则自行将其装订成册，不像现在有成熟的全国统编教材或规划教材。我们一时难寻门径，颇感迷茫。吴棹仙老师将《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难经》等有关生理、病理部分编著成《医经生理学》《医经病理学》，第一次作为教材在我们年级使用，近年房明东博士将其校注出版，是不可多得的学习经典的好书。李斯炽院长作内经专题讲座。刘述机老师主讲《伤寒论》，戴佛延老师辅导。邓绍先老师是全国著名伤寒专家，因身体不好不讲课，我留校工作后与教研室青年老师一起到他家聆听过他的专题，内容以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为主，深奥难懂。温病已有南京中医进修学校编写的教材《温病新编》，由刘旭辉主讲。宋鹭冰老师没上我的温病课，后来受到他的指导。中药学凌一揆老师编写了《本草学讲义》，他讲课内容少而精，逻辑严谨，深入浅出，深受欢迎。凌老师不像一般的中医老师，着装时尚，头发一丝不乱，皮鞋锃亮，精神饱满，学者风度，业余时拉琴自娱，或垂钓品茗。陆闻鸿老师主讲方剂学，文琢之老师主讲中医诊断学，孔健民老师主讲中国医学史，李介民老师辅导。中医内科学由李子犹、刘耀三、彭履祥、冉品珍老师主讲，雷德明老师辅导。冉品珍老师挑着书箱下乡带习成为佳话，虽然他神色冷峻严肃，刚直不阿，但对学生关心，不乏幽默，如称某女生学习努力，睡着了都拿着书在看，批评某男生懒惰，拿着书就睡着了，很是逗笑。中医妇科由卓雨农老师主讲，曾敬

光老师辅导。1963年卓老师病逝，在省政协礼堂举行追悼会，省市有关领导出席，气氛庄严肃穆。中医眼科学由陈达夫老师主讲。我们那时还保留了中学时期的礼仪，路遇老师则敬礼，记得给陈达夫老师致礼时，他总是笑呵呵地频频点头回敬，十分亲切。改革开放后，陈老出席了全国科技大会。蒲湘澄、余仲权、关吉多老师主讲针灸学，蒲老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案例典型，语言生动，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好。蒲老曾获卫生部金质奖，出席全国群英会。中医骨科学由罗禹田老师主讲，中医外科学由吴介成老师主讲，许玉辉老师担任气功课主讲。

公共课和西医课老师来自方方面面，第一类是外校援教老师，如世界医学史由华西郭成圩教授主讲。语文由四川大学黄念田老师主讲，郑孝昌老师辅导。黄老师自编讲义，常引注其父黄侃（北大名教授）《文心雕龙札记》的相关内容，后来采用王力教授《古代汉语》作为教材。黄老师形似潦倒，放怀不拘，妙语连珠，语出惊人，他渊博的学识受到敬重。黄老师曾给毛主席致函，我们年级有几位同学到望江楼陪他喝茶，目睹过毛主席回信原件，我从《毛主席书信集》看到致黄念田先生，注释黄念田四川大学副教授。后来黄老师正式调入我校。生物学由省医院杨聚义主讲，邓邦兰（后下放西昌）辅导，寄生虫学由华西胡孝素教授主讲。西医内科学由省医院医内科主任吴德诚、吴孝感主讲，附属医院高蕊娟主任讲授部分内容。吴德诚是全国著名心血管专家，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回国。我曾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开展卫气营血临床科研，吴德诚兼查房，再次受到他的教诲，每次病案讨论结束时他都要问："中医学院张医生有什么补充？"有时晨练在一环路相遇，他也会停下脚步与我寒暄，从他身上可以看到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外科学由省医院黄文主任、潘慈康主任（后任院长）主讲，骨科由盘宝聚主任主讲。第二类是从外校调入我校的资深老师，如雷利坚教授主讲物理学，李述宗、宋熙、罗莹芳等教授主讲解剖学，杨纪曾教授主讲生理学。肖崇厚、邬碧辉教授主讲化学，徐本仪老师主讲组织胚胎学，姚鸣春教授主讲生物化学，周邦靖教授主讲微生物学。我与周邦靖老师颇有缘分，1965年巡回医疗时，吴棹仙老师任队长，我与周老师同

住一室，半年时间朝夕相处，1968 ~ 1973 年的 5 年期间，又与周老师一起从事钩体病研究，获教多多。现周老 90 多岁，精神矍铄，我们在一起时，回忆许多往事。第三类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生中分来一批青年骨干教师。他们充实了教学力量。

我们是第二届学生（时称 1963 级，按现在称谓是 1957 级 1963 届），入校 60 名同学，是招收最少的一届。1956 年卫生部委托我校举办高级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简称高研班），1958 年开办中医进修班，进修班生源是基层中医，高研班是选派来的高级西医（主治医生以上），大约是第三届以后，放宽了要求，一般的西医都可选送，名称则改为西医学习中医班。1959 年建立药学系，招收第一届学生。本科学生中有“调干”生，指在职干部考入的学生，带有一定数额薪金学习，我们年级资历最老的“调干”是抗日老八路范忠贵，现年近九旬，还在为社区居民义务服务，曾多次提名“中国好人”候选人，先进事迹见诸媒体。他担过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省长李大章的兼职保健医。1962 级老大哥“研干”生最多，首届学生会主席张锡常，入学前是贵州省某县卫生局长。1964 级军人学员最多，大约不低于 20 名，中尉至大尉军衔，“高研”二班的军人学员有少校、中校军衔者。学生年龄悬殊，穿着各异，高研班和“调干”学员，着装较洋气，进修班和本科生服装较简朴，个别进修班学员还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大袴，现在只有影视剧中可见。军人学员军装整齐，领章金星闪烁。下课或进餐时，人流集中，多种多样的服饰形成一道特别风景线。在我们眼里高研班学员似乎带有几分学者的气质，进修班学员老成持重，而我们应届学生则充满活力，甚至爱“咋呼”。大家各自保持距离。

校园学习氛围浓厚。高研班王成荣研究整理中医理论成果显著，荣获卫生部金质奖章。进修班中的佼佼者被留校当老师，有的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专家教授，如杨介宾、陈潮祖等。毕业时统一分配工作，同时填写志愿书，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需要的人数极少，多数指标在专县基层医院，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三州，当时的信念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们的生活待遇当时在成都高校中可能是最好的。记得第一餐和黄天文同学用的大号青花瓷碗盛饭，可能是原来挨饿久了，潜意识驱使各自选购了一个大碗，看见其他同学使用的是袖珍小碗，不禁汗颜。当端起不用花钱的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饭时，感慨良多，从此再不为吃饭发愁。只有中医学院学生才享受与师范院校学生相同的待遇：生活国家包干了。除此以外，还可申请助学金，以补充平时生活所需，个别的冬季可申请棉袄。党和政府为发展中医药事业做出如此巨大的投入，激励了莘莘学子的学习热情。1957 年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 9 元，以后增至 12.5 元（城市居民大约每月 5~8 元），标准比较高，吃得很好。炊事班长钱凤起，做得一手好饭菜，就餐前已摆好在桌上，纱罩罩着，到下课开饭时，8 人一桌，座式就餐，菜肴丰富多样。

学校文娱生活丰富多彩，周末利用食堂举行舞会，轻音乐一响，自然翩翩起舞，友谊舞、交际舞，文明礼貌。每逢国庆、五一节则集会庆祝，排练和表演节目。在现在的天府广场科技馆附近搭建类似天安门的城楼，西南局、省市首长，登楼检阅游行队伍，我们学校薛鉴铭老师（针灸）是省级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在城楼上，当扯着“成都中医学院”横幅的队伍经过时，他频频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为有薛老师而自豪，欢呼雀跃。特别是 1959 年国庆十周年庆典，成都所有大学生集中在人民南路广场，通宵达旦，或歌，或舞，尽情表演，充满朝气、活力，由衷祝贺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周末有时在操场放映露天电影，争先恐后，摆凳子，占位置，难抑期待。文娱节目留下深刻印象的有我们年级的“胖大嫂回娘家”，扮演胖大嫂、尖嘴幺姑的同学，一直被大家亲切称呼为“胖嫂”“幺姑”，乃至忘叫本名，延续至今。1962 级的舞蹈“花儿与少年”，很吸眼球，高丽民的美声、郁文骏的京剧、马有度的快板书等精彩叫绝。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如烟，我们的领导、老师有些已作古，当我回忆起他们时，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是他们的教诲培育，我们才走到今天。我们缅怀逝者，向其英灵致敬，祝健者更健康，长寿幸福。今天我们踏着前人的脚步，进入了暮年，成为耄耋老人，一切似乎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昔日

同窗不少与我们阴阳两隔，他们在另一世界也许同样能看到母校的巨大变化，校园恢宏，绿树成荫，人才辈出，也会难抑激情，与我们一起讴歌。

本文摘自《成都中医药大学报》556 期第 15 版。

撰写人简介：

张之文，男，成都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著名温病学家，首届全国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第二、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导师，四川省名中医，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首批四川省委直接掌握联系的高层次专家，四川省首届干部保健专家。获四川省医疗卫生终身成就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及省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出版专著 21 部。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受聘为台湾长庚大学客座教授，并多次受邀于瑞士、美国等讲学。

早期教材建设，一条责无旁贷的漫漫长路

讲述人 / 万德光

1958年7月，我毕业分配到成都中医学院，适逢中药专业开办筹备，学校正有序地组织各项筹备工作，老师们也都全力配合。学校鼓励教师们积极参与建设，我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最初只是列席旁听学习，但随着筹备工作的推进，我逐渐领悟到自己的责任，虽为初入校园，但作为学校的一分子，参与学校建设责无旁贷。从那时起，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作为专业老师应主动参加学校的专业筹备工作，尽我的微薄之力。

满腔热血　主动请缨

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有两项工作：一项是中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另一项是教材、器材和人才的“三材建设”。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制订教学计划，确定培养目标，确定课程设置，最后敲定教师配备。学生进校要上课，老师要讲课，师生手里需要有教材。这时学校就面临了一个大问题——教材建设。因为新生马上要招进来了，时任领导强调教材建设任务非常紧迫。我意识到：我应该积极地参加教材的建设。

学院明确了教材建设基本方案，即采用现有的教材或借用或自编。比如，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医古文等中医基础课程，可以直接采用中医学专业的现成教材；中药学专业专门设置的课程教材，采取借用和自编两种途径解决。

我所在的学科课程小组所涉及的课程有药用植物学、药用动物学、中药鉴定学，其中药用植物学可借用孙雄才主编的《药用植物学》，药用植物实验

导教材则需要自编；药用动物学及中药鉴定学课程当时没有院校开设，无教材可以借用，必须自编。

那时学校师资很少，每本书只有1名或者2名老师编写，编写教材的队伍也很年轻。我那时仅20出头，正是满腔热血的年岁。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主动请缨，一个人负责《药用动物学》教材的编写。曾万章老师也主动担起《药用植物学实验指导》的编写，贾敏如和李仿尧老师承担起了《中药鉴定学》的编写。

向老祖宗学习 图书馆里“寻根问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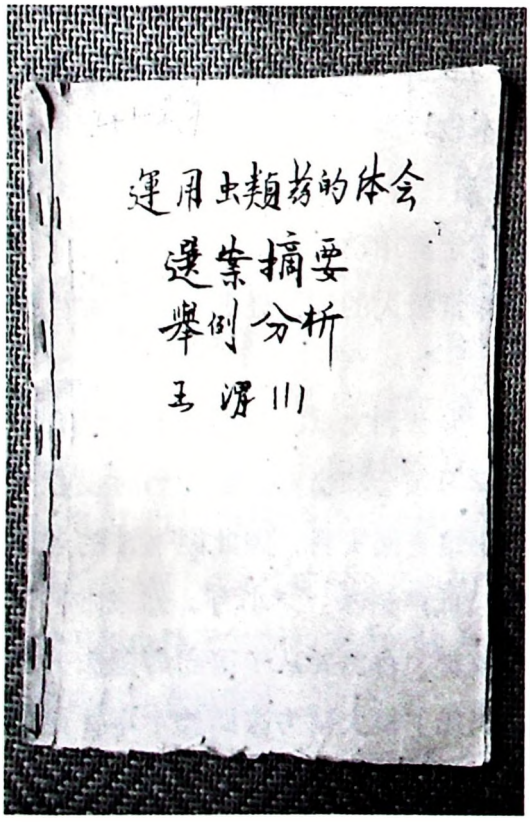
重任领下来之后，当我拿起笔准备编写时脑子却一片空白，瞬间觉得编写工作任重道远。领导很重视教材建设工作，我们领取任务后立即得到了分管领导和专家的关心、支持与帮助。时任教务处处长的魏云祥指导我们先编写一个提纲出来，交由教务处审定，然后再开展后续的编写工作。有了魏处长的指导，好似灵光一现，我就熬更守夜地编写提纲。我的大体思路是：作为中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药用动物学在专业中的定位是什么？在人才培养目标中应该起什么作用？我认为这本教材需要帮助同学们掌握药用动物的基本知识（包括药用动物的形态、构造、分类及本草中记载的相关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以及识别和鉴定药用动物的方法。我编写完大纲后，交由教务处审批。紧接着，便是工作量极大的编写任务，我们继续挑灯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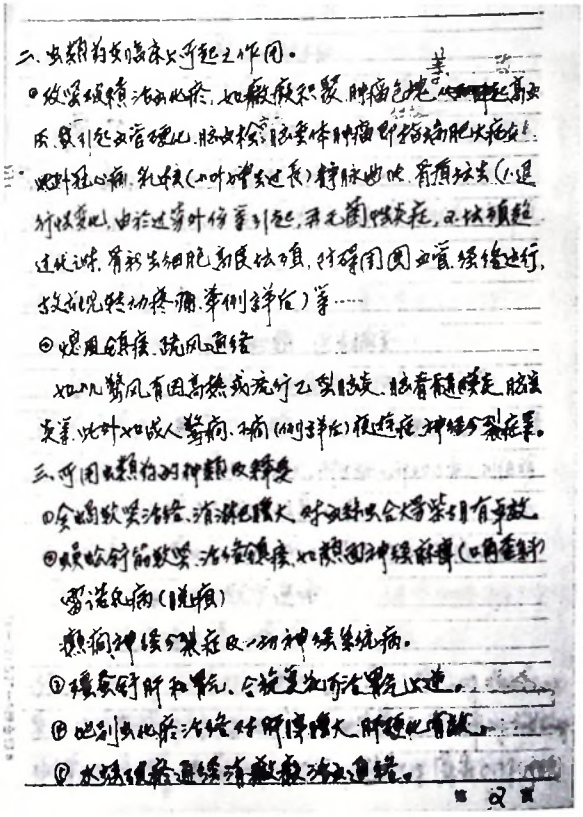
编写教材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借鉴相关专著和文献，我们的老祖宗有很多宝贵的中医药经典论著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领会和借鉴。因为当时没有网络，资料只能自己翻书寻找，我经常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因此图书馆的老同志们都跟我熟了。每次去图书馆，他们都会低声招呼：“小万，你来啦！”由于我编写的是中药学专业的药用动物学教材，自然要从中医药的源头去寻根问底。因此，在查阅资料这段时间里，我花了很大精力去阅读本草，比如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明代的《本草纲目》等。在教材的绪论里，我借鉴了古代本草中记载的药用动物药。《神农本草经》记载的动物药已经

达到65种，绝大部分动物药沿用至今。明代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中收载的药用动物药高达466种。让我非常震撼的是，李时珍将这些动物药进行了分类记载，虫部有99种、鱼鳞部有85种、禽部有75种、兽部有121种、人部有35种。看了《本草纲目》之后我备受鼓舞，因为我找到了药用动物的源头。

专家“会诊”　教材要有中医药味

我还查阅了大量的现代动物学领域关于动物形态、分类、结构等方面的书籍。因为专业学习时已有一定基础，所以阅读这些书籍时很顺利。在查阅中医药有关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著名中医妇科老专家王渭川的指导。有一次王老先生跟我说：“小万，你编写药用动物学是件好事，动物药为血肉有情





王渭川老先生赠送的虫类药应用医案

之品，可产生同气相求，疗效必会卓佳。”自那以后，我常请他解惑，便与王老先生熟稔了，后来老先生把他整理的有关虫类药运用医案赠予我，阅读后让我茅塞顿开，真切体会到了动物药在临床治疗中的卓越疗效。

查阅药用动物资料的过程让我很深刻地领会到，动物药在我国应用历史悠久、品种众多、疗效卓著，也进一步认识到编写好这本教材的必要性，我一定要把这些珍贵、有价值的动物药知识引入教材，告诉我的学生，于是心中便多了一种使命感。后来在书中涉及国内药用动物的地方，我一直坚持所举的例子都是本草中所举，有根有据，尽量让教材有中医药味。保证自己所讲述的不是普通动物，而是有中药味的药用动物。后来，我指导青年教师讲课时，也常常告诫他们“讲课一定要讲出中药味”。

编写这本教材的基本标准之一，便是对学生学习的思维辩证与能力培养，包括培养学生辨识动物药的能力、对药用动物的基本形态结构的了解、掌握对药用动物的分类方法、了解动物药在历代本草的记载及当今的应用。让学生能看懂、能领悟、能学到、能应用，这就达到了我们建设教材的目的。

漫漫长路　终有所成

药用动物学教材编写完后，魏云祥教务长亲自审稿，教务处通过后，《药用动物学讲义》于1961年1月由学校缮印室打印装订成册，正式在中药学专业的学生中使用。紧接着1961年9月我又编写完成了《药用动物学实验指导》，与教材配成一套教学用书。到了1964年我又进行了《药用动物学讲义》第二版教材的编写，于1964年10月完成。此版从整体内容到印刷质量都有提高。1993年我领衔主编高等中医院校协编教材《药用动物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于1996年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教材一等奖。2009年我担任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药用动物学》主编，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药用动物学教材建设，从校自编讲义（1961年1月）发展到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9年9月），历时近半个世纪，可以说是一条紧跟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的漫漫长路。在这条路上，我除了完成了药用动物学教材建设的工作外，我还相继主编出版了以下教材：《中医学习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1月）；《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纲要》（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年10月，成都中医药大学特色教材）；《中药品种品质与药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2月，教育部面向21世纪创新教材项目）；《中药资源学专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11月，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规划教材（首版）]。



万德光老师主编的部分教材



万德光老师主编的部分教材

在对教材的持续建设发展工作中，我受益良多。这项建设工作赋予了我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使我在一个个接踵而来的艰巨任务中领会到，面对高难度的工作时一定不能急于求成，要踏实走好每一步，否则将会欲速则不达。我始终认为，我们要把握住每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你珍惜，愿意去做，踏实肯干就一定会获益匪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所能做的就是将我的一生献给我所热爱的事业。

本文由万德光口述，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整理。
采访时间：2021 年 4 月 9 日
采访地点：万德光教授住所
文字整理：康玙歆　邓玉思

讲述人简介：

万德光，女，四川省成都市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重点学科中药学学术带头人，是当代中药领域开创学者之一。主编出版了《中药品种品质与药效》《中药品质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四川道地中药材志》《药用动物学》《中药分类学》《中药资源学专论》等专著及教材。主持完成了国家及省部级科研、教育研究项目多项，获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4 项、四川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4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项、中国药学发展奖（中药）1 项、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教材一等奖 1 项，获评首届“四川省医疗卫生终身成就奖”。

成都中医药大学早期药圃的记忆

讲述人 / 万德光

1958 年，师生齐动手在十二桥校区现在的操场右后方建了一个药圃，占地约 1 300 平方米。虽是小小一块地，但那里四季花开，药草飘香，是一个鲜活的中药标本馆，是师生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学校早期药圃

药圃玲珑布局，精妙独到

学校早期的药圃规模袖珍但是极富中医院校特色。药圃选种 500 余种中药，药味十足，可谓“布局合理，小巧玲珑”。一走到药圃，就能看到两旁砖砌的柱子，中间是木栏门。我清楚地记得木栏门上有一块很是简易的木牌，上面写着“药圃”两字。

进门是一条林荫小道，由一个绿色的大棚高高撑起，棚顶上布满了绿色藤本植物，前半部分是金银花，后半部分是瓜蒌。瓜蒌和金银花都是生命力极强的药用植物。从春至秋，藤叶繁茂蓬勃，相互缠绕，铺满了整个棚顶，编织出了一条葱翠的绿色走廊。这条林荫小路把药圃分为了左右两部分，井然有序地种植着 500 多种药用植物。

药圃内的植物种植规范，科学有序，放眼望去一目了然。四周被乔木环绕着，中间较为宽敞的地方是草本类中药，按类分成许多小块，分厢种植，便于老师们带领学生近距离观察和辨识中药。

木本植物中，令我记忆最深的是进药圃门左侧的一株钩藤，藤茎粗壮、横卧向上而生。初次见它的人都会倍感惊讶，因为平常在药房看到的都是小小一段带钩的茎，原来它的茎藤还能生长得如此粗壮。这是我刚到中医学院接触到的印象深刻的一味常用中药的基原植物。

药圃中部种植的草本类中药品种多样。有川丹参、川白芷、芍药、白术、龙牙草、川射干、川红花、川麦冬、京大戟、马鞭草、杏叶沙参、桔梗、天南星、半夏、百合等。由于搭配得当，一年四季不同的药用植物相继开花，何时进入都是花团锦簇、满目葱茏。比如 4 月正是鸢尾盛开的时候，当鸢尾刚刚凋零，芍药花、牡丹花又继而盛放，简直是一个充满魅力且富有活力的“天然实验室”！药圃也因此成了师生们最喜欢的学习中药、观察药用植物、感悟中药之美妙的胜地。

药圃左后方有几株生气鲜活的杜仲，是我带学生要去观察的一种药用植物。杜仲以树皮入药，断面有细密、银白色、富于弹性的胶丝。但要观察这一特征，树皮是不能动的，我会让学生拾杜仲叶片折断观察。会发现叶片断面也

有白色胶丝，从而直观理解杜仲的这一特征。并且学生们会联想到杜仲皮和杜仲叶都有胶丝，就会提出一个疑问：杜仲叶是否也可以入药呢？然后我就会引导学生思考同基原多部位入药的可能性，当然要回答这一问题离不开本草考证、实验研究和临床观察。后来经研究证实了杜仲叶确可药用，已经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药圃右后方有一株枇杷树和一株荷花玉兰。这两种植物的叶子有些相似，若不仔细辨认易混淆。因此，老药工徐大爷便故意把这两种树种到一处。徐大爷后来告诉我："曾经有位年轻老师采枇杷叶回去给娃娃熬水喝，结果认错了，采到了荷花玉兰叶。娃娃喝了之后便出现了不良反应，这时候才反应过来采错了。"后来一旦有学生来药圃看枇杷叶和荷花玉兰，徐大爷总会在一旁提醒，还会折下枇杷叶和荷花玉兰叶让他们比较观看：枇杷叶上面光亮多皱，下面密生灰棕色绒毛；荷花玉兰叶上面深绿有光泽，下面密生锈色细毛。经过这样直接的对比，学生们对二者的差别便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年的药圃对内开放受到广大师生欢迎，对外也颇具影响力，曾经是国内外同行专家来校参观、交流、考察中药的窗口之一。

种药杏林园，药圃耕耘人

药圃种植有特色，布局有序，管理规范，这份成果与徐大爷的贡献分不开。徐大爷本名徐安福，但我们都叫他"徐大爷"以示尊重。徐大爷五十出头，中等个子，敦厚朴实。他是这里的老药工，负责药圃的耕耘和管理，在药圃旁有一个小房子，他和徐大娘就住在里面，一年365天几乎未曾离开过，始终守护在药圃。夏天他总爱穿着一件白布小褂，头顶草帽，脚蹬草鞋。遇雨天则头戴斗笠，身披簑衣。做起事来也不紧不慢，但他做事很有章法，每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嘴里常叼着一根叶子烟，边干活边吧嗒着。

那时师生们常去药圃看药用植物，徐大爷就是我们的顾问。看到有些叫不出名字的药用植物，就会喊："徐大爷，这是啥？"徐大爷便会一一介绍。当年我常到药圃看药，采实验材料，便和徐大爷互相熟悉了，他总是老远看见我就和我打招呼："小万老师，你来啦！"我和徐大爷常交流，也从他那里学

习到了许多。1964 年 9 月的一天，我去药圃，徐大爷老远朝我打招呼："小万老师！你快来，快来！我给你看个东西。"我有些惊讶于他今天的语气明显充溢着满满的兴奋。徐大爷住的小房子前有一个小花台，他站在花台前指着一盆已经盛开的淡紫色的花："小万老师，你看这是啥子？"我定睛一看，这花开得好漂亮啊，我在脑海里搜索着这株似曾相识但又陌生的植物，我从花的特点突然想起了一味活血祛瘀药"藏红花"，但我在此前从未见过藏红花的原植物，只见过药材，便有些不确定地说："这个有点像藏红花。"他说："就是藏红花！"徐大爷居然盆栽种植成功了藏红花，而且还开花了！我十分激动，这在当时是罕见的。要知道，20 世纪 60 年代初种植藏红花成功的很少，四川几乎没有，更别说让藏红花开花了！我迫不及待地问："徐大爷你在哪儿弄到的诶？"徐大爷说："别人给了我一坨它的根（球茎）。我下了点儿功夫，种活了，开花了，你快看，这个花开不了多久。你看它的花蕊有点儿特别。你看啊，这三个丝丝（雄蕊）上的粉粉（花药）像箭头。你再看这个伸出花的细长下弯的细丝（花柱）顶端有点膨大，深红色的是不是很漂亮？这个！最管钱喽！"藏红花被称为软黄金，它的入药部位就是花柱。我很兴奋地问："徐大爷这个怎么种？怎么开花的？"徐大爷依旧像往常一般娓娓道来："栽藏红花底肥要施够！这可是我的诀窍。"我又问："你施的什么肥呢？"徐大爷说："圈肥和草木灰，要注意适当保持湿润。"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鲜活的藏红花，这一次的分享是令人难忘的。

徐大爷没有植物学背景，也不会专业的术语，但是他就像一本"活字典"。听完他讲述药圃植物的特征、习性、种植、管理之后，你会觉得书本里的知识一下子就"活"了，不再是枯燥无味、古板沉闷的白纸黑字。徐大爷从 1958 年开始，便将他的心血全部献给了药圃，全心全意做好药圃，我们青年教师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

1966 年夏，学校因"文革"停课。徐大爷依然每天辛勤劳作，把药圃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每天都是开会学习，去药圃的次数就少了。一天，一位老师告诉我，徐大爷生病了，可能是癌症。1970 年 7 月，我回成都后特地赶去看他，带上我先生老家河南灵宝寄来的红枣，匆匆奔向他家。见到他的时候，

他强打起精神招呼我坐，显得消瘦了许多，但仍然平静、慈祥。他见到我很高兴，对我说："小万老师，看来我不行了，我得了这个难治的病，我愁的是药圃咋个办啊！"我心里一阵酸涩，他把药圃视为他的心血，在病危的情况下依然牵挂着药圃的工作，怎能不让我心生敬佩呢？我对徐大爷说："徐大爷，你要好好治疗、休养。你会好的，等你好了，我们还要一起种藏红花呢……"徐大爷看着我，虚弱地呢喃："藏红花啊……好……种藏红花。"1971 年的一天，徐大爷终因医治无效驾鹤西去了……徐大爷爱校、爱药圃、勤劳、朴实、热心为教学服务的敬业精神，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本文由万德光口述，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整理。
采访时间：2021 年 4 月 9 日
采访地点：万德光教授住所
采访人：康珀歆　邓玉思

讲述人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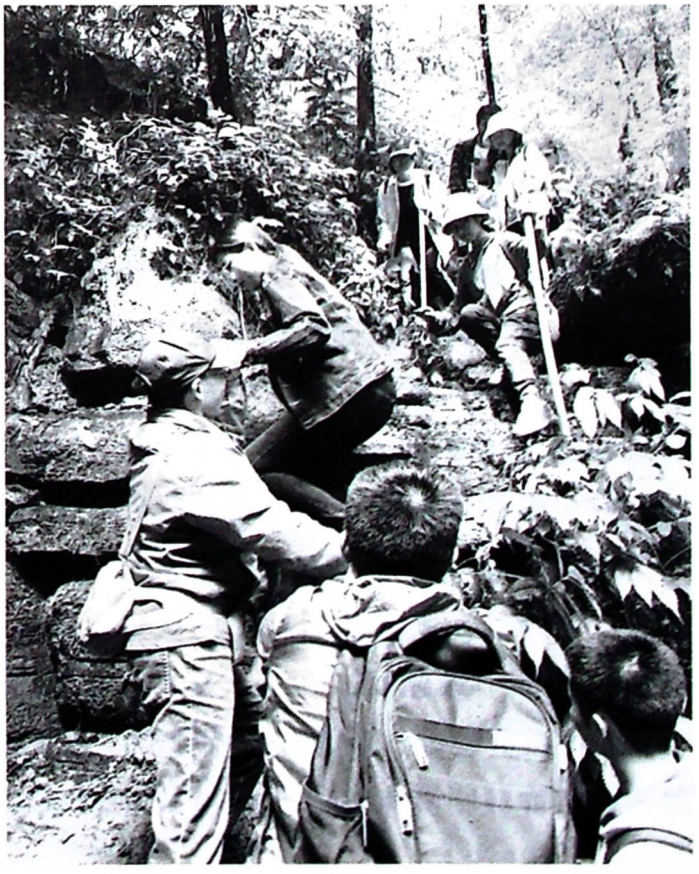
万德光，女，四川省成都市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重点学科中药学学术带头人，是当代中药领域开创学者之一。主编出版了《中药品种品质与药效》《中药品质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四川道地中药材志》《药用动物学》《中药分类学》《中药资源学专论》等专著及教材。主持完成了国家及省部级科研、教育研究项目多项，获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4 项、四川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4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项、中国药学发展奖 (中药)1 项、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教材一等奖 1 项，获评首届"四川省医疗卫生终身成就奖"。

高山实习

——一条中医药特色育人之路

讲述人 / 万德光

药用植物学野外高山实习是我校的特色课程，从1959年开设至今已有62载，是全国中医药高校中最早开设、坚持时间最长的野外实习课程，取得了显著的育人成效。



学生参加药用植物学野外高山实习

身为中药学人，需精通中药的四气五味、寒热温凉、升降浮沉、阴阳调和等理论。我们常说，用药如用兵，只有辨得君臣佐使，才知用兵良策。因此，我们学校将“认、采、种、制、用”一整套培养环节纳入中药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即认药、辨知、种植、炮制、制剂、应用。其中，“认”是首要环节。在中药专业教学计划执行过程中，首先要通过帮助同学们认识中药，方能达到一个辨识的标准，即能够鉴别中药，并探明它的基源、鉴别它的真伪。所以在我们组织教学的过程中，除了注重理论教学这一环节外，还特别重视另一项工作，这便是高山野外实习。在这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大课堂中，我们中药专业学生要学会认药、寻药、观察、记录、采集及标本制作等。中药本就来源于天地自然，要想认识中药，我们就得回归自然，与中药亲密接触，与中药交朋友。

高山野外实习工作的开展，必须选建一个中药资源丰富的基地，组建一支敬业、专业素养好的教师队伍，这是高山实习成功开展的重要基础。

基地选址：跋涉千山万水，最终情定峨眉

从1959年中药专业开办之初，即启动了药用植物及中药鉴定野外实习基地考察工作，先后调查过的基地有峨眉山、青城山、卧龙、金佛山、缙云山、瓦屋山、海窝子、大宝山、九峰山、天台山等。教研室的老师们都积极投入了此项调查工作。调查方式为徒步踏测，主要调查中药资源种类及其分布状况。工作开展十分艰苦，跋山涉水、日晒雨淋，但大家都相互鼓励、相互关心、坚持不懈，因为大家心怀一个共同目标：开辟高山野外实习课程基地。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最初爬山我常摔跤，同行的曾万章老师告诉我，“这路滑，难行走的地方，要把十个足趾‘抓’起，这样即可稳步前行。”此法十分有效，我效仿后摔跤的次数也就少多了。在野外实习基地调查时还会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在无人居住的大山里，找不到食宿点。记得1972年4月，我和贾敏如、杨孟奇两位老师，从成都启程经彭州白水河上行至大宝山，夜宿蛇纹矿开采场，在那里开展了为期两天的调查。第三天我们请了一

位老药农带路，前往汶川方向的九峰山，听说那里中药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沿山路上行，路越走越窄，后来根本没有路了，我们便穿越在山谷、林间，在偏僻的山间我们发现了大型动物的粪便，领路药农告诉我们那是熊的粪便。一听说有熊，我们便更加小心地继续前行。太阳快落山了，我们仍然在山谷中穿行，最后在天黑之前找到一个隐藏于山中的伐木场工棚，工棚外贴有一告示，“凡在我处搭伙者，自己背米、背柴、背水”。经交涉，伐木场工人知道我们是成都中医学院的老师，到那里是调查中药的，才同意解决食宿。夜晚，贾老师和杨老师与伐木工人同住工棚的通铺。我被安排单独住在一间放杂物的工棚里，四面漏风，有门无栓，真有点怕，不敢深睡。早上起来上厕所，没有女厕，只好请杨孟奇老师为我站岗。整个行程非常艰辛，但一想到多勘察一座山，建设基地就多了一份选择，种种艰险便不足为惧了。后来我们又沿白水河右侧继续上山到了仙女洞、天台山。令我们欣喜的是，在一个叫作二坪的地方，我们见到了罕见的米贝母正在开花，便向当地药农请教其应用，药农回答说他们就当贝母用。我们采集了样品带回学校制作标本并开展实验研究，连续发表了 3 篇论文。在不同时期我们所调查的实习基地加起来至少有 10 个，其中开展过实习课程的基地有峨眉山、青城山、卧龙、海窝子。后经综合评估，包括药用品种、分布状况、可展开的实习路线、食宿基本条件、交通、安全性等各方面的综合比较，认为峨眉山为好。但由于峨眉山属于自然保护区，而且是热门旅游区，因此在实施中具体的实习路线先后有多次调整。前期是住宿山上的庙宇，从阴山上、阳山下，那时游客不多，有可实施性。中期学校在中峰寺建了实习基地，实习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随着峨眉山旅游业的发展，实习开展受到了影响，又开始在峨眉山另寻新址（麻子坝），以保证实习的顺利开展。

高山实习：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教书育人

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我始终倡导“要做学问，先做人”的理念。以此为导向，药用植物高山实习课程一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素质教育的紧密结

合，高度重视创新能力与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老师带领学生跋山涉水，一脚泥、一身汗，上山寻药、认药、观察、记录、采集药用植物，并进行标本制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收获很大，把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变得鲜活了。我认为中药专业的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不仅仅是单纯教学生掌握中药及其基原植物辨识的本领，还是育人的好课堂。一方面，野外实习是个艰苦的过程，翻山越岭，钻草丛、爬陡坡，漫山遍野寻药，被虫咬、蚂蟥叮时有发生，学生的意志、吃苦耐劳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好的锻炼。



万德光老师（中）带领学生参加高山实习



万德光老师（中）和教学团队部分成员野外备课

老师对待每味药从寻找到引导学生辨识，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对药用植物孜孜不倦探寻的精神会让学生深受感染，从而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树立正确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野外实习是在自然的大课堂里寻找药物、发现药物、观察药物，学生们享受着“于疲劳时领略大自然的美”的时光，从而领会到《黄帝内经》的一个核心内容“天人相应”，也感受了我们中医药学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自然界为我们人类提供的药材资源数不胜数，治疗、预防、康复、保健等所需要的药材资源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从而学会欣赏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

虽说实习过程很艰苦，但也有愉快的时刻。有时路很窄，学生们不能围成圈，只能是老师带头前行，学生列队紧跟于后。老师边走边讲，挨个将药名传下去，中途很容易传错，总会闹出一片笑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偶尔老师还会与同学们开开玩笑，遇见自己也不大确定需要回去检索查阅植物志的植物，就说：“这叫‘麻倒师傅’。”有学生信以为真，也跟着说：“原来这个植物叫‘麻倒师傅’呀！”顿时师生笑成一片。在爬山寻药过程中同学们还会给老师起几个爱称，譬如：在山高路险的环境中，老师依然带着同学们不知疲倦地向上攀、往前冲，同学们就戏称我们为“爬山虎”；有的同学见老师们在山间坡地的草丛中穿梭不停，似在草上飞行一般，就笑称我们为“草上飞”。老师听见学生们所起的爱称，也不会生气，反倒乐呵呵地与同学们打趣。

高山实习：锤炼了一支爱岗敬业、业务精湛的师资队伍

自 1959 年建系至今，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从未间断过，这与几代中药学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分不开。我和曾万章、刘代明、秦云程、李新荣等老师是开展高山实习的第一代。我们踏遍山山水水，实地考察，最终选址峨眉，创建学校的高山实习基地。我主编的《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纲要》作为我校高山实习的指导用书一直沿用至今。严铸云、陈新、马云桐、裴瑾等老师是建设高山实习课程的第二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坚守和弘扬了

老一辈的优良传统，把高山实习开展得有声有色，使高山实习日益发展，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药人才。现今他们也已年近半百，但依旧坚持高山野外带习，领着同学们跋山涉水夯知识、学本领。令我欣慰的是，年轻一代老师也担起了重任，全身心地投入高山野外学习工作，如王光志、陈璐、刘薇、何冬梅、吴清华、闫婕、陈江等青年教师。青年人的茁壮成长让我看到了希望。



严铸云老师带学生参加高山实习



学习老师为学生讲解药用植物鉴别知识

高山野外实习也磨砺了团队的品格和精神。经过多年的团队建设和发展，我们形成了老中青结合、高学历、多学科交叉、蓬勃发展的队伍。迄今为止，已建有“中药品质”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万德光传承工作室以及2个四川省青年科技创新团队。吾辈坚持孜孜以求，春种秋



药用植物高山带习师资团队



药用植物学国家级精品课建设与师资培训会

收。2000年“药用植物学”课程获批四川省重点课程，2003年建成为四川省精品课程，2006年建成国家精品课程，2017年成为四川省在线开放课程，2020年成为国家级首批一流本科课程。这些成绩是几代人砥砺前行，不断攀登的结果。

全员育人：高山实习的护航人

高山实习开展这么多年能一直坚持从未间断，这不单单是老师们的辛勤付出，还有学校的支持和相关部门的配合。早期学校的交通工具只有一辆吉普车和一辆货车，学校用车十分紧张，而我们进山实习学校专门安排货车载师生到实习点。当时，学校开货车的师傅叫王中华，多年来，一直都是他送师生们上山。王师傅为师生们考虑得十分周到，当学生们拿着行李上车时，他一次又一次地提醒学生先把行李安放好并坐在行李上，以防颠簸出去。因为我晕车，他就叫我坐在副驾驶位；每次遇到很颠簸的地方，他就会绕过去，嘴里还念念有词：“不要把这些娃儿抖出来哦！”可见他对学生们十分关心爱护。令我非常难忘的还有我们学校的“炊事班”。学校为了给学生节约伙食费用，让大家吃得干净、营养、放心，多年来都一直派炊事员与我们一同前往山上，做好膳食保障。老师同学们在山上实习时，中午回不了驻地吃饭，需要携带干粮。炊事员就会一大早起来做饭蒸馒头。此外，学校卫生科也专门派了医生，为师生健康护航。当有师生受伤或是有感冒发烧的，他们会第一时间为师生治疗。在山上实习期间，校领导和院系负责人也都会上山看望实习中的老师和同学，若发现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会及时予以解决，这些优良作风一直保持到现在。近几年还有保卫处的老师们上山为同学们的安全保驾护航。整个实习过程，老师们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学校及相关部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障，这是我们野外高山实习能坚持始终的至关重要的原因。

回顾漫长的参与学校教学建设的过程，我深深体会到，有付出才有收获，人生难得，一路走来，只有我们坚守目标不动摇，继承、弘扬、守正

创新，坚持不懈地朝着目标努力，就会不断有收获。朱熹有一句名言鼓舞了我一辈子——“万事须是有精神，方做得”。不管你做什么，都要带着一种精神去做，才会收获成功。历史永远是由事实而写成，路途就在这里，没有捷径可走。

本文由万德光口述，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整理。
采访时间：2021 年 4 月 9 日
采访地点：万德光教授住所
文字整理：康玓歆　邓玉思

讲述人简介：

万德光，女，四川省成都市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重点学科中药学学术带头人，是当代中药领域开创学者之一。主编出版了《中药品种品质与药效》《中药品质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四川道地中药材志》《药用动物学》《中药分类学》《中药资源学专论》等专著及教材。主持完成了国家及省部级科研、教育研究项目多项，获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4 项、四川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4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项、中国药学发展奖 (中药)1 项、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教材一等奖 1 项，获评首届“四川省医疗卫生终身成就奖”。

建校初的四台车

撰写人/王　军

现今的中国，车多路堵已成常态，我们的校园也是如此。

可是在60多年前，我们学校创建之初，却只有两台非机动车。一台是马拉的胶轮大车，主要用于拉货；一台是人力的黄包车，主要用于接送学校当时的领导。赶大车的师傅名叫武宝森，拉黄包车的师傅名叫陈凯。武宝森是典型的北方汉子，高大威猛，嗓门洪亮，做事讲原则。后来学校有了汽车后，武宝森师傅就转行做了学校的看门人,也就是今天的门卫。武宝森讲原则是出了名的，什么时间开门、什么时间关门、进出人等，一切按规章制度。据说曾经有位校领导，因出差早上回来还未到开门的时候，任你怎么叫门，他也不开，让领导在门外等到开门的时间才进到学校。陈凯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个子不高，但腿脚灵便，极肯帮忙，先后在学校的后勤、保卫部门工作，曾经是我们西安路辖区内一位知名的积极的基层治保骨干。

1956年学校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才真正有了两台机动车。一台大车是从重庆歌乐山荣军疗养院调来学校的。一台是四川省卫生厅调来学校的，是当时国内极为珍贵而稀少的苏联华沙牌小轿车。开大车的师傅名叫王中华，是从重庆歌乐山荣军疗养院开同车过来的老师傅，技术精湛，服务态度好，为人低调。开小车的师傅名叫黄正，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两位师傅不仅要承担当时学校几乎全部的远程运输任务，包括学校领导外出、接待、学生实习、教学、科研、生活物资等运输任务。而且由于当时社会车辆维修保养服务不健全，大量的维修保养任务还要两位师傅自己亲力亲为。

时常看到他们钻车底，拆机件，一身油污，非常辛苦。他们从无怨言，总是能按时按量地完成学校交办的任务。

马拉的胶轮大车和人力黄包车在学校正式成立后就逐渐停止使用了，但作为学校的固定资产一直保存到20世纪70年代，儿时我们还曾经在学校老车房的后面见到过。此后，美国的十轮卡车和苏联的华沙牌轿车也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更多更先进的运输车辆也先后来到学校，开始为学校服务。我们两个时期的四位师傅也已先后作古。

今天我们缅怀那些曾经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贡献的老员工们，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他们那种为学校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老黄牛精神。成都中医药大学60多年的发展不容易，学校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到今天，无不饱含着几代人奋斗的心血！几十年来，从成中医奋发图强的历程中凝练出来的成中医精神，“艰苦奋斗”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相信成中医的后来人，必将会继承老一代拼搏奋斗的成中医精神并发扬光大，引领成都中医药大学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撰写人简介：

王军，男，1958年3月生，1963年随父母来到成都中医学院，1978年参军，1981年退伍后进入成都中医学院工作直至退休。先后在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制药厂、劳动服务公司、总务处、组织部、保卫处、后勤管理处、离退休管理处等部门工作。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工作和生活五十多年，对学校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变迁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学校防疫小组赴眉山防治血吸虫病

撰写人 / 蒲昭和

20世纪50年代，四川多地出现了血吸虫病病例，各地卫生防疫部门、医院等都抽调大量人员参加防疫工作。刚建院不久的成都中医学院也积极参与其中，当时就派出了以张华书记与蒲湘澄老师为首的领导小组，到四川眉山进行血防工作。小组成员有侯占元、王渭川、曾敬光、袁鸿江、王汉董、李明富、杨家林等。

1958年7月20日，小组在张华的率领下由成都出发。到达眉山县（今眉山市）当天，就由眉山卫生科王长荣科长和血吸虫病防治（简称血瑞）工作组的张队长介绍了眉山血防工作的一般情况。

1958年7月22日，小组先是到太和场（镇）学习，并帮助总结太和中医治疗组的治疗经验。同时进行了一部分门诊治疗，包括抽出了部分同志协助开



学校防疫工作组因血防工作出色受到表彰

展当地锑剂治疗工作、运用针灸预防锑剂中毒反应等。

1958 年 8 月 1 日，防疫小组来到距眉山县 20 千米的尚义乡展开了门诊及住院治疗工作。由于当地条件限制，整个门诊和住院的治疗，都在当时的尚义小学校内进行。

1958 年 8 月 15 日，小组又分出了部分同志，由张华书记带领到了眉山另一乡多悦乡开展相关防治工作。蒲湘澄是两组的业务负责人。

从 1958 年 8 月 1 日到 9 月 9 日止，两个小组先后在尚义乡、多悦乡两地治疗病人 725 人，3 080 多人次。在所治疗的 725 人中，对于病情严重的病人，采取了收入住院治疗，先后收入 39 人住院，另有 2 例严重病人住街上亲戚家里进行治疗，共计住院者 41 人。

对病情较轻或条件受限的病人，治疗小组采取了门诊治疗或住在附近联合诊所治疗，由小组每日出诊，共计治疗 548 人。对部分能够进行劳动的早期血吸虫病人，为了不妨碍他们生产，小组采取了送药上门和送药到田间的办法，先后治疗 138 人。

在所治 725 人中，属晚期血吸虫病的 52 人。治疗主要采取了消水、扶正、杀虫、消痞等法配合进行。对送药上门的早期血吸虫病病人，根据病情，分别给予了雄槟榧子散、新方杀虫丸、复方荜澄茄、新方皂矾丸、绛凡平胃散等中



蒲湘澄、曾敏光、侯占元等在多悦乡村医院指导工作

药或西药治疗，这些药物有的证明是有一定疗效的。如单纯中药治疗无效，也使用西药四氯乙烯治疗。治血吸虫病药物大多有较大毒副作用，为减轻不良反应，小组也酌情采取了针灸疗法以缓解不良症状。



蒲湘澄等在讨论血防工作



蒲湘澄、曾敬光、侯占元正检查住院病人



蒲湘澄等正参加学习讨论



蒲湘澄、王渭川、侯占元在视察乡卫生院

除防治血吸虫病外，小组也采用中药或针灸为当地百姓治疗了一些常见病。如风湿关节炎、胃痛、浮肿、崩漏、子宫脱垂、月经不调等杂病。同时还为当地培养了针灸人员、检验人员共 3 名。

这次血防工作历时 50 余天，小组成员不顾夏日炎天，环境艰难，工作辛苦，始终坚守在防疫第一线，圆满完成了预期的工作任务。这次赴眉血防小组也因工作出色而受到上级的肯定和表彰。

本文为作者根据其祖父蒲湘澄在学校血防工作结束后的工作汇报及工作日记整理。

撰写人简介：

蒲昭和，男，成都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曾从事中医基础及诊断教学工作 8 年，中医药情报研究及咨询工作 30 余年。参与编辑中医药专著 12 部、科研课题多项，撰写中医药论文 20 多篇，在全国医药报刊发表科普文章 4 000 余篇，有 2 400 多篇收入同方、维普等专业数据库，被多家报刊聘为特约通讯员、优质撰稿人等。2001 年被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四川省十佳科普作家”称号，2008 年获“四川省 50 年五十位优秀科普作家”荣誉证书。

这是成都中医学院第一张院报（刊）吗？

撰写人 / 蒲昭和

学校退休老师陈先赋在“成中医故事”主题网页发表《创办校报　三次献礼》一文中，曾提及《成都中医学院报》正式办刊时间是在 1974 年。然而，我一次意外发现，我家藏有一份成都中医学院的“校报”，发刊时间却要比刊文所说要早得多，刊名全称叫“成都中医学院（专业、学习、生活）专刊”，发行时


成都中醫學院

专业、学习、生活介绍专刊

成都中医学院编　　1958.5.30

成都中医学院概况

间为 1958 年 5 月 30 日。全刊共 6 版，注明由“成都中医学院编”，但刊名题词不详。后经档案馆查阅可惜只有 1~4 版，缺失 5、6 版。

有意思的是，从仅有的 4 版来看，本刊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报纸字体和照片还是两种颜色套印，1、4 版为红色，2、3 版为紫色。

第 1 版的上半部并排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有关中医的题词。三位伟人题字一同上校刊，实属难得。其中朱德对针灸的题词非常少见。刊右上角是吴棹仙向毛主席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照片。


·2·
1958.5.30
中医工作的新面貌
中医治疗的效果和体会及其发展远景

下半部是“成都中医学院概况”。全文对成都中医学院成立以来，关于学院有关专业、课程、机构、师资队伍以及取得的教学成果等方面内容作了详细介绍。同时又配有成都中医学院校大门的全景照 1 张（即现在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医馆）。

第 2 版的右上角，是“学院实验大楼一角”照片。下半部分有李斯炽院长发表的《中医治疗的效果和体会及其发展远景》一文，妇科专家卓雨农为苏联专家诊病照片，学院领导卢耀西参加教师“交心会”的照片。



·3· 成都中医学院 1958.5.30

中医医療专業簡介

中醫婦科學對人民的貢獻

“針灸疗法”已逐步走向世界医学的行列

中医师进修教育事业

第3版主要有“中医医疗专业”“中医师进修教育专业”的介绍。右上角为“邓绍先副教务长正在备课”的照片。左下发表有妇科专家卓雨农的“中医妇科对人民的贡献”一文，并配有“妇科教研组学术讨论”专家照（左起依次为曾敬光、卓雨农、王渭川）。



· 69 ·

本版中下偏右，发表有针灸专家蒲湘澄的“针灸疗法已逐渐走向世界医学的行列”一文（此文是蒲对学生进行开学教育的演讲），另配有“蒲湘澄在附属医院指导研究班学员为苏联专家治病”的照片。

第4版有“中医研究班”及“现代医学课程”的介绍，并有中医附院黄德彰副院长之文“祖国医学的宝藏急需更多的力量来整理和发掘”。本版还配有本院1、2年级学生的实验图照，以及解剖室教师指导学生解剖学习，痔漏科医生给病人做手术的照片各1张。

以上为报刊版面内容的说明，但对于本刊仍有一些待解之谜。如本刊未注明期数，是否为创刊号？是否是连续出版？刊名题字者不明，从字迹看有点像院长李斯炽的字体，是否为李斯炽题字？还有，本刊现存4版主要是专业、学习内容，是否缺少5、6版生活内容，这些都有待考证。

撰写人简介：

蒲昭和，男，成都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曾从事中医基础及诊断教学工作8年，中医药情报研究及咨询工作30余年。参与编辑中医药专著12部、科研课题多项，撰写中医药论文20多篇，在全国医药报刊发表科普文章4 000余篇，有2 400多篇收入同方、维普等专业数据库，被多家报刊聘为特约通讯员、优质撰稿人等。2001年被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四川省十佳科普作家”称号，2008年获“四川省50年五十位优秀科普作家”荣誉证书。

严师益诲

——忆李斯炽先生

撰写人/陆干甫

最近清理书籍，在一本旧杂记薄中，捡出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来。那泛黄的纸上浸着淡淡的墨痕，抄录着《金匮》关于中风历节病的两条条文的解释。纸的左下方写有“缺课、挨训一次”几字。也许正是这缘故，这张纸头才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唤起了我的一桩回忆，脑子里浮现出李老师那连说带笑，呵呵之声不绝的形象。

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我在四川国医学院学习。李老上金匮课，由此讲中风历节病时，我记不起什么原因缺课了。事后的一天，我经过办公室，李老突然叫我进去。“你缺了几次课？”他问道。我惶然地说，“那天……缺了一次。”又急忙补充：“我已读了。”想借此弥补一下。李老笑了笑说：“不要无师自通呵！”片刻，他又道：“我问你：跌阳脉浮而滑，滑则谷气实，浮则汗自出，咋个讲？”我回答说这是论述肾内蕴热，再外感风湿。“那么，你说说这条条文完不完整？”李老继续问道。我无言以答。这时何伯埙老师在一旁插话：“还是二通嘛！”李老哑然一笑，右手食指敲着桌边对我说：“下一条的少阴脉浮而弱，这少阴脉在哪里？”“在尺部。”我回答。“还有喃？”还有？我一下子懵住了。李老收敛起笑容说：“少阴肾脉在足内踝后跟骨上，就是太溪穴。”接着，他又详细地阐释了前有脱简，据文，应有汗出入水，或汗出当风，才可引起历节痛的症候；后一条，除诊腕部尺脉，再候太溪穴以确定其病在肾；并说古人诊脉之严谨，引申张仲景按寸不及尺，寻手不及足之戒。最后，李老严肃而亲切地告诉我：“不要学五柳先生呵！似懂非懂，就是不懂。”此番教导虽时过30余载，却在我脑中印象极深，忆其情境，恍如昨日，李老治学严谨不

苟，他用严格标准要求青年学子：治学切不可马虎了事。常说：“学问、学问，既要学，又要问，光学不问，只算一半。”他为培养学生，真是诲人不倦呵！

本文摘自《成都中医学院院刊》（1979年7月10日，第59期二版）。

撰写人简介：

陆干甫（1923—1993），男，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四川成都人，祖籍江苏，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幼受其家庭熏陶，喜研文史，爱好诗词，矢志学医，继承祖业，19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四川国医学院，即随祖父应诊，继承家传。

我的中医历程

撰写人 / 李明富

1956 年 7 月我从昆明医士学校毕业时，正遇上国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成立四所中医学院（从此中医药学纳入了国家高等教育的轨道），而且当年倡导向科学技术进军，中专毕业生保送 10% 升大学，我作为中医世家的第三代传人，也就有幸从昆明来到成都，成为成都中医学院的首届学生。本届学生共有 120 名，主要来自西南、西北地区，其组成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应届医校毕业生、调干（原为国家干部，后调到学校去学习的学生）、青中年中医、军区尉级军官等。

当时的校址在四道街，由于学校尚在初创，条件较差。占地仅 28 亩，户外活动场所只有一个篮球场，所以空闲时经常会到附近的街道去散步。中医老师是当时省政府、卫生厅在全省范围内选调的临床经验丰富、有名气的医生。没有现成的教材，老师根据教学需要编写，然后刻蜡纸印刷发给学生，期末时



1962 级学生合影

再汇集装订成册。

在学校的生活还是蛮好的，当时国家对中医学生和师范生免费供应食宿。伙食费一个月9元，8个学生一桌，每餐都有四五个菜。当时也要参加一些劳动，比如参加了搬运建筑材料、修建学校办公楼、至双流黄许运输中药郁金等。

由于省委、省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重视，我们在四道街只生活了两年就搬到十二桥原成都医士学校的校址了。现在国医馆的那栋楼就是最主要的教学楼，教室、图书馆、组胚实验室、生化实验室、解剖实验室都在这栋楼里。

经过6年的努力学习，1962年我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了，我的毕业论文《瘀血论》也被评为第一名，所以我的毕业证书是我校的1号。毕业后留校在中医内科教研室，从事教学、医疗、科研工作。

1964年，学院送我到上海中医学院进修，当时中医内科学教材是由上海中医学院的黄文东教授主编的，我有幸跟黄文东教授学习。我很感谢党对我的关爱和培养，自题了一首小诗在照片上："今生多幸党栽培，昆送蓉城今又申，誓立艰苦发奋志，深研岐黄报党恩"。

1981年学校准备派我作为访日学者，先送到吉林延边医学院卫生部办的日语进修班学习日语，通过一年的学习，日语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毕业文凭

学生李明富系云南省澄江县人，现年二三岁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入本院医疗系本科学习六年，现已学完全部课程，成绩及格，准予毕业。

成都中医学院

院长

李明富持有的毕业证
（文書登记第001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领导干部要实现“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学校在上级领导的安排下，就选拔学院新领导成员开展了广泛地听取群众意见的活动。1982 年我从东北进修完日语回到学校后，老院长常耀五对我说你暂时不要安排教学、医疗工作。1983 年 4 月的一天，常院长找我谈话，他说省委组织部已经批准我当院长。我觉得很突然也很意外，我当时半开玩笑地对常院长说：“这下要把马笼头套起了。”1983 年 5 月份任命下来后，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在全院的教职工大会上宣布我任成都中医学院院长。

上任后遇到了中国院校校长都能遇到的问题，比如职称晋升、工资评定、教师子女的工作安排、福利房分配等难题。在党委和整个班子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坚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始终把全体师生员工放在首位，比较圆满地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由于四川省是“中医之乡”“中药之库”，这为我校的发展创建了一个优越的大环境。在省教委的指导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下，学校的中医药特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办学规模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欧、美、日等国家来校学习的人员也日渐增多，他们大多反映我校的中医特色较为突出，来我院能学到传统的中医。



1964 年，作者于上海中医学院进修

在1994年和1995年，学校领导班子又为争取更名为大学而努力。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学规模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学院也派员到北京汇报，争取国家教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更名大学的理解和支持。1995年5月，经过上级的批准，我校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省委、省政府任命我为大学校长。自此，我校和全国其他几所中医大学一起，在中医界的第一方阵里迈步前进。

2000年5月，在我61岁时，由于年龄的原因，我退出了领导岗位，至此，我已在院长、校长的岗位上工作了17年，为学校的全面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退出领导岗位之后，我主要从事中医门诊工作，继续发扬中医药特色，为患者解除病痛。

撰写人简介：

李明富，男，1939年生，汉族，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53年10月—1956年7月在昆明医士学校读书，毕业后保送至成都中医学院学习，为首届六年制本科生。1962年9月毕业后留校从事中医内科学的教学、医疗、科研工作。1983年5月—2000年5月任成都中医学院（后更名为成都中医医药大学）校长17年。任《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医药卫生典》主编，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2010年4月退休，继续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杏林名师　永远铭记

撰写人 / 郑士杰

作为学校一名退休职工，回忆起学校的建立、建设、发展的历程，思绪万千，许多往事浮现眼前。但使我记忆深刻、永远难忘的是建校时期各位名医、名师。

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名成都中医学院），是 1956 年经国务院批准，全国首批成立的 4 所高等中医院校之一，它的成立在中医药教育事业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合格的中医药人才，而教师是培养人才的根本。因此，如何解决初建学校的师资问题，成为最迫切的重要任务。经过反复研究，学校采取如下措施：一是通过认真调查，从素有“中医之乡”美称的巴蜀大地，选调了一批名医、名师到学校任教；二是通过举办中医进修班和中医资格培训班，从中挑选比较优秀的中青年中医，调入学校任教。而现代医学、生物学和普通学科的教师主要是通过相关院校的毕业生分配入校任教。同时，还通过举办西医离职学习的中医班，选调一批进入学校任西医基础或临床课教师。

大学的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中医药专门人才的重要任务。 这些新选调或毕业分配到校担任教学的教师，就是学校培养人才的奠基者。他们的治学精神、医术水平、学术思想、学风教风、医法医风，时刻都将对每个受教育者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对学校各学科的发展也奠定坚实的基础。据我所回忆，重点说说部分专家的事迹，与大家分享。

首先，我院首任院长、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李斯炽。他早在 1936 年就致力于中医人才培养，创办了四川国医学院。除主持教务工作外，还亲自编写

教材，讲授《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中医内科》等课程。在教材中，善于用现代科学知识诠释中医医理，内容深入浅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院校教材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成都中医学院成立初期的师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四川国医学院毕业生。他在担任学院院长时，尽管有繁重的行政事务及社会活动仍坚持为学生讲授《黄帝内经》等课程，亲自批改作业，评阅毕业论文。素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潜心于中医理论及临床研究。1958 年，他深入成都附近疫区，开展中医防治钩端螺旋体病的研究，筛选有效治法及方药，进行分型论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次，著名伤寒学家邓绍先。他于 1956 年 9 月调入学院任副教务处长，并讲授《伤寒论》。为了培养学生，他常常废寝忘食，精心编写教材，认真备课，经常工作到深夜。课堂讲授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很受学生欢迎。1960 年，卫生部委托成都中医学院举办全国中医院校《伤寒论》师资培训班，先后举办了三个班，均由他担任主讲。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为各院校从事《伤寒论》教学、科研的知名专家。同时，他还主持了全国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伤寒论讲义》编写工作。他是全国著名的《伤寒论》专家，故有“邓伤寒”的美誉。

还有著名中药学家凌一揆，他历任教务处科研科科长、中药方剂教研组主任、成都中医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他十分注重教学内容和方法，在讲述和阐释问题时，经常是引而不发，引导学生积极思索。他强调，教学的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掌握良好的治学方法，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终身受益。由于他教学思想好，因而教学效果好，校内外师生有口皆碑。他对中药学的发展有深入研究。他认为，几千年来中药学的核心是临床效用，其特色是注重整体效应，理法方药环环相扣。为探索当今中药学自身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他大力强调必须处理好继承与扬弃、传统认识和现代科技、学科分化与综合三大关系，倡导建立当代的“系统中药学”，有力地推动了中药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继而，学校中药学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确定为首个博士授位学科，并由他担任我国第一个中药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重点学科中药

学学术带头人。从此，他在国内外皆有了很高知名度。同时，也提高了学校在国内、国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还有著名医经学家吴棹仙。他是四川巴县人。调成都中医学院前，他曾任教重庆中医进修学校，先后任重庆市一、二中医院院长。1955 年底，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向毛泽东主席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从此闻名于中国。调成都中医学院时，他表示：“要把我所知的知识传给下一代。”向学生授业、传道、解惑，总是引经据典，反复讲解明白。故陈仲谨评如“天铎”，叩之则鸣。他教授学生不择文化之高低，有志于中医事业者，以“有教无类”之古训，十分重视业余教学，培育中医人才。作为一代名医，无问院内院外，街头乡间，有请毕至，诊病时望闻问切十分仔细。数十年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针效如桴鼓，故有“神针”之誉。

还有一批各具特色的名医专家。他们是精通温病学说、擅长热病治疗，著名中医学家和温病学家宋鹭冰；在长期教学、医疗实践中总结的《中医眼科六经法要》学术思想，形成我国眼科学术上新流派的著名中医眼科专家陈达夫；在教学中誉为教书育人的一代宗师，临床上处方用药简、便、廉、效，曾载誉蓉城，有“卓半城”之称的著名中医妇科学家卓雨农；热心中医教学、主张课堂与临床并重，使学生掌握针灸操作技能的著名针灸学家蒲湘澄；常以“书为我师勤多阅，方即吾友贵择交，脉诀须知求四诊，药名不厌读十遍”，鼓励学生勤奋学习的著名中医儿科专家胡伯安；在临床中擅长使用祖传绝招杵针、气功手法，内外合治、针药结合的精针善药的传统医学专家李仲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再述了。

常言道：师高弟子强。在建校初期，这些名医、名师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批批、一代代的青年学生、青年教师，经过多年的教学研究、医疗实践锻炼，逐步成为新一代的名师和名医。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名师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严谨的学风、教风，高尚的医德，得以代代传承。学校发展到新世纪的今天，能拥有国家级教学名师万德光教授，首届国医大师郭子光教授，第二届国医大师刘敏如教授等，就是最好的名师相传承继的结果。今天，我们提倡永

远铭记杏林名师，其目的就是不忘过去学校的名师，同时要继往开来，让杏林名师代代相传，一代胜过一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校再次腾飞，推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中医药大学的奋斗目标。

撰写人简介：

郑士杰，男，1937年生，四川省渠县人，中共党员，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1955年毕业于泸州医士学校，分配到四川省卫生厅工作，1958年调入成都中医学院，1999年3月退休。历任教务处干事、教务处秘书、医学系秘书、教工党支部书记、学院党委办公室组织干事、医学系党总支书记、成都中医学院副院长、成都中医学院党委书记，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1989年主编《中医药管理学概论》，1996年晋升教授，曾获评四川省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1996—1998年任四川省政协特邀委员。

有关成都中医学院的老故事

撰写人 / 艾儒棣

接到学校征集校史故事的任务后浮想联翩，仿佛又回到从前，故事一幕幕重现。现在择其要点记录几个小故事，以飨同道。

“传而不染”的名言——吴棹仙教授语

1965 年秋天，学校要派医疗队下乡。在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我们聆听吴老代表全校老师表态，鼓励大家在乡下要待病人如亲人。只要我们做到正气存内，邪气不可犯我；如果我们正气虚了，邪气必然侵犯而患病，故有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说。接触病人不可怕，只要大家身体健康，就是遇上传染病，也会“传而不染”。言毕大家会心地笑了。这次吴老讲话对我们学习、认识《黄帝内经》的预防思想有更进一步的启发，对我们从医后对扶正祛邪理论有了更切实际的认识与体会。

校园药圃见闻——凌一揆教授带习认识鲜药标本点滴

凌一揆教授是国内著名的中医药专家，在中医药方面的造诣是首屈一指的。他待人谦和，对学生十分耐心细致，深受学生的爱戴。凌老是我们本科《中药学》主讲老师。1965 年秋天，凌老带我们到校内中药苗圃去认识中药活标本，详细讲解药物科属、生长环境、采取时间、炮制方法、药物功效、适应证候、用量、禁忌等，给我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至今尚记忆犹新。凌老做事细致认真，苗圃标本的标签都是凌老亲手所书，从这些点滴之事就可以看出凌老治学十分严谨，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效仿。

伤寒论序言讲解——邓绍先教授别具一格的讲课

邓绍先教授，是国内伤寒大家，也是国内讲气化理论的大家。除担任本校学生的授课外，还常常到北京、上海、广州讲《伤寒论》。广为传播的是他用气化理论讲解的《伤寒论》。我们当年《伤寒论》是学年课，由邓老亲自授课，由戴佛延教授、陈治恒教授协助。我记得序言就讲了 2 次 4 学时。开始讲太阳经气从膀胱升起，玄冥幽微，深奥莫测。要求我们在学习气化理论时注意两点：太阳统周身皮肤、营卫、百脉、经络，为一身纲领；毛窍乃太阳寒水气化出路，一切外邪之来，必由毛窍而始人于内，出入二字乃邪正机关。故太阳本经之邪应从毛窍以汗出为顺；若从下出（通下）则为传经、传腑之变证，都应从气化上去探求。我们初学时听之，十分茫然，后来慢慢琢磨，发现邓老很简洁地将常证与变证鉴别开了。其理论与《伤寒恒论》之气化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故气化二字，乃伤寒论之真正要害所在，非有造诣精深者难识其中真机。

健脾除湿法减肥凑良效——李斯炽教授治疗肥胖病案

临床带习的老师，给了我们从实践角度来学习的机会，在视野上有了进一步地扩大。在卫生科跟李斯炽院长门诊时，我是忝列门墙，由于诊断室太小我是站着看李老门诊，李老对病人十分耐心，用药清灵巧取，最常用的方剂有四君子汤、益胃汤、二陈汤、三仁汤、二至丸、生脉饮、归脾汤、瓜蒌薤白半夏汤、桂枝汤、补阳还五汤、天王补心丹等，太多不一一列举。有幸遇见一例特殊病案供同道分享。

有一例肥胖病例，男，8 岁，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时逢我的内科老师陈源生老师来成都市参加四川省农工民主党常委会，陈老与李老是好朋友，我陪陈老到西安路李老家拜访。巧遇成都军区首长小孩来治病，体重已经 90 kg，身高 168 cm，无任何不适。舌苔、脉象正常。李老认为其是痰湿内停，堵塞清窍，水湿浊污内停。治则为健脾除湿，化痰排毒，方剂用二陈汤加白芥子、大腹皮、淫羊藿等。2 个月后再遇患者来复诊，这时体重已经明显减轻，体重减至 76 kg。看诊这种情况，我十分欣喜，当时还不能理解李老用药的奥秘。思之良久，我从李老的经验集中悟出了道理：湿邪集聚则肿，湿邪散则肿去，治湿

宜清淡化湿，湿去则健脾，所以在第二次看诊的处方中加了四君子汤。我体会到李老见湿不治湿，而是以化浊醒脾为要。李老的教诲深深印入脑海，湔拔不去，受用终生！

名家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受教于国医大师任应秋先生

1983 年 9 月任应秋教授到四川省讲学时，回江津县（现江津市）老家省亲。路过成都时，专门看望老朋友吾师文琢之教授。文老为了答谢老朋友造访，在成都骡马市教学餐厅款待任老一行。任老的两位研究生在座，其中一位就是当今国医大师王琦教授。当时陪同的有侯占元院长、张启光教务长、文老和我，一共 7 人。任老与老朋友交谈十分高兴，任老同时也多次称赞四川的美食，说去北京二十多年了，在北京没有这样的四川美食。席间文老、任老互相介绍学生情况。当介绍到我时，我回答说主要随师从事临床和教学工作，我告诉任老我在 1965 年是读任老编写的书《阴阳学说》入门的，他听后十分高兴，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诚恳地向任老请教学习外科的理论方法，任老十分耐心告诉我三点：

一要通读外科发展史，这样可以明白外科发展的脉络，才能全面了解外科；二要研究外科的流派，流派的形成是众多名医大家共同的学术思想的汇集，对发展学术是有很大帮助的；三是要研究名家，多读名医专著，才能从中汲取名医的特点和独特的思维方式，然后融入自己的思维才能有很大的提高。我按照任老的教诲去做，终身受益。

牢记恩师教诲终身受益——简记文琢之教授

川派中医外科名家文琢之(1905—1991)，四川省射洪县人氏。幼时生病多，体质太弱，多方医治，起色不多。时遇释灵溪大师免费施药，文老父亲向大师说明文老病情，并许下诺言，若文老病好，便在 10 岁时出家，在大慈寺剃度，拜释灵溪大师为师，学医来治病救人。文老幼时家贫，敏而好学，果如其诺。10 岁剃度出家，即师从四川方外名医释灵溪上人。释氏擅长内外科及杂症，亲制各种灵效之膏丹丸散。释氏之师天映大和尚乃清代四川外科名手，曾应清廷

召入宫为慈禧太后治疗背痈瘥而名扬四海。释氏为其高足，文师入室学业8年尽得其传。1925年，在成都开业行医。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引起了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当时文老与医界同仁一起奋力抗争，他与北京市李重人教授，上海市张赞成教授，张觉人教授等人一起。他们分别在北京市、上海市、成都市等地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强烈反对废医案集会”上，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保存和发展祖国传统医学。文老1957年调入成都中医学院任教，先从事教学如诊断学、内科，1963年到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文老事外科，以内外合治为原则。文老推崇的医家汪机说：“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其如视诸掌乎。”他为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外科的创立、建设、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文老名言：“人体表现于外的痈疽疔疖，尤江之浊流，树之枯叶，只有澄其源而流自清，润其根而叶乃茂。”其代表著作有《文琢之中医外科经验论集》《川派中医药名家——文琢之》。

文老至孝是我们学习榜样。由于文老父亲去世早，成人后文老为了尽孝，一直与母亲同住，侍奉起居，问寒问暖。如果在外面吃饭，一定要带好食物回来孝敬母亲，母亲很高兴。由于母慈子孝，文老母亲享高寿103岁，文老对母亲的孝顺影响了学生，学生们都纷纷向文老学习。

文老传授杀虫止痒秘方。记得1981年秋，张觉人老师因出版《中国炼丹术》一书，兼之张老满九十岁补过生日，在人民南路的一家饭店请客，我陪文老赴宴，席间张老十分高兴，亲自签名盖章送我新书，讲了很多炼丹方面的经验，我都一一记下，如饕餮享大餐，十分解馋，收获颇丰。席散我陪文老回天涯寺南街家，文老兴奋，当时没有人力车可坐，只好缓缓步行回家。由于路比较远，我们边走边谈，文老将秘方传授与我，后公之于世，受到欢迎。疥药粉是四川地区流行较广，影响很大的一个特效秘方，同行对该药的流行是认同的。由于过去没有外传，我在编写文老经验集时将其公布于众。

牢记恩师教诲终身受益——简记罗禹田教授

罗禹田教授（1905~1990），国内中医骨外科名家，中医界名宿。学验俱丰，

尤以手法整复骨折、软组织损伤、骨病、烧伤、外科杂病、皮肤病见长，深为病者乐道，学生称颂，同道赞许。罗老家传骨外科业已三代，其父罗裕生疗骨折、治损伤，为当时大国手，有“罗氏骨科，国内独步”的美誉。

罗老幼时聪颖，少随其父学医，教导甚严，遍读医籍。随父练习推拿、复位手法，习做膏丹丸散之秘药，渐渐地把家学继承下来。成年后，又拜诸名师指点，医技日精，名成于青年，蜚声于川。

罗老在成都市一人民医院骨外科工作，1957 年调入成都中医学院任教，担任中医外骨科教研室主任，参加 1960 年、1963 年全国中医外骨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同时参加附属医院的门诊工作。他主讲 1962 级、1963 级、1964 级、1965 级中医外科、骨科、五官课程，培养了许多高级中医专家。1966 年参加 32111 钻井队烧伤抢救工作疗效好。由于罗老工作成绩突出，1965 年当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罗老每于精神好时，或讲《内经》，或讲《易学》，或讲《外科》，或讲杂病，或讲临床心得，或讲授用药规律，循循善诱，一丝不苟。在读书问题上，指导学生要重点读代表作，经典著作必须精读。罗老为成都中医学院外科教研室成立、建设、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罗老的治学名言：“先博览群书，增长见识，后由博返约，精读细研。”这一方法使我受用终生。其代表著作有《中医外科临症集要》《川派中医药名家——罗禹田》。

随妇科名家王渭川教授、王祚久教授学习

我在工作后转科时，在妇科跟随王渭川教授、王祚久教授临床学习，在老师们的繁忙工作中学习到许多宝贵的经验。比如，王渭川教授长于妇科杂病、不育、带下症等，故王老治疗不育症时重点是调经与带下症同时治疗，加以通窍之品，不仅调好月经，带下之疾也随之而愈，还治疗好不育症，产下健康宝宝。王祚久教授治疗妇科疾病喜用傅青主女科方。二老之中，前者以医治不育者居多，后者以医治经带疾病居多。

关于学校中医外科的发展

1956 年成都中医学院成立时，中医外科教师很少。罗禹田老师是教研室

负责人，吴国璋老师、文琢之老师兼内科教学和附属医院外科门诊。学校开设师资进修班后增加了刘洁明老师、张敬姜老师、阙再忠老师、熊永文老师。到1970年又增加了陈忠雄老师、杨嘉钊老师、黄世成老师、宋根信老师和我，外科此时已经渐渐形成梯队。始分为中医外科教学组、骨科教学组、西医外科教学组，后成为三个对应的教研室。后来人员代有补充、更迭，到20世纪80年代中医外科发展为硕士学位招收单位。2002年发展为博士学位招收单位，随后又作为四川省重点学科、四川省精品课程以及全国规划教材副主编单位，多部学会及自编教材主编单位。1997年院系合并后又成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建设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传承工作室——文氏皮科传承工作室。中医外科能够有今天的成绩，罗老、文老功不可没。

在我进入中医行业时，得到很多老师们的教育和帮助。有了他们才有今天的我，我会永远记住他们。他们是李斯炽先生、吴棹仙先生、李克光先生、文琢之先生、罗禹田先生、彭履祥先生、冉品珍先生、王渭川先生、王祚久先生、陈源生先生、张觉人先生、曾应台先生、陶涵清先生、余仲权先生、关吉多先生、雷德明先生、刘洁明先生等，受教甚多，难以一一举例，我执弟子礼，故以称呼先生为敬。

撰写人简介：

艾儒棣，男，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四川省十大名中医，国家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川派中医外科第四代学术传人。承文琢之、陈源生、罗禹田、张觉人等全国中医名家多年，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个人临床心得，提出了“扶正祛邪、重建平衡”的见解。针对免疫系统疾病及其他内、外科疑难杂症，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天疱疮、皮肌炎、硬皮病，通过中医药治疗，获得了良好的疗效，得到中西医同行的称赞。出版《中华大典·外科总部》《文琢之中医外科经验论集》《中医外科临证集要》等著作。

成都中医药大学校牌字体的来历

撰写人 / 谢克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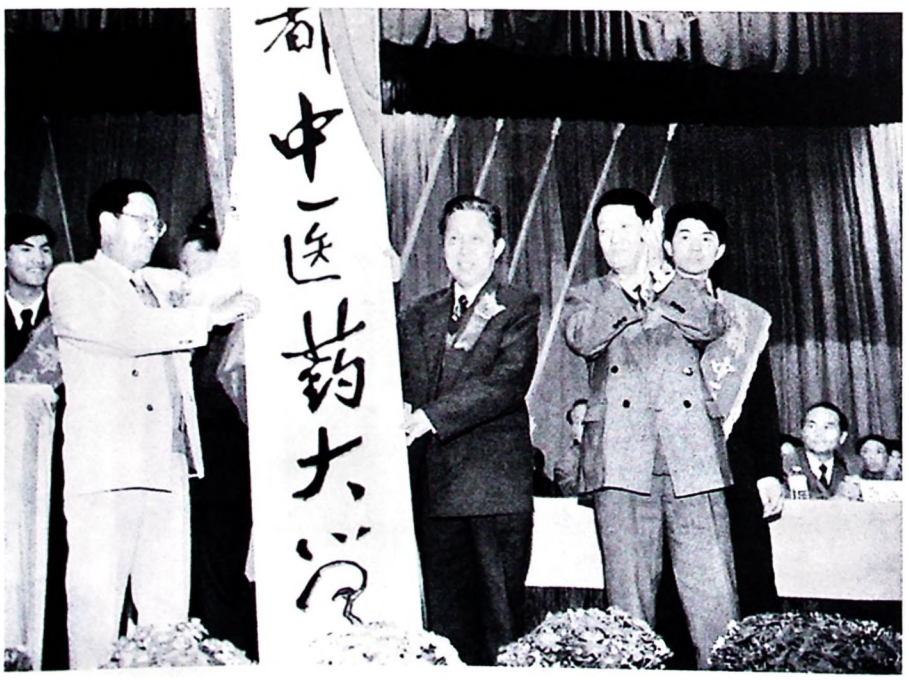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校第一任党委书记张华同志，在北京请郭沫若亲笔题写了校名。从那时起，根据郭老手书制作的“成都中医学院”（1995 年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校牌，一直高高悬挂在学校大门口。郭老的字笔力雄厚、气势开张、字体道丽、神采飞扬，造诣之精深，特色之鲜明，当代书法界罕有能与之比肩者。用郭老手书制作的校牌不但为我校师生员工所喜爱，而且为同行、群众乃至于台港澳同胞及国际友人所熟悉。它不仅体现了我校的性质与任务，而且是我校变革发展成长壮大的历史见证。



由郭沫若亲笔题写的成都中医学院校牌

30多年来，郭老题写的校牌和我们共同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又和我们一道迎来了阳光明媚、充满希望的春天。对于这块校牌，我们感情深厚，无限热爱，无比依恋。然而，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形势的发展，经专家评议，国家教育委员会已于1995年2月15日批准我校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所以，我们必须告别这块校牌，因为它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应当让它光荣退役，而代之以“成都中医药大学”新校牌。于是全校师生员工立刻开始关心一个新问题：新校牌由谁来题写？采取什么字体？

校党委书记郑士杰同志深情地说：“我们现在的校牌，是郭老亲笔题写的。郭老不仅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而且又是杰出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选用名人手书集字制作校牌，兄弟院校已有先例。我提议新校牌仍旧采用郭老字体，去掉一个‘院’字，加上‘药’和‘大’不就成了‘成都中医药大学’。”李校长和学校其他领导一致同意这个建议。校党委扩大会很快进行了讨论，认为这项提议既照顾了师生员工的意愿，又尊重历史，与原有的校牌一脉相承，突出了学校的发展历程，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锦上添花、皆大欢喜。这项提议顺利获得通过并且学校委托我来完成集字任务。



1995年，成都中医学院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

从1995年2月20日到2月24日，我在学校图书馆查阅了所有的郭老手迹和遗墨，很快找出5个字（以后又找到20多个），接着又找到2个体，而且是相当标准的简化字！我选出其中的一个“药”字和一个“大”字，不加任何修饰，仅仅根据需要在复印机上进行缩放，然后取出我校原藏郭老手书校名的影印件，选出除“院”字以外的5个字，与“药”和“大”进行对接，我眼前一亮，看到了奇迹：“成都中医药大学”7个字，宛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天衣无缝。这7个字不仅保持了郭老手书的风格，而且无论从书法角度，还是从审美角度来讲都十分紧凑协调，奕奕有神。噫，天下妙趣有逾于此乎？是郭老在天之灵有先见之明欤？抑我校之与郭老真有缘分耶？学校负责的同志征求老领导、老教师的意见，大家看到新校名底稿，不但满意，而且甚感欣慰。全校师生对新校牌仍然使用郭老字体，一致拥护，完全赞同。学报刊头、校报刊头、附属医院吊牌都将选用郭老字体。

这样，郭老的形象和他的字迹，不但不会随着学校的更名而消失，相反会更为广泛地深入到我校教、医、研等各个方面，并随着我校的兴旺发达，闪烁更加灿烂的光辉！郭老的亲切关怀，永远是我们开拓前进的动力，而采用郭老手书集字的新校牌，势必成为我校全面振兴和迅速腾飞的里程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为记。

本文摘自《成都中医药大学报》第209期（1995年3月15日第一版），略作编辑。

撰写人简介：

谢克庆，男，1945年生于河南省滑县，家里世代从教业医，少承庭训，耳濡目染，有济世活人之志。1964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攻读中医专业，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与行政管理工作。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1997年擢升教授，后又担任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历任教务处副处长、医学系副主任、针灸系主任、学校副校长等职，兼任成都市针灸学会副理事长、成都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等。任职以来，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辑有5部专著。工书法，善著文，能绘画，喜篆刻，尤以大篆、楷书与草书见长。

我爱母校我爱党

撰写人/谢克庆

在深切的等待企盼中，1964年8月23日，我终于如愿以偿，接到了成都中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家世代业医，父祖均望百年家技后继有人，长孙考上中医学院，全家兴高采烈，像过年似的喜气洋洋。

1964年8月29日下午，我肩负着亲族承前启后的使命和师友的深情厚望，坚持独自背着行李提着网兜，乘5路公交车去通惠门外新罗路校部报到。在十二桥站一下车，五六个佩戴白底红字校徽的高年级同学即热情主动地前来迎接，一边道贺，一边帮忙拿东西，又互报姓名，并问长问短，和我交流。他们的朴实、真诚与友善，给初来乍到的我留下了极其深刻和美好的印象。

从车站到学校不足500米路，沿途绿桐成行，浓荫泻地，屋宇参差，风景如画。学校大门由青砖砌就，左右两边墙壁上装饰着花团锦簇的赭色浮雕，中间位置有四根汉阙般的方形立柱构成三条通道，显得特别典雅。大门里面是花台，花台中央是假山。假山上流泉飞瀑，四周鲜花盛开。花台后面矗立着雄伟庄严的教学实验大楼。

同学们引着我在楼下中门过厅报到。一位20多岁戴眼镜、留着平头的年轻老师一接过我的录取通知，就微笑着对我说："我姓徐，是新同学的辅导员，今后你们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我是党组织派来为大家服务的。"完成报到手续后，辅导员帮我领取了生活用品，带我到男生六舍安排住处。学校迎新的准备工作安排得十分细致周到。老师直接引我登上三楼向左拐，第三间宿舍门上已贴着该室同学名单。走进室内，看到三张上下铺的木床，左边下铺床挡头，

就贴有我的名字。那是一张用毛笔蘸墨写的纸条，字迹雄强飞动，引人注目。老师见状对我说，你看的书多，字写得很好，又爱讲故事，今后年级上的活动要多参加啊。刚见一面，老师竟对我的情况如此熟悉，我不禁对老师油然而生敬意。后来我才知道，编组名单和床头字条都是老师所写，他已从师范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而我才走进大学，他是那么谦虚和蔼，与博学善良的老师相处，多好啊！

住宿落实之后，我告别老师，想在校园里走走，熟悉一下环境。记得那年序属甲辰龙年，又临近中秋，整个校园里桂香馥郁，松柏苍翠，竹影婆娑，银杏挺拔，紫藤葱茏，芙蓉含苞，橘柚初成。砖房不多，尚存茅屋、板棚，楼房也不高，仅有两三层。但整个校园整洁、清爽而宁静。虽然规模不大，更谈不上气派豪华，然而却是一个学习深造的理想环境。在校园中一转下来，我对新环境一见钟情，倍感亲切，此后几十年来一直未变。

1964 年 8 月 30 日上午，全校医、药两系新生在食堂参加开学典礼。由于党委书记张华同志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大会遂由吴敬副书记主持。吴书记皮肤白皙，面容慈祥，剪齐耳短发，操纯正普通话，衣饰朴素，举止稳重。抗战时期，她离开天津女子师范大学，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职全国妇联干部，是蔡畅、邓大姐的老部下。为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后调来我院协助张华同志开展工作。学校首任院长、全国人大代表、中医教育家李斯炽先生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讲到了党的中医政策，讲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医院校的战略意义和重要影响，讲到了中医、中药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对学生的基本要求。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听得学生兴奋激动，终生难忘。

其后是校办彭和明主任向新生介绍学校概况。彭主任是一位江西籍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瑞金出发，转战南北，出生入死，终于到达延安。他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仍然精神抖擞，豪气干云。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学校工作，从部队转业到我校担任人事处长、校办主任没几年，就将学校的情况搞得一清二楚。他说，学校的管理队伍以老红军、老八路、老党员、老干部为骨干。在战争年代，为了夺取胜利，他们无私无畏，英勇斗争。现

我爱母校我爱党

撰写人/谢克庆

在深切的等待企盼中，1964年8月23日，我终于如愿以偿，接到了成都中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家世代业医，父祖均望百年家技后继有人，长孙考上中医学院，全家兴高采烈，像过年似的喜气洋洋。

1964年8月29日下午，我肩负着亲族承前启后的使命和师友的深情厚望，坚持独自背着行李提着网兜，乘5路公交车去通惠门外新罗路校部报到。在十二桥站一下车，五六个佩戴白底红字校徽的高年级同学即热情主动地前来迎接，一边道贺，一边帮忙拿东西，又互报姓名，并问长问短，和我交流。他们的朴实、真诚与友善，给初来乍到的我留下了极其深刻和美好的印象。

从车站到学校不足500米路，沿途绿桐成行，浓荫泻地，屋宇参差，风景如画。学校大门由青砖砌就，左右两边墙壁上装饰着花团锦簇的赭色浮雕，中间位置有四根汉阙般的方形立柱构成三条通道，显得特别典雅。大门里面是花台，花台中央是假山。假山上流泉飞瀑，四周鲜花盛开。花台后面矗立着雄伟庄严的教学实验大楼。

同学们引着我在楼下中门过厅报到。一位20多岁戴眼镜、留着平头的年轻老师一接过我的录取通知，就微笑着对我说："我姓徐，是新同学的辅导员，今后你们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我是党组织派来为大家服务的。"完成报到手续后，辅导员帮我领取了生活用品，带我到男生六舍安排住处。学校迎新的准备工作安排得十分细致周到。老师直接引我登上三楼向左拐，第三间宿舍门上已贴着该室同学名单。走进室内，看到三张上下铺的木床，左边下铺床挡头，

就贴有我的名字。那是一张用毛笔蘸墨写的纸条，字迹雄强飞动，引人注目。老师见状对我说，你看的书多，字写得很好，又爱讲故事，今后年级上的活动要多参加啊。刚见一面，老师竟对我的情况如此熟悉，我不禁对老师油然而生敬意。后来我才知道，编组名单和床头字条都是老师所写，他已从师范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而我才走进大学，他是那么谦虚和蔼，与博学善良的老师相处，多好啊！

住宿落实之后，我告别老师，想在校园里走走，熟悉一下环境。记得那年序属甲辰龙年，又临近中秋，整个校园里桂香馥郁，松柏苍翠，竹影婆娑，银杏挺拔，紫藤葱茏，芙蓉含苞，橘柚初成。砖房不多，尚存茅屋、板棚，楼房也不高，仅有两三层。但整个校园整洁、清爽而宁静。虽然规模不大，更谈不上气派豪华，然而却是一个学习深造的理想环境。在校园中一转下来，我对新环境一见钟情，倍感亲切，此后几十年来一直未变。

1964 年 8 月 30 日上午，全校医、药两系新生在食堂参加开学典礼。由于党委书记张华同志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大会遂由吴敬副书记主持。吴书记皮肤白皙，面容慈祥，剪齐耳短发，操纯正普通话，衣饰朴素，举止稳重。抗战时期，她离开天津女子师范大学，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职全国妇联干部，是蔡畅、邓大姐的老部下。为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后调来我院协助张华同志开展工作。学校首任院长、全国人大代表、中医教育家李斯炽先生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讲到了党的中医政策，讲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医院校的战略意义和重要影响，讲到了中医、中药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对学生的基本要求。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听得学生兴奋激动，终生难忘。

其后是校办彭和明主任向新生介绍学校概况。彭主任是一位江西籍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瑞金出发，转战南北，出生入死，终于到达延安。他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仍然精神抖擞，豪气干云。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学校工作，从部队转业到我校担任人事处长、校办主任没几年，就将学校的情况搞得一清二楚。他说，学校的管理队伍以老红军、老八路、老党员、老干部为骨干。在战争年代，为了夺取胜利，他们无私无畏，英勇斗争。现

在遵照党的指示创建学院，虽然任务从战场转移到学堂，但革命干劲不能减，责任更重大。“我们的责任就是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做好后勤保障，改善师生生活，办好中医学院，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可靠接班人。”他又说，“党委张书记和李院长深刻地认识到，要保证教学质量，提高专业水平、关键在于教师。”因此，他亲自带领教务科长侯占元、科研科长凌一揆，跑遍巴山蜀水，到处明察暗访，深入调查研究，请来几十位名贤、学者、专家，组成一支实力雄厚、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如成都的伤寒专家邓绍先，妇科名医唐伯渊、卓雨农，骨科名医杜子明、罗禹田，医史学家孔健民和李介明，内科专家刘耀三、刘安衢、陆干甫，儿科名医杨莹洁，金匮学家邹仲彝，内经学家邱明扬，外科名医文琢之，针灸名家关吉多，中药专家徐楚江，个个经验丰富享誉蜀中。而来自重庆的内经学家、善用金针的吴棹仙，儿科名医曾应台，伤寒学家戴佛延，西昌的眼科圣手陈达夫，三台的温病学者宋鹭冰，射洪的针灸大家蒲湘澄，遂宁的内科双雄彭履祥、冉品珍，万县的针灸名医余仲权，妇科专家王渭川，眉山的儿科专家胡伯安，资中的伤寒学家顾大德，宜宾的内经学家熊永和、方剂学家陈潮祖，内江的中药学家雷载权等，医德高尚，技术精良，遐迩闻名，享誉蜀中。彭主任说：“严师出高徒，有这么多贤达名师执教，相信同学们今后的学习生活会变得丰富多彩、信心满满、收获多多。”

记得当年的新生入学教育只有几天，但安排紧凑、收效显著。开学典礼结束之后，紧接着是专业介绍、学校规章制度及学生守则宣讲，再下来是体检复查和观看迎新文艺演出。由医学系1968级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与医学系1967级演出的全本话剧《箭杆河边》，令我对高年级多才多艺的同学刮目相看，充满敬意。

入学教育虽然简短，但让同学们明确了学校完全是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开办的。我们巩固了专业思想，明确了努力方向，鼓足了学习劲头。

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古代汉语，主讲是郑孝昌老师。郑老师中等身材，文质彬彬，慈眉善目，谈吐儒雅，讲课语速舒缓从容，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引人入胜，可谓胸有成文，满堂生辉。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得遇良师，吾等幸

运之至。

讲授中药学的凌一揆老师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材主编，走进教室时，衣着整洁，腰板笔直。他十分重视教师仪表：头发梳理得光洁整齐，白色衬衣一尘不染，皮带内扎西裤笔挺，皮鞋锃亮。凌老师讲课不用看教科书，几张厚纸卡片（大约是课程内容提要）插在上衣口袋里也未见取用过。但凌老师讲课却有磁石般的强大吸引力。他紧扣主题，用语准确，语言简洁，声音洪亮。提纲挈领，掷地有声，画龙点睛，让人难忘。

方剂学老师陈潮祖博学多闻，记忆力惊人。他上课从不带书，手里只端一只茶杯。尽管他身躯清瘦，体质虚弱，阳气不足，夏天也要穿棉袄。但一讲起课来，却气充神爽，精神百倍，容光焕发，绘声绘色，妙语迭出，若有天助。同学们均说，听陈公讲课，简直是一种享受，如月下清泉流于石上，润物无声，沁人心脾。

吴棹仙老师讲《黄帝内经》则旁征博引，大开大合。以经解经，无不恰到好处；致远钩深，令人茅塞顿开。

顾大德老师讲《伤寒论》也很有特色，他祖述百家，参以己见，尊古而不泥古，发扬而不离宗，条分缕析，去粗取精，指事切用。

彭履祥老师讲授《金匮要略》也很受同学喜爱。他备课认真，语言朴实，既重点精解仲圣经文，又密切联系临床辅以亲历病案，以古喻今，以今证古，相辅相成，真实可信。

感谢学校党委如此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在以后几年的学习生活中，专业设置的每门课程，我们遇到的都是好老师、好先生。如教《党史》的余海峰，上体育课的黄隆清，讲外语的刘先挺，授西医的李述宗、罗云芳、杨纪曾、周邦靖等。他们不但课讲得好，和同学相处的关系也特别融洽，受到学生们的尊重。

除优秀老师的授课保障我们的学习任务得以顺利完成之外，母校还给予每个同学以极大的感动。如进入中医学院读书的全部同学，从一走进校门开始直到毕业，伙食费完全由学校提供，自己不用掏一分钱。不但伙食不花钱，要是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还可以申请逐月领取人民助学金，而且冬天可以申请补助棉衣棉裤棉被，夏天申请补助蚊帐。除生活上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外，

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听取国际国内形势报告，组织时事政治学习，举办党团知识讲座，以提高思想觉悟，明辨大是大非。如果同学有了思想问题，老师总是主动来找同学谈心，和风细雨，实事求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循循善诱，引而不发。

党的中医政策在成都中医学院得到以学校党政领导张华、李斯炽为首的领导班子和全校师生的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和老师就像学生的父母，学校就是我们的家园。在学习期间，我对学校和专业的感情日益浓厚和加深，我多么渴望毕业后能够留校，一方面努力为学校事业的发展工作，一方面又能为自己的深造提高得以随时求教各位恩师啊。

有时幸运之神会显示出惊人的大度和慷慨。我就受到她的眷顾和赐予。1971 年 8 月 18 日下午，学校宣布老五届最后一批学生毕业留校 25 人，其中一位就是我！

这使我万分兴奋和感动。第二天一早，我怀着感恩之心去人事部门报到，请求立即投入工作，结果被分到教务处担任教务干事。加入教职工队伍之后，我对学校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以老红军、老八路、老党员、老干部为主体的管理队伍，把党的光荣传统和延安精神带进了学校，他们工作积极又负责任，办事干练又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精打细算，践行党的路线方针坚决果断，不折不扣，兴建中医学院殚精竭虑、全力以赴。而以巴蜀名医与原四川国医学院各届毕业生为核心的师资队伍，他们身怀绝技，德艺双馨，理论基础深厚，临床经验丰富，为实施专业计划，培养高级中医师、中药师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证。学生队伍来自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青海、陕西，他们艰苦朴素、刚强正直，学习热情高涨，奋斗方向明确，团结友爱，忠厚善良，完全可以给予重托与信任。从此，我就在学校和谐、宽松和快乐的环境中工作着、学习着和生活着。学校培养我，信任我，使用我，入党、提干、升职，一切顺理成章；上山下乡，搞试点，办分校，授课，带习，管后勤，征地建新区，一晃就是 40 多年。我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校实践中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蓬勃发展的中医事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母校的繁荣昌盛和我的今天。我亲自看到了在历届党政领导的带领下，通过全校师生员工的艰

苦奋斗与努力拼搏，学校已经从无到有，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单一走向综合，从草创走向成熟。学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已经全面步入和谐发展的新轨道，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迈进。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教师，虽然我为母校的拓展和升华贡献过心力，燃烧过激情，但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不值一提。倘若人生能够重新规划和安排，我仍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就读母校和毕业留校工作。因为党是母亲、学校是我的家，我爱母校我爱家！

撰写人简介：

谢克庆，男，1945年生于河南省滑县，家里世代从教业医，少承庭训，耳濡目染，有济世活人之志。1964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攻读中医专业，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与行政管理工作。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1997年擢升教授，后又担任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历任教务处副处长、医学系副主任、针灸系主任、学校副校长等职，兼任成都市针灸学会副理事长、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等。任职以来，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辑有5部专著。工书法，善著文，能绘画，喜篆刻，尤以大篆、楷书与草书见长。

盛世奇缘　天从人愿

撰写人 / 谢克庆

早闻生肖属龙一生与龙有缘的棹仙翁妙术通神，又有向毛主席面呈“子午流注环周图”非凡经历，心生敬仰，倾而慕之久矣，惜识荆无由，未得当面受教。甲辰龙年之秋，学校为我班开设《黄帝内经》课程，吴老是主讲教师之一，于是热切期盼着。记得首次为我班授课时，鹤发童颜的吴老被好几个年轻教师簇拥着走进教室。落座之后，吴老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博古证今，滔滔不绝。年轻教师们听得聚精会神、眉飞色舞。我和同学却始而欣喜，继而迷茫，嗣后如坠雾中。大师授课，我却听不明白，因此满腹疑问。课后我斗胆向吴老讨教。老师说：“你才从中学走进大学，听不懂很正常，犹如走进一个新环境，谁都会感到陌生，啥子都不晓得一样。你听不懂，为什么那些年轻老师听得扎劲呢？因为他们早进门，熟悉了。你以为学中医容易呀，我从八岁开始学医，开头也是什么都不晓得。连学 15 年，才在重庆挂牌开业。开业以后，不断遇到难题和麻烦，自己解决不了，还得请教老师。到今天我行医 50 年，也没有把中医彻底搞懂。你才开始学习，怎么能全都听得懂呢？要想学好中医，必须下苦功夫。一遍听不懂，再学二遍，二遍不懂再学三遍。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嘛。”说话时，语调柔和，神态安详，那年他已 72 岁，而且名满天下，谦逊如此，让我倍感亲近。

于是再请教先生：“如何学好《黄帝内经》？”

师曰：“没有捷径，只有多读、多背、多听、多想、多问，才能磨杵成针，滴水穿石，功到自然成。”

我又问：“参考何书为好？”

老师答：“以扁鹊之《难经》、仲景之《伤寒》、玄晏之《甲乙》，并孙思邈之《千金》。”

我再问：“老师是全国著名《黄帝内经》解读专家、学界泰斗，可有著述供弟子学习？”

吴老说：“泰斗谈不上，关于解读《黄帝内经》，我倒是有个计划，只是教学诊务太忙，才开了个头，写了本《医经生理学》，整个工程就停下了。”

我问：“何处可以借阅老师大作？”

师曰：“学校图书馆有油印本。”

结束和老师的谈话之后，我赶往图书馆，去借阅吴老所著《医经生理学》。馆长答曰：“图书馆原有几册油印本，因为是吴老自著，言简意赅，深入浅出，颇具参考价值，所以早被借阅一空。已经有好几位同学排队等着借书。你要借，也登个记排队吧。”我迫不及待地在借阅簿上登了记，但等了好久也没轮到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图书馆经过筹备重新开放，我再去借阅《医经生理学》，早已片纸无存，不见踪影。我不禁感慨万端：欲见庐山真面，怎么比唐僧取经还难啊！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觉又到了壬辰龙年，这年正是吴老诞辰120周年。又是在龙年秋天，一日弟子房生问我知不知道吴老所著《医经生理学》，我听后如闻惊雷，全身一振，忙问：“何以问及此书？”他说：近日淘宝，在古旧书籍中，偶然发现吴老所著《医经生理学》油印资料，但残缺不全，只有中下篇，没有前面的内容。想到是自己学校前辈大名鼎鼎的吴棹仙老师所著，还是想办法索取到手。我听了之后，连连称赞房生是个有心人，为中医事业做了一件好事：油印资料虽是残卷，毕竟是我几十年都未曾得见的吴老遗泽啊。房生问：“学校图书馆有无此书？”我答：“早已找过了，肯定没有。”答话虽然令房生沮丧，但他的运气却好得出奇。房生本是我的学生，他勤学好问，能写会画，表现出色。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推荐他到刁本恕师兄门下临床实践和深造。他在刁本恕的调教下进步很快，深得器重和喜爱。房生将他淘宝得到《医经生理学》资料一事汇报给老师时，刁师兄顿时愣住了。原来50多年前，他的姑妈在成都中医学院读书，因为成绩优秀、出类拔萃，

老师赠她一本书作为奖励，这本书正是吴老所著《医经生理学》。姑妈如获至宝，反复研读，学业大进，将这本书一直珍藏着。后来看到侄儿学习中医不但刻苦，而且聪明过人，遂赠侄儿助其更上一层楼。本恕师兄认真阅读、反复推敲，获益良多，也将此书妥善保存。但所持之书仅有上篇，而缺中篇和下篇，虽为美玉，却非完璧。他曾多方寻觅，始终一无所获，只好抱残守缺。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现在听到房生奇迹般地淘到了《医经生理学》残卷，而这部分恰恰是自己梦寐以求、搜求无着的中篇和下篇，怎能不叫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呢？原来上篇卷首有吴老亲笔所写“自序”。序言说：“爰集灵素经文，间采难经、千金、圣济经等书有关生理者为三篇：上篇论固定之形脏，中篇论流通之营卫，下篇论变化不测之神明。斯举也，浅而导之深，虚而证之实，作一升轩岐堂奥之阶梯耳。”吴老这段话，明确传递出三条信息：一是本书所引经文，主要出自《黄帝内经》，间采《难经》《千金要方》与《圣济经》；二是内容分为形脏、营卫、神明三篇；三是为初学者析疑阐奥、升堂入室提供帮助。师兄所藏上篇正系形脏部分，追寻的就是营卫和神明。双方取出各自所藏仔细比对，居然上中下三篇，在半个世纪后重新实现无缝对接，通篇不缺一行，不差一字，首尾合龙，天衣无缝。终成善本，横空出世。狂喜激动之余，师生当即决定将此奇遇立即向上级报告，并申报科研课题，深入进行研究与开发。于是《医经生理学》再续传奇。成都市卫生局领导赵文，饱学之士也。他原本就有组织力量重点收集整理出版当代成都名老中医著述，以继承弘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长远规划。闻知一代宗师吴老先生除子午流注灵龟八法之外，又一力作《医经生理学》历尽曲折，重生出世，当场明确表态：列入老中医遗著重点抢救名录，责成书稿拥有者尽快提供精准电脑打印文本，政府全额资助，抓紧时间出书，使孤本不孤，徽音永驻，推而广之，以慰吴老在天之灵。接到任务后，刁本恕先生让房生将全部书稿打印出来，他亲自加以校勘，准确无误以后，让房生打一清样，交我一读。面对《医经生理学》上、中、下三篇书稿，我终于如愿以偿！ 49 年后始见吴老遗著，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恩师音容宛在眼前，思绪翻滚，感慨系之矣。我想到老师的《医经生理学》正式出版，也只是实现了吴老遗愿的一部分，

而他计划中的《医经病理学》《医经诊断学》《医经治疗学》《医经预防学》等，尚未动笔就已在丙辰之年龙飞极乐。所以印刷出版《医经生理学》只是吴老的遗愿之一，继承他的遗志，广泛深入地分类整理诠释《黄帝内经》。古为今用，与时俱进，更好地为祖国医学和人民健康服务。吴老已经以身作则做出了榜样，我辈医者与后来人，都应当感谢他，学习他，再接再厉，再创辉煌，弘扬他未竟的事业，续写他未竟的篇章。

撰写人简介：

谢克庆，男，1945年生于河南省滑县，家里世代从教业医，少承庭训，耳濡目染，有济世活人之志。1964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攻读中医专业，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与行政管理工作。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1997年擢升教授，后又担任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历任教务处副处长、医学系副主任、针灸系主任、学校副校长等职，兼任成都市针灸学会副理事长、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等。任职以来，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辑有5部专著。工书法，善著文，能绘画，喜篆刻，尤以大篆、楷书与草书见长。

我校首批巡回医疗队亲临记

撰写人/张之文

1965年开学之初，我被派遣参加以吴棹仙为队长的巡回医疗队。出发前在老校区操场举行隆重欢送仪式，党委书记张华作重要讲话，鼓励大家为贫下中农服好务，接受锻炼、教育和改造。在吴老讲话后，副队长刘成双（时任附属医院院长）即刻率领全队直奔温江县（现温江区）涌泉乡。现今涌泉是成都市温江区繁华城区的一个部分，54年前，这里还是偏僻的乡村。医疗队落脚于中共温江地委党校。党校是一木质结构平房，坐落在绿色田园中央，周边没有其他建筑，显得格外宁静。我有幸在这里与中医前辈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天。

医疗队成员，除队长、副队长外，还有附属医院针灸科薛鉴铭主任、儿科胡伯安主任、中西结合儿科姚邦垣医师、护士长刘少华、学院伤寒温病教研室宋鹭冰老师、内经教研室熊永和老师、中药方剂教研室罗祺休老师、微生物教研室周邦靖老师。我时年28岁，是最年轻的一位队员。吴老的侄子吴慎修专事吴老起居，并为其抄写处方，属于编外。医疗队工作分工：一是吴老在党校收发室坐诊。二是宋鹭冰、胡伯安、熊永和、罗祺休老师在“干家店子”涌泉诊所上门诊，周邦靖老师负责临床常规检验。诊所与党校相隔一小段距离，老师们早出晚归。三是年轻队员，片区包干，下村巡回。薛鉴铭老师本应留在诊所，他强调自身健康，执意同我们几位年轻人下到最基层。另有卫生员（当时不叫赤脚医生）培训工作，薛主任主讲针灸、姚邦垣老师主讲西医、刘少华老师主讲护理、周邦靖老师主讲临床化验知识，我则讲一些中医基本知识。

中医泰斗吴棹仙老先生向毛主席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的新闻曾红遍全国，这次由他率领的医疗队直达基层，轰动乡村，波及邻县，甚至更远，患者

络绎不绝，有扶老携幼步行而来的，有滑竿抬来的，有用鸡公车推来的。一位西藏的糖尿病患者，从报纸上看到吴老下乡的消息，专门乘飞机赶来成都，再坐长途车到达温江，赓即步行抵达涌泉，因其过度疲劳曾一度昏倒在田埂上。

吴老时年 73 岁高龄，每次由侄儿陪同，手持拐杖，缓缓走向临时诊断室。那根龙头拐杖引人注目，把柄刻有“逍遥游”三个字，署名陈季让赠。陈季让乃陈毅元帅胞弟。鹤发童颜的吴老在诊断桌前一坐，仙风道骨，不同凡俗。

吴老精诚执业，经方、时方、针灸等，左右逢源，信手拈来，疗效称奇。记得四清工作团团长、温江军分区马政委患肩痛疾，求治于吴老。吴老接过针具，拇、食指将其紧捏，由下往上一捋，此时薛鉴铭主任高声提醒：手上有细菌！吴老声色未动，话音刚落，针已深深扎入穴位。经过几次治疗，马政委肩疾痊愈。本人也有幸体验过吴老高超金针治疗术。那是在医疗队工作结束之际，地方政府邀请全队进县城为居民和干部服务一周，此时我牙髓炎发作，疼痛难忍，队里所有药品已收捡打包运走，没有止痛药可用，只有指望吴老。吴老满足我对金针的好奇，我拈起金针一看，比火柴杆稍细，较一般毫针粗了许多，黄亮而软。吴老按子午流注为我取了左右列缺穴，正当准备进针时，我心里发虚，从未接受过这么粗的针刺，畏痛感油然而生。吴老进针迅速，沿皮下缓缓向上推进，没有预想那样疼痛。提插捻转后留针，牙痛逐渐缓解，片刻消失。出针后留有凹陷痕迹，较长时间才消散。唯恐复发，我默默计算着镇痛持续时间，约在 1 小时后，疼痛渐起，但较前缓和，能够忍受。又经吴老连续两三次治疗，效果奇好。西医姚邦垣对针灸镇痛很感兴趣，赞许其止痛快，作用较持久，比口服止痛药好。疼痛缓解后，我坚持完成了最后一周的医疗服务，这个经历久久没有忘记。

蓝天白云，麦浪翻翠，花草吐芳，令人心旷神怡！

每次早餐后，我们巡回队员身背药箱出发，我与薛主任有一段同走的路，临行前他常叫我：“小张，我们一起走吧！”薛主任历来生活讲究，到了农村亦然，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身着洁白衬衫，咖啡色背带长裤，皮鞋锃亮，戴一副宽大墨镜，身材高大，有时手拄拐杖。其后跟随着卫生员，在田边地头，十分惹人注目。“城里来了一位薛教授”的消息迅速传开，求其治疗者甚众，应接不

暇。他或蹲或屈着身子，检查、治疗，累得满面通红，汗流浃背，却乐此不疲。薛主任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针灸专家。

涌泉的工作团由成都军区机关组建，队员基本上是军队干部。我们医疗队，以及北京政法学院部分师生，虽然算得上工作团的组成部分，但是与正式队员有着明显的差别。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来接受教育、锻炼和改造的。刘成双院长因此对我们严格要求，我们也自觉约束，增强“改造”意识。有一个晚上正在看坝坝电影，刘成双院长派我为一位急症患者出诊。一听急症，脑袋大了，情况不明，忐忑不安，但容不得半点犹豫、含糊，必须绝对服从，立即出发。所幸的是患者是一位中年男性农民，身体壮实，发热头痛，给他针刺治疗，疼痛缓解，随即送我回到住地，这时电影已经散场，我瘫软在床上。

在队里分工明确，各自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有一次在巡回中，我顺便到涌泉诊所看看坐诊老师，以为不算什么问题，事后被刘成双院长知道，将我狠狠批了一顿，其严厉程度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和刘成双院长接触，始于1965年医疗队。1966年初夏，崇庆县（现崇州市）万家煤矿发生烧伤，刘院长深夜找到我，指派我与徐文成等于第二天凌晨赶赴现场，抢救烧伤，又给我一次锻炼机会。有幸与华西、省医、第七军医大（现三军医大）的烧伤专业医师共事数月。1968年又是他抽调我参加国家级重点课题710（钩端螺旋体病）研究。该课题与屠呦呦从事的523（疟疾）是并列课题，刘院长则是四川地区这个项目的直接领导人。我与他相处长达5年之久，我觉得他既要求严格，又重情重义，关心下属。那时，我和妻子长期两地分居，在刘院长的努力和其他学院领导关怀下，我们夫妻得以团聚，我爱人被调回任教、从医。刘院长是一位抗战时期的老革命，现今90多岁，他廉洁奉公，凛然正气，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业余时间，医疗队还是自由的，可以溜进县城或邻近双流区邹家场，买点瓜子、花生米等零食（工作时间在管辖区域是不允许的）。胡伯安老师曾托我买过泸州老窖和下酒菜油酥花生米等，他与宋鹭冰老师同住一室，晚上时有小酌，有时也拉着我同品佳酿。

我们与当地的卫生员结下了深厚友谊。我和周邦靖老师分工培训的卫生员叫杨秀琼，隽秀清灵，淳朴大方，她文化程度不高，虚心好学，经常向我们请教。

有一天她大早跑来，说她爸爸病得不轻，无论如何求我和周老师走一趟。我早先知道她父亲患有喘症（属现在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曾经给他开处方治疗过，也许这次真的加重了，或许她不放心我这位年轻中医，非要周老师同去不可。她家林盘茂密，小溪环绕，大门紧闭，异常幽静。当我们推开木门时，惊讶地看见她老爸正气喘吁吁地转动着磨盘，高兴地对我们说，今天请两位老师来吃豆花饭。我们感到很突然，执意不从，小杨和她妈妈挡在门口，不准离开半步。无奈之下，转念一想，小杨与我们是师生关系，正值周末休息日，问题不大，便留了下来，有幸分享了一餐地道的农家美味。在我们离开时，又给我们每人准备了满满一竹篮鸡蛋，追赶到地头，恳请我们收下，经我们反复讲明利害，不能为此犯错，方才罢休。医疗队工作结束，我们与小杨失去联系。1990 年初，我家刚搬到路南区新宿舍不久，一天突然一对中年夫妇敲开家门，正在迟疑间，



前排左二罗棋修，左三吴棹仙，左四胡伯安，左五熊永和，左六薛鉴铭，左八宋雪冰
第二排右三周邦靖，右五刘成双
第三排左一张之文，左二姚邦垣，左三刘少华

女的直呼："张老师，您不认得我了？我是杨秀琼！"我喜出望外，但面前的小杨，已失去昔日少女风韵，一时难于辨认。我约上周邦靖老师，一起回忆在涌泉乡的那些难忘往事，在交谈中，得知她父母早已过世，她在家种地务农，由于劳累，她和她老公落下一身病痛，曾多次来治疗。

我和周邦靖老师颇有缘分，他是华西医科大学最早支援我校的老师，主讲微生物学，我是他的学生，我毕业留校，与周老师同属一个系，一同参加医疗队还同住一个房间，后来又一同从事钩端螺旋体病研究，继续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退休后我们同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我们相处亲切融洽，互称"周师"或"张师"，我没有在老师面前的那种拘束感。周老师令我十分崇敬，90岁有余高龄的周老师，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只要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常常会同温往事，特别是在涌泉的日日夜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翻开泛旧的老照片，吴棹仙、宋鹭冰、胡伯安、薛鉴铭、熊永和、罗祺休、姚邦垣等老师，音容笑貌犹在，但与我们却阴阳两隔，难抑思念之情！昔日年轻的我，现已满头霜雪，看到杏林学子，志在岐黄，朝气蓬勃，感慨万千，拟小诗传承一首，以期共勉：

时光难我待，薪火虑途长。
荣谢随天序，相期道术彰。

撰写人简介：

张之文，男，成都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著名温病学家，首届全国名中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第二、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导师，四川省名中医，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首批四川省委直接掌握联系的高层次专家，四川省首届干部保健专家。获四川省医疗卫生终身成就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及省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出版专著21部。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受聘为台湾长庚大学客座教授，并多次受邀于瑞士、美国等讲学。

中药标本馆建设工作中的逸闻趣事

撰写人 / 卢先明

位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二楼的中药标本馆是集教学、科研的综合实体，是对外开放的窗口。今天的中药标本馆是学校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凝结而成的。标本馆的建设，头绪繁杂，涉及面广，历届校领导高度重视。常耀五院长、李明富校长、郑士杰书记、万德光校长等为标本馆的建设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在温江新馆建设中，从策划、设计到布展，梁繁荣校长、余曙光校长都先后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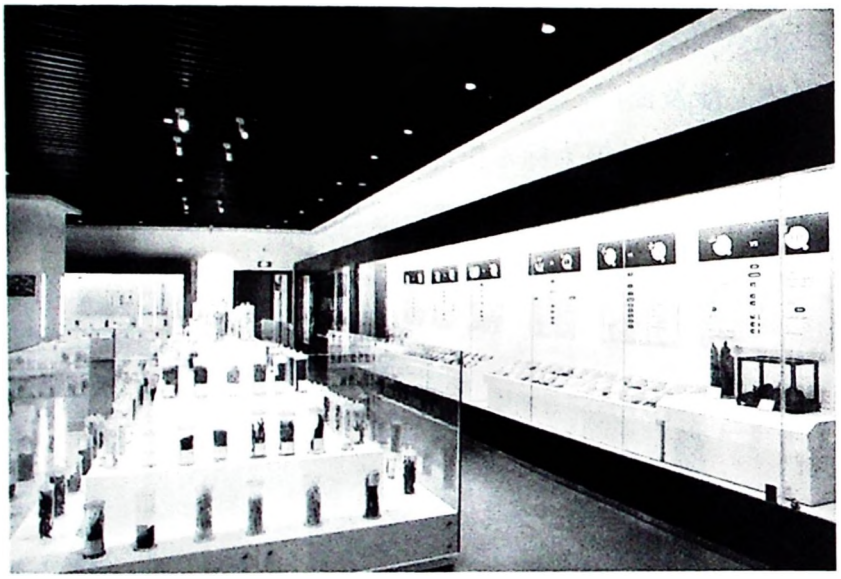
30 年前的标本馆



新时期的标本馆

自把关。

万事开头难，中药学专业创办于1959年。其中专业课程的实践性很强，如“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等，当时没有标本馆，第一代中药学老师需要开展大量的野外实习基地考察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李仿尧老师、贾敏如老师、曾万章老师、刘代明老师等到阿坝州茂汶县（现茂县）海拔3 000米的高山考查实习基地，进入深山后，迷失了方向，直到天黑，也没走出深山。后来找到一岩洞，就在一个岩洞架起篝火，烧起火，一是避寒，二是防野兽。直到第二天天亮后，大家才带着疲惫的身体离开岩洞，走出深山。



新时期的标本馆



新时期的标本馆

“镇馆之宝”——虎骨标本的由来

1989 年，自贡市动物园一只老虎老死后，听说虎骨在成都市中药材公司。校领导马上开会研究，在办学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批专款买了这具虎骨标本。目前中医药院校中，只有成都中医药大学有一具完整的虎骨标本，是馆内的“镇馆之宝”。

用扁担从海南挑回道地药材

常言道，“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今天的成中医人，不但要传承老一辈老师艰苦创业的精神，更要不断努力学习新的科学知识，继续努力前行。每当我走进中药标本馆道地药材展区，看到“榔胎”标本时，就想起了我们尊敬的李仿尧老师，万千思绪涌上心头。这份标本来得太不容易了！ 1972 年，李仿尧老师从海南辗转数省，用扁担从海南挑到华东，从华东挑回成都。途中挑断了三根扁担，李仿尧老师的肩上也磨起了血泡……当时李仿尧老师在海南收集的标本，本可直接在海南寄回学校的，李仿尧老师想到学校的经费也不宽裕，节约一分钱也是钱。人们说李仿尧老师就是成中医的一头牛，李仿尧老师的精神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成中医发展到今天，与李仿尧老师这样的老黄



新时期的标本馆

牛流血与流汗分不开。

在香港餐桌上“收集”的中药标本

老一辈成中医人，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他们爱国、爱校、爱岗敬业，不管是在校内校外、本土他乡，心里装着的都是与自己的专业、岗位相关的事儿。标本的收集是品种鉴定的重要环节，2002 年 1 月，贾敏如老师在香港就餐时，发现餐桌上有一道菜是鲍鱼，鲍鱼的外壳就是中药里的石决明，为多基原品种。为了收集标本，贾敏如老师等用餐的人把鲍鱼肉吃完以后，一桌一桌地收集，在场的所有人为之感到由衷敬佩，这种行为不但没有降低教授身份，更让人感受到这种敬业精神的可贵。

在康巴高原的雨季采集标本

2001 年 8 月，我们与摄制组一行，到了甘孜州德格县，为网上标本馆收集素材。8 月份是康巴高原的雨季，绵雨不断，在野外工作，为了抢时间、节约开支，下不下雨，工作都得照常进行。我们一边冒雨前行，一边寻找药用植物。行间，突然发现了羌活，正是花期，大家都非常兴奋，拍照的凌宗士老师和龚荣生老师，忙架起摄影架，拍摄了羌活、秦艽、升麻、独一味等药用植物。拍摄完后，凌老师、龚老师他们的衣服湿透了。当地人说：“这段时间，高原上雨多，为什么不带雨衣？”其实雨衣是带了的，被凌老师、龚老师用来保护摄影器材了。这件事已过去好多年，一说起雨衣，就想到当年在野外拍片的情境，至今难忘。我校在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业界名列前茅，与我们职员素质是分不开的，这些优良的品质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与传承。

富饶天府、文明巴蜀孕育了“中药之库”。丰富的中药资源，令我们自豪，激励我们前行。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蜀儿女生生不息、奋发图强，创造了令人神往的巴蜀古代文明。在标本馆的规划建设及各类标本的收集、鉴定、制作、养护中，凝聚了无数前辈和同仁的心血和汗水。我们将铭记为本馆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

中医药标本馆事业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事业，是鼓舞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是开启现代中医药发展智慧之门的金钥匙。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祖国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药标本馆的建设充满信心。我们坚信，在国内外中医药界同行的继续支持下，在我校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标本馆将会不断增加新内容、增添新风采。

撰写人简介：

卢先明，男，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原药学院、中药博物馆教师，曾先后参加了《中药商品学》《中药栽培学》《中华本草》等10余部著作的编写，发表论文20余篇。

记忆深处的“百沸汤”

撰写人/王　军

吴棹仙老先生是我校建校之初为数不多的几位著名教授之一。1955年在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会期间，向毛主席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最为称道。

我家与老先生为邻，也就是校友们熟知的“老八栋”。老先生是一个非常孝顺、风趣、开朗的人。家里四世同堂，上有需尽孝的养母，年老、有残、孤身一人的妹妹也由老先生供养，下还有众多儿孙。每日上班下班，必向养母请安问好，每逢重大节日均要带领儿孙向养母行大礼。平时高兴时，常管小孙儿叫小小弟、小孙女叫小小妹，于是乎他的家人，不管老幼，也跟着叫小小弟小小妹，以至于邻里的小伙伴们也都对其如此称呼。故儿时的我们也爱在老先生身前膝下玩耍。

那时只要老先生得闲，天气晴好，不管春夏秋冬，总要让家人在门前摆上一张方桌、几把椅子，桌上照例摆放着当天的报纸、时常研读的医学典籍，以及文房四宝和方笺脉枕。老先生在桌旁一边读书看报，一边为前来就诊的病人把脉诊病。来人不管是学校的校友员工，还是校外的布衣百姓，老先生都会为其细细把脉，认真处方，而且从不收取分文报酬。病人多时，老先生也就在桌旁用餐。儿时我们总爱围绕在老先生前后，听老先生讲些有趣的故事，观看老先生为病人望闻问切。

以前的许多往事还记忆犹新，其中“百沸汤”的故事最让我难忘。那是一个夏天的上午，老先生照例在门前的方桌旁一边看书，一边等待就诊的病人。当时成都劳动人民新一村的居委会主任，带着一位衣衫不整、面黄憔悴的五保户老婆婆，来请老先生看病。老先生非常细致地询问病情、观看舌苔、把脉、

处方。其中提到，煎药的水要用“百沸汤”，这让我们这群围在前后的小朋友感到非常新奇，因此记忆特别深刻。老先生详细地给病人讲述了“百沸汤”的制取。就是“用砂锅烧水，水沸后，用木瓢舀起沸水，从高处倒回砂锅；水再沸后，再用木瓢舀起沸水，从高处倒回砂锅，如此往复百次，即得百沸汤”，用得到的“百沸汤”来煎药。至于为何要用“百沸汤”来煎药，有何独特的中医学原理或神奇的作用，我至今还不得而知。但老先生为布衣百姓看病的那份认真、执着，却让我难以忘怀。

老先生一生勤苦学习，培育桃李，鞠躬尽瘁，不嫌贫寒，救病患于水火。这种博学厚德的人品不正是我们成中医人应该代代传承的成中医精神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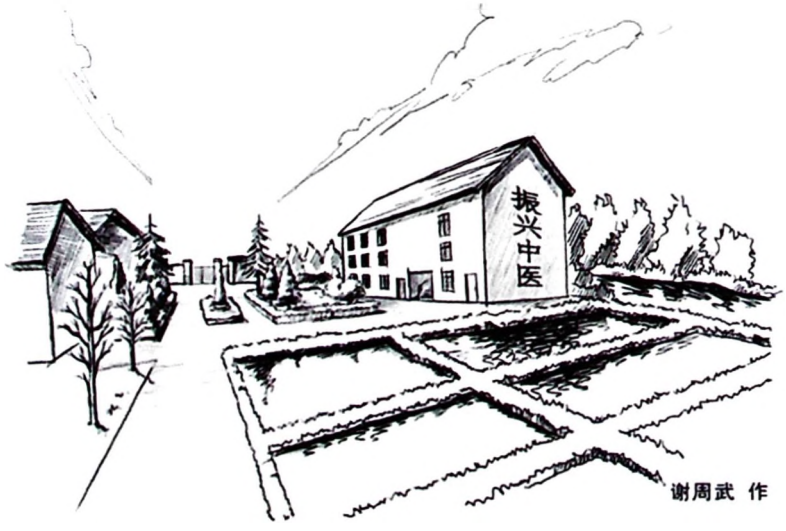
撰写人简介：

王军，男，1958 年 3 月生，1963 年随父母来到成都中医学院，1978 年参军，1981 年退伍后进入成都中医学院工作直至退休。先后在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制药厂、劳动服务公司、总务处、组织部、保卫处、后勤管理处、离退休管理处等部门工作。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工作和生活五十多年，对学校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变迁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校园里的三亩水田

撰写人/王　军

记忆里，在20世纪60年代初，十二桥校园里曾经有一块水田，面积约有2 000平方米。具体位置大约在第一教学楼的西头，一条小河从水田边流过，沿河边零星有些柳树，每到春夏，燕飞蝉鸣，蛙声阵阵，这里也是师生们清晨和傍晚读书谈心的好地方。到了春天插秧的季节，学校的教职工就会选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组织义务劳动。人们使用简单的工具耕田、除草。记得食堂的彭远银和易志云两位师傅用一个报废的架架车（四川方言，意为木板车）轮子，另加几根青竹，灵巧地编织出一架像模像样的水车。水车架在小河边，把清澈的小河水提灌到了田里。总务长罗福基带着一干人马，用架架车从附近农村拉来了秧苗，一部分人忙着平整田地、一部分人忙着插秧。经过一天紧张、繁忙而有序的耕耘，横平竖直的秧苗就插满了这块水田。当人们晚归的时候，水田在月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宁静和美丽。



后勤的老工友刘华子担负着日常对稻田的管理，时常都能在清晨和傍晚看到他劳作的身影。平时除草施肥，天旱时灌水、下雨时排涝。慢慢地秧苗长高了、扬花了、结出了谷穗，稻田的色彩也慢慢地从鹅黄、青绿变成了金黄。

到盛夏放暑假的时候，田里的水稻成熟了，人们又自觉地汇集在一起，开始收割金黄的稻子。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收获的多少，而更愿意沉浸在这欢歌笑语的劳动中。儿时的我们也会呼前抢后追逐着大人们的脚步，去抢拾稻田里散落的谷穗。收获的稻谷最后都会交到食堂，用于改善师生们的生活。

劳动的队伍里有学校的领导、教师、干部和工人。张华、吴敬、彭鹤明、魏云祥、张志明、陈云超、余仲权、徐楚江、凌一揆、杨介宾、武满立、叶超群、孙东昌、张兰英、王景堂、彭兴宇、翁成娟、石志远、周鹤鸣、郑培清、任义友等很多人，还有更多至今也叫不上名字的人……他们劳动时的音容笑貌却至今难忘。

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年的劳动者们大多已经离开我们，健在的也已是耄耋老人。但记忆中父辈们在稻田里欢快劳作的身影却愈来愈清晰。每到静下时，常常会想起他们。他们有的从雪山草地走来；有的从黄土高坡走来；也有的从白山黑水走来；他们都是从祖国的大江南北汇集到成都中医学院的。在他们身上都有着中华民族善良、纯朴、勤劳的优良品德。

他们大多也是优秀的共产党人，保持着我们党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保持着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父辈们正是依靠我们民族的优良品德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艰难困苦的年代，实现了学校早期的创业和腾飞。今天我们还会继续传承我们民族的优良品德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谁会怀疑我们学校的再次腾飞呢？

撰写人简介：

王军，男，1958年3月生，1963年随父母来到成都中医学院，1978年参军，1981年退伍后进入成都中医学院工作直至退休。先后在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制药厂、劳动服务公司、总务处、组织部、保卫处、后勤管理处、离退休管理处等部门工作。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工作和生活五十多年，对学校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变迁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一盘石磨三口大锅的故事

——记学校药厂的创业者

撰写人/王　军

1965年春，学校为解决药学专业半工半读学生的实习难题，决定创办一个小型制药厂，由药学系的李玉纯老师负责创建工作。当时什么条件也不具备：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场地，四无工人。

没有工人。首先想到当时学校有十多位随丈夫奉调来学校，而失去自己工作的家属。这些家属没有多少知识，更没有制药的专业技能，但她们不缺中国人肯学习、爱劳动、懂节约、能吃苦的精神。有了这样品质的人，其他的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

没有场地。李玉纯老师就选择了校园内小河边，一块长满杂草的空地，也就是现在十二桥校区学生一公寓前面的研究生公寓所占的位置。家属带着自家简易的工具，开始了场地的平整、清理和必要而简单的建设。



没有设备。根据初期制药产品的需要，家属拉回了学生食堂丢弃在煤灰堆旁报废的三口铁锅，抬回了食堂暂时不用的石磨。由于事前并未向学校后勤商借，还曾经闹过药厂的女人们偷了食堂的铁锅和石磨而报到学校领导那里的笑话。她们捡来废弃的碎砖头，砌起了熬药的土灶，用油毛毡和竹竿搭建起非常简易的工棚，从实验室借来了碾药槽、小天平、烧杯、试管等必需的用具。

没有资金。当年国家是计划经济，各类原料药材都可由药材公司调拨，然后用成药产品充账的方式解决。

就这样，在1965年的春天，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制药厂在李玉纯老师的带领下，在17位家属的积极努力下办起来了。后来学校其他部门的何玉权、谢秀群、罗忠友、阳昌镒、邹德瑜等几位老师也一起共同参与药厂的建设。当时主要设备是三口大铁锅一盘石磨，生产的第一个产品是“追风膏”。这时的药厂，实际上就是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制药作坊。

没有汽车，物资运输全靠借用学校后勤的木板车(就是川人称为的架架车)。原料药材远在八里庄的中药材仓库，离学校有十多千米，药包一个百十斤（1斤=500克），女人们自己扛。一车药2 000多斤，女人们自己拉。拉煤炭在八里庄、拉包装材料在八里庄、送成品药也是在八里庄。盛夏，她们顶烈日，挥汗如雨；寒冬，她们踏冰雪，鬓发结霜。李玉纯老师也带头一起参与拉车。

一盘石磨，用来研磨药粉。三口大铁锅，一口用来煎熬原药，一口用来浓缩收膏，一口用来浸膏保温，锅里面温上水，再放一口小锅，锅里是已经配好的膏药，保持软软的浸膏状态。女人们围坐在这口大铁锅前，用竹筷挑上一块绵软的浸膏，在裁切成方方正正的绵实的白纸上，摊成一个个圆圆的膏药。刚开始，她们对膏药的重量控制、膏药圆形直径的控制都不熟悉，每摊一张膏药都要用小天平称一称，用尺子量一量。女人们的手是灵巧的，没用多久，她们都能娴熟地掌握摊膏药的技巧了。一张张大小一致、重量一致的膏药从她们的手中摊出来了，铺满一个个竹编的簸箕。

那时没有谁计较过报酬，大家都拼命地工作，时常午饭还要家人送到简易的工棚里。厂里也没有什么规章制度，也没有谁来检查谁，谁来监督谁。但她们服从安排、努力学习、团结一心、努力劳作，她们自觉地把药厂的兴亡与自

己的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们珍惜这劳动的机会，劳动也给她们带来欢乐。在劳动中她们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劳动也体现了她们对学校奉献的精神。

经过一年多辛勤劳动，厂子有了原始的一些资金积累。简陋的工棚作坊，逐渐被一排青砖的厂房所取代。药厂建起了粉碎车间、水丸车间、蜜丸车间、包装车间、机修车间，建起了烘房、原料仓库、成药仓库。员工队伍也得到了充实和提高，从峨眉中药学校毕业的辜德全、冯长明、刘光群，老药工杨孝禄，技术员罗信元也都陆续来到药厂。因陋就简地添置了粉碎机、振动筛、制丸机。很多设备都是工人们自创的，他们用废旧的角钢、水管、钢板自己切制、焊接，特别是制丸机也是亲手用竹子编的一个筐，里面是用桐油石灰抹制的。

药厂也逐步走向了成熟和正规，产品也从单一的“追风膏”，逐步增加了“上清丸”“橘红丸”“九味羌和丸”等。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药厂的设施设备有重大发展，技术力量、生产能力也有重大提升，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产品，对市场有重大的影响力，其中包括“藿香正气水”“鼻渊舒口服液”“金龙胆片”“上清丸”等产品系列。

创办药厂距今已经过去 50 多年了，让我们记住这些为学校药厂默默奉献一生的 17 位女人吧。她们是：陈泽清、邓世菊、王桂珍、赫秀英、李仕素、谭凤翔、刘发钰、彭祖芳、袁秀英、刘素容、唐秋莲、周素华、周文秀、徐应茹、王建文、陈本华、周淑全，还有为创办药厂呕心沥血，奉献了青春年华的李玉纯老师。老一代的创业者们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一个现代企业，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无价的无私奉献、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精神财富。

撰写人简介：

王军，男，1958 年 3 月生，1963 年随父母来到成都中医学院，1978 年参军，1981 年退伍后进入成都中医学院工作直至退休。先后在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制药厂、劳动服务公司、总务处、组织部、保卫处、后勤管理处、离退休管理处等部门工作。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工作和生活五十多年，对学校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变迁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和成中医的第一间实验室

撰写人 / 宋开源

1956 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要在全国兴办中医药高等教育，振兴传统医学。成都中医学院是周总理亲笔签署成立的老四所中医学院之一，首任院长是李斯炽老先生。当时从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调入一批人员组建西医基础教研室，包括解剖、生物化学、生理、药理、病理、微生物等专业。

建校初期设备落后，没有进行科学实验研究的条件，只能承担最基础的教学。个别教研室做了一些摸索，但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基本设备仪器缺乏，连动物房都没有，只有一个叫霍伯川的工人负责两条狗的喂养，勉强应付学生基本的教学实验学习。



早期学校实验教学条件

1968年，学校承担了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从中药中筛选对钩端螺旋体病治疗有用的药方及其有效成分。四川省成立了钩体病防治办公室，负责人是时任附属医院院长的刘成双，办事员是曾道冰。四川医学院、重庆中药研究所（现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四川省防疫站（现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成都中医学院等组成协作单位。

学校随即成立了钩端螺旋体病研究组，包括临床和基础研究室。完成这项实验科学研究必须要有动物房，必须建实验室，包括药理和药化部分。实验用的动物要求纯种，需要专职的实验员和制作饲料的人员。学校指派我和付肇明老师带队赴重庆中药研究所参加重庆医学院、重庆中药所和我校的协作研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中药的研究技术和动物房的动物饲养繁殖和管理技术。那时交通不便，我和付老师背上铺盖卷，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才到重庆。

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我们回学校以后，随即着手开展实验室建设工作。从动物房的寻址选房到建设、实验设备物资的采购、实验人员的培训等，一切从零起步，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条件下，今天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在那时是非常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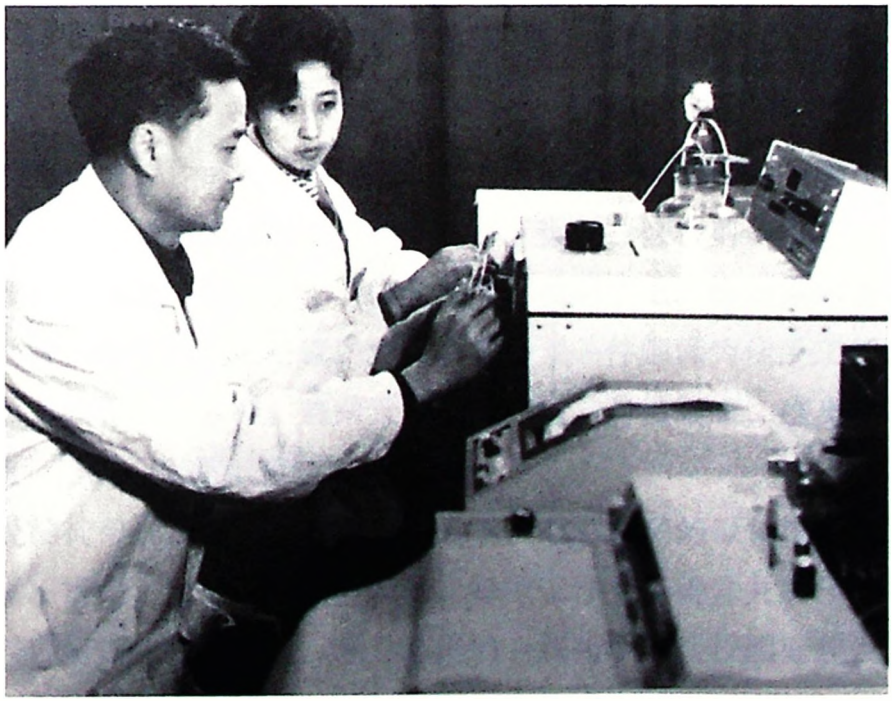


早期学校实验教学条件

经过反复勘察，我们自己动手将连接家属院之间的隔墙推倒，将废砖打理出来建动物房的喂养台。没有饲养箱怎么办呢？由院办开介绍信，以国防科研需要，通过我们几位参与对方单位的劳动换来了白铁皮，再请专业师傅制作成饲养箱。两位实验员到邛崃窑厂定制了实验用陶瓷罐。

设备勉强到位后，开始着手筹备动物。该病的实验动物，必须要求是对钩端螺旋体敏感的动物，叫金地鼠，当时四川省全省都没有这种动物。时间紧，任务重，学校派附属医院医生徐文成乘飞机去福建省福州防疫站引进种鼠。李明富、张之文、付肇明等几位老师和我，还有两名实验员每天晚上轮流值班繁殖金地鼠。就这样，我们艰难地把动物房建起来了，这才有了成中医最早的供实验研究用的动物房和纯种动物。

有了实验动物，我们便抓紧时间开始进行钩端螺旋体病的相关实验研究。药理组（筛选组）由周邦靖和付肇明老师负责。钩端螺旋体病的病原细菌由福州防疫站提供。该病的研究对实验室要求高，需要隔离，处理程序也非常严格，3~7 天就要观察记录实验反应。药化组由我负责，实验开始一段时间之后，我



年轻时的宋开源老师（左一）

邀请原化学教研室的肖崇厚老师参与进来。所需的基本设备，如全玻蒸馏器等派专人从上海空运回来。设备置齐后，我们持续工作约 8 个月的时间，提取的单味中药和复方数十个，并做急性毒性测定。

但后来我的工作被迫中断了。由于当时我们没有毒气柜，而提取药物时必须经常与用作溶剂的氯仿等多种有害溶剂接触，因此造成我身患严重的急性药物性肝脏损伤，检查发现肝脏转氨酶，突破了当时光电比色计读数的最高限。1970 年 5 月我开始住院治疗，长达半年的时间没能继续我的实验，药化组的实验由肖崇厚老师继续开展。直到钩端螺旋体病科研任务结束后，整套设备用以成立了药物化学教研室。

撰写人简介：

宋开源，男，1937 年生，四川省富顺县人，中共党员，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56 年毕业于自贡蜀光中学，同年入读四川医学院医学系，1961 年毕业后即入成都中医学院生化教研室任教。1964 年，在卫生部全国生化高师班培训一年。1968 年，组建勾体病研究室，1973 年组建针灸、针刺阵痛研究室，1983 年由省政府批转为中医基本理论研究室。主攻中医时间医学的生物学基础，先后承担国家、省、市级多项课题，获多项部省级科研成果奖，并获四川省医疗卫生终身成就奖。

花团锦簇忆故人

撰写人 / 邓世铸

常言说往事如烟，岁月无痕，但我总感觉岁月在我心里，虽说时光如水，但也留下铭刻在心的印迹。20 世纪 50 年代末，我父亲邓绍先奉调到校任教并担任学校首位教务长，十二桥路 37 号便成了我生活的原点。这里有我成长的足迹，有我在这里工作直至退休的历练。成长也是一种岁月的沉淀，它能让一些人和事在记忆中渐渐模糊、淡忘，但一些看似平淡如常却满含情意，有趣、隽永的人和事则能让人难以释怀，徐安福徐大爷便是其中的一位。

徐大爷实际年龄并不是很大，50 出头，中等个，大眼，微胖，敦厚朴实。他建校不久从重庆过来成了学校第一位专职花工，可以说也是学校绿化工作的初创者。一个人承担起当时十二桥校区占地面积 70 余亩的绿化种植，维养工作，原也给他安排了两位小伙子当他徒弟，可没过多久都先后调走，徐大爷仍是“独立大队”队长。

记得从我记事到上学以后，每天上学和放学路上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要么肩扛锄头、铲子，要么推着辆小架子车拉着短梯、锯子、修枝剪、喷雾器等工具，在校园里锄草、施肥、挖土填土、修剪枝条、喷药治虫。嘴里常叼着一根标志性的叶子烟杆，边干活边吧嗒着。夏天总爱穿着一件师母为他手工缝制的白布小褂，头顶草帽，脚蹬草鞋，遇雨天则头戴斗笠，身披簑衣，这身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形象今天是不容易再看到了。

多年前听他曾经的徒弟说过，别看徐大爷一人承担起那么多的绿化维养工作，做起事来也不紧不慢的，但他做事很有章法，每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效率高，效果好。经过短短几年的时间，硬是靠他的一双巧手，让校园面貌发

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一迈进学校大门，正对校门的教学实验楼（现国医馆大楼）两侧排列着整齐高大的松柏，中间一座花台，置有假山、喷泉，左边靠原图书馆一侧路边有几十米长的栀子花树，大楼东侧原解剖教研室位置种有银杏、桂花、香樟等树木，环绕实验楼周边的水泥小路两旁，是修剪整齐的万年青，下面种有茂密有序的麦冬草。沿校园道路两侧树木参差，竹林青翠，各类乔灌木错落有致。一条约2米宽近千米长的小河蜿蜒穿过校园，小河上有三座桥，其中，中间一座规模最大，有十多级台阶，两侧焊有铁栏杆，上面焊有一个与桥面面积大小的铁棚架。徐大爷在两旁栽种了攀缘性藤本植物和葡萄，每到春夏季节，枝繁叶茂，透着阵阵凉爽。最诱人的还是棚架上挂着的一串串乌红发亮的葡萄，还未成熟时调皮的大娃娃们偷偷拿着竹竿去过过嘴瘾，如运气不好被徐大爷抓住是要被打屁股的。但等葡萄成熟时，这位童心未泯的老头，会召集家属院的娃娃们“排排坐吃果果”，只是要遵守一条规矩，最大最甜的让年龄最小的先挑。

不知是徐大爷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除日常绿化外，他还移栽、种植了大量的药用植物，从现在的“九九亭”到图书馆，一教楼、二教楼、研究生一公寓、附院门诊大楼、动物实验中心等位置的路边和空地种有能清热利湿、安神降压、色彩艳丽、中看又中用的美人蕉；有其貌不扬、低矮的灌木丛，密集深绿的枝条上，点缀着一朵朵白色的五角星形状的小花，它不仅能清热解毒，凉血止血，还有一个好听且浪漫的名字“六月雪”；还有滋补肝肾，明目乌发的女贞子树；数十棵分布校园的桑树。儿时的我们常骑在树上吃得嘴皮发黑、发乌的桑果，那就是安神补血，降压消渴的桑葚。还有小河边上我们常鼓起腮帮子吹得绒毛飞舞的清热解毒良药蒲公英。把一种长满细密小软刺叫“鼠粘子”的小果果，偷偷粘在女同学的长辫子上搞恶作剧，这也是疏散风热，宣肺透疹的中药材牛蒡子。这些药用植物，在运用它们治疗一些小恙上确实发挥着大作用。我一同学受了湿热，后背四肢长满了红疙瘩，奇痒难忍，身上抠出一道道血印子，徐大爷给他父亲支招，用麻柳树叶子熬水洗澡，还有用一种生在路边开着黄色小花名叫“千里光”的草草熬水喝，前者解毒止痒，后者祛湿热

解疮毒，果然没几天便痊愈。

20世纪50年代末，中药专业成立，为方便学生识别药材，掌握药用植物栽培技术。师生齐动手在现后校门停车场位置辟地两亩多建成“药圃”一座，20世纪60年代就已栽培各种药材500余种，后又发展为800多种。药圃的日常管理和维养工作仍是徐大爷，过去许多学校老师有空闲都爱到药圃去看看，转转。我父亲也是常客，还有凌一揆、陈瑶鲲、陆闻鸿、余仲权、曾应台、陈潮祖 、顾大德、唐天挺……他们边看边和徐大爷交谈，有时还开上几句玩笑，气氛非常融洽，进入药圃左侧，建有一砖木结构的小屋。我们曾进去玩过，靠小屋前用铁丝牵拉一个网架，上面是爬满青藤的金银花，房后有一个大木架，上面除放了一些工具外，还放着大包小包的各类种子。空闲时，徐大爷喜欢坐在屋前的竹椅上修修工具，整理种子，抽上一杆叶子烟，喝上一口热茶，那感觉既有“茅檐长扫净无苔”的清爽，又有“花木成畦手自栽”的惬意。遗憾的是徐大爷在20世纪70年代初不幸患癌病逝。药圃也随学校的建设需要于20世纪80年代拆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今天学校已走过60余年的风雨历程。每当我徜徉在花团锦簇，满目葱茏的新校区，感慨时光的飞逝和学校所发生的巨变的时候，成中医前辈们那些充满感动，盛满爱心的嘉言懿行总会时常浮现脑海。他们中有一身正气，夙夜在公的老领导张华、吴敬、许允安、卢耀西、蒲布、彭和民、张志明……也有治学严谨，医术精湛，会聚蓉城的川内中医药业界精英李斯炽、吴棹仙、卓雨农、陈达夫、邹仲彝、蒲湘澄……更有像徐大爷一样默默无闻，不见经传的一线职工，他们中有第一代的汽车驾驶员黄镇、王中华；有攀高爬低随叫随到的电工任义友、祝阁月；有保证师生开水、伙食供应的锅炉工张学成、陈义和；有风里雨里的食堂采购员易志元和起早贪黑的食堂师傅们；有无论寒暑，骑车四处奔波采购实验用品的姚有余、陈林友；有性格活跃风趣，自称见啥做啥的校工刘华子……他们质朴、实在、敬业，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极其普通平凡，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独特魅力！

昨天的创业勤勉已浓缩成今天的回忆，我们怀念昨天是因为它凝聚了成中医前辈筚路蓝缕，奋力前行的过往，承载着他们美好的憧憬与期待，过去的已然定格，让我们用不懈努力去书写成中医绚丽的今天，为明天我们的回忆和怀念创造更多的骄傲和亮色！

撰写人简介：

邓世铸，男，成都中医药大学退休人员，在学校工作40年，曾先后从事校报编辑部编辑、记者和《中医药信息报》编辑、记者工作十余年，多次获省、市及省高校校报好新闻奖。后在高新西区校区管委会、后勤基建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至2017年退休。

小中见大、奥妙无穷：膏丹丸散治急重危病

撰写人 / 邓世铸

膏、丹、丸、散是中华医术精髓，在诊治疾病的临床运用中因其配伍方便，药性稳定，便于加工，成本低廉，疗效持久而被世人推崇。因此有“诊顽疾不外望闻问切，起沉疴多为膏丹丸散”的说法，我通过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例，对此有深刻的感受和体会。

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约 1969 年），我父亲邓绍先在右侧腰以下靠近臀部处长有一核桃大小的包块，质软，不红不肿，不痒不痛，父亲认为这就是中医所说的“痰核”，多由经络不畅，湿痰流聚而成。气聚则塞，气散则通。按此思路，自己开药方服用，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包块还由原来核桃大小长成鸭蛋大小了，遂到省医院诊治，结论是脂肪瘤，唯一办法住院开刀切除。因父亲有冠心病、高血压遂放弃手术治疗。一次我父亲在与李老（李斯炽）谈及此事时，李老推荐说可找罗禹田试试，他可能有办法。罗禹田老师（中医界名宿，外科专家，曾任我校外科教研室主任）没在学校居住，幸有我父亲学生陈治恒老师费心辗转找到罗老师，来家诊断后，罗老师向我父亲“打包票”（表示有把握）说没问题，只是配药还需等几天，几天后，罗老师遣学生专门送药上门，是用黄色油纸包着的约两斤重的浅咖啡色粉末状的散剂，有一股说不上是香还是臭的浓烈药味。来人特别转达了罗老师对用药和调药的要求，每晚临睡前敷药一小时，前七天敷药需将包块顶部亮出，以后便全部覆盖，最奇特的是调药不用水，也不用酒或醋，而要用新鲜的大葱切成葱花与药一起调成糊状敷用，我们遵医嘱用药约半个多月时间，奇迹出现了：包块变得更软并逐渐缩小，大概一个多月时间包块竟完全消失了，只是皮肤上留有一块浅紫色的痕

迹，没过多久也全部恢复如初了。后来听我母亲讲过，我父亲曾问过罗老师，这包药的组成是否由一些软坚散结，活血化瘀，除湿通络之药组成，罗老点头称是，但他强调说药中所用药引子才是发挥作用的关键，问及药引为何物，罗老还调侃我父亲想抢他饭碗，笑而不答。

借用罗老这药引子引出另外一段往事，这是我亲身经历。儿时顽皮从树上摔下，致左手尺桡骨远端骨折，母亲带我找到她在中医附院的同事，骨科主任、杜氏骨科的掌门人杜琼书老师。杜老亲自为我接骨复位，并用夹板固定，她还吓唬我说起码还要痛一个月。虽是玩笑话，但骨折复位后，手肿胀疼痛却并未减轻，加之夹板固定，睡觉翻身也不便，辗转一夜未能很好地入眠。杜老第二天送我母亲一白色小瓷瓶药粉，让我服用，并嘱每次用量不宜过多，用一双筷子头头撮起一撮即可。回家打开瓷瓶，一股奇特的香味散发出来，这是杜氏骨科家传秘方，由三七、麝香等组成，当天服用后，便让我体会到什么叫神丹妙药，到晚上骨折处肿胀疼痛感明显减轻，一周多一点，肿胀疼痛感尽消。

除这两件中药散剂妙方奇特的事例外，还有一例用中医外治熏蒸法治急重危病产生独特疗效的事例。当事人吴老师是我一个长辈的朋友，这位毕业于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曾做过大报的编辑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做中学语文老师。他性格开朗，乐观豁达，凭他雄厚的古文功底和对中医药的浓厚兴趣，托亲戚朋友寄，自己购买，收藏了不少中医药典籍，一有空闲便手不释卷以中医药书籍为伴去打发那寂寞难耐，苦不堪言的日子。很快他便融会贯通，当地百姓有个头疼脑热，他便热情为其诊治，有时还送药送钱，没几年以他的学识、口碑，成为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名医和主心骨，有什么事或生了病都愿找他。一天他正吃晚饭，匆匆来一壮汉求助于他，原来是壮汉妻子在家生小孩，小孩生下来了引起大出血，人已昏过去了。吴老师一听情况，告诉他产后大出血是急危重症，得赶紧送县医院才行。这壮汉见他推辞，扑通跪下就是不走，无奈只得随壮汉赶往他家中，到了观察产妇已意识模糊，一家人围着她苦求吴老师救命。情急之下，他想起《备急肘后方》中所载中医外治熏蒸法可治产妇血晕，急忙叫壮汉找家中镰刀、锄头之类铁器，放灶膛里猛火烧，直至烧红，一边找来一小木盆接着，扶产妇坐起，取出烧红锄头将放瓢里的醋朝锄头

浇去，顿时一股浓烈的醋酸蒸汽喷涌而出，趁势对着产妇鼻子熏蒸，不一会儿产妇便苏醒过来，立即嘱咐家属速送县医院，最终转危为安。这就是中医外治法的奇特之处，疗效迅速，尤其对急危重症更能显示其治疗之独特，难怪古文有“良丁不废外治”之说。

这几件事情都是我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虽已过去多年，仍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之中，中医药不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为解除病患痛苦和中华民族的繁衍生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审时度势，变化莫测的“配伍有君臣佐使之分，用方有大方小方之别”“处方如布阵，用药如用兵”的韬略往往小中见大，奥妙无穷。透过这几件事例，一方面表达对博大精深的祖国传统文化的由衷赞叹，同时让同学们通过这些事例来分享和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从中受到一些启示，这对巩固他们的专业思想，激发学习热情，明确前行目标应该是有所裨益的。“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得”，愿我们的同学们在传承弘扬祖国传统医药文化的道路上博学、精思，砥砺奋进！

撰写人简介：

邓世铸，男，成都中医药大学退休人员，在学校工作 40 年，曾先后从事校报编辑部编辑、记者和《中医药信息报》编辑、记者工作十余年，多次获省、市及省高校校报好新闻奖。后在高新西区校区管委会、后勤基建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至 2017 年退休。

岐黄学子的怀思

撰写人 / 张发荣

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校友、教师、医生，60 多年的岐黄路，感受良多，下面略道个人学习中医的缘由、感悟与怀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的祖母、父亲、叔父、婶娘、姑姑等十来位亲人，相继都因发热、咳嗽、咯血而病故，当时我们老家的邻里乡亲，类似其境遇者，连绵不断。这种病众称肺痨。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无钱可治，也无药可治，只能听天由命，坐以待毙。从小经历了病魔的肆虐，患者的痛苦，对亲人的无助，幼小的心灵就点燃了学医的火种。

1957 年高考，我们的考场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该校校园方圆十里，绿树成荫，琼楼玉宇，错落有致，夜间灯火辉煌，是一座壮观美丽的学生城。

苍天不负有心人，我考上了成都中医学院。在我兴致勃勃来到成都四道街成都中医学院报到时，发现学院和医院只有几幢一楼一底的小平房，礼堂是茅草房，礼堂后面是原始的烂泥塘。其范围之小，若有人大声说话或讴歌，可响彻全校。比我们中学小多了，与西南师范学院相比，更有天上人间之别了。此情此景，对我而言，却是坦然面对，无怨无悔。原因一是学医的愿望已心想事成，二是家境贫苦，中医学院读书吃饭不要钱。

1958 年，学校经过初春洗礼，迈开了发展的步伐，迁到了成都通惠门十二桥成都医士学校的旧校址，办学条件得到初步的改善，有一幢三层楼砖木结构教学楼，8 幢一楼一底的家属员工宿舍，两条小溪夹道穿流的运动场，但学校办公室仍是茅草房。为了适应教学需要，又增建了一间阶梯教室和一小幢一楼

一底的教学楼，有6~8间小教室。学校的南北西三面全是菜地农田。在这所具有田园风光的中医院校里，经过6年的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学、医疗、科研工作。岁月如梭，60多年的时光东逝，但其间的史事情景记忆犹新，回味无穷。特别学校老领导，如张华、许允安、张艺、龚锦文、彭和明、罗福基、侯占元、魏云祥等，他们以身作则，艰苦创业，为中医事业努力奋斗的精神，成了学校艰苦创业的传家宝和砥砺前行的动力。诸多岐黄恩师，如李斯炽、吴棹仙、邓绍先、蒲湘澄、卓雨农、陈达夫、凌一揆、彭履祥、宋鹭冰等名家的大医风范，慈祥师长的身影，讲经传道、诲人不倦的育才形象，至今还印在我们的心里，指引杏林学子在医海扬帆，驶向理想的彼岸。

2013年暑假，我们年级同学在青城山开了同学会，当年63届同学计有63位，由于因事因病等原因，到会者不到一半。大家见面，兴高采烈，谈及学校往事，有如钱塘江浪潮，滔滔不绝，千言万语，汇聚成核心的主题：世事沧桑，国家巨变；杏林儿女，功德流芳。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发展，我们学校也由小鸡变凤凰了，学校有十二桥老校区、温江主校区等，也有具有相当规模的附属医院，跨入新时代一流中医药高校的行列。

抚今追昔，回顾学校的发展历程，无不感慨万千。词曰：

沁园春·成中医旧貌新颜颂

杏苑逢春，学府新篇，绽放曙光。忆初生幼凤，蜗居小巷[①]；起飞喜鹊，落脚平房。周甲春秋，空前盛况，林立高楼聚栋梁。医林茂，喜风滋雨润，硕果盈筐。

中医源远流长，重实践频频谱彩章。赞岐黄宝典，继承精义；扁张[②]巨著，光大流芳。斯炽达夫[③]，群贤后继，时代精英正领航。征程起，已扬帆世界，永放光芒。

① 蜗居小巷：成都中医学院创建于1956年，医院创建于1957年，地址在四道街小巷内，规模小，是平房与茅屋相间的学校。

② 扁张：扁鹊著难经，张仲景著伤寒论，均是中医经典著作。

③ 斯炽达夫：斯炽指李斯炽教授、老院长；达夫指陈达夫教授，眼科大家。

而我们杏林学子，同全国中华儿女一样，把青春献给了新时代。现在大家欣喜相逢，苍苍的白发，布满皱纹的面庞，迟缓的步履，真切的眼神，折射出了沧桑岁月的记忆，渗透着对母校摇篮成中医的深情。大家感叹不已，为当年报考中医专业的选择感到欣慰；为济世活人誉满人间而自豪！歌曰：

咏都江堰青城山同学会（七律）

展翅分飞五十年，金秋幸会古城间。
回眸岁月晴还雨，饱览河山沧变田。
怀抱忠贞滋热土，情倾仁术润医园。
今朝情景长相忆，期盼来春谱续篇。

感恩，尊敬的母校！怀思，亲爱的校友！

撰写人简介：

张发荣，男，1963年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并留校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1986年晋升教授，为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名中医、四川省优秀教师、劳动模范、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50多年，擅长治疗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脑血管疾病、老年病等疾病。主持、主研部省级科研课题17项，获得部省级科技进步奖15项，独撰、主编、合编中医学术著作14部。2014年获中华中医学会中医药学术发展成就奖；2016年获四川省医疗卫生终身成就奖；2017年被评为全国首届名中医。曾应邀前往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作学术交流、讲学，长期兼任美国俄勒冈东方医学院博士班客座教授，被该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忆我的从医之路

讲述人 / 李祖伦

与中医药结缘于高中

小时候，家庭对我的要求是学好数理化和语文。到了中学，就读成都七中，学校对我们灌输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认识中医呢，是从一本书开始的。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走进春熙路新华书店，看到一本介绍中医的书，是32开本的，只有100页左右的小书。我好奇地翻阅起来，立刻被里面介绍的中医理论、五脏六腑、经络理论和针灸治疗这些内容吸引住了。但是我又十分好奇，俗语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中医怎么讲“五行（hang）”呢？到了大学我才知道，所谓的“五行（hang）”，在中医学里应该念作“五行（xing）”，是阴阳五行的五行。更为重要的是，我读高二的时候患上了风湿病，是靠吃中药、针灸治好的，这对我以后报考中医学院、中医专业有很大的影响。

我在成都中医学院的求学之路

求学分三个阶段。1963年我进入学校医疗系本科。那个时候我们学过培养目标，当时培养的是高级中医师，而且对高级两个字还进行了讨论，后觉得“高级”用词不妥当，就改叫中医师。那么药学呢，就是高级中药师，后取消“高级”两个字，就叫中药师。在我的印象中，医疗专业当时是按全科医师的模式培养的。全科医生就是不分专科，什么都学一点，尽管他不是每一科都那么专，但是下基层去很有用处，这个我今生感受到了。

1978年全国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我考入了成都中医学院研究生，考

试科目有政治、外语、医古文、中医基础和专业课，共5门。全校招收研究生17名，其中包括我在内的中药学专业的4名研究生。毕业后我回遵义医学院工作。

1984年，我又考上了凌一揆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考试科目为外语、中药学、温病学，共3门，研究方向为“温病用药规律”。当时成都中医学院是全国唯一的中药学博士授权点。1987年我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

幽幽杏林缘 难忘师生情

在我读本科的时候，那时学校叫成都中医学院，我还记得第一个给我们上课的是院长李斯炽教授，讲的《黄帝内经》的《上古天真论》，其中说道：“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把这一段讲了，他就开始给我们用很幽默的那种方式提出了，现代有几种人类起源的学说。他说：“科学家说人是猴子变来的，基督教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中国古人说人是盘古王开天辟地造成的”，然后我们就思考。这我就很有印象，从《黄帝内经》的《上古天真论》中谈到黄帝怎么来的，他就联想到人是怎么来的呢，就给我们讲了三个来源，让我们思考。我觉得是扩大我们的思维，扩大我们的见解。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课，把《黄帝内经》和人类起源联系起来讲。所以，我觉得李斯炽教授很不错，很了不起。

此外，给我们讲课的还有邓绍先教务长，他讲的是《伤寒论》。其中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是一个医生摸脉的时候，起初呢，病人看了这个医生眉头紧锁，就想遭了，我这个病不好治了。过了一下呢，这个医生的眉头开展了，病人又想呢，我的病有法治了，有搞头了，很高兴。结果呢，这个医师在想什么呢，他想的是有个方桌，那么大，咋个放进房子里呢，他就眉头紧锁，后来他慢慢想通了，咋个想通了呢？先把桌子放在这儿，然后再修房子。所以，办法就想好了，眉头就舒展了。那病人就觉得，嘿，我有搞头了，老师表情都不一样了。实际上邓老通过这个例子就说明：一是把脉一定要认真，医生的表情可以影响病人的情绪，病人看到医生的表情，就可能联想起其他的事儿，结果这病就不容易治好。因此，医师和病人要互相来理解沟通，医生对病人的影响非常重要。他给我们

讲的这个道理，我们受益匪浅。

凌一揆老师讲课很有特点。当初，全国研究生没有统一的教材，都是老师自己来整，自己编。凌老师上课不带教材，空手进教室，就按他的记忆讲，讲得很好，他记忆力相当厉害。我们边听边就做笔记，可惜那时的笔记有些已经不在了。凌老师是反对照本宣科的，那是老师自己对于上课的态度，对自己的要求，身教重于言教。

还有一位是给我们讲中药化学的肖崇厚老师。因为我爱喝茶，我很清楚记住了他给我们讲茶。肖崇厚老师讲茶很有特点：他从茶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应用讲起，然后联系到中医的功效与应用。因此是学贯古今，中西结合的。他讲课、备课是很严的，尽管他主编了《中药化学》，但是硕士研究生的课，更是花了心思的，对我们启发尤深。

恩师凌一揆教授的学术思想及趣事

凌老的主要学术思想

凌一揆教授提倡建立当代的“系统中药学”，为中药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他认为中药学的核心是临床效用，其特色是注重整体效应，理、法、方、药环环相扣，以发挥最大的临床治疗效应。他一直强调必须处理好继承与扬弃、传统认识和现代科学、学科分化与综合三大关系，为现代中药学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与借鉴。我觉得系统中药学的思想实际上与系统论很有内在相同的地方。钱学森教授当时提倡系统论，他把还原论和整体论的方法辩证统一结合到一起，形成他的系统论的整个方法。因此这一点，大中药和系统中药学我认为在本质上是一脉相通的。我只是协助凌老把大中药改成系统中药学。

中药学一级学科的诞生

凌老的趣闻故事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90—1991 年凌老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在一次会议上凌老第一次提出把中药学从中医学中的二级学科深化为一级学科，这个提法得到学科组专家们的一致认可并达成了统一意见。后来这个建议的成文和上交我是亲自参与了的，因为

我是当时中医学科评议组的秘书。这件事情意义很深远，1997 年实现了中药学成为一级学科，有了中药学一级学科的编码 1008。

凌老的一份检讨书

我是凌老讣告的主要执笔者，写讣告的时候，我就必须去查阅有关的资料，我在凌老的师资档案里面发现了一份检讨。内容关于什么呢？说他想找一个小桥流水的地方，上午看病，下午钓鱼，他太爱钓鱼了。接着他又检讨什么呢，他说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应该改正。我们现在来想呢，如果一个人找一个小桥流水的地方，上午看病下午钓鱼，其实是很不错的。但是呢，在当时确实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了检讨。

另外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到日本去。因为日本邀请他去讲学。他为了更扩大学识面呢，就把贾敏如老师喊到一起，两个人去日本。他们两个都有喝早茶的习惯，但日本人是喝冷水，贾教授就拿英语跟那个服务员讲："我们要开水泡茶。"服务员听不懂。凌老学过日语，他就突然把那个单词想起来了，就说"oyou"，日文中的"oyou"就是开水，那个日本服务员听懂了，就给他们找来开水泡茶。这也是一个生活的趣事，我想这个就说明了凌老师对外语还在孜孜不休地自学的，难能可贵。不知道他怎么学出来的，他没详细聊他的过程，只是他喝早茶的时候，就遇到"oyou"这个事情，讲给我们听了，我觉得很有趣。

本文由李祖伦讲述，吴丽娜整理文字。

讲述人简介：

李祖伦，男，1943 年生，成都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63 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先后在四川省雁门硫铁矿和遵义医学院工作。1978 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中药学硕士研究生，1984 年成为全国第一个中药学博士研究生，师从凌一揆教授。1987 年毕业后留校从事中药学教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工作，致力于中药理论和川产道地药材研究。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被国务院、教育部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五、六届中医学、中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重点学科

——耳鼻喉科成立始末

撰写人 / 熊大经

1965 年我考入成都中医学院医学系，从此开始了我的从医之路。进校一年后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其间虽然零零碎碎，上上停停地上过一阵子课，更多的是靠自己“偷偷摸摸”地找机会读书、背书。我也实在无心在这样的环境里虚度年华，只好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趁大家还在睡觉时，轻脚轻手地起床，拿一本书到外面田地里背书，当时学校周围都是农田。《金匮要略》就是在那时背完了，这些经典文献至今仍影响着我。

在这段时期，全国各高校既不招收学生，也无学生从学校里毕业，大量的学生沉积于学校。当时，全国其他本科院校学制是 4~5 年，而中医院校学制都是 6 年，并且是免学费的。由于学制 6 年，当时学校沉积了 1966 级、1967 级、1968 级、1969 级、1970 级、1971 级几个年级，这些学生都没有分配出去。后来陆陆续续将 1966 级、1967 级、1968 级学生分配走了，学校就剩下 1969 级、1970 级、1971 三个年级。我们本该 1971 年毕业，也于 1970 年提前毕业分配了。提前拿工资，比起那些师兄师姐，算是幸运的，真是别提有多高兴了。因为我们算是 1970 年毕业，从此，也从 1971 级改叫 1970 级了。

毕业后我留校了，分配在针灸科，算是分得很一般的科室。当时大家流传一句话“金眼科，银妇科，最好还是搞内科”。由于不喜欢针灸科，就一天也不去上班，赖在学校印刷厂帮学校教务处刻钢板。当时工农兵学员刚进校，没有教材，学生进校后的所有教材，都要靠手工在钢板上刻制后再印刷。因为急用，有的并没有装订，发给学生的是像当时的传单，一页一页的，大家戏称其为传单教材。由于教材多，我在印刷厂待了 1 年多。

针灸科不断催我上班，可我对针灸这“尖端”学科实在提不起兴趣，找各种理由不去见科室领导。后来得知针灸科的领导李伯宁老师将我作为培养对象，准备送去上海进修神经内科，现在想来真是辜负了他一片好心。后来又给工农兵学员补习文化课，就这样又赖了一年。针灸科老师抱怨，这熊大经是什么人，一两年也不上班，财务科工作人员说，只见这人每月领工资，就是不见这人上班。后来，我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另外成立一个科室，避开针灸科，于是就提出成立中医耳鼻喉科。

这真是炸开了！一个从来未接触过这专科的年轻人，真是异想天开。我想没有接触过这个专业可以到外面去进修学习。一打听，当时只有广州中医学院有耳鼻喉科，于是提出要出去广州进修。到省外“进修”这可是天方夜谭，真是白日做梦，一句话“不可能”！那些日子真像无头苍蝇，到处瞎碰，今天找这个领导，明天又找那个院长。记得有一天到医院后找到当时分管医疗的副院长，诚惶诚恐地将事情由来说了。也不知他是没听懂我的意思，或是根本就不愿意听我这个无名小卒之“个人”事由，十分不情愿地说：这耳鼻喉科是一外科性质的科室，你一个年轻人能行吗？我们医院眼科，好几位老师以前都是五官科的，现在而今都只搞眼科了，你能行吗？要不你先去其他科打打杂，帮帮忙，这耳鼻喉科你一个人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这话如同一盆冷水从头淋下，其心情可想而知。随后他又说，目前巡回医疗缺人，你先下乡去做医疗吧。这样我又随眼科林万和老师下乡去搞冠心病普查。两三个月的巡回医疗结束后，回到学校又找医院、学校领导。这样经过软磨硬泡，学校侯校长终于同意派我去广州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进修一年。

1973年进修回来后，怀着满腔热情，准备成立科室，又找到那个副院长。他说：“我们医院房子非常紧张，哪里有房子给你开耳鼻喉科？”我只好找各种理由来说服他，什么耳鼻喉的重要性，一个医院没有耳鼻喉科是不完整的，总之找了无数理由。每天这样磨呀磨呀，最后他也被我的执着弄得没办法，只好说，只要你找到了房子就可以。这让我看到了曙光，于是在医院里到处找房子。当时，附属医院在四道街，门诊就二层小楼，总共可供作诊断室的房子可能也就15间左右，内科、妇科、眼科就基本占完了整个门诊楼，要找一间空房子谈

何容易。我每天就在门诊楼转悠，看哪一间房子白天没有人用。终于看见一间堆满了破旧家具的房子，如获至宝，这样就名正言顺地开始了耳鼻喉科的筹备工作。我是又当搬运工，又当泥瓦工，又当电工，首先搬走这些破旧家具，粉刷墙壁，垒洗手台，接电线安电灯，找诊断桌椅。好在我在广州进修时已经将门诊必要的日常常用的器械买好了，从库房将器械领出来就可以开始门诊了。

开诊那天也没有选什么黄道吉日，准备工作做完了就开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开始了我耳鼻喉科医师生涯，同时我们成都中医学院，从此也有耳鼻喉科了。当时全国有中医耳鼻喉科的中医院校，也仅有我们和广州中医学院。想来也挺自豪的，当时仅 27 岁的我，为我们成都中医学院填补了一个空白。至今我还记得，开诊的第一天就挂了 18 个号，以后每天病人逐渐增多，一般不少于 20 个号，想来这辈子还从未坐过冷板凳。

当时我们四川成都鼻腔疾病特别多，每天大部分病人都是鼻科疾病。而且很多患者症状都大致相似，而我开的处方也大致相同。此时就萌发了弄一个现成的、方便服用的院内制剂的想法。当时的院内制剂申请也很简单，写一个处方，让药房相关专家审一下，责任自负。于是我就将先父之“吉雷开窍汤”根据鼻科临床症状加减化裁，拟了一处方共 14 味药，让药房加工成口服液，也就是后来成为国内中西医鼻科临床一线用药、每年生产 2 个多亿的“鼻窦炎口服液”“鼻渊舒口服液”。这使我院耳鼻喉科在国内学术界有了一定知名度。

1974 年，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主持要编撰《中医大辞典》。由于眼科陈达夫老先生的威望，决定五官科编撰内容由我院承担，我们耳鼻喉科刚成立一年多，就承担如此重大的编撰大型工具书的任务，对于不满 30 岁的我，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我只有付出比别人多 5 倍、10 倍的努力，跑了国内 16 家图书馆，手抄卡片 4 万余张。经过近 5 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初稿。写书过程非常严谨，初稿完成后要经过院内审、省内审、全国本学科专家审、全国各学科专家审多道程序。

1979 年，国家又组织全国专家编撰大型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其中的《现代医学》卷和《中国传统医学》卷是举全国中西医之力编撰的工

具书，内容涵盖中西各科。由于有编撰《中医大辞典》之先例，我又作为副主编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耳鼻喉科分卷的编撰。之后又参与了我国第一部中医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证候、治法）耳鼻喉部分之编写工作。由于我校参与了国家这些大型工具书和中医国家标准的编写，加之我们科又研制出国内知名的鼻科临床一线药“鼻窦炎口服液”“鼻渊舒口服液”，因而我校耳鼻喉科顺理成章成为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

撰写人简介：

熊大经，男，1946年12月生，重庆人，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卫计委首席专家，四川省十大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内首个中医耳鼻咽喉科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同行评议专家，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评审中心核心专家。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耳鼻喉口腔科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研制的“鼻渊舒口服液”等用于临床近50年。先后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厅局级科研项目6项，获省部级奖励3项，厅局级奖励5项，主编《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十二五”“十三五”全国规划教材，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9部。

我校中药鉴定学特色教学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的三个故事

撰写人 / 卫莹芳

中药鉴定学是中药专业的专业课程之一。它是鉴定和研究中药的品种和质量，制定中药质量标准，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应用学科。课程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鉴定中药的真伪优劣，确保中药品种正确，质量优良，安全有效，稳定可控。中药鉴定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所以我校从中药系开办之初，“中药鉴定学”就开设了中药性状鉴定讲习课、实训课、中药鉴定高山实习实训课和川产道地药材产地实训课，以期全面达到“中药鉴定学”课程大纲规定的教学目标，为社会输送优秀人才。

四川素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之美誉，现有中药资源近 5 000 种，在全国公认的 200 多种道地药材中，川产道地药材就有约 50 种，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中药资源大省，这为我校开展特色教学服务地方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我校在全国率先开设“中药鉴定学”中药性状鉴定讲习课、实训课

20 世纪六七年代是计划经济时代，全国的中药材由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成都中药材 522 仓库担负着西南地区（四川、西藏、云南、贵州）所产中药材的集中、统一调拨以及全国各地调入西南地区药材的储存与集中分配任务。该仓库面积大、品种齐全，其中大宗常用药材实行专品专库，每种中药的仓储量数以吨计，大黄等大宗药材的仓储量甚至有上百吨之巨，就连珍稀贵重药材麝香、川贝母、三七等也是数量惊人！连麝香的真伪鉴别初步检选都是用箩筐一

筐一筐地抬出来倒在大长桌上，担任快速筛查鉴别的十多个师傅围坐在长桌两旁，每人左右各放一个箩筐，将合格与不合格的分别放入不同的箩筐，如有不合格的麝香，再对其进行进一步深入鉴别。犀角、虎骨、豹骨及剧毒药材如信石、生藤黄、马钱子、斑蝥等也是一应俱全。其零货门市部品种繁多，既有药材又有饮片，可供师生们随意折、尝，这为师生们开展中药性状鉴定和中药仓储、养护学习提供了绝好的场所。从1960年起，中药鉴定教研室就到成都中药材522仓库和天福街成都市中药材公司门市部调研、学习并建立教学实习基地，从1962年起到20世纪80年代，正式建立了522中药材仓库、天福街成都市中药材门市部中药材和饮片性状鉴定实习基地，为包括我校全国第一届中药专业本科生（1959级）在内的多个年级学习中药性状鉴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成都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是全国17个著名中药材市场之一，也是西部地区最大的中药材市场。现有市场面积达20万平方米，可容纳商家4 000户，经营来自全国各地的植物类、动物类、矿物类中药材约4 500种，常用药材近2 000种，日销售额最高达500万元，是学习中药性状鉴定和市场管理很好的场所。从20世纪80年代起延续至今，我校先后在荷花池中药材市场等地建立了“中药性状鉴定实训基地”，配合学校中药标本中心开展中药性状鉴定教学工作，为学生准确识别常用中药材、川产道地药材及饮片起到



2016年，中药2013级参加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性状鉴定讲习

了不可替代的教学效果。

而成都市药检所（现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绵阳市药检所（现绵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成都地质学院博物馆（现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成都市动物园等亦为我校中药鉴定学教学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到成都市药检所、绵阳市药检所见习中药检定程序，学习中药鉴定方法和该所历年中药检验工作中收集留样的珍贵的中药真、伪标本。至今难忘的是成都市药检所冯贤祥老先生为我们师生所做的现场麝香药材系统鉴定的精彩报告和到成都地质学院博物馆学习矿物药性状鉴定和矿物磨片技术。成都地质学院博物馆内有丰富多彩的矿物药原矿物标本，讲解员老师对每种矿物药的成矿因素、产地、矿物的鉴定等进行深入浅出的精彩专业讲解，使师生们大开眼界。另外，矿物药的显微鉴别与植物药、动物药的显微鉴别所需要的显微制片制作方法和技术与一般使用的显微镜完全不同，矿物药需要制成矿物磨片后，在偏光显微镜下进行显微鉴别。由于种种原因，我校没有开展矿物磨片实验。成都地质学院为我校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矿物磨片技术学习场所，老师和师傅们手把手地耐心教导使师生们收获满满。学生们还到成都动物园参观学习动物药原动物鉴定，如蟾酥（中华大蟾蜍、黑框蟾蜍），龟甲（乌龟），鳖甲（鳖），蛇类药如乌梢蛇、蕲蛇、金钱白花蛇（乌梢蛇、五步蛇、银环蛇），穿山甲（穿山甲），刺猬皮（刺猬），熊胆（黑熊、棕熊、马来熊），灵猫香（大灵猫、小灵猫），鹿茸、鹿角（梅花鹿、马鹿、白鹿、白唇鹿、水鹿等），豹骨（金钱豹），虎骨（东北虎、华南虎），象皮（大象）等的鉴定。到每一个实习点，都请相关专业人员介绍情况，现场讲解，现场答疑，使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收到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二、我校建立全国唯一的、独具地域特色的中药鉴定学高山实习基地

我省很多野生大宗常用中药材和川产道地药材主产于高山地区，如川贝母、冬虫夏草、天黄、羌活、秦艽、川木香、川赤等。为了将我省独具地域特色的大宗药材和道地药材资源优势转化成中药鉴定学教学特色优势，加强学生

对中药基原鉴定、生长环境、产地采收加工、药材性状鉴定等直观教学，我校中药鉴定教研室从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招生后，就筹备开设中药鉴定学高山实习和道地药材产地实训课，建立中药鉴定学高山实习基地。为此，1978~1979年，中药鉴定教研室对包括阿坝藏族自治州、绵阳市在内的省内多地进行了药鉴高山实习基地选址考察工作，1979年5~6月对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进行了实地踏查，最终建立了全国唯一的中药鉴定学高山实习基地。从1980~1989年，我校中药专业本科生每年均在卧龙自然保护区进行中药鉴定学高山实习。

卧龙自然保护区基本概况与生物资源

卧龙自然保护区始建于1963年，是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和高山森林生态系统为主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面积约20万公顷；1975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78年收归林业部管理；1979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2006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西南部（东经102°52′~103°24′、北纬30°45′~31°25′），邛崃山脉东南坡，辖耿达乡、卧龙镇两个乡镇，东西长52公里，南北宽62公里，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深谷地带。全区最低海拔1218米，最高海拔6250米，自然景观垂直谱带显著，植被繁茂，药用植物、动物品种繁多，珍贵动植物分布十分集中。距离成都约125公里，交通便利。

自然保护区以“熊猫之乡”“宝贵的生物基因库”“天然动植物园”享誉中外，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据报道，对已采集的植物标本统计，区内有高等植物1 989种。但卧龙究竟有多少种药用动、植物？其中大宗常用的高山动植物药材有多少？具体有哪些品种？它们分布在哪些地方？蕴藏量如何？产地加工情况如何？哪些品种有开发利用和教学实习价值？区内交通和食宿情况能否支持百人以上的教学实习安排？建立教学实习基地的可行性如何？这些情况当时均不清楚。经教研室研究并报请学校和卧龙自然保护区批准，我们决定将实习基地的踏查工作集中在卧龙镇。1979年5~6月，中药鉴定教研室在贾敏如、李仿尧老师带领下，曾俊超、卫莹芳等老师以及学校电教

室的汪秉宁、罗仁华、熊曾等老师，另外聘请了卧龙管理局的黎定国同志做全程向导，组队对卧龙镇进行了高山实习基地踏查工作。当时工作条件简陋，吃、住、行条件艰苦。我们用大木箱装上必要的工具书、体式显微镜和药用植物采集工具，在当地租用卧龙管理局的大货车或临时搭乘森工局的空货车对卧龙镇沿旧303省道道路两旁，皮条河河谷及巴朗山进行徒步考察。每日自带干粮——馒头、白开水，白天考察、采集标本、对口药材和对当地药农进行采访，晚上和雨天翻查标本、鉴定标本。力求弄清卧龙镇的每一条沟谷，每一个山坡的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主要品种、分布情况、当地药农采收加工情况以及交通安全情况。

皮条河在区内自西南向东北流经整个卧龙镇中部，汇入耿达乡正河转而向东流入汶川县境内绵江后再经岷江流入长江。从卧龙镇（沙湾，海拔2 000米）沿皮条河向下几公里到达核桃坪，而从卧龙镇沿皮条河河谷溯源而上到达巴朗山脚下的邓生（海拔2 700米），再从邓生沿旧303省道在巴朗山盘旋、蜿蜒而上到巴朗山垭口（海拔4 487米），再从垭口往上进入流石滩区。而海拔5 000米以上则为极高山寒冻雪带。卧龙自然保护区最低海拔1 218米与巴朗山山顶海拔5 040米垂直高差约3 800米，在短短的几十公里范围内，随着海拔的升高，根据植物种类组成和植被的外貌特征，卧龙的植被可划分为6个植被带：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植被带；温带针叶、阔叶混交林植被带；寒温带寒温性针叶林植被带；耐寒灌丛和高山草甸植被带；高寒带高山流石滩稀疏植被带；极高山寒冻雪带。不同的植被带蕴藏了极为多样的植物、动物种类，其中生长着众多著名中草药。

沿皮条河及支流河谷踏查两岸山地中草药品种及分布情况

我们首先踏查了皮条河河谷及两岸的核桃坪、沙湾、沙湾后山的大板昭、瞭望哨、浑水沟、五一棚、卧龙关、银厂沟、英雄沟、三圣沟，到达巴朗山脚下的邓生等地。先后采集到了天麻、半夏、天南星（4种）、续断、何首乌、厚朴（2种）、石韦（2种）、骨碎补（2种）、五倍子（2种）、鹿衔草（3种）、车前草（2种）、虎杖、金荞麦、牛蒡子、夏枯草、南鹤虱、沙棘、甘

肃丹参、黄精（3种）、重楼（4种）、败酱草（2种）、川木通（3种）、木通（2种）、小通草（3种）、威灵仙、老鹳草、九眼独活、牛尾独活、南五味子、红毛五加皮、大百合、红毛七、党参（3种）、松萝（2种）、川贝母（甘肃贝母）、升麻、赤芍（2种）等及矿物药自然铜等。

记得在浑水沟踏查时，最大的挑战是旱地蚂蟥特别多。如果早上露水未干时，蚂蟥一般爬在草叶上，当人、畜走过时，便十分敏捷地爬到人畜身上，不知不觉钻进皮肤吸血，待到发现时已被咬得鲜血长流。因其唾液中含有水蛭素及抗凝血酶等物质，若被其叮咬，常常血流不止，不易止血，且伤口极易感染。得到当地向导和药农的提醒后，我们穿上农田高帮胶鞋和白色长筒布袜，打上绑腿，扎上长袖工作服袖口和领口，带上打草棍，宛若侦察兵一路谨慎前行。虽然我们已是全副武装，但仍然要不时停下来搞掉爬在身上的或正在吸血的蚂蟥，我们中就有老师被蚂蟥咬得腿脚鲜血长流！我自己更是时时小心提防着。但当我们采集到野生天麻（最多的一窝有大大小小20来个天麻）和矿物药自然铜时，无不大声欢呼，而将蚂蟥的威胁和所有的疲惫统统丢在了脑后！

在三圣沟踏查时，有一天中午时分，天气晴朗，我们选择了一个巨大的石包，坐下来就着行军壶中的白开水啃着冷馒头，吃完午餐稍事休息后又继续上路了。我走在后面，突然看见刚才坐过的大石头后边的草丛在晃动，我下意识看过去，妈呀，好大的一条蛇！似乎是菜花烙铁头，它可是当地有名的毒蛇哦，它显然是被我们给惊扰了，正在迅速地爬走！多险哦，要是不小心踩到它，难保不会被它咬到，后果不堪设想！

踏查巴朗山

我们对巴朗山进行了踏查。巴朗山，又称“斑斓山”，藏语叫“巴郎拉”，海拔5040米，位于卧龙自然保护区至四姑娘山风景区之间，位于小金县以东，小金县、汶川县、宝兴县三县交界处。从巴朗山山脚的邓生往上进入巴朗山，沿羊肠小道和盘山公路依次盘旋攀爬到达塘房、贝母坪、巴朗山垭口，再往上进入流石滩区。

自邓生继续往上直到巴郎山顶，随着迅速上升的海拔，你可看到明显的植物垂直分布带谱，并感受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象变化，使得沟谷和峰顶宛如两个世界。站在巴朗山垭口，也许刚才还是艳阳高照，但随着一阵山风吹过，云卷云舒，甚至如果有人在高山上大声呼喊，引起空气震动，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阵浓雾（实际上是乌云）和小雨，也可能是一阵山风裹挟着阵雨，或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脸地砸来。但当雨过天晴，又是艳阳高照，蓝天白云。瞬息万变的气候，使得我们总是湿一身干一身的。夏天草甸上到处盛开五彩缤纷的野花，绚丽多姿，其中生长有不少著名的大宗常用高山中草药。而成群的牦牛悠闲散布其间，此景令人赏心悦目。

限于当时的条件，我们只能乘坐大货车沿阿坝州森工局运输木材的盘山公路从邓生经针叶、阔叶混交林植被带，针叶林植被带前往灌丛和高山草甸植被带的塘房、贝母坪、巴朗山垭口及其上方的流石滩考察。那时那条盘山公路是一条土筑公路，因年久失修，被雨水冲刷和重车碾压，形成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沟槽和高低不平的大坑小凼，雨天稀泥烂滓，晴天一路尘土飞扬。车行其上，颠簸跳跃，坐在货车车厢里，人被弹跳得老高，头撞在货车顶部的铁栏条上，生疼，感觉头骨都要骨折，全身都要散架了！而左侧就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峭壁，感觉十分危险与恐惧。但当我们在 3 000~4 200 米的高山草甸上远远地看到鹤立鸡群的大黄（掌叶大黄，高的植株高可达 2 米！）正开着耀眼的红高粱似的花簇，张开硕大的叶片欢迎我们的时候，那份欢呼与雀跃，都与我们的年龄不太相称了！急急忙忙下得车来，忙不迭地奔向大黄，同时还有惊喜在等待着我们——大黄不远处还有不少的川木香（灰毛川木香），它莲座状簇生的叶片长圆状披针形，铺地而生，叶片展开，直径可达 70 厘米，中间簇拥着鸡头大小开着紫色小花的头状花序 10 多个。更有纤弱矮小草本植物，它叶片稀疏，披针形至线型，低头扼首，茎顶单生紫色、深紫色或浅黄色、花被片带紫色斑点或小方格的钟状花朵，散生在海拔 2 800~4 500 米的灌丛或草地上，这不是我们昼思夜想的川贝母（川贝母、暗紫贝母、甘肃贝母）吗？近得身来，用竹片或小铁锹轻轻地将它们的鳞茎挖出，除去须根、粗皮及泥沙，小心放入布袋之中，带回驻地晒干；由于在它们不同的生长期，鳞茎的大小和性状不同，干燥

后就分别得到“松贝”和“青贝”了。

在从塘坊经贝母坪到巴朗山垭口途中，在海拔接近4 000米时，我开始出现高山反应，头昏、头痛，走路比较吃力，感觉轻飘飘的，好似踩在棉花堆上，呼吸也比较困难……队里的老师嘱咐我不要紧张，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就会缓解。果然，当我休息半个小时之后，高山反应逐渐缓解，继续投入到采集踏查工作中。

这一路，我们在针叶林植被带采到了松萝，它们细长的（有的长松萝可达1.3米）、密密的灰绿色丝状地衣体垂生在大树的枝干上，宛如老树的胡须般随风飘荡。而在灌丛和高山草甸植被带，其间生长的常用大宗中药材最为丰富，如大黄（2种）、川木香、川贝母（3种）、羌活、秦艽、藜芦（2种）、佛手参（2种）、黄芪、党参（3种）、赤芍（2种）、红景天（3种）、刺参（2种）、拳蓼类（3种）、雪茶、雪灵芝等，在缓缓流动的山溪里和潮湿的片石下还有可爱的羌活鱼。而翻过垭口进入小金县日隆镇境内，我们从垭口附近日



1979年5月，卫莹芳、熊曾老师踏查、拍摄卧龙高山药用植物

隆镇境内的草坡上采挖到了冬虫夏草。

我们白天在巴朗山考察，晚上就借宿在塘房道班养路工人的工棚中。工棚顶是用木板盖成的，四周的墙壁也是木板围成的，从山上砍来灌木和高山杜鹃枝条围绕在木板墙外，以免受到野生动物侵扰。我们在高山草甸上踏查时也看到过有被野生动物撕咬倒毙的牦牛，据师傅讲，晚上有时有豺狗在房屋周围觅食，并发出凄厉的叫声，嘱咐我们晚上不要单独到屋外去，以免发生意外。夜幕降临，我们和道班师傅围坐在火塘旁边，吃着夹生的挂面（由于海拔高气压低，工人们煮的饭是夹生的，连煮的挂面也是夹生的——那时师傅们还没有高压锅），翻烤着植物标本和湿透的衣物。晚饭后，道班师傅腾出一间小屋子给我住（就我一个女性），其他人则挤住在另一间大屋子的通铺上。半夜里，山风呼啸，我似乎听到板墙外边有动物走动和呼吸的声音，吓得我毛骨悚然！赶紧敲门跑到隔壁道班师傅和考察队老师们的房间里，裹着被子坐在火塘边，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开门走到屋后，果然看到湿地上有一些动物的新鲜足迹，稍远处还有不知名的动物粪便。



1979 年 6 月，卫莹芳老师鉴定卧龙高山踏查采集药用植物标本

当进入巴朗山高山流石滩，满眼都是巴朗山寒冻风化高山地貌，山体陡峭嶙峋，岩石裸露，随处可见山石岩屑坠落崖下而形成的碎屑坡和石碓，人称流石滩。据说高山流石滩昼夜温差很大，由于白天经过强烈的日晒和紫外线照射，到晚上气温骤降，可听到岩石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人一踏上碎屑坡，疏松的碎石就会向下滑动，险象环生，有坠落崖下的危险。这里寒风凛冽，空气稀薄，呼吸困难，行走吃力。紫外线强烈，在山上一两天后脸上就被晒脱一层皮，肤色黢黑。高山流石滩植被稀疏，主要散生一些多毛的或肉质的矮小草本植物或垫状植物，如多种凤毛菊属、红景天属、蚤缀属等植物，另外还有少量的地衣和苔藓植物。虽然植物稀少，但名贵中药川贝母——梭砂贝母星散其间。梭砂贝母生长在碎石缝隙之中，植株矮小，高 15~30 厘米，少有的 3~5 枚叶片及茎均呈绿黄褐色，通体与流石滩浑然一色，只有在花期，顶生单花浅黄褐色的花被片上有红褐色斑点状小方格纹稍微显眼，所以有时不小心都踩着它了。由于长期的进化与自然选择，梭砂贝母形成了多么完美的保护色！

而珍稀植物水母雪兔子那圆溜溜毛茸茸的身躯上，密集的灰绿色叶片均满被稠密的白色长棉毛粘上露珠，迎着朝阳，全身好似缀满了珍珠一样珠光闪闪。此外，巴朗山上还有美丽的绿绒蒿，有红花的、蓝花的、黄花的，那绸缎般的花瓣迎风招展艳丽无比。其中有的还属于中国特产物种，除了药用价值外，更是公认的世界上少有的珍稀名贵花卉。



1986 年 6 月，卫莹芳老师带领药学院中药专业 1982 级学生在卧龙进行中药鉴定学高山实习，图为在巴朗山上采大黄

最终选定实习线路

通过实地踏查，卧龙不但生物资源丰富，特别是大宗中药品种分布较为集中，离学校距离较近而且交通方便，食宿均可安排，我们最终确定将药鉴高山实习基地定在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卧龙镇境内，并制定了实习大纲和指南，选定了卧龙高山实习的几条最佳路线，确定了每一条路线上所需要观察到的中草药品种及主要鉴别特征和相应的产地加工方法。报经学校和卧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及四川省林业厅批准，从1980年起至1989年我院中药专业的中药鉴定学高山实习均在该区卧龙镇境内进行。

经过我校在卧龙多年的中药鉴定高山实习和科研工作观察，同时查阅了卧龙自然保护区标本陈列馆的标本，我们发表了论文《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常用中药资源调查及鉴定》，考察收集药用品种近300种，涉及260味中药，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85年版）一部收载的有73种，《四川省中药材标准》收载的有29种。

通过高山药材产地实习，我们在业务上达到了预定目标，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同时磨炼了学生们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精神，增强了团队意识、珍惜中药材的意识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提高了学生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上述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令许多学生终生难忘。

卧龙的许多珍稀植物，如川贝母、水母雪兔子、绿绒蒿、红景天等均属于生长缓慢，生物量极低，分布地区又比较狭窄的高山珍稀植物，如果随意采挖，就会造成高山生态系统的破坏，进而造成这些珍稀植物的灭绝。每次上山实习时我们都遵守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相关规定，以观察药用植物为主，在保护区允许范围内少量采集植物标本，仅供教学示范之用，最大限度保护好卧龙的生态环境。

1978年我校药学院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全国首届“全国中药鉴定学师资进修班”，来自全国多所中医药高等院校的青年教师和中央药检所、内蒙古、新疆、吉林等药检所的学员有几十人，1979年学员们在卧龙自然保护区进行了中药鉴定学高山实习，认识了许多四川特产大宗高山药材的原植物、动物形态，生长环境及药材性状鉴别，开了眼界，长了真知，收到很好

的教学效果，受到学员们一致好评，认为此番经历终身受益！

三、我校建立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中药鉴定学道地药材产地实习、实训基地”

随着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的日趋完善，为保护卧龙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保护区不再同意大专院校在保护区内进行野外教学实习。于是我校从1990年起不再进行卧龙中药鉴定学高山实习，转而进行川产道地药材产地实习，从1990年至今，持续开设了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中药鉴定学川产道地药材产地实习、实训基地”。

在全国公认的200多种道地药材中，川产道地药材就有近50种，其产量大，质量优，临床疗效好，誉满中外，素有“无川药不成方”之说。而大部分栽培的川产道地药材主产区则在我省丘陵地区。许多川产道地药材因为其适宜的生长环境，经过长期优化的栽培和田间管理措施与独特的产地采收、加工方法，形成了举世公认的中药知名品牌，现今有多种川产道地药材建立了中药材GAP基地。我校中药鉴定教研室经过前期调研，取得当地政府、药材公司、药材生产企业支持，从1990年至今，建立了一批川产道地药材实习实训基地。

建立都江堰市道地药材中药鉴定实习、实训基地

我校建立了都江堰四川省中药材公司养鹿场（改制后为四川医药集团新鹿药业养鹿场）教学实习基地。师生们在梅花鹿、马鹿养殖场参观学习梅花鹿、马鹿的原动物鉴别，养殖方法，鹿茸的采收、新鲜鹿茸现场加工全过程，以及成品鹿茸药材与饮片性状鉴定，鹿茸的真伪优劣鉴定。参观学习黑熊养殖以及活熊取胆汁。

我校建立了四川养麝研究所和养麝场教学实习基地。麝香是著名的贵重川产道地药材，现在是少数几个由国家统一管理的中药材之一，不允许市场进行自由交易。其原动物野生林麝、马麝和原麝为濒危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禁止捕猎。1958年我省率先在阿坝藏族自治州、都江堰市进行了林麝试养

并取得成功，同时建立了养麝场和养麝研究所，现已建成麝香 GAP 生产基地。人工养殖林麝的活麝取香技术已经成熟，并能提供麝香商品药材。师生参观四川养麝研究所和林麝养殖基地，学习麝香原动物鉴别、林麝养殖方法、活麝取香方法、麝香药材鉴定方法及相关科研工作、麝香产品研发情况等。



都江堰四川医药集团新鹿药业养鹿场



工作人员展示刚锯下的花鹿茸（三岔）



卫堂芳老师在新鹿药业养鹿场指导学生进行鹿茸药材与饮片性状鉴定

我校建立了都江堰市川芎教学实习基地。都江堰市现已建成川芎 GAP 生产基地，师生通过参观川芎 GAP 基地，采取技术人员现场讲解、学习川芎育种，产地栽培技术，药材采收、加工，饮片加工、贮存方法，药材和饮片性状鉴定及川芎产业开发前景等。

我校建立了青城山三木药材种植场实习基地。三木药材——厚朴、杜仲、黄檗是著名川产道地药材，厚朴是都江堰市地理标志产品，四川更是古今公认的优质厚朴——紫油厚朴的原产地。师生在青城山种植场参观学习三木药材的种植方法、原植物鉴别，现场体验皮类药材的传统采收加工方法，包括厚朴与杜仲的发汗、干燥和新的采收方法——立木剥皮，以及药材与饮片性状鉴定。



2016 年，药学院本科生在四川养麝研究所参观学习

在绵阳市建立道地药材中药鉴定实习、实训基地

我校在绵阳建立了江油市附子实习实训基地。附子为著名川产道地药材，是国家重点管理的毒性药材。江油市现已建成附子 GAP 生产基地。师生们在附子栽培基地现场听取附子 GAP 生产基地技术员介绍附子种植全过程，包括育种和移栽以及田间管理示范，了解栽培附子生长情况以及产地采收。参观附子加工厂。江油附子加工厂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投资的毒剧药材加工厂。通过正规的产地加工达到减毒增效的目的，不同的加工方法形成众多的饮片商品规格。在附子加工厂通过参观整个加工工序及流程，学习成品药材和饮片的真伪优劣鉴别方法以及毒剧药材的管理法规。参观青黛加工厂，学习了解青黛特殊的加工方法，以及青黛的真伪鉴别方法。



2012 年，学生在绵阳江油附子种植基地见习



2013 年，学生在绵阳市安州区附子种植基地参观学习

我校建立了三台县麦冬实习实训基地。麦冬为著名川产道地药材，三台县现已建成麦冬 GAP 生产基地。师生们在三台县花园镇麦冬 GAP 生产基地的麦冬栽培田间，现场听取技术员介绍麦冬种植全过程和田间管理示范，特别是农药和肥料使用情况及间种、套种情况，参观栽培麦冬生长情况以及产地采收方法。到麦冬加工厂参观学习麦冬产地加工方法、药材性状鉴别、麦冬药材商品不同的等级规格以及听取麦冬药材等级规格标准制定情况介绍。同时，麦冬是药食两用品，听取当地政府和企业介绍麦冬的健康产品开发情况及远景规划介绍。

我校建立了中江县丹参与白芍产地实习基地。中江县是著名川丹参和川白芍的道地产区。师生们学习栽培川丹参、白芍，了解其生长情况、植物形态、药材及饮片性状鉴别，对比川丹参与国内其他产地不同的采收加工方法，特别是了解白芍熏硫带来的危害及白芍新加工方法探索等。

在遂宁市建立中药鉴定实习、实训基地

白芷为著名川产道地药材，遂宁市产白芷药材是全国白芷药材主流商品，现已建成白芷 GAP 生产基地。师生们现场听取白芷种植全过程和田间管理情况，参观见习栽培白芷田间生长情况以及产地采收方法，特别是熏硫过程带来的危害以及产地加工方法改革与创新。学习白芷药材和饮片性状鉴别以及储藏养护方法、注意事项等。



2015 年，学生在三台县麦冬 GAP 生产基地实习

综上所述，通过在上述川产道地药材产地建立中药鉴定学实习实训基地，请当地药材公司或企业技术员或药农为学生现场讲解和示范道地药材特色栽培技术、田间管理技术、采收加工方法、药材等级规格标准制定以及现场进行药材和饮片真伪优劣的性状鉴别，学生纷纷表示，百闻不如一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到了书本和课堂上学不到的真知，收到优良教学效果。

“中药鉴定学”课程充分利用我省得天独厚的川产道地药材资源优势，药材生产、经营的人才优势以及科研创新优势，转化为独具特色的教学优势，立足于培养能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优秀中药人才，以期能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大局。

撰写人简介：

卫莹芳，女，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从事中药专业本、硕、博教学与科研工作46年，历任药学院中药鉴定教研室主任、中药品质研究室（四川省中药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药品种质量鉴定实验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主任、中药材标准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等，是四川省卫生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精品课程“中药鉴定学”学科带头人，国家级教学团队“中药品质教学团队”中药鉴定学学术带头人。主持和主研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等科研课题31项，获各级学术奖励12项，公开出版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及学术专著4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

我校领衔创编全国第一版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中药鉴定学》

撰写人/卫莹芳

我校是全国第一家创办药学院的高等中医药院校，在开办中药学本科教学之初涉及的各学科教材在全国完全是空白，创编各学科相关教材成为药学院办学之初的当务之急。

我校作为首家开设中药鉴定学课程的教学单位，在教学和教材建设上积累了丰富和成功的经验。当主编中医学院试用药材《中药鉴定学》的任务落实到学校后，贾敏如、李仿尧、万德光等老师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创编中药鉴定学教材的责任。（协编单位有北京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江西中医学院、辽宁中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青海中医学院、黑龙江中医学院、吉林医科大学、上海市药材公司、成都市药材公司）[①]。教材从筹备、编写到出版，





成都中医药大学主编教材《中药鉴定学》（1977年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以上单位分别为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青海大学医学院、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吉林医科大学、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成都市药材有限公司。

其间历尽各种艰辛，最终于1977年7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保证了“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中药学本科生——中药77级及其后各年级使用全新的《中药鉴定学》教材。

全国第一版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中药鉴定学》的特色与贡献

在全国首次统一了学科名称为“中药鉴定学”，并确定了《中药鉴定学》教材的编写体例，其总体框架沿袭至今。该书分绪论、各论与附录三大部分。

绪论：第一章我国中药的丰富资源，第二章中药鉴定学的意义和任务，第三章中药的采收、加工与贮藏，第四章中药的鉴定，其中重点介绍中药鉴定的依据和中药鉴定的方法。

各论：收入常用中药372味。以植物、动物、矿物药分大类，以药用部位分章，每章又以生物的分类系统编排每个中药（矿物药以主要成分归类）。所载中药分为重点、一般和简介三种形式，部分内容采用小字排列，以供教学选择。各药主要介绍其基原鉴定、性状鉴定，必要的显微鉴定和理化鉴定。对品种混乱的重点中药，于该药的附注中择其主要混伪品种简介其鉴别特征，以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学生对中药真伪优劣的鉴别能力。

全书收载墨线图共计794幅，包括总论，各论原植物图、原动物图、药材图和部分饮片图、显微图等。其中，为适应本教材需要而对不少引用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相关墨线图进行改绘。尤为珍贵的是本教材有三十几味药材图，特别是部分道地药材图为我校谢先云老师首次以实物进行写生的墨线图，如川乌、草乌、盐附子、黑顺片、白附片、黄附片、黄连、何首乌、延胡索、麦冬、三种郁金、浙贝母、钩藤、枳壳（酸橙及香园）、枳实、使君子、枸杞子、冬虫夏草、土鳖虫、僵蚕、毛壳麝香（未修边剪毛和已修边剪毛共2幅）等。另外，还有蕲本（新疆蕲本）等一些药材图为编写单位老师提供的写生图。教材出版后这些写生图被后续不少教材多次引用。

附录：收入类似中药的对比鉴别、中文名索引和植物、动物拉丁学名索引。尤其是类似中药的对比鉴别，收录了30组药材性状相似，容易混淆的不同

中药材，将其药材名、品种来源、药材性状鉴别，以表格形式列出，着重对比其性状主要鉴别特征，突出鉴别要领，通过这种药材与药材的横向比较，拓宽学生真伪鉴别的能力，方便学习掌握，深受老师和学生认可和喜爱，收到良好教学效果。

我校对《中药鉴定学》教材建设、改革与创新的贡献

《中药鉴定学》教材从我校药学院领衔创编第一版后，1980 年，学院再次主编了《中药鉴定学》教材第二版，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编写单位有上海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辽宁中医学院、江西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我院参加编写的有贾敏如、李仿尧、万德光、卫莹芳等同志，贾敏如同志任主编。

《中药鉴定学》教材从我校药学院领衔创编第一版后，至今已经过去了 40 多年，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药服务社会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中医药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教育改革在不断深入，中药鉴定及相关学科的新方法、新技术不断涌现，推动中药鉴定学学科不断发展。《中药鉴定学》教材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提高与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后续教材已经出版了若干版，但第一版主要的编写体例几乎沿袭至今，第一版教材的写生药材图也被广泛引用，这就是成都中医药大学对中药鉴定学学科发展和教材建设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首版《中药鉴定学》出版后得到各兄弟院校的广泛使用并给予一致好评。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中药鉴定学》从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到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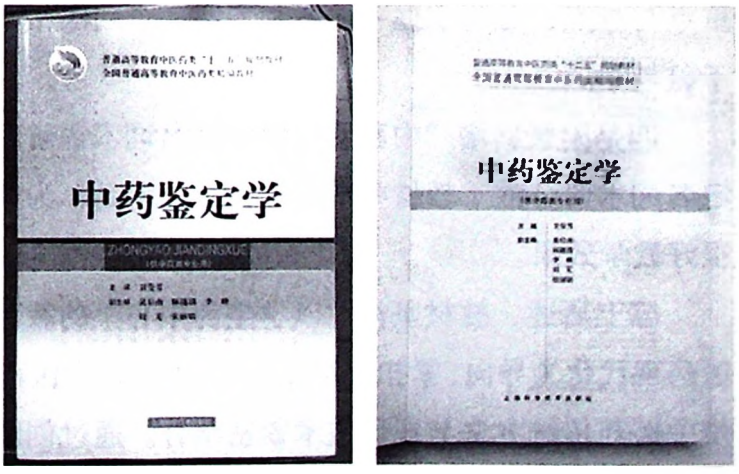
成都中医学院主编《中药鉴定学》1980 年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教材的编写，其间主编单位经历了几次更换，但我校中药鉴定学教研室的老师们一直没有缺席过每一版《中药鉴定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从《中药鉴定学》教材的创编到如今，一直为《中药鉴定学》教材建设、改革与创新做出了应有贡献。

我校卫莹芳教授主编并于2010年9月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中药鉴定学》（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十二五”规划教材）。本版《中药鉴定学》教材是由全国高等中医药教学管理研究会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组织，由全国14所高等医药院校共同编写而成，全书80万字。

本教材内容以社会需求和中医药现代化为导向，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教材长处，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传承中药鉴定传统精华，守正创新，力求体现“精、新、实、特”特色。学生易学好懂，能学以致用。

一是总论编写体例的完善与改革。在上一版教材的基础上，第三章新增影响药材质量的因素；第四章新增中药鉴定的一般程序，并在第四节中药的鉴定中将鉴定中药真伪优劣的方法归纳为中药的真实性鉴定、安全性检测、质量评价；新增第五章中药质量标准的制定。完善了影响中药质量的因素及中药鉴定方法，拓展了中药鉴定学的内涵，增强了总论的系统性、科学性。同时，总论注意反映国内外，特别是国内中药鉴定的新方法、新技术，影响中药质量和安全的主要因素以及中药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在质量标准中的应用，增加学生们的自豪感，巩固学生们的专业思想。



成都中医药大学卫莹芳主编《中药鉴定学》2010年版作为“十二五”规划教材，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二是各论中药编写体例创新。对30多年未变的各药编写体例有重大创新，紧扣中药鉴定的核心是鉴定中药的真实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与总论呼应，对鉴别及检查等项目依其目的进行分类，新设置为中药【真实性鉴定】包括植（动、矿）物形态、性状、显微和理化鉴别；【安全性检测】包括重金属与有害元素、残留农药、有毒成分、黄曲霉毒素的限量检查等；【质量评价】包括经验鉴别、纯度、浸出物、含量测定等，更利于学生掌握中药鉴定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各论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编写教材内容，各药编写项目与内容设置上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重点药与一般药、简介药的内容繁简关系，及时反映《中国药典》对中药品种、质量控制和安全性检测的要求，重点突出、层次分明、注重实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化学成分”项，一改以往教材笼统编写的方式，按大类成分编写，脉络清晰，重点突出，主要介绍有效成分、指标性成分或具明显生理活性的成分，与其后理化鉴别及质量评价形成有机联系。另外，本教材各论率先收入了中药饮片鉴别，在重点药【附】药项收载了同类药材或中药提取物鉴别，使中药鉴定学的内容完整地涵盖了药材、饮片、中药提取物和中成药。“附注”内容丰富翔实，知识覆盖面广，对大宗常用道地药材及剧毒药材择要介绍其常见伪品、地方习用品、资源状况及相关产品等内容，为学生扩展知识面，了解药材使用历史、现状及资源情况提供有益参考，深受师生欢迎。

三是新增导学项。总论每一章和各论每一篇前新增导学项，突出各章节的重点与难点，分为掌握、熟悉和了解三个层次，明确了教学的任务与要求，利于教与学。

四是附录新增“中药鉴定学常用名词术语解释”。解决了长期以来中药鉴定名词术语分散于教材中不利于自学的不足，为教与学提供了规范内容，收到很好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教材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内容以社会需求和中医药现代化为导向，紧扣大纲要求，高度贯彻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精神，使中医药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通过创新编写体例与内容，完善中药

鉴定理论系统与知识体系，使教材更具系统性、科学性、启发性和适用性。教材体例完善，附图翔实，有“精、新、实、特”特色。学生通过本教材系统学习，掌握学习方法，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且能举一反三，培养自主学习及创新能力，提升知识自我更新和终身学习能力，收到很好教学效果，深受广大师生和同行好评。

最后，特别感谢万德光、李仿尧、谢秀琼、杨启德、唐声武、谢先云等老师为本文提供相关信息，感谢龙飞老师协助提供教研室历年相关教学文件资料。

撰写人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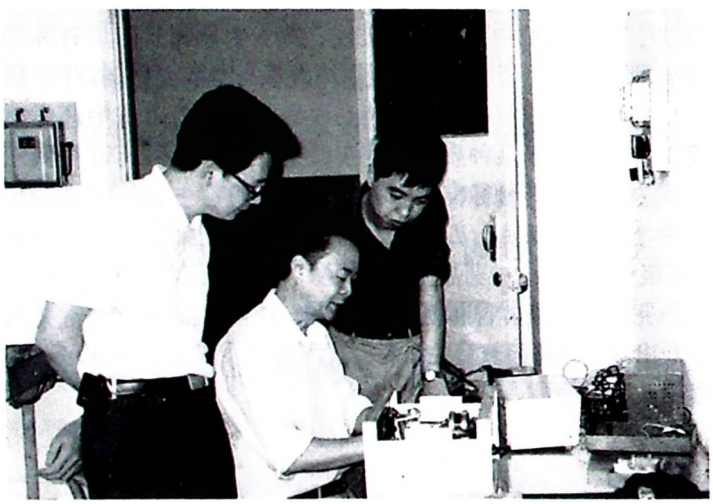
卫莹芳，女，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从事中药专业本、硕、博教学与科研工作46年，历任药学院中药鉴定教研室主任、中药品质研究室（四川省中药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药品种质量鉴定实验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主任、中药材标准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等，是四川省卫生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精品课程“中药鉴定学”学科带头人，国家级教学团队“中药品质教学团队”中药鉴定学学术带头人。主持和主研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等科研课题31项，获各级学术奖励12项，公开出版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及学术专著4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

针刺麻醉实验在成中医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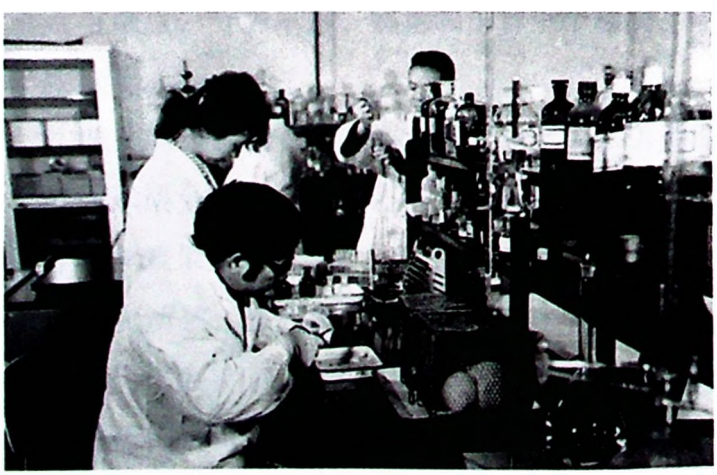
撰写人 / 宋开源

1973 年，周总理对开始出现的针刺麻醉手术有一项重要指示：“不能墙内开花墙外结果”，要在全国组织力量来研究针刺麻醉。

那时，针刺麻醉最早在西安和上海起步，我校参与了全国协作组，学校成



工作中的宋开源（中）



与吴今义（前）在实验中

立了针灸针麻研究室，我们一行五人赴外学习，从广西到福建再辗转到上海。回来后我们就开始组建我校的针刺麻醉实验室，首先做针刺阵痛的动物模型，天天与兔子接触。由于兔子有疥疮，我们每个人都惹上了疥疮，奇痒难忍，每晚都要涂上硫黄油膏，历时一月之久。我们创作的针刺镇痛模型指导后为重庆医学院等单位采用。我与付肇明老师也常深入温江公平等一些公社在当地老百姓中做针刺阵痛和经络感传相关临床实践。1975 年全省针刺麻醉研究协作组调集全省相关外科医生，有我校、四川医学院、渡口医院（现攀枝花市中心医院）、温江地区医院、铁路医院等协作组到温江地区、苍溪、绵竹、广汉等地。其中最艰苦的是苍溪，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差，住在高山公社的招待所，床上有虱子，不但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差，连来去行程都经历了种种艰难甚至是危险。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团队不懈的努力，我们的科研论文《经络感传与经络气血的关系》以及收治的针刺阵痛的临床研究，在 1978 年四川省科技大会上获得表彰，1978 年底在全国卫生科技大会上再次获奖。我们的研究表明针刺阵痛对副交感神经类型的人效果好。

在针刺麻醉的实验研究基础上孕育了新的研究方向，特别是我国针灸学泰斗，我校吴棹仙老师的《子午流注说难》的启迪，我们考虑针刺阵痛与《子午流注说难》中的气血流注理论是否有一定关系，是否跟现代时间生物学理论有关。


0010

为表彰在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成都中医学院 特颁发此奖状。

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

一九七八年

0010

成果项目：

1、经络感传与经络气血关系的探讨

2、中西医结合自内障针拔术的研究

3、《中医妇科治疗学》

4、治疗气管炎有效中草药研究

（以上为）全国科学大会奖

宋开源老师获奖证书

1977年，针麻协作组在绵竹工作时，我与薛鉴铭老师住在一起，偶然发现薛老师的床下有一个小抄本，叫《国外时间医学文献综述》，作者是吴今义。这个小本本让我大开眼界，原来国外已有这么多医学的时间因素相关研究。后来有幸结识吴今义老师，吴老师建议我们将针刺阵痛与现代时间医学的相关性结合起来研究。我顿觉求之不得。后几经周折，经我强力推荐，侯占元院长于1978年将吴今义老师正式调入成中医。

1982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世界时间科学之父哈尔贝克来成都在锦江大礼堂讲学。全国400多所大学和生物研究机构的人员来蓉听讲，这是我国第一次引入时间生物学。会后安排到青城山参观，哈尔贝克教授说时间宝贵，宁愿给其他人讲学，不愿去青城山，可见一位学术伟人之专注精神，令人深感敬佩。再后来吴今义老师也去了美国，加盟了哈尔贝克实验室，我则继续这方面的研究。1980年在新的教学实验大楼开始《子午流注的生物学基础研究》。实验相当辛苦，经常是24小时不间断观察，早上八点进去，第二天早上八点才能出来，那时还经常停电，对我们的实验干扰很大。围绕这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我们先后指导了40余位老师和学生共同勤奋工作，也产出了不少成果。2008年我们团队以《针灸时间治疗的生物学基础》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时至今日，我想说，我无悔于对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选择，无悔于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中医的学术研究领域，我这一生很幸福！

撰写人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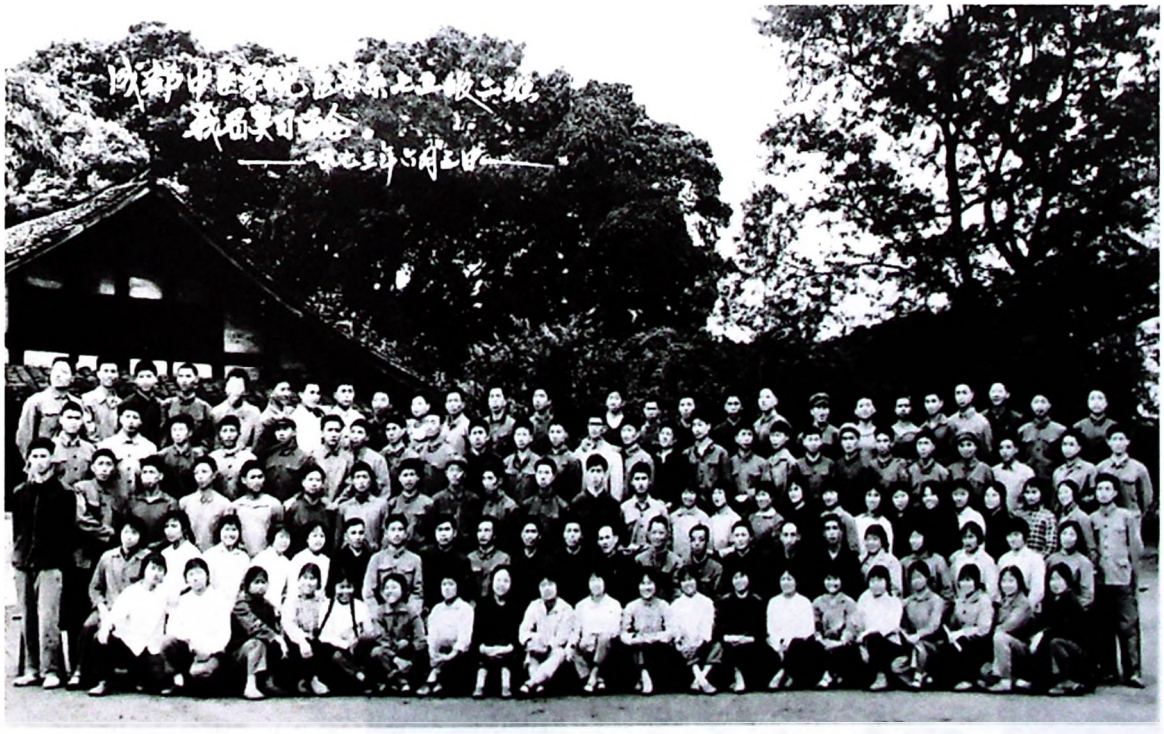
宋开源，男，1937年生，四川省富顺县人，中共党员，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56年毕业于自贡蜀光中学，同年入读四川医学院医学系，1961年毕业后即入成都中医学院生化教研室任教。1964年，在卫生部全国生化高师班培训一年。1968年，组建勾体病研究室，1973年组建针灸、针刺阵痛研究室，1983年由省政府批转为中医基本理论研究室。主攻中医时间医学的生物学基础，先后承担国家、省、市级多项课题，获多项部省级科研成果奖，并获四川省医疗卫生终身成就奖。

龚锦文老红军带队峨眉山中药实践

撰写人 / 曾一林

为适应当时教学改革的需要，我们中医学专业的学生在上中药学课时，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走出课堂到药材产地，一边认药采标本，一边学习中药学。

那是 1973 年 5 月中旬，我们班 120 名学生，在班主任彭永茂、蒲忠国老师带领下，从学校出发，坐火车到达峨眉站，兄弟院校西南交大派卡车接送我们到达目的地——中药材宝库峨眉山。带领我们的老师除了班主任外，幸运的是由龚锦文老红军作为我们的带队领导，他老当益壮，处处以身作则，与学生



峨眉山下全班集体合影，第二排左起十二为龚锦文

们打成一片，和蔼可亲，给我们留下极好的印象。

我们的教师队伍实力雄厚，除了有中医学老师雷德明、郭仲夫、谢克庆，中药学老师凌一揆、刘继林、徐治国、蔡佩英、林森荣外，还有党政领导陈彭年、张重郃，马列主义教研室老师余海峰、柯义成，体育老师黄隆清。后勤保障是刘伦全师傅，他们对工作兢兢业业，为我们的学习与住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们的大本营都设在寺庙里。第一个大本营便是峨眉山脚下的报国寺，住下后第二天开始上课，讲解采认药物知识与交代注意事项，然后分成6个小组，由老师们带着我们上山认药采标本。

在完成报国寺的预定计划后，师生们背上行装，徒步上山，依次是万年寺、洗象池、雷洞坪，每到一处都要住下一至两天，一边上课一边采认中药。

在雷洞坪修整后，继续向峨眉山最高峰金顶进发。当时金顶因失火被焚烧，已经成为废墟。在金顶采认中药后，徒步下山回到洗象池休整。休整后继续徒步下山，在九岭岗分开岔路，经九老洞、九十九道拐，到达洪椿坪大本营。在洪椿坪休整后，经清音阁，安全返回报国寺。我们全程边走边采识中药标本。为了节约开支，我们的食品如米、面、油、盐及部分蔬菜（如土豆、南瓜），都是自己扛上去的，师生同吃、同住、同跋山涉水。



师生在“报国寺”庙内铁塔前合影，二排左起第二为龚锦文



学生们在采药途中，前排左起第三为龚锦文

老师们一丝不苟地传授认药知识与做标本技术，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记得牢，使我们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同学们学习也特别认真，对每味药的生长环境、功效、临床应用及注意事项，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采集到的药材，回到学校后逐一归类制成标本，丰富了中药标本内容。为考核学习成果，老师将标签拿掉，每位学生要回答由老师随机抽出的五种中药标本，要求说出中药的科属、归经与药性，才能及格。

两周的峨眉山中药实践虽是短暂的，但由于有老师们的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精神，使我们收益多多。

值得回味的那一幕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头脑中，回味在心田里！

撰写人简介：

曾一林，男，四川省泸州市人。1975 年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留校从事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曾任成都中医药大学骨科教研室主任，全国高等中医院校骨伤教育研究会和中国人才研究会骨伤人才分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科分会委员、四川省中医药学会骨伤科专委会副主任、《中医正骨》杂志编委。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医名师学术思想传承》暨杨天鹏骨科学派技术专家、四川省杨天鹏骨科学派传承人、四川天鹏长寿研究所所长，出版著作 18 部，编导出版音像教学片 7 部，发表学术论文 67 篇，承担国家和省厅级科研课题 7 项，获国家专利 1 项。

“培土生金”治肺病

——开门办学中的故事

撰写人/郑士杰

成都中医学院从1972年恢复招生三年制中医专科生，每届学生都实行“开门办学”，即安排一定时间深入到农村、工厂、部队去进行教学和临床实习。

从1973年9月起，学校分配我担任医学系党总支书记。1974年，我曾经带医学系1972级一班学员和彭履祥、冉品珍、肖正安、郭子光等老师去什邡县（现什邡市）进行“开门办学”，时间半年。我们在什邡县城安排有师生上课和食宿地点，临床教学实习主要与县上的中医联合诊所合作。1975年7月，成都中医学院与什邡县合办了什邡县中医函授学校。对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业务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开门办学期间，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彭履祥老师为当地一位患肺结核病人的医治故事。

有一位什邡县当地男性患者，经县医院进行X线检查肺部后，确诊为“空洞型肺结核”。这位中年男性患者得知后，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焦急。他听别人说，成都中医学院有著名的中医老师，带学生在县城中医联合诊所进行开门办学临床指导。于是他和他的家人一起来到这里，找到彭履祥老师就诊。

彭履祥老师正带着学生实习，对这位新来的病人非常认真地按照中医诊病的望、闻、向、切四诊和辨证施治原则，进行医治。老师口说，学生写处方，所用的中药主要是温补脾胃，没有直接针对肺结核的药物。跟老师抄处方的学生，感到十分不解，明明县医院诊断的是“空洞型肺结核”，为什么处方里没有治肺结核的药物？

彭老师知道学生的疑问后，在当日晚上进行辅导讲课时，特别向同学们讲道：“这是中医理论的一种辨证施治方法，即‘五行’的方法运用。‘肺属金，脾属土’。土生金，治脾胃是培土，培土则生金。”同学们听后，深受教育。

据老师们介绍，彭履祥老师早在1941年，就考入四川国医学院深造，获得

李斯炽院长、邓绍先教务长等老师的指点，学业精进，名列前茅。就读期间，受《黄帝内经》“人以水谷为本”“有胃气则生”的启迪，撰写了《得谷者昌，失谷者亡》一文，由此阐释发挥，以后在临床实践中，重视培土生金、调理脾胃，遣方用药，常寓于平淡之中而见高妙，救人甚众。1956年，彭履祥奉调成都中医学院任教，先后主讲《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中医内科学》《各家学说》等课程。

这位病人经过两个多月连续服用彭老师开的药方，自觉肺部情况有好转，再去县医院X线复查，发现肺部空洞不见了。当检查的医生看片子后，感到有些奇怪，就问病人：“你吃的什么药？是西药？还是中药？”病人告诉医生说，我吃的是成都中医学院彭老师给开的中药。他又将中药处方给医生看了，但这位医生仍然有些不相信。他后来通过一些方式打听、了解后，确有这位彭老师，才放心了。

半年时间的开门办学快结束时，这位病人带来一个好消息：经过坚持数月不断服用彭老师开的中药后，去县医院进行肺部X线检查，肺部结核不见了。病人高兴地说：“没想到中医中药治疗肺结核还有这么好的效果！”现在，老百姓对中医中药更相信了。

我对这个真实故事至今难忘，这就是中医精华所在，只要有机会我就向老师们，尤其中青年老师讲。有一次，谢克庆副校长听我讲完后，他说他要在临床上试用下，看效果如何。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彭老师的“培土生金”方法，试用后效果不错。特别是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奋力弘扬发展中医药文化，为人类健康共同体服务。

撰写人简介：

郑士杰，男，1937年生，四川省渠县人，中共党员，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1955年毕业于泸州医士学校，分配到四川省卫生厅工作，1958年调入成都中医学院，1999年3月退休。历任教务处干事、教务处秘书、医学系秘书、教工党支部书记、学院党委办公室组织干事、医学系党总支书记、成都中医学院副院长、成都中医学院党委书记，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1989年主编《中医药管理学概论》，1996年晋升教授，曾获评四川省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1996—1998年任四川省政协特邀委员。

创办校报　三次献礼

撰写人 / 陈先赋

想到“七一”就想到献礼，就想到40多年前的往事。

1974年7月1日，《成都中医学院通讯》（以下简称《通讯》）作为党的生日礼物，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个看似简报，打字机手打，油印机手推，散发着刺鼻油墨味的《通讯》，虽然“土气”，甚至寒酸一点，但却包含着同志们多少夜以继日的辛劳。封面通讯题字，还是徐川同志手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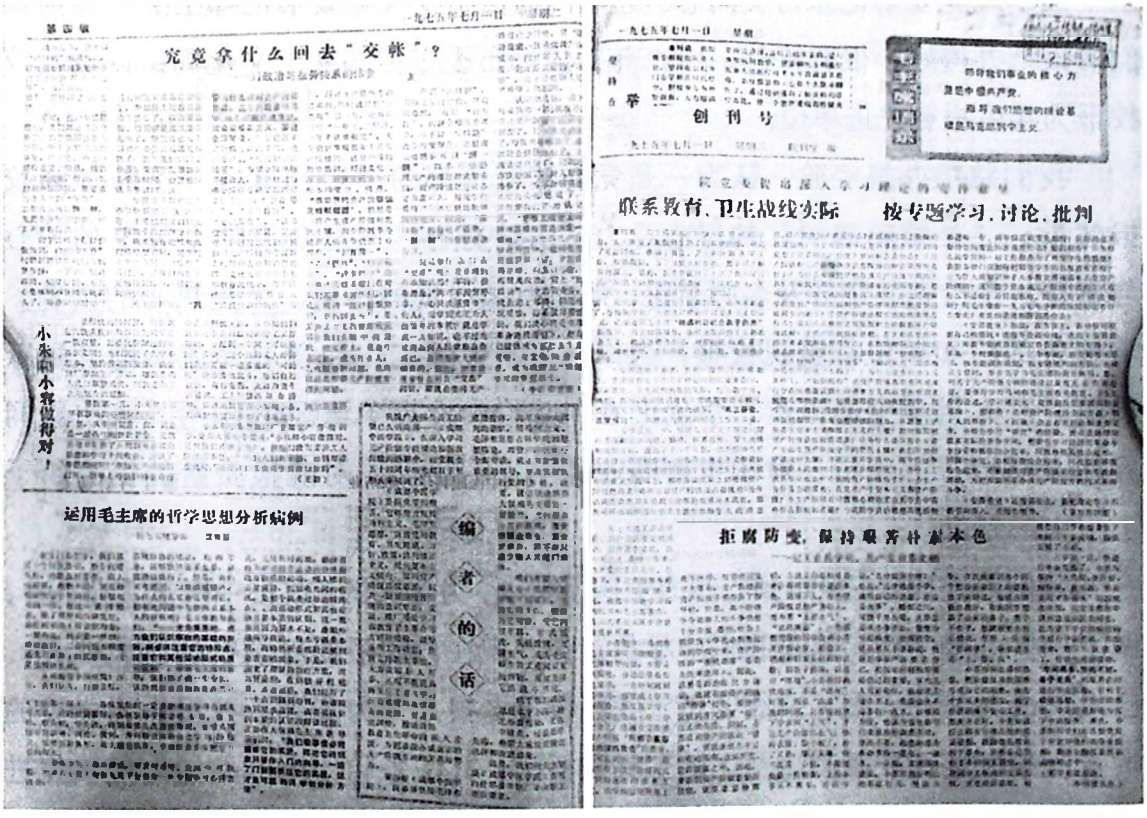
试刊两期后，学校党委决定筹办一张与高校名副其实的铅印报纸《成都中医学院院刊》。任务交给了政治处，具体落实到宣传科。没有办报经验，没有印刷厂，甚至连一张印版所需的新闻纸都没有，经费少得可怜，更不兴什么稿费。那时时兴两句话：一是“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二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口号很豪迈，但做起来谈何容易。时值学院开门办学、巡回医疗，建立通讯组的工作，采访、组稿，来回跑温江、德阳、什邡、乐山等地，费时费力。特别是印刷，长期无着落，成都的大厂不愿印，小厂印不了。

好在什邡县（现什邡市）有个印刷厂，通过各种关系做工作，该厂同意承担印刷，但他们从未印过报纸，设备不足，工人没有排印报纸的经验。时间过了大半年，同志们不知经历和克服了多少困难。1975年6月下旬，我和蔡绍雍同志将稿件带到什邡，用《四川日报》的半张旧报，权作画版纸，进行版面安排。与印刷厂师傅密切合作，共商办法，不断调整版面和多次试机，常忘吃午饭和下班时间，终于在“七一”前夕，《成都中医学院院刊》创刊号成功印出了！

像婴儿的诞生，我们欣喜万分，不待稍息，即将几大捆院刊扛在肩上，步行到汽车站，将报纸运回了学校，并连夜分发。1975 年 7 月 1 日，这份崭新的院刊，铅印的四开报纸，呈现在学院领导、各单位部门和各开门办学点师生眼前，第二次向党的生日献礼。

去什邡印报，来回往往一周时间，终究不是办法。我经常不能照顾家庭，有时为减轻多病的爱人的负担，不得不将年幼的小女儿带往出差。政治处的同志，亦全力以赴，帮助工作。陈彭年、孙绍湖、刘光华、蔡绍雍、吴敦纯、熊习兰、卢强等同志，都先后与我同往什邡，指导或协助工作。

因印刷周期较长，影响稿件的时效性，所以学校下定决心，以缮印室为基础，筹建印刷厂，改善办学条件。学校特从《成都晚报》调来老印刷师傅、原地下党员黄永森同志负责筹建，老干部袁彬大姐是著名作家琼瑶的姨妈，年轻同志叫她袁婆婆，她老当益壮，带领原缮印室全体同志艰苦创业。除方师傅和从新


究竟拿什么回去"交账"？
小朱同小宋做得对！
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分析病例
编者的话
创刊号
联系教育、卫生战线实际　按专题学习、讨论、批判
拒腐防变，保持革命本色

院报创刊号，1975 年 7 月 1 日

华印刷厂调来的李顺英同志外，其余陈家琪、小汪、小柯、小刘等，都是新手。一批朝气勃勃的小伙子和年轻姑娘，在黄永森厂长和袁彬大姐的带领下，白手起家真的办成了拥有对开机的印刷厂。校报编辑部的同志，从始至终，与印刷厂的同志共同努力，攻坚克难，终于又在1977年7月1日，在我们成都中医学院自己的印刷厂里，印出了我们的校报，第三次向党的生日献礼。

《成都中医学院院刊》后更名为《成都中医学院报》。在我任主编期间，段钢、邓世铸、田兆新、吴奇、卢强等同志，为办报不辞辛劳、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十分出色，从不计较得失，一切以工作为重。我们这份报纸，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结合学校的中心任务和具体情况，办出了中医高校特色，从内容到版面，受到全院师生的欢迎。

这份小小的报纸，不仅在成都和四川省高校校报中享有一定名气，校报的文章和版面多次获省市好新闻项目奖，学校因此成为成都市新闻学会和四川省学校校报研究会常务理事单位，而且在全国高校同行中得到好评。1986年，山东中医学院党委书记张奇文同志，还专门写信给我校党委书记郑士杰，表扬我们的报纸办得好，很有特色。1987年，成都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评选我校校报为年度报刊先进单位。

我们总结办报经验，认为一是党委和宣传部的领导和重视，不断加强校报建设；二是编辑部同仁的尽心尽力，团结努力；三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关心与支持。全校党政领导及名师名医，既是校报尽责的作者，又是热心的读者。学校各部门和单位都重视校报，当作不可缺失的工作和学习交流园地，踊跃投稿。一大批学生通讯员、学生记者在院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省市新闻界朋友对校报的支持，对学生新闻业务水平的培训，对院报质量的提高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我们热爱校报，多年倾心倾力于这份报纸，为今天的《成都中医药大学报》，做了一些铺垫工作，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现在，校报随着学校的巨大变化，已发展成为对开大报，成绩斐然，我们校报老报人尤为高兴。校报作为党委的喉舌，学校宣传联系师生员工的工具和桥梁，其任务和作用，是任何现代先进传媒技术所不能完全代替的，因此，这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希望校报年

轻同仁，在党委领导下，坚定办报理念与方向，为新时代成中医的展翅腾飞，多贡献力量。把校报愈办愈好，愈富特色，成为全校师生员工喜闻乐见、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撰写人简介：

陈先赋，男，1941年生，重庆市人，医学史专家、新闻学者。196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74年调成都中医学院工作，历任《成都中医学院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报》）主编、《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常任编辑，并任成都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医史文献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成都市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高校校报研究会秘书长、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地方志编委会特聘编辑等社会职务。出版著作有《四川医林人物》《四川名医传》（上集）、《成都中医学院发展简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和新闻作品数百篇。个人事迹录入《中国知名专家学者辞典》等人物辞典。

《成都中医药大学报》历史沿革

撰写人 / 陈先赋

《成都中医药大学报》原名《成都中医学院报》，报名来源于郭沫若的手书题字，创刊于1975年7月1日。成都中医药大学是全国中医药院校创办校报最早的学校之一。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都中医学院各方面的工作也有了明显起色，学生和各班次增加较快，大批师生在省内许多县、市见习、实习和带实习，亟须互通情况，交流信息，院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委的喉舌和上情下达的有力工具应运而生。

校报在创刊之初，无论人力、物力、财力、经验等方面都面临许多困难。为准备条件，摸索经验，先办了两期油印《成都中医学院通讯》作为校报的试刊。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在全校师生的通力合作下，编辑部同志发挥艰苦创业的精神，校报终于在1975年党的生日之际正式出刊。此期间的校报为四开小报，1月1刊，内容紧随政治形势，反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新闻性较弱，版式较单一。后因种种原因先后停刊2次。

1985年10月，校报经成都市委宣传部批准正式复刊。学校党委副书记陈彭年兼任院刊编委会主任。校报以4开小报，内部刊物的形式，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重视和加强了党委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加强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教育方针、育人宗旨的宣传，“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崇高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校报结合学校实际，及时传播有关信息，加强信息沟通。从1986年2月起，校报由月刊改为半月刊，进一步改进了内容与版面，面貌焕然一新。文字及美术编辑水平提高，师生投

稿踊跃，内容丰富、版式灵活、题材广泛，消息、通讯、特写、诗歌、散文、小说、漫画、连环画等体裁异彩纷呈。“百草园”“祖国医药”“灯下漫笔”“他山之石”“诊余偶笔”等栏目生动活泼。其中，“祖国医药”版获1985年成都市好新闻评比版面奖（当时获版面奖的仅有两家，另一版面奖由《成都晚报》获得）。为总结办报经验，开拓工作，校报编委会于1986年4月举行了出刊百期纪念会，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现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等9所兄弟院校校刊以及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市新闻协会、省电台等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与此同时，校报举办第一期通讯员培训班，由成都晚报社、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校报编辑部老师讲授新闻基本知识。1986年7月，省高校校报研究会、省高校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成立大会。我校校报编辑部当选为常务理事单位，院刊编辑部主任陈先赋当选为副秘书长。1986年9月，经校党委决定，为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新闻工作，充分发挥校报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信息交流的作用，校报改为《成都中医学院报》，“校报编辑室”更名为“校报编辑部”。同年，校报6件作品分别获省市好新闻奖。

1987年，校党委专门召开院报工作会，强调要进一步突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调，加强对学校工作的指导性，号召各级党政负责人亲自动手，带头撰稿，报道师生关心的大事要闻。1991年起，校报刊号为“川内字号”。为了适应工作需要，1993年7月重新组建了通讯员队伍。1994年，重新聘任了校报编委会，由学校党委副书记徐川任编委会主任。同年4月，学校新闻协会成立，由学校党委书记郑士杰任编委会主任，设立院报记者站，并在师生中广泛发展通讯员。1995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成都中医学院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校报随之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报》。1997年，校党委提出办报要求：形式栏目化、内容多样化、队伍网络化、管理制度化。2000年校报使用国内统一刊号CN51-0911/（G），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校报作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重要阵地，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采写、编辑、版式、校对等方面长期保持着高质量、高水准。2003年，校报受到四川省新闻出版局的表彰，获得“四川省优秀校报”奖牌。新老编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坚持开展对学生记者和通讯员的培训，由新闻专业老师讲授相关业务知识和技能。

2006年，是成都中医药大学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一年，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省卫生干部管理学院、四川生殖卫生学院三校合并的大背景下，先后迎来省局共建成都中医药大学、50周年校庆、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等重大事项，为适应学校发展新形势，充分发挥校报作为党委喉舌和上情下达有力工具的作用，经四川省新闻出版局的批准，校报从395期起改版为对开四版彩印大报。编辑部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保证了校报的新闻性、时效性、宣传性、指导性，改版后的校报图文并茂、版式生动、内容丰富，校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校报复刊后坚持定期出刊，创办以来已出刊400期。先后记录和报道了校报出刊100期，30周年校庆，35周年校庆，沉痛悼念邓小平同志，喜迎香港、澳门回归，迎接新世纪，校报出刊300期，李岚清副总理访问学校，温江新校区奠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省局共建成都中医药大学，新校区搬迁，50周年校庆，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等校内外重大新闻和时事。校报作为党委的喉舌，紧密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坚持办报宗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学校改革和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摘自《成都中医药大学报》（2006年），略作修改。

撰写人简介：

陈先赋，男，1941年生，重庆市人，医学史专家、新闻学者。196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74年调成都中医学院工作，历任《成都中医学院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报》）主编、《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常任编辑，并任成都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医史文献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成都市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高校校报研究会秘书长、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地方志编委会特聘编辑等社会职务。出版著作有《四川医林人物》《四川名医传》（上集）、《成都中医学院发展简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和新闻作品数百篇。个人事迹录入《中国知名专家学者辞典》等人物辞典。

二郎庙

——天降神车运水泥

撰写人 / 陈先赋

二郎庙江油水泥厂（现双马水泥厂）是西南两个最大的水泥厂之一，三个高大的烟囱浓烟蔽云，各车间加紧生产，亟欲超额完成年指标任务。换班下来的包装、装卸工人浑身水泥，脸上只见两只眼珠在转动。厂区外车水马龙，来厂抢运水泥的车辆，从工厂专用大门起排成长蛇阵，延延绵绵达到几公里外大山脚青林口大桥公路前。这是1977年底的一番忙碌景象。

二郎庙地处冬寒气候地区，雨雪飘零，这时家家户户早已开始烤火取暖。抢运水泥的汽车驾驶员、带车员十分辛苦。水泥厂招待所和二郎庙街上的小旅店，早已人满为患，他们只能随车食宿。长蛇阵上，前面车辆一动，后边立即跟上，谁也不敢松懈。天寒地冻条件下驾驶员们根本吃不上一顿热饭，更谈不上睡个好觉。虽然穿着厚厚的棉大衣，仍不时走下车来，不断搓手跺脚，待身体暖和一点，便又上车去等待。而这往往要持续等待两三个昼夜，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们成都中医学院的车队，是比较幸运的。1976~1978年，学校大规模的基建已经开始。全院上下、各个部门，抽调得力人员，倾力投入基建工作。新职工宿舍、教学实验大楼、附院新门诊部等一批批项目紧张施工，师生员工踊跃参加劳动，挖土方，和水泥，运建材，挑灯夜战，工地一片沸腾。各路人马，奔赴水泥、钢材、木材等建材战场，日夜兼程，不辞艰辛。从1976年起，我多次从政治处宣传科被“借”到学校基建办公室“跑材料”。江油水泥厂是1969年当时四川省革委组织部门分配我去“当工人”的工厂。我与工人师傅们在劳动和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与工厂各级领导相处关系也很好，大家都叫我“陈大学”。学校交给我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回厂“要水泥”。回到水泥厂，

领导和师傅们都很高兴，热情问长问短，他们说，总要给“陈大学”一点面子。就这样，50 吨、100 吨的“要”，一次又一次，也不知道“要”了多少水泥。

要是要了，但厂里无法用火车车皮发运。车皮需要提前向成都铁路分局报批，这就难了，因为车皮太紧张，计划内的指标往往都不能批够，一等就是一月、几月，所以才出现各单位年终用汽车抢运水泥，车水马龙，排队数里长的浩大场面。

基建办公室的科长吴俊德，是个神通广大的实干家，他常年晚宿办公室，昼夜指挥各路人马的战斗。学校得到“五冶”运输车队强大运输能力的支持，每次至少派出了 3~5 辆载重 10~12 吨重型汽车，到江油运水泥。我和基建办的陈金、单援助，药学系的曹国彬，汽车班的杨师傅等，多次随车前往。每次，都得到工厂领导和工人师傅们的关心和帮助。厂里招待所住不下，工人师傅们就主动让出集体宿舍里自己的床位去和别人挤；天气寒冷，师傅们又为我们杀羊炖肉，送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特别是，他们认为成都中医学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是为人民服务的，建校建医院，都是满足人民健康的需要。因此，不仅帮助我们“要”到水泥，而且“帮人帮到底”，千方百计帮助把水泥及时运回成都，解决学校基建的燃眉急需。师傅们出了一个妙计：半夜开车绕道另门入厂。在各处师傅们的帮助下，待天明上班不久，我们的车辆很快就满载水泥顺利出厂了。其他车队感到很奇怪，难道真的是二郎神帮他们“从天而降”嗦？不满的驾驶员骂道，“开后门”也太神了嘛！当然，我们心有不安，但也顾不得骂声，满怀感谢地向帮助我们的水泥厂工人师傅们挥手道别。40 多年过去了，忆起往事，总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许多……

撰写人简介：

陈先赋，男，1941 年生，重庆市人，医学史专家、新闻学者。1964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74 年调成都中医学院工作，历任《成都中医学院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报》）主编、《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常任编辑，并任成都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医史文献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成都市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高校校报研究会秘书长、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地方志编委会特聘编辑等社会职务。出版著作有《四川医林人物》《四川名医传》（上集）、《成都中医学院发展简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和新闻作品数百篇。个人事迹录入《中国知名专家学者辞典》等人物辞典。

带着照片上北京

撰写人 / 陈先赋

1978 年 3 月中旬，学校满园春色，仍有三分寒意。紧张建设的教学实验大楼已经封顶，往日塔吊繁忙的工地场面，节奏放慢了许多。基建办的同志们喜中有忧，似有所难。我奉命到基建办报到，张正平处长从办公室走出，与我握手，开门见山着急地说："火烧眉毛啦，大楼外墙'穿衣服'的白水泥，还一点没有搞到，急死人！请示党委后，又把你'借'来了，看有啥子办法。"我懂得，这么大的工程，一旦停工待料，经济损失难以想象。基建办同志们焦急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要解决所需要的大量的白水泥，谈何容易？四川没有白水泥厂，全国只有一个在苏州，几千里之遥，产量也不大，属国家调控产品。搞到，不比炭元还烫手吗？

再困难总得试一试。我向张正平处长、吴俊德科长建议，并半开玩笑地说："'重上井冈山'，还是去一趟江油水泥厂，找找门路吧。"基建办派了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单援助与我同往。老实说，几个月前到江油厂汽车抢运水泥，闹得二郎庙地区沸沸扬扬，给厂里领导惹了不少麻烦，这次厚着脸皮又去，的确不太好意思。当我们向厂长侯宝庭说明来意和详细情况后，他还是一如既往那么热情。侯宝庭想了一会儿，就摸笔给我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原国家建材部部长刘建勋，另封给原建材部水泥局闫力局长。侯宝庭资格老，能力强，办事果断认真，待人热忱，乐于助人，在建材部人缘关系很好，颇有名气。侯宝庭在给闫力同志的信中写道："今有事情，请闫力同志帮忙。成都中医学院十多年来，深入山区，面向基层，对我厂支持很大，为我厂职工

就医解决很多困难。该院在成都市中心修建一座教学大楼，省委领导对这项工程很重视，要求教学大楼修得壮丽美观，需要白水泥用以外墙装饰。因四川不生产白水泥，最好请国家建材部能分配一些，或介绍到苏州白水泥厂去求援，请你和有关领导大力支持帮助解决为盼。今有该院陈先赋等二同志前往，请接洽。”

我们迅速返校复命。基建办领导让我和单援助稍作休息、准备，立刻赴京。

出发前，我们精心准备了两样东西：一是教学实验大楼封顶急待“穿衣服”的大照片，二是买了4瓶每瓶3元钱的四川特产泸州老窖特曲。去北京的卧铺车厢上，单援助不小心打破一瓶，顿时整个车厢芬芳扑鼻，引来好奇的旅客寻看究竟，风趣地说：“好香呵，原来是‘手榴弹’打破了！”

三月北京，风沙漫道。在六铺炕建材部招待所住下后，次日，带着侯宝庭的介绍信，先后去了刘建勋部长和闫力局长家。他们一瓶酒未收下，刘局长还留我和小单在家吃了一顿饭，并给上海建材公司张恒义同志写了一封信。“手榴弹”没起作用，倒是那张带去的照片派上用场，面临停工待料的大楼实景打动了建材部的领导们。闫力局长虽说“这个老侯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仍然给负责调拨的邸立长、杨玉华同志写信：“江油水泥厂侯厂长介绍两位同志来要水泥，同志们来了，我还是介绍给你们，请帮助解决问题。”几天后，国家建材部以沪字第46号调拨单，通知国家建材工业上海管理处，向四川省成都中医学院调拨白水泥50吨。我们迅即电告学校，处长张正平闻罢让我们马上飞沪。我和单援助都是第一次乘飞机，途中出了几回洋相。下机后，直接到上海管理处。管理处正接到建材部通知，接待安排住宿，并于1978年4月1日向苏州白水泥厂（光华水泥厂）下达了产品调拨通知单。苏州光华水泥厂厂长请我们放心住下，尽快安排火车车皮发往成都。

此间空隙，我和单援助自费去无锡一游。千顷太湖，春光明媚，湖波粼粼，白帆点点，渔歌悠扬，飞鸟上下，鸳鸯戏水，美不胜收。我俩站在

湖中小岛高处，极目望去，大湖美景，尽纳眼底。想到艰巨任务，即将完成，情不自禁唱了起来：“太湖美呵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返回苏州白水泥厂，厂长告诉我们，车皮已经落实，即将发运，一周左右可达成都。他用苏州普通话说：“你们的50吨白水泥分量多大呵，什么概念呵！你们重庆长江大桥，是全国重点工程呵，全国重点呵！部里才给拨了30吨呵！你们不简单呵！不简单呵！”一连串的“呵”，让单援助激动起来，本来说话有点结巴的单援助也跟着连连“呵呵”起来：“谢谢你们呵，呵！辛苦你们呵！欢迎到成都来玩呵，我们来接你呵，呵。”按照建材部有关领导的叮嘱，待水泥落实后，回北京报告情况，于是我们重返北京，仍住建材部招待所。几天前存放招待所的几瓶特曲，便送给了招待所的同志。诸事办毕，学校又特许乘机返蓉。从双流机场回到学校大门，正好碰上吴俊德和材料保管员霍伯川，兴奋极了：“白水泥已到东站，派车运去了！”“辛苦了！辛苦了！”

为了奖励我俩的“功劳”，经研究，基建办会计叫我们各买一个人造革出差用挎包，限额3元钱。我和单援助到盐市口、青年路一带跑了一圈，3元钱实在难买一个较实用的皮革包，最后选中一款5元一个的，回到会计处，每人向她报销了3元，余额自掏腰包。两个多月后，教学实验大楼基本竣工，部分开始使用。这座建筑面积17 000平方米的大楼，凝聚了许许多多人的心血，是我国中医高校一颗时代建筑明星。我拍摄的大楼竣工照片，刊登于1978年7月13日《健康报》第4版首条。

感曰：

高楼饰靓装，
行者换新囊。
南辕复北辙，
力量缘爱校。
冉冉光阴逝，
更惜砖与草。

家兴不可败，

三思继业道。



建成后的教学实验大楼

撰写人简介：

陈先赋，男，1941年生，重庆市人，医学史专家、新闻学者。196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74年调成都中医学院工作，历任《成都中医学院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报》）主编、《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常任编辑，并任成都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医史文献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成都市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高校校报研究会秘书长、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地方志编委会特聘编辑等社会职务。出版著作有《四川医林人物》《四川名医传》（上集）、《成都中医学院发展简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和新闻作品数百篇。个人事迹录入《中国知名专家学者辞典》等人物辞典。

听凌老师讲课有感

撰写人 / 曾德昌

早就听说凌一揆教授讲课讲得好，最近在中医进修班听了他讲的几堂课，的确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学识渊博，内容丰富

凌老师讲的是中药学，但并不限于中药学。他广泛涉及了自然科学的多方面，特别是密切联系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融会贯通，深入浅出。

如讲七叶莲，他介绍了此药已载入《中国药典》，被评价为治疗三叉神经痛的特效药。同时强调三叉神经痛多属风、痰、湿为患，如按中医辨证施治，疗效将会更佳。还介绍了他本人用乌辛茶加祛风涤痰的南星、半夏为治的经验。这就使学生时时不忘辨证施治——这一祖国医学的重要内容。

凌老师把“止痛药”列为单独章节来讲授，这是历代本草没有先例而当代学者尚有争论的问题。凌老师从中药学要发展的观点出发，引用了大量事实证明古典医籍中早就有“对症治疗”“特效治疗”的记载(其中包括止痛药)。并从中医理论说明应该“治病求本”但又必须“急则治标”的道理。止痛乃治标，使用止痛药，无损于辨证施治。他还联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加以论证，认为有这么一大批具有“止痛”特效的中药这一事实，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指出“任何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必须新陈代谢，继往开来”。这样一讲，不仅使我们对新添“止痛药”这一章有了认识，且对标与本，继承与发扬等的辩证关系也加深了理解。

凌老师讲单味具体中药时，突出每一生药的特点，抓主要矛盾，密切联系临床实际。如他讲雪胆，就是性寒如雪，味苦如胆，过去认为是清热之品，现

更重视其止痛之功。这样就非常形象、生动。讲延胡索，就突出其强大的镇痛功效，作用类似吗啡，又无吗啡之弊，因而可广泛用于临床各科一切痛症。一般认为是“活血祛瘀”，但对“非瘀血之痛症”也一样有效。同时指出，急腹症诊断不明者慎用。然后，又介绍了中、日两国所用生药品种及性能的差异。讲述了当前从同科属或近缘植物中去寻找代用品或发现新药的成果和情况。这样讲课，有血有肉，毫不枯燥。对药物认识了现状，展望了未来，看到了尚须探讨的新课题，既回味无穷，又发人深思。

观点明确，概念清楚

讲课有明确的观点和独立的见解，这是教师可贵的品质之一。凌老师的讲课，在这方面也是很突出的。

如讲到疼痛的病机是气滞血瘀，同时便指出了历代医书将病因病机混淆不清的严重状况，为“继承、发扬”提供了新课题。又如讲气的概念，除个别具体所指（腹部胀气，肺从外界吸取的清气）外，一般都指脏腑功能。因此就自然生了另一概念：“凡一切有助于改善机体功能的药物都可认为是调气药”。他说研究中药要从方剂入手，就提示了中药学与方剂学的内在联系。他讲止痛药的临床意义，除止痛治标，迅速消除病人痛苦、缓解症状外，还可阻止疼痛而产生的进一步病理生理改变，从而说明了“标本缓急”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止痛”之“特效治疗”的重要临床意义，但又提醒更要辨证施治。他强调辨证而又不拘泥于辨证，认为有的病人在疾病的某一阶段“无证可辨”或“辨证不明”时是不排除对症治疗或特效治疗的。他提出要注意中药复方的重要性，而又反对盲目的大包围。总之，概念明确，观点清楚，个人见解也毫不隐讳。基本上做到了知识过手，当堂吸收。

大胆批判，勇于创新

凌老师的课，具有批判的和创新的精神。

他指出两千多年来对中药未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整理是当前中药学存在的重大问题。“十八反、十九畏”矛盾尤多，必须迅速研究解决。药物归经问题也

要研究。他赞扬将现代植物分类学引用于中药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还指出对生物鉴定不能再依靠“老经验”，而应该使用现代化学分析的科学方法。他认为《黄帝内经》“举痛论”反映了当时较高的水平，但在今天看来就比较肤浅。他对寒性热性药同用为“反佐”以“存其用而去其性”的传统解释，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对丹参软肝机理仅解释为“活血化瘀”也提出了疑问。对医籍所载的雪上一枝蒿“三转半”，既肯定其提示“剧毒”的积极一面，又指出其磨“三转半”不准确的一面，从而主张依靠现代科学方法对其用量定出标准。他从青木香这一马兜铃科的强力止痛药得到启示，勇于实践，收集和研究了四川马兜铃科的植物数十种，从中又发现了不少具有止痛作用的新药。

凌老师在批判性的继承和实践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并将这种思想贯彻在他整个教学过程中，使我们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如果把前代医家的理论和经验当作顶峰，那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境地，就会束缚我们的手足。凌老师那种既要清除民族虚无主义，又要克服复古主义倾向的正确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我也认识到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使中医药学适应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已刻不容缓，须尽快提到了议事日程和教学活动中来。

本文摘自《成都中医学院院刊》（第 56 期四版，1979 年 5 月 7 日）。

撰写人简介：

曾德昌，男，20 世纪 70 年代从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毕业分配到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职于西医外科，1978—1979 年参加学校中医理论提高班学习。后侨居海外。

忆陈达夫教授

撰写人 / 文琢之

达老（陈达夫）与我是同庚且又共事 20 多年，朝夕相处了解甚深。他为人襟怀坦白，言直行一，常言："与其背后道人长短，不如多看书报；与其对人钩心斗角，不如深究业务。"因此我乐与其交游，感情甚洽。

他身材中等、略消瘦，而精神矍铄，冉冉银须，稀白秃发，身着简洁，态度和蔼，谈吐清晰，温文尔雅，而又无迂腐气味，并且妙趣横生，往往使人破涕为笑。记得我们两人多在空闲之时去郊县风景区清静场所，借以把临床经验回忆记录下来。达老《眼科六经法要》一书，着力多在此时，我的《经验集》，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初稿的。

达老学识渊博，虽专攻眼科，而对《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籍无不熟悉，内、外、妇、儿科无不通晓，此非少年下苦功夫而安得如此地步！他疗目以内经为主，也施以"金针拨障"的独特手法，同时采用西医的消毒、麻醉等法，以供长补短，提高疗效。他医术高明，辨证明确，而且处处为病员着想，凡慢性眼疾，都处以长服方，并嘱病人有变化时可直函询问，故每日复信不绝，其医德深受群众赞誉。他又乐于传授经验，喜讲诊断用药要点和立法选方精义，所以随诊学生多有长进。

达老待人真诚，我中风瘫痪在床时，他每日给我诊治并多云安慰。后有月余达老突然不来，多方询问，方知他担任"全国眼科学习班"主教，十分忙碌，无法抽身。之后，我瘫痪之躯站了起来，重返工作岗位，我和达老又喜相见了！晚年之日，达老精神更加焕发，誓为"四化"做贡献。他赴京出席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归来后又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尔

后荣任教授，著书立说，大施其才，以报答党和人民，后来不幸罹患肺癌，医治无效，终于1979年3月30日离开人间。我为失去良师益友，悲痛不已。达老热爱党和人民，对医术精益求精，对工作热情负责，关心中西医结合，为中医事业做出了贡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本文摘自《成都中医学院院刊》（1979年7月10日，第59期二版，略作编辑）。

撰写人简介：

文琢之(1911—1991)，男，著名外科专家，四川省射洪县人。幼时从师四川名医释灵溪大师，继承了大师治疗内外科病症和杂证经验，以及各种膏丹丸散的制作技术。1925年，在成都开业行医，1957年调入成都中医学院任教，1963年调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从事外科临床工作。

忆恩师陈潮祖

撰写人/宋　兴

从平凡中走来——陈老的求学之路

恩师陈潮祖出生于偏僻的农村（1929年2月12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李场镇），自幼天资聪慧，18岁时毕业于宜宾师范学校，后因其母宿疾久困，常延误诊治，长期耳濡目染，渐至心有所向，情有独钟，遂矢志岐黄，济世救人！师从同里孙芳庭习医，孙氏以精研《伤寒论》《金匮要略》，医术精良，享誉一方，陈潮祖正是以此为起点，步入中医学术殿堂的。学成，悬壶桑梓，声誉鹊起。

1957年陈潮祖考入成都中医学院师资班学习，得伤寒专家邓绍先、杂病专家彭履祥、温病专家宋鹭冰、妇科专家卓雨农、眼科专家陈达夫、脾胃专家冉品珍等蜀中名医悉心教诲，学术长足进步。1958年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结业，并留校从事中医教学、临床、科研工作。

在平凡中伟大——陈老的临床及教学成就

陈老曾治疗一例喉癌患者，其咽喉疼痛3月余。水米难下，语声低微，形体微胖，面色黄白，脉沉细数。基层医院诊断为喉癌，市医院诊断怀疑喉癌。陈老指示：中医的价值在于辨证论治四字，辨证方向和方药考究要准确，患者前期误治，大量运用银翘马勃散之类寒凉的方剂，加上长期大量使用抗生素，使寒湿郁闭日久，实则为少阴病，予以半夏散及汤加减，桂枝、法半夏、炙甘草等分等量，一天一剂，3日后复诊，患者声音恢复，症状改善。陈老治疗喉癌的医案，基于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中医理论，运用独到的辨证思维，以及对疾

病全程的认识，少药轻剂的遣方，疗效显著。

教学上，他提携后世、爱才惜才、谦逊好学；出版多本著作，晚年仍坚持撰写；对待后生，胸怀博大；授课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学术渊博，讲授医方时，凡方出之源，方理分析，成方加减，无不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之理予以深刻阐发，特别强调据证析理，据理立法，依法组方，随证选药，灵活化裁，并以先贤见解，名家医案，以及自己的心得体会为例证，内容充实生动，从松花江畔讲到宝岛台湾，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效应，永远给人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美好清新感受。他识见高远，讲授方剂学，自始至终，特别强调中医必须立定辨证论治脚跟，抓住脏腑病机这个纲，去求法，求方，求化裁，才能举一纲而万目张，处疑临怪，应变无穷。

我与恩师的故事——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陈老在家乡的小镇上办了一个培训班，培训家乡的基层医生，没有一分报酬，他自发组织的，师资就是我们这批参加毕业实习的学生，给了我们一个锻炼自己的很好的机会，上完课后找我谈话：留在学校工作怎么样？我当时是拒绝的，陈老就反复做我的工作，我们在这儿待了半年，他就做了我半年的工作。每天一吃完饭，只要天不下雨就来约我，我们就一路出去谈天说地，几乎每天都要谈到这个话题，他就引导我到学校里来参加中医教育工作，后来终于把我说动了，但是毕业时分配政策为老少边穷（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区，穷困地区）这些地区学生原则上应回原地工作。我是川北来的，曾经是红军路过的地方，所以既属于穷困地区又属于革命老区，我响应国家政策回革命老区工作，和我原来的那个追求正好吻合，我内心里面欣喜若狂，我想当走村串户的民间医生。陈老听说我走了以后，赶忙找有关部门说：“这个人档案不能放回去，要想办法把他抓回来！”于是学校派两个人带着两封信来南充准备把我带回去，但南充这边又不放人，学校又在陈老的坚持下去跑省里，最后省里给南充地区发了一封电报：请将宋兴同学转让成都中医学院做师资使用，于是我才回到了学校。特作诗缅怀恩师：

品高德重，术高学重，趣高情重。

勤勤恳恳的一生，平平淡淡的一生；

勤勤恳恳是大美，平平淡淡是至真。

岁次巳巳，生于叙府，李场陈门，诗礼涌泳，博物通经；

精究岐黄，济世救人，著作等身，桃李天下，惠泽众生。

不阿贵，正气凛然，特立独行；

不畏权，是非分明，铁骨铮铮；

不慕富，广施仁术，清贫一生；

不抑才，不遗余力，举贤荐能；

不忘本，无偿办学，桑梓情深。

一身傲骨，两袖清风，唯有桃李满天下，

百年人生，千古文章，留得著作遍宇内。

撰写人简介：

宋兴，男，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各家学说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多项厅局级课题，荣获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优秀奖、四川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长期深入研究伤寒、温补等不同学派著名医家的学术见解和诊疗心法，擅长运用健脾补肾、宣肺化痰、活血通络等法，治疗心肺系统、肝脾系统及癌症术后、放化疗后继发症等多种病症。多次赴日本中国传统医学会、成都中医药大学葡萄牙宝德分校、香港中文大学、台湾长庚大学等多家学术机构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学术交流等工作。

冉品珍医事小传：人参败毒散加减治疗顽固性水泻

撰写人／陈丽平

我校各家学说博士生导师宋兴教授在课堂上曾向学生讲述了冉品珍老先生为他诊治的往事：

宋兴老师童年吃过很多树皮草根，后来肠胃就一直不好，很容易腹泻。上大学时，曾找过当时成都中医学院的不少名家诊治，都没有收到良好效果。唯独没找冉老看过，因为冉老一年四季板着面孔，神情冷峻，让人望而生畏，不敢轻易去打扰他。他在附院的号又特别难挂，得半夜去排队。

宋老师有一次又因旧病复发，腹泻一天二十多次，百药无效，只好住院治疗。经 2 周输液治疗，每天仍腹泻十来次。

那时宋老师也在内科工作，上门诊时诊断室和冉老门对门，住院部主任是两位老妈妈，对科里的同事，无论长幼，都特别友好。她们都建议宋老师去找冉老看看。还给他出主意，叫他穿着工作服去找冉老。

宋老师遵照主任指点，穿着白大褂，一直坐在对门的诊断室里等着，眼瞅着冉老的病人看完了，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求见冉老。进诊室后，恭恭敬敬站在冉老诊断桌旁，嗫嗫嚅嚅地叫了声：“老师好！”

冉老正在那儿卷旱烟，听到招呼，他一声不吭，依旧卷他的旱烟。过了好一阵子，才眼皮都不抬地冷冰冰问了一句：“啥事嘛！”宋老师说：“想麻烦老师帮我看看病。”

冉老又不吭声了，还是认认真真卷他的旱烟。卷完一支再卷一支，等到旱烟卷得差不多了，他才把烟往桌上重重地一放，没好气地说：“学了医自己都看不了自己的病，学医还有什么价值嘛！”宋老师只能在一边战战兢兢地听

着，接着他又把旱烟杆一敲说："坐嘛！"然后给把了把脉，看了看舌苔，把处方扔过来说："写嘛！人参败毒散去人参加藿香。"

宋老师说，他写完处方后心都凉了半截，心想：自己的病都十多年了，又不是近期感冒风寒造成的，吃辛温解表药干啥？再说，从进中医学院学习中医以来，从补中益气汤到理中汤、砂半理中汤、丁萸理中汤、附子理中汤、乌梅丸，其他老师都用过了，全无效果。一个与脾胃病毫不相干的解表方，会有什么效果？心里非常失望。

宋老师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到病房后，两位主任老妈妈来拿方准备去给住院部药房帮他煎药，宋老师说这方治不了自己的病，吃了也白吃，不愿意吃这药。两位主任说："不能这样看啰！冉老的方就是非常轻描淡写，很多人吃了疗效都特别好，一定要试一试！"

药煎好后，当晚在两位主任的监督下喝了一次，腹泻就完全好了。宋老师说，他当时真被惊呆了！这么轻描淡写的药，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后来宋老师听说冉老一家五口都死于大饥荒，就剩下冉老孑然一身，才知道冉老内心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宋老师就经常去冉老那儿给他卷旱烟，陪他聊天，师生感情自然也就越来越亲密。

后来宋老师请教冉老："以辛温解表药为主的人参败毒散是不是治疗久泻不止的妙方？"

冉老纠正说："哪有这种说法哟！哪有什么通治一切腹泻的妙方哦！治病要分性质，分层次嘛！人参败毒散只治它应该治的那种腹泻哈！不能当作万应灵丹到处乱用哈！"

宋老师问冉老："我腹泻那么多年了，怎么会还停留在一个表浅层次呢？"

冉老回答说："那是因为你年轻呀！所以才久在一经不移嘛！"

宋老师问冉老："那诊断依据又是什么呢？"

冉老回答说："舌苔薄白呀！有一分白苔便有一分表寒嘛！"

宋老师问冉老："为什么附子理中、乌梅丸既固守元气，又邪正兼顾，却没有效果呢？"

冉老回答说："还是刚才讲的那个原因嘛！不同方药结构不同，作用方式和作用的浅深层次不同，治证也不相同嘛！理中、乌梅都药过病所了嘛！所以没有效果呀！"

宋老师后来说，冉老的解说简单明了，让他有如醍醐灌顶，当时就被深深震撼了。

宋老师至今还时常称颂冉老"身怀绝技，是真正一流的医林高手啊"，也时常感叹冉老命运坎坷，人生不幸。

人物小传

冉品珍教授（1913—1987），四川遂宁人，早年师事蜀中名医徐立三先生，习医八年，颇得其真传。后悬壶乡里，不仅医技精湛，而且为人坦荡，医德高尚，求医者络绎不绝，名噪遐迩。他曾担任遂宁平民优待征属送征所所长、遂宁中医师公会理事长。

1956年，成都中医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前身）创办之初，由于其医术和学术盛名远播，被选拔到成都中医学院任教，1982年晋升为教授。从事黄帝内经、伤寒、金匮要略、中医内科学等教学和临床工作50余年，著有《内科临证辨治录》（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内科55讲》（成都中医学院）及《中医内科手册》等专著，参与编写《中医内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73），又编有《内科临床实习参考方药资料》《内科讲稿》《脾胃病讲稿》等教学参考资料和讲稿。

撰写人简介：

陈丽平，女，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医各家学说（明清医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研究）。承担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中心项目1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子课题1项。作为主编出版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参编教材和各类专著20余部。获四川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我的恩师

——“药王菩萨”徐楚江教授

讲述人 / 胡昌江

徐楚江教授是著名中药炮制学家，中药炮制学科创建人之一，全国首批名老中医专家。徐老不仅在中药、炮制、鉴定、制剂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有“药王菩萨”之美誉，在遣方用药方面亦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是当时医药结合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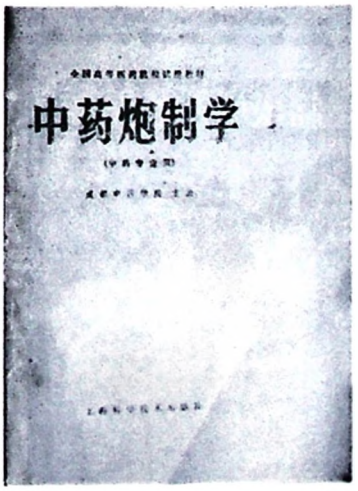
1959 年成都中医学院中药学专业成立，即聘请徐楚江、冯相贤、欧建忠等作为中药炮制学教师，参与传统中药炮制技术授课和实验教学。那时教学大纲、实验教材以及试卷为铅印，但有很大部分是手刻，称为“刻钢板”，现在很少见到了。我刚分到教研室时，比较年轻，精力充沛，对“刻钢板”的工作有“舍我其谁”的感觉，刻钢板其实就是上面一张“蜡纸”，下面一块专用于刻字的“钢板”，用一支专用刻钢板的笔在蜡纸上书写。尽管简单，但还是很讲技巧的，刻重了，印几十张就坏了，刻轻了就印不明显。推印时的轻重缓急，也跟印刷质量密切相关。那时，教研室每周二下午有教研活动，周六下午有组织生活，教研活动专门讨论教学活动中的疑点难点，教学实验的设计和安排，学生对教学的反映，讨论的内容都要做记录的。此外，对试卷的知识考点都要作认真分析，对学生的答卷也要认真分析，明确教师在授课时概念讲授不清楚，以便下个年级改正。

1979 年，由卫生部组织有关医药院校编写全国首部《中药炮制学》统编教材。成都中医学院作为主编单位，参与编写的还有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学院（现江西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

药大学）、南京中医学院（现南京中医药大学）、湖北中医学院（现湖北中医药大学），所有编写人员均未署名。1984 年，由卫生部组织中医教材编委会炮制学教材编写组在一版教材基础上编写的第二版教材，供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药专业用。第二版教材充实、提高了一版教材的内容，为中药教育中炮制学教材的奠基之作。本书由我校徐楚江教授主编，叶定江教授、傅宝庆教授、许志明教授、王爱芳教授参加编写。

我作为青年教师有幸担任教材编写秘书，亲眼看见了老一辈炮制学家的风采，以及他们做人、做学问一丝不苟的精神。那时教材编写是非常严肃的事，教育部和学校各部门均非常重视。30 年过去了，经历的事情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时主编 1 人、副主编 1 人、编委 3 人是基本固定的，都是全学科的顶级人物。那时电脑尚不普及，完全靠手写，写好后将每个字工整地手写入稿笺纸上，在编排时一个字丁一个字丁地拣来卡在一行行的格子内，从而印成书。我曾到排字房内参观，成千上万个字丁堆满房间，靠排字工人逐字逐字地排版，可想而知出版一本书何其艰难，没有一年半载是出不了书的，非常费工费时。不像现在有电脑，交稿时就交电子版，这也是科学进步的一种表现。当时每出版一本统稿教材，由主编单位办一学期的师资班，并开设与炮制相关的基础课程，均是请学校的知名教师进行讲授。我记得成都炮制师资班教师，有《中药学》的凌一揆、《方剂学》的陈潮祖、《医古文》的郑孝昌、《中药化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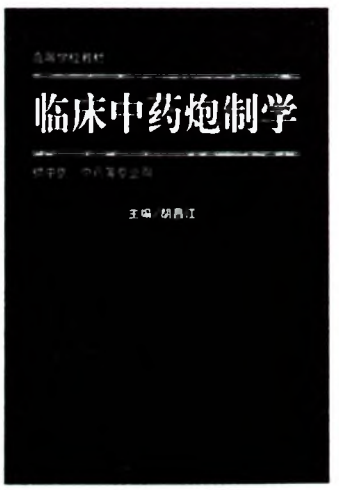
徐楚江教授及其主编的《中药炮制学》一、二版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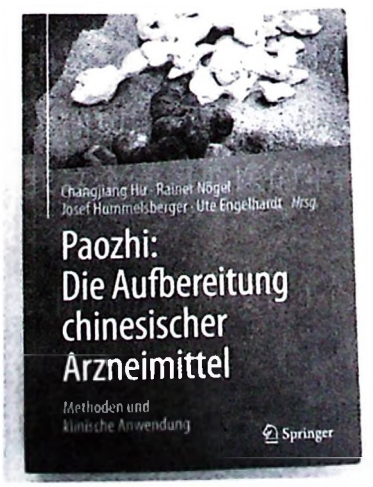
肖崇厚、《中药炮制学》的徐楚江等教师，这批老师的讲授，大大展示了我院教师风采和师资力量。

1991年，我有幸被遴选为徐楚江教授学术继承人。当时在中药炮制方面，四川仅徐老一人。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我的知识架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走上医药结合之路，所以十分感激恩师徐楚江教授。在跟师期间，除了每周两次跟师应诊之外，周二下午徐老在家中给我传授医药知识，使我学业更加精进。那时老师年近古稀，在无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周二讲授，纯粹是出于一份崇高的事业心和责任心。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崇高精神一直鼓励着我、鞭策着我、激励着我，是我坚守在中药炮制和临床岗位的力量源泉和动力，如有任何懈怠，就对不起徐老的精心传授。尤其是炮制工艺比较传统，当时条件很简陋，炮制加工这些活又“脏”又累，行业也不景气，因此教研室来了几个年轻教师，唯我坚持了下来。那一定是老师的精神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徐老师对我的学术传承使我终身受益，他高风亮节的人品、渊博的学识、诲人不倦的精神，是课堂和书本上学不到的。

1992年，在恩师徐楚江指导下，依据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灵活用药的需求，撰写了《中药炮制与临床运用》，重点阐释了常用中药炮制前后不同功效和临床运用，奠定了《临床中药炮制学》教材编写体例，架起了沟通中药与中医临床的桥梁。同时，本人也主编《中药炮制学》教材，供全国高等医药院校







胡昌江教授撰写的相关专著

使用，为全国中药炮制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

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不忘师恩，不辱师恩，出师后我将老师的精神和思想带到了教学和科研中，不敢有丝毫懈怠。坚持中医临床疗效是中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医的生命所在。中药炮制作为中医临证用药的一大特色，是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手段。同时，我不断总结川派中药炮制技术，将其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学科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本文由胡昌江口述，陈志敏整理。

讲述人简介：

胡昌江，男，1952年11月生，中共党员，成都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中药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首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徐楚江教授学术经验继承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国家标准化项目等各级课题20余项，主编教材和专著7部，参编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主持研究的30个品种纳入国家《中药配方颗粒品种试点统一标准》，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等各类奖项10余项，获发明专利30余项。

首批中医眼科研究生的杏林之路

讲述人 / 张济南

距离毕业，满打满算已经有 42 年了，我对中医的热爱历久弥新。老先生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言犹在耳。从医的这大半辈子，深一脚浅一脚，我书写了它们，它们也书写了我。

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

早年从西医医学院校毕业后，我于 1971 年参加了四川省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之后还在中医附属医院进修了一年。工作几年以后，四川省在 1977 年又举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理论提高班，我再次参加学习且收获颇丰。就这样，我这个西医出身的人与中医结了缘。参加工作后，我便将所学到的中医知识应用到了临床和教学工作中。

1978 年以前，我在阿坝州卫校工作。由于当时人才缺乏、师资力量不足，我那时 30 来岁，精力充沛，便主动担任了两项教学工作，即一边开设中医课，一边从事西医课程的教学工作。长期教学的过程中，我对中医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看到了中医在治未病和辨证施治上有许多有别于西医的特色，尤其是中医的整体观念——这是中医的精华。

1977 年，我得知，成都中医学院即将招收首批中医学研究生。当时我学习中医已经将近 10 年了，对中医兴趣正浓。得知有机会深造中医学，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复。一经单位批准，我便迅速地投入了紧张的备考中。记得当年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和专业考试（眼科专业和中医综合）。面对这么庞大的备考任务，当时的我一边工作一边备考。所幸我长期的教学工作里包含了中医学

的内容，这为我省去了大量的备考任务。那时的每一天不是执教于讲台，便是伏案于桌前，废寝忘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统考结束，总共 17 名学生获得攻读成都中医学院硕士学位的机会，我则是其中一员。收到录取通知的时候，那种高兴劲儿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家人也替我高兴，即使生活再艰苦也支持我进一步地深造。

报到那天，本科只有两个年级，即 1977 级和 1978 级。研究生是由被录取的 17 人组成的 1978 级，人数不多。当时接待我们的人充满热情，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表述的。那天，郝计有书记、常耀五院长、侯占元副院长来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我们是第一届研究生，他们对我们寄予厚望的同时也要求严格，我们深切地明白，定要潜心学习、修炼本领，万万不能辜负了各位领导和老师对我们的期待和支持。

济世无捷径，南山需躬行

当时的住宿条件不算好，本科生就住在现在的学生二宿舍（十二桥校区）。我们研究生是四人间，上下床，我就住在楼下最靠左手边的那间。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吃饭在食堂，根本没有开小灶的条件。虽然我们住的地方比较简陋，生活各方面的条件较差，但我们有着其他更“豪华”的配置，那就是我们的老师。



张济南老师接受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

承担教学任务的老师们德高望重，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眼科专业是陈达夫教授，中药学专业是凌一揆教授，中药化学专业是肖崇厚，中医内科专业是冉品珍教授、傅灿冰教授，金匮要略专业是彭履祥教授，中医基础专业是李克光教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深知学好知识才是主要任务，万万不能本末倒置。我们没有抱怨生活条件的不足，心中的自豪与喜悦却常常不露自显。

研究生班是各个专业汇聚在一起的17个人，学制2年。第一学年是夯实基础、筑牢根基。开设的课程有中医基础、医古文、四大名著选读等。学校十分重视打牢我们基础知识的根基，只有根扎得够深才能从中医药的广袤土壤里汲取养分，只有根扎得够牢才能咬定青山不放松，困境中也能有一分“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从容。第二学年是跟师学艺、精进本领。我们17个人进入到各自专业的一线：中药学专业进实验室，内科学专业进内科诊室，我们眼科4位同学就随着陈达夫老师进入眼科病房。我们随身带着一本视为珍宝的笔记本和一支笔，跟随老师查房、上门诊。每遇典型病例便眼前一亮，赶紧做好笔记；若是病情复杂尚有疑问也记录下来，等候没有病人时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中医药知识偏于抽象，但它来源于临床的背景也决定了它理应回归到临床。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坚持以临床印证理论、以临床促进理论成了我们的共识。



首届研究生班毕业合影（最后一排右四为张济南老师）

闲暇之余，也是为自己在专业上添砖加瓦的好机会。细读中医经典，从凝练的语句中窥探古人的智慧；及时回顾，总有温故知新的别样收获；泡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收割文明；收集临床案例，学习如何在变化多端的临床实际中游刃有余…… 我的导师陈达夫常常强调：眼科不光是要学好眼科的本领，还要加强内科和其他基础的学习。中医一向推崇整体观念，讲求辨证施治，因此不能把眼和全身分割开来，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于是，空闲时间里，我们眼科的同学也常与内科及其他专业的同窗交流学习。紧凑的空闲时间让我的收获也满满当当。

临床科研齐头并进

当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具体专业要求是：必须在本门学科内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既能从事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教学工作，又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还应具有解决一般医疗工作的能力。学校注重培养我们的综合能力，讲求各项能力齐头并进。

跟随陈老上临床，是我成长最快的时期。陈老提出了关于眼底的“玄府学说”，创造性地将内眼疾病与脏腑相关联，这是一项创举。他常常在临床上以具体病例为我们讲解较为抽象的理论。例如，我们治疗黄斑病，首先考虑脾病；对出血性疾病，从心考虑；对于黑色素疾病，从肾考虑。陈老从不排斥西医的检查，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医界是较少的。他常常向我们强调，看病不能只靠肉眼的观测，尤其在内眼疾病的治疗方面，更加要重视仪器检查的辅助作用。在四诊合参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仪器诊断结果，再综合性地用药。从我们临床的长期观察来看，依据陈老的理论再结合中医治疗后，病情预后较好、反复性也小。那时，毕业需要写毕业论文。我们的论文都是从自己的临床实践、治疗的病人当中收集起来的，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很实用，耗时也较长，我记得我的论文当时还被评为了优秀论文。

在我成为老师后，对研究生的培养仍旧贯彻我们以前的方法：教学、科研、临床要齐头并进。这么多年过去了，课本更新了一版又一版，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教学细则也在不断修改，可万变不离其宗。我曾经任临床教研室的主任，

科研方面主要培养学生进行眼底出血疾病的研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我们团队对视神经萎缩的研究也获得了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这也是我们眼科老一辈专家悉心指导和辛勤教育的结果。

做临床，就是要能看病、会看病、看好病。不论是搞理论还是做科研，都是以临床为基础。临床中的千变万化，需要靠平时的积累，积累越多、见识越广，应付这些复杂多变的情况才能左右逢源，如庖丁解牛。

中医药拿出特殊的方法

在学校的悉心栽培下，我于1981年顺利毕业。在陈老孜孜不倦的教诲下，中医眼科巨大的魅力让我心向往之，我并以此为主攻方向，在毕业后继续探索着更深的奥秘。忆往事，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研究生时光单纯又可爱。杏林春暖，我把中医眼科烙进了我的生命，至今我这个杏林的守园人坚守岗位已有50余年。治疗方面，也有了一些浅薄的经验与大家分享：

中医眼科与西医眼科有许多不同之处，双方各有千秋，要想让更多患者重获光明，需要各自发挥优势，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西医在诊断方面相对



与学生合影（第三排右数第五位为张济南老师）

较强，能借助精密的医疗仪器锁定病变部位，手术方面也更加精细一些。我们中医经过长期实践与经验总结，在眼底出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近视弱视等病种上找到了突破口，主动地承担起让更多患者重获光明的责任。

例如，针对小孩的弱视，这种先天性的弱视临床上多见，一般是由于眼球的发育缺陷造成的，眼睛的视力就恢复不好，无论佩戴什么眼镜，他的视力都无法恢复到 5.0。器质性的缺陷使先天性弱视恢复起来更加困难。弱视治疗的黄金年龄在 4~7 岁，正值儿童发育期，及时地进行中医干预能有效地提高裸眼视力、恢复正常眼功能。另外在近视的治疗上，对于西医来讲，通常是佩戴眼镜或做手术。一般近视牵扯到用眼卫生、用眼科学，通过中医治疗，让眼睛肌肉调节的功能增强，眼球的眼轴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状态。经过中医治疗，基本上可以将 16 岁以内的青少年近视治愈。我们有许多成功案例，部分度数高达 500、700，甚至 1 000 度的患者，最后甚至恢复到了 5.0 的裸眼视力。这些案例都证明，只要辨证准确、坚持治疗，患者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恢复视力、摆脱眼镜。这就是中医主动作为的结果，用今年流行的话来讲，这就是我们的拓荒牛精神。中医在治疗这类疾病方面独具特色。我们国医馆权可富老师在全国中医药院校进行调研考察后，发现我们学校对弱视和近视的治疗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除了眼科，在血小板疾病方面，中医也有它的长处。我曾经遇到血小板为零的病人，我用中医的方法为他治疗，五六年过去了，那位患者至今都安然无恙。

我从事中医几十年，确实是感到越学越深奥，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中医经典是中医药文化的滥觞。所以我常说古人的东西不能丢，四大经典要多钻研，里面有很多的宝藏等着我们去发掘。举个典型的例子——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她成果的灵感来源是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肘后备急方》的原文用法是“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肘后备急方》，顾名思义是古人揣在肘后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方书，最大的

特点是简、便、效、廉。这就决定了应急使用的青蒿不会靠高温加热等复杂加工以发挥疗效。屠呦呦得到这一启示便改用乙醚降低了提取温度，此举使得提取物对于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便是经典带给我们的灵光乍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现在，国家正大力扶植中医药事业，中医学子真是要踏踏实实地学好自己的本事。要相信，业精于勤，只要我们主动作为，中医药定会有所作为。

本文由张济南口述，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整理。
采访时间：2021年3月25日
采访地点：十二桥校区离退休办公室
文字整理：杨雨婷　陈治佑
摄　　影：罗掬月

讲述人简介：

张济南，男，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名医，著名眼科专家。早年毕业于现西南医科大学，先后两次参加四川省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1978年考取成都中医学院首批研究生，师从全国著名眼科专家陈达夫教授，学业优秀，眼科医学理论造诣较深，从事眼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50余年。曾参与全国中医眼科学教材《中医眼科学》（第五版）的编写工作，曾获得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善治眼底出血、黄斑病变、青少年近视、儿童弱视等，现仍工作在临床第一线。

四十年磨一剑

——记中医养生学科开创之路

撰写人 / 马烈光

中医养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一直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直到近几十年，随着中医学分科越来越细，社会对养生健康的呼声日渐高涨，中医养生学才渐趋独立发展，最终建立了中医养生学五年制本科专业，成为中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

我于1977年毕业留校任教，穷40年岁月，立足《黄帝内经》研究养生，有幸为中医养生学科与专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回顾我的中医养生研究历程和中医养生学科与专业建设的开创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研究积累期、学科确立期、专业成型期。其中充满了偶然与必然，机遇与挫折，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同时也应验了我常说的那句话“天公不负厚道，付出总有回报”。

研究积累期

其实早在幼年时期，我由于出生于青城仙山坐落的灌县（现为都江堰市），故“弱龄慕道，素好养生”，后来拜当地名医方玉祥先生为师，侍诊时即已有针药不能尽治百病之感，在老师的指点下，对养生产生了浓厚兴趣。1969年参加医疗卫生工作后，参与临床工作，对养生之作用尤多感慨。及至1977年于成都中医学院毕业留校，从事医、教、研工作后，则正式拉开了养生研究事业之大幕。

心路故事 1

1977 年大学毕业之时，恩师李克光曾劝我道：“烈光啊，你就留在内经教研室当‘念经的和尚’吧。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枯燥，但我相信，以后你会感谢我的！”后来，内经教研室主任郭仲夫老师也肯定了我的选择，于是我承两位恩师指点，留在了内经教研室。《黄帝内经》“高古渊微”，全国各大中医高校当时《黄帝内经》名家如云，各具特色，那我的《黄帝内经》研究应该选择何方？此时恩师郭仲夫教授又指导我说：“你干脆另辟蹊径，研究养生吧！《黄帝内经》是‘奉生之始’，研究养生是对了的！”我不禁恍然大悟，《黄帝内经》那么多养生名篇，甚至第一篇《上古天真论》、第二篇《四气调神大论》就是养生专篇，说明了养生于中医的重要性，然而中医养生学在当时却是冷门，少有中医学者专门研究，这是多么广阔的学术天地啊！从此，我就“咬定青山不放松”，矢志不渝地踏上了养生研究之路，并为之坚持至今。两位恩师的指点为我打开门户，而且我的养生研究还受到了李斯炽教授的深刻影响。当时我在大中基教研室担任生活秘书，经常去李克光副主任家中送教研室分的生活福利，常能见到李斯炽老前辈。记得那时李老已 80 余岁高龄，喜欢在自家院中独坐，“一把藤椅伴日光，几句黄庭对夕阳”，悠闲得很。看李老兴致很高，我窃思正好趁机会向李老请教学术。李老当时喜欢给我讲《黄帝内经》的《上古天真论》，而且专门讲其中的“养生五大法则”。与课堂上听讲的感受不同，李老的讲解非常深入，旁征博引，细致入微，大大开拓了我的养生视野，加深了我对养生的理解，对我一生的研究影响很大，乃至影响了我后来在学术交流会议上的演讲风格，故此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在《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发表，题为“聆听李老论养生”。现在我也已逾古稀之年，对李老当时的心态颇有体会，真如辛弃疾所言“万事云烟忽过，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这就是中医的传承，所以我曾感叹“学无师不得高明，术无承不得传薪”啊！

此后我一直在内经教研室默默研究养生，积累学术底蕴。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少数中医高校探索开设中医养生康复学选修课程，成都中医学院的中医养生康复学课程由郭子光老师和我共同向学校教务处成功申报，郭老师

负责主讲中医康复部分，我负责主讲中医养生，从此开启了养生教学历程。但学科一直未受重视，发展得较为缓慢。“着意寻不见，有时还自来”，转折发生在21世纪初。当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在护理专业范围内，编写一本《养生康复学》规划教材，这个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最终，《养生康复学》于2005年8月出版并在当年护理专业新生中使用。这本教材汇聚了我几十年辛勤耕耘的成果，是我国养生领域第一部正式本科教材（之前均为试用教材）。该教材在2006年还被教育部评选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从此，我在校内外声名渐起，先后又主编出版了《中医养生保健学》《汉英双语·中医养生学》等国家级规划教材。

心路故事2

古人言“世间多少不平事，多在机缘遇合中”，俗语也说“机遇不光顾没有准备的大脑”，2003年时，我研究养生已整整26年，已年逾半百，谁知道机遇就这么悄然地到来，现在想来记忆犹新。那年初春的某一日，我到四川省针灸学校取资料，突然想到很久没有见过陈中熊、李继福老师，便顺道上楼拜望。李老师与我几句寒暄后，突然说：“马老师啊，我记得你是搞养生的吧？我这里正好有个棘手的事，你来得真是太巧了，我正准备近日亲自登门找你呢。”我就问是什么事。李老师说：“中医药出版社有本‘十一五’《养生康复学》的教材喊我去当主编，但我又不是搞养生的，干脆我推荐你去当主编吧，这个主编你当最合适。”陈中熊老师也在旁边极力劝我。我说：“李老师啊，人家是让你当主编，中医药出版社又不认识我，我当不合适。更何况我又没申报，也没得到通知，临时换主编，对方肯定不同意呀！”李老师做事很干脆，对我说：“你说得也对。别忙，我打电话问问。”说完就拿起电话拨给教材办公室主任，并开门见山地说：“我不是搞养生的，当不了这个主编。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我们学校的马烈光老师，他研究养生几十年了，我认为他一定能胜任主编工作，请你们慎重考虑。”临阵换帅，对方一开始是极为不情愿的，后来拗不过李老师，也就妥协了，对李老师说：“既然这样，那我们也尊重您的意见。但是要换主编，还必须履行手续和流程，我们也要上报有关部门审批。就请那位

老师最近几天把申请表填好，盖章以后马上传真过来。”就这样，中医界第一本养生类本科教材《养生康复学》的主编重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落在我的身上。第一本养生类本科教材、人生第一次主编教材、第一次向外界展示成中医的养生学术风貌，几个第一次集合在一起，令我感到压力很大，编写过程真可谓“夙兴夜寐、焚膏继晷、稿凡屡易”。这个过程太艰辛了，以至于这12个字在我其后编写的8部中医养生类规划教材前言中反复出现，也算是对这本教材的一种纪念和追忆。

学科确立期

我曾反复思考，中医养生学科确立的标志是什么？经过反复比较，我认为应当是“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中医养生学》的成编。

2011年，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责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启动了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简称“十二五”行业规划教材）编写工作，我再次被遴选为《养生康复学》主编。这本教材经过我的呼吁，名字最终更改为《中医养生学》。这是中医养生学这门学科中第一次出现的国家规划教材，充分彰显了学科的独立，在中医养生学的现代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后，我又主编了“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中医养生学》《中医养生学导论》及供研究生使用的国家卫计委“十三五”行业规划教材《中医养生保健研究》，由此进一步巩固了中医养生学的学科地位。在此过程中，我在中医养生界的声名积累日渐深厚，因而在“十四五”周期内，再一次被确定为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养生学》的主编，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回首这些年主编教材的经历，颇有“不待扬鞭自奋蹄”之感！

心路故事3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设置中医养生康复学选修课时，我就对中医养生学和中医康复学的分离颇有想法。后来主编《养生康复学》的时候因为是临危受命，尚不能自鸣。但是到了2011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上升，整个社会已经掀起养生热潮。而中医养生和中医康复仍然因循守旧地强扭在一起，严重滞后于大众的健康需求和学科的发展大趋势，

恰逢我又被选定为教材主编，于是我自感必须要站出来为学科说几句了。那是在北京召开的主编会议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领导都在场，轮到我发言时，我大声疾呼："各位领导，各位同道，今天，老朽我有几句话不吐不快。我研究养生30多年，现在人们健康养生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我们却还在用《养生康复学》作为教材名，我认为这是极为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养生与康复，一个重在健康人群，一个重在残障患者，虽然应用方法技术上有些相似之处，实际上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十一五'甚至更早的时候，发展形势不允许，两个学科合在一起尚能说得过去，然而在现今的新形势下，为什么还要将两个学科强行捏合在一起呢？这不符合学科的发展规律！更何况，从整个中医学角度来看，养生是中医学的特色，应当是中医学的基础学科之一，《黄帝内经》首篇《上古天真论》就是在专讲养生，甚至列为'圣人'之学。所以我向在座各位领导和同道强烈建议，将我负责的这本教材改名为《中医养生学》，希望能给予支持！"令人感动的是，我的发言得到了其他主编的一致认可，纷纷发声支持，一些老前辈也表示了赞同。与会领导对我的意见也很重视，直接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下达指示："马教授说得好啊！中医养生和中医康复怎么能一样呢？你们下来一定要配合马老编好《中医养生学》这本教材。"就这样，大事成矣，教材由此更名！"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中医养生学》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养生学的独立在中医范畴内得到公认，也使这门学科在中医学领域回归了其应有的地位，是现代中医养生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专业成型期

有这些学科建设成果的铺垫，我先后作为学术带头人和学科带头人成功申报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医养生健康重点研究室和中医养生学重点学科，又经民政部批准备案，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下创设了养生专业委员会，并在全国率先建立养生康复学院。就这样，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养生学科从创立到初具规模，迈出了"创业艰难"的第一步。其后，中医养生学的专业设置问题得到了教育部的重视，2016年8月，由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持，

在南京召开了“中医养生学专业设置”论证会。莅临会议的除了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相关领导外，全国各中医高校的校领导和教务处领导也出席。我校教务处王飞处长和我一起受邀出席了会议。我在会上向出席论证会的教育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详细汇报了早已酝酿多年的中医养生学专业蓝图，强烈呼吁在中医学五年制本科专业规划中独立设置中医养生学专业，得到了与会专家的热烈响应，也得到了领导的支持。至此，倾注了40余年心血的中医养生学科加专业的宏伟大厦，终于屹立起来，我也被评为“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和“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心路故事4

2015年，我校曾向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申报设立中医养生学本科专业，未获成功。2016年8月中旬，乘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的东风，我校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再次发起《中医养生学》专业设置申报，并召开了论证会。会前，时任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的陈涤平教授对我说：“马老，这次申报能不能成就全靠您了。我们与教育部和国家中管局领导商定，大家发言都限定5分钟，唯独给您留的时间最长，有30~40分钟。您主编了那么多本规划教材，是养生大专家，说的话才有分量，您可要想办法打动他们啊！”不仅如此，会议主持人还特意安排我第一个讲。我当时就在想，既然我是作为专家受邀的，又承担着养生专业的希望，就不能唯唯诺诺、瞻前顾后，必须体现出专家的特点，实事求是，有什么就说什么。于是在我讲之前，先把手表摘下来放在桌上显眼的位置，防止超时，然后就直入主题、直抒胸臆：“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开讲之前，我首先提个问题：中医学最突出的特色和优势何在？不言而喻，我认为就是养生！本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如果还不赶快设立中医养生学本科专业，那么在座诸位，包括我在内，都将是中医学历史上的罪人，有负‘江东父老’啊！”随后，我从养生概念说起，一直说到中医养生学与中医康复学、中医治未病、中医临床医学的区别和联系，中医养生学对中医学学科体系的重要性等，共计用时近40分钟，恰好没有超时。一位专家用如此强烈的语气发

言，可能平时都很少见到，但确实起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我记得有国医大师石学敏院士、孙光荣教授，他们首先对我的发言表示了强烈支持："马教授说得对！中医养生学专业确实亟待成立。现在养生的社会需求这么大，专业人才却始终缺位，这充分说明专业设置有问题啊！"最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教司卢国慧司长说："马老放心，我们下来一定向卫计委、教育部汇报，尽快推动中医养生学专业的落地，不辜负马老的一片良苦用心！"于是，在2016年12月29日，我永远铭记的一天，在"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表彰大会期间，就在人民大会堂，恰是我正与余曙光校长商讨向相关部门探询专业设置消息的时候，卢司长乐呵呵地走过来对我说："马老，我恭喜您啊！今天您可是双喜临门呦！"我心中隐隐有些猜测，但又不敢相信会这么快，于是试探着问是哪"双喜"？卢司长说："您今天获得了教学名师，而就在昨天，您老人家心心念念的中医养生学本科专业获得了教育部的通过，正式设立了，这还不是双喜临门吗？"一听此言，我几欲潸然泪下，坚守40年的中医养生学梦想，竟然圆梦在今朝，真是"幸福来得太突然"啊！



马烈光在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表彰大会现场（左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余曙光、中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教司司长卢国慧）

中医养生学科和专业的开创过程大致如此，苏东坡说“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只是一个热爱养生、研究养生的普通成中医人，在学术积累的基础上适逢时代大势，顺势而为，于是幸运地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一件事，仅此而已。朱熹曾诗曰：“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如今我也不觉间年逾古稀，“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中医养生学领域未来发展应当是年轻人的天地，由我的学生、弟子们和成中医人去发挥才学了，我只待“她在丛中笑”。

撰写人简介：

马烈光，男，1952年生，中医养生学科创始人、国家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全国中医药文化建设先进个人。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养生康复学院名誉院长，贵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养生学院名誉院长，《养生杂志》主编，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养生学”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四川省名中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会长等。主编国家规划教材8种及专著40余部，公开发表文章200余篇。

学校成人教育发展路程

讲述人 / 傅春华

成人教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特定的作用。学校成人教育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建校初期，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壮大于21世纪初期。到21世纪初，学校的成人教育已经为全省培养了近2万名中医药和医疗卫生人才，成为全国中医药院校中招生人数最多、培养人才最多的成人教育学院之一，为社会尤其是一些艰苦地区和基层地区培养了一批用得上、靠得住、留得下的人才。



傅春华老师接受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

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

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总理周恩来签字，在全国成立四所中医学院。因为中医一直都是代代相传，没有完善的学校教育体系，因此全国各地的中医学院建院初期都面临师资短缺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大家公认全国两个地方产名医，一个是南京，一个是我们四川。这时候成都要办中医学院，只能前往全省各地去选有影响力的医生到学院授课，比如凌一揆、陈潮祖等人，他们那时候还很年轻，但是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被选入学校当老师。但是名医进来以后不能立马上岗，只能着手培训，所以就举办了“中医师资培训班”，培养了大批专业教师，这就是最早的成人教育的一种形式。所以学校成人教育的发展是跟学校的发展基本上同步的。另外，在办了师资班以后，还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现在我们称之为“西学中班”。国家的第一批西学中人才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西学中班”里培养出来的，比如说现在四川省中医研究院的王成荣教授。王老师从华西毕业之后到我们附属医院工作，当时被选中参加“西学中班”学习，还获得了国家颁发的金质奖章。这个班毕业的学员，现在都成了影响力很大的四川省名中医。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

成人教育的形式最早是师资班和西学中班，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开始变成函授教育了。四川是全国的人口大省（当时重庆还没被分出去），学生人数多，对于学历提升的需求很大。虽然高考恢复了，但是招的学生人数有限，绝大部分人是考不进大学的。社会又需要中医药人才，但当时基层是以大量“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指农村非正式医疗人员）为主的。这些“赤脚医生”很多都是自学成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因此国家批准在全国各个行业举办函授教育，针对超过了读书年龄的成人。最初的函授教育是一种补救式的教育，不需要参加高考，也不需要脱产到学校来读书，报考门槛非常低，只需要有医疗相关的经历比如做“赤脚医生”的经历即可，当然还包括社会中喜欢医学的群体。报名后通过审批就可以在当地接受系统的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学出来以后，国家承认学历，颁发大专文凭。我们学校举办函授教育的

作用是将之前没有系统学过医学，但是又在基层医院当医生的人通过系统培养达到有质量地开药治病的效果，从而有利于国家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

1981 年，四川省高等教育局批准成都中医学院恢复举办中医大专函授教育。当时是张英秀老师负责建立“夜大函授部”，为成人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刚开始几年，成人教育每年招生 200 人左右，1997 年我到成人教育学院工作后当年就招了 2 000 多名学生。

函授教育的形式是学生就在当地的市县不脱产学习，学校在各地建立县级函授站，地、市建立中心函授站。教师采用两依靠，一是依靠学校的老师资源，将老师派到函授站进行重点的面式教学。那个时候一周只休息一天，在休息的那天学校将知名的老师如李克光等人派过去，所以当时知名的老师如凌一揆、郑孝昌、李克光等都有函授教学的经历。二是依靠地方卫校和当地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经过培训作为师资。要求函授站授课的老师需要一定的教学经历，临床经验，具备一定的职称。因此学校会派出老师到当地进行师资培训，授课的老师经培训合格后就可以在函授站承担教学任务。当地所有函授学生不离开他的本职工作岗位，不脱产，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以自学为主，短期集中到函授站全天性突击性上课。



函授教育办公室老师在讨论教学工作

成都中医学院的函授教育在全国都是做得很好的。其总结的五落实（组织落实、师资落实、经费落实、设备落实、时间落实）办学经验在全国推广。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适应远距离教学需要，函授教育又发展了电化教学的方式，由学校电化教学中心（即信息中心的前身）将老师的讲课内容录成录音带、录像带等教学片，然后发给各个函授站进行教学。对函授站采用分阶段集中教学法，对函授生强调自学为主，面授掌握重点，期末全省统一闭卷考试的方式。在当地的医院统一时间进行考试，成绩出来后，不及格的需要补考。成人教育严格的学习考试选拔制度，为全省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在当时，如果在没有接受函授教育之前已经当了卫生院的医生，他仍然只是一个临时医生，身份不能长久保留。因此很多人想通过接受函授教育，拿到大专文凭，成为正式的医生，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

发展壮大于20世纪90年代

基于不同的社会需求，顺应社会发展，成人教育能更大地发挥社会作用和社会培养功能。这个时期是成人教育学院发展得最辉煌的时期，发挥的作用也是最大的。1994年成人教育学院正式挂牌，由函授部和自学考试办公室合并，改名为成人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是由学校副校长万德光兼任，李正华副教授作为常务院长主持工作。我是1997年任成人教育学院院长，2002年任副校长，但兼任成人教育学院院长一直到2006年。

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我担任成人教育学院院长期间，根据社会需求的急剧增大，我们在全省18个地市建立了128个中医函授站。基本上所有的人口大县都有函授站，能够为当地系统地培养基层医生服务。我们进行了生源扩大，在已有专科基础上新增本科招生，于是就形成了成人教育有专科学历和本科学历的局面。我们在专业设置上由单一的中医学专业新增中西医结合、中药学、护理学、管理学等，这样就有了每年招收几百人到一年招收几千人的火爆时期。在培养目标上强调符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在教学定位上以通用和实用为知识重点，在课程设置上以“必须、够用、少而精”的原则，加强对成人教育学生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临床思维能力的学习与提高。在保持不脱

产函授为主的基础上新办成教脱产班。那个时候成人教育学院在如今十二桥教学楼六楼上课，让部分成人教育同学可以跟本科生一样在学校住宿学习，参加学校各项活动。同时在以成人教育学院主办脱产班的基础上，调动各学院积极性，让各学院不仅承担教学任务还要自己办班。办成教工作量是教职工奖金的一部分，学校的政策规定，在完成普通本科学生的教学任务后可以接受成人教育的教学任务，成人教育老师的报酬普遍比本科老师的报酬要高一些。所以各个学院都非常有积极性，纷纷开展成人教育的脱产班。比如说临床医学院、针灸推拿学院、药学院都办了成人教育脱产班。总之，成人教育的扩大是随着学校本身专业学科体系的建设而扩大的。后来国家规定没有医生的经历是不能报考医学院的，于是学员们就形成了中专读卫校，取得初级学历的条件之后再来读我们的专科，再后来可以完成专升本的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学院对函授站的业务进行指导。统一出题，统一阅卷，保证质量。自己出题是根据我们本省本身的情况，把握难易程度，统一时间统一考试，统一时间统一阅卷，考试一直都是严格的。比如初期的时候，成教院的老师不够，最多的时候只有 40 多个人，后来我去了以后精简到不到 30 个人。在统一考试的时候，抽派学校的老师到各个函授站，卷子由我们的老师带着去，每个函授站派两个老师去监考、巡考，考完以后卷子由去的老师带回来。来回坐汽车、火车，中途密封，回来后统一在成人教育学院关门阅卷，程序是很严谨的，这样才能保证公平。成人教育学院之所以生源好，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办学质量好，学校的声誉高。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的教育事业已经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国家的政策跟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相比已经有了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是急着补课，让过去有工作经历的人能够快速地系统化学习，满足社会需要。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上大量人员需要提高学历，但是普通本科招生的名额是受限制的，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只有靠成人教育来补充，在这时成人教育已经不是单纯的针对在职工作人员了。成人教育招生考试是由学校自己出题，考文化课、政治课和专业课，但是整体录取分数很低，门槛不高。因为医学行业具有特殊专业性，社会需求量大，同时省上招生有计划（招生名额

是教育厅给的）。人才的培养要与地区的整个经济发展同步，学校也要求我们保证教学质量，所以我们根据情况，综合考虑招收人数，尽可能多地争取录取指标。学校在这个阶段仍然是成人教育的学生多于普通本科教育的学生。我当院长的时候，成教院在校学生一年有6 000多人，最多时报考人数达到万人。

学校的成人教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我们需要将过去质量不太保证的或者生源不太多的函授站就淘汰了，但是当时很多的函授站都不愿意撤销，因为函授站的作用太大了，学生们能够提高学历，改变身份，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很大。于是我们就采取合并的方式，把原来的县区一级的函授站合并到州市一级，函授站数量也减少到28个，这些函授站都是经历了时间考验的，办学质量不错。

我们原来在省外是有函授站的，后来国家不允许跨省进行函授教育，所以外省函授站全部取消。当时我们办了海南班、新疆班，专门为海南和新疆培养人才。海南的第一批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学生都是成人教育的脱产生，这是因为当时国家实行计划招生，不能省外招收本科生。我当院长的时候研究认为需要走出去，所以就在海南招了第一批本土学生接受成人教育。现在这批学生都非常优秀，如今在海南有300多名校友，中间有一大半是成人教育的学生。那些学生大部分都是医学世家，所以学习很努力，如今有成就的也很多，而且那些孩子对母校的感情非常深厚。他们觉得学校给了他们很多帮助。

1996年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把继续教育培训中心放在成人教育学院。1998年我们还争取建立了省劳动厅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这个对于成人教育是很重要的。因为成人教育学院有权利开展被劳动厅认定的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培训合格后有技能职业证，相当于国家法律认可，社会也赞同。1999年经省教育厅批准成立高等职业继续教育学院。这些都是对学校在成人教育方面的发展补充。

成人教育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在全省的医疗卫生资源比较匮乏的阶段，为基层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人才。因为接受函授教育的学生本来就在当地安了家，接受函授学习后，不会因为获得了学历、改变了身份就到大城市工作。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本科学生培养人数也不多，只愿意在成都这些

大城市医院工作，也没有人愿意到基层去，所以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就靠成人教育毕业的学生。成人教育培养了很多很优秀的学生，学生本身有工作经历，拥有一定的临床基础，带着问题而来，对知识渴望，天道酬勤，经过学院系统严格培养，所以成才概率大。据我们调查，在21世纪初的时候，全省大部分中医院的院长、卫生局局长、基层的卫生院的医生不是我们学校本科培养的，就是成人教育学院培养的。这些学员们都很认可自己是接受过成都中医学院函授教育的。基于四川是人口大省，也基于学校的重视，学校的成人教育一直在全国中医学院中属于招生最多、在校生人数最多、在社会基层服务人数最多的院校，为全省培养了近2万名的中医药和医疗卫生人才。

转型发展于当今

随着全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成人教育的生源非常广泛，招生分数线水涨船高。生源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职人员的数量逐年减少了，高中应届生和中专生成了主要的生源。在四川省的高校里，历来都是我们和四川师范大学报名人数最多。大家都觉得学医是很有前途的，所以我们的生源非常广泛，每年报名人数都有近万人。2005年以后我们招生人数最高的一年招了6 000多人，当时报名的学生有上万人。这个时候招生分数线跟着水涨船高，而且生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时候虽然也有医学世家的身份来学习的，但占的比例很小了，更多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中专生。因此现在的大部分成人教育的学生都是年轻学生。

成人教育现在还担任着四川省中医药继续教育培训的职责，主要是订单式的培训，针对制药企业或者中医药行业职工有目标地进行短期的脱产或者不脱产的培训。公司缺人了，可以通过成人教育学院的培训中心来进行培训。还有人才专项培养，比如说补课推广先进经验。我们在抓好学历教育的同时，也做好四川省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认真履行“四川省中医药继续教育培训中心”的职责，开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医院院长班”“药厂企业职工技能岗位培训班”等多种对企业从业人员提高的继续教育，使成人教育办学途径更为宽广。

我在成人教育学院工作的时期，学校对成人教育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

在办好普通本科教育的同时多条腿走路、发展。普通本科教育是学校的根基，得培养精英的学生出来。而成人教育则面向广大的社会，为基层培养人才。学校总的发展方针是："稳步发展本科教育，开展研究生教育，配套发展继续教育，为终身教育提供更为可行的途径。"我校的成人教育一直都是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在未来也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本文由傅春华口述，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整理。
采访时间：2021 年 4 月 21 日
采访地点：成都中医药大学十二桥校区一教学楼
文字整理：赵　荷　梁一禾
摄　　影：黄　宇　于凯雯

讲述人简介：

傅春华，女，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为四川省政协委员，曾任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中西医结合贡献奖获得者、四川省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教育部首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医学与中药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四川省中医药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任刘敏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临床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从事中医妇科学教学、科研、临床及学校管理工作 40 余年，为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主要学术骨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科研项目 16 项，获得 9 项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发表科技论文 50 余篇，参编专著 6 部。

我校第一个独立科研机构

——中医古籍文献研究所

讲述人 / 傅春华

古籍文献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每一个朝代安定下来以后都需要整理古籍文献。在浩如烟海的文献里，中医文献占据了一个重要部分。实际上，发掘、保护、研究古籍也是传承中医药的重要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药高等教育出现前，中医一直都秉持着师徒传承或是世家代际相传的方式，没有很好地融入现代科学体系，容易造成珍贵资料的丢失，诊治经验与手法的流失和断代。我留校初期在科技处工作，对这一点更是深有感触，那个时候中医没有什么科研可以做，能将古老的东西学好，传承好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我国迎来了第二个“科学的春天”，开始在各个方面抓科研工作。1981 年，陈云副总理指出：“整理古籍是一项很重大的工作，工作量很大，关系到子孙后代。”1982 年，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决定建立“卫生部中医司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机构设在人民卫生出版社。这是国家成立的专门性的中医古籍整理与研究机构，并且提出了“抢救 100 本中医古籍文献”和“抢救 100 名名老中医”的举措。

国家非常重视这方面工作，1983 年下达了三类古籍整理任务：第一批十一本古籍，包括《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金匮要略》《中藏经》《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脉经》《难经》《黄帝

内经太素》，第二批200多本，第三批500多本，总共800本左右，要求这些书必须在短期内完成整理工作。

艰辛起步——成立中医古籍文献研究所

中医古籍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的工作，它的落地实施面临诸多困难。原因在于，搞文献学的人不懂医，搞中医的人又很有可能在文献学方面不精通。对于医古文，一般人连断句都不容易做好，看懂医古文并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难上加难。在我们学校古籍所成立之前，已经领回了一些古籍整理的任务，包括第一批的《黄帝内经太素》，第二批的《景岳全书》等。

当时，学校的科研氛围并不浓厚，起步工作很艰辛。可以说我们学校的正式的科研工作就是从整理名老中医经验、抢救中医古籍文献起步的。这个工作最早是在科技处，没有经费、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也没有人员编制。我的老师也就是当时学校科技处处长赵立勋老师，他同李明富老师都是我们学校的首届毕业生，可以说他们在古籍文献整理以及推动我校古籍研究所的成立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赵立勋老师和郑孝昌老师都被列入了抢救古籍文献的整理者的名单，同时他们也是学校最早研究医古文的专家。

赵立勋老师是陕西人，他做学问很实在，古籍文献功底深厚且在温病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后来自己还专门到四川大学进修了文献学。在工作上，他治学严谨，快言快语。无论春夏秋冬，每天七点五十准时到办公室，别人都下班了他才走。他的桌上摆满了古籍文献资料和用于整理的纸条，在文献整理工作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忘我精神，是让所有老师都心服口服的。同时，他对待工作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如有不能按时交稿的，赵老师都会予以严厉批评。开会时有不同意见就要发表，从不有所保留。生活上，他为人正直，勤俭节约。当时卫生部抽调我们学校的老师去全国搞古籍调研工作，到绵阳时，住的是一晚上10元的宾馆。赵老师无意间看到有个牌子上写着旧房子5元一晚，为了省钱，立刻就和宾馆的工作人员协商要求换成老房子。

《黄帝内经太素》作为中医院校的参考读物，属于第一批古籍整理任务，也就是11本最经典的、源头性的古籍文献。这一整理任务是由李克光教授领回来的，之后不久他被调到四川省中医药研究所（现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当院长，后来当了省政协副主席，因此后续的工作就由学校科研处管理和执行，由郑孝昌老师承担具体工作。当时采取的是校勘本，排版是竖排繁体。整理工作完成后，由于人民卫生出版社中途取消了出版计划，所以没能在第一时间出版，于是就拿到贵州去出了第一版。后来中医古籍文献研究热潮再次涌起，于是第二版就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二批古籍文献中，我们学校承担的是《景岳全书》的整理任务，于1985年开始整理工作，1989年出版，这类古籍采取的也是竖排繁体。第三类古籍的整理，是由熊大经老师主持，采取的是语译本，排版是横排简体。正是我校这些有影响力的专家们共同努力，使得古籍文献研究所成立之前的古籍整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上面领导对我们工作的完成情况也表示了满意和认可，这均为后来古籍研究所的成立和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3年四川省高教局批准了我们学校第一个独立的科研机构——中医古籍文献整理研究所，1985年明确了该所作为学校的专职科研机构，并给了处级单位的人员编制（学校也是第一次有了60个专职科研编制），所长是凌一揆，副所长是赵立勋并主持工作。我们学校成立古籍所算是很早的，当时成立研究所的中医院校可谓是屈指可数。这个研究所的成立大大推进了我校的古籍整理工作，也使得我校在全国的影响力提高了。最初研究所的办公地点是在行政楼的一个房间（即现在的国医馆），20世纪90年代搬到了图书馆的二楼和三楼。而且自己专门在三楼设立了一个“小图书馆”用来存放线装书等文献资料，人员编制最高达到了19人。研究所成立以后，古籍文献整理的工作就主要放到了研究所。当时除了完成中古办的整理任务外，还和山东、辽宁的中医院校一起筹备大的古籍整理项目。研究所总共完成了大概11本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随着大的课题与项目的进行，为更好地适应工作需要，古籍研究所的人才队伍建设也被提上日程。作为医学院校，我们缺乏文献学

背景的人才，所以从古籍研究所建立之初，就开始招纳医文两方面的人才，并且将学中医的人送去学文，当时研究所的四个人被送到北师大进修了两年，后来，古文字及文史专业毕业的人才也逐渐被引进来。伴随古籍研究所的发展，它被赋予了“文化中心”这一新名称，后来又和博物馆合并，演变为现在的国学院。随着国家的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厅局项目的下发和分配，研究所的工作也随之稳步前进。

浓墨重彩——编撰《中华大典》

中医古籍文献研究所承担的项目中，《中华大典》的编撰工作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1990年，由国务院批准，四川巴蜀书社联合国内多家古籍出版社筹备了一个大项目，即《中华大典》，它被列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

《中华大典》的分支体系是由典、分典、总部、部构成。当时四川作为项目发起省份承担的任务很多，我们学校承担的主要是与《医药卫生典》相关的工作。《医药卫生典》分为医学、卫生学、药学分典，当时我们学校力量有限，一下子无法完成这么多任务，于是医学分典由我校负责，当时的校长李明富教授牵头；药学分典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负责；卫生学分典由中国中医研究院与云南中医学院（现云南中医药大学）共同负责。

为保证该项目的顺利落实，中宣部下文，国务院发函，全国各大图书馆必须对该工作予以大力支持，为研究人员开放珍贵古籍的借阅服务。当时文献研究所就到北京图书馆复印了很多古籍文献资料，组织全校的力量做好整理工作。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学校承担了很多前期的试点工作，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与实施落地中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提供了探索性的解决思路。尤其在《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的编撰方案、引用书目、样稿体例的拟定方面，我校做出的贡献不容小觑。为了完善拟定工作，我校研究所派人员到北京、沈阳、山东、武汉等地征求名老中医的意见，如山东张灿岬、北京的余瀛鳌等。在项目具体任务进行的过程中，也历经了很多困难和曲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

费不足，条件艰苦。当时参与整理工作的学校教师100多人，他们不计名利，不怕辛苦，都是手工进行整理，用的是剪刀加糨糊这样的原始工具。尽管如此，最终的整理质量都还是很有保证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我校师资队伍的成长与建设。第二个问题体现在进度控制上，当时我们学校承担的《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各个总部的进度难以保持一致，因此出版社就遵循先完成先出版的原则，陆续出版了基础理论总部、儿科总部、针灸推拿总部、内科总部、眼科总部、外科总部等。此外，由于这个工作集中了全校的力量，参加的老师众多。研究所作为总负责机构，其协调工作是相当难做的，因为老师们还有教学、临床和科研任务要做，所以有时稿子催不上来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虽然我们有很多按期完成的总部，也给其他总部做了示范，但还是存在一些未能按时完成的总部。纵观《中华大典》的编撰历程，从1990年开始，1991年有所停顿，到1992年重新启动，直至今天，还有个别总部没有完成整理工作。所以时至今日，《中华大典》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完毕。

我们学校从1982年开始整理文献。比如分不同医家的明清医学全书，我们学校研究所就承担了叶天士医学全书的编撰工作。我们学校还参与编撰了《四川省医药卫生志》的中医部分，荣获四川省1992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3年，在赵立勋老师的主导下我们学校编写了《四川中医药史话》一书，它是一个历史总结性质的书籍，广受研究四川中医发展史学者的赞誉。

走向数字化——古籍整理的当代发展

2000年之后，古籍整理工作开始走向数字化。开始时用的是386、486的计算机，它的硬盘内存都很小，存储空间只有几十兆，后来才扩充到几百兆。那时学校花了20万美元建了一个计算机房，用的都是有1G硬盘小型机。在Windows2000出现后，学校才开始用很流行的数据库。学校领导重视数字化建设，就提出了中医知识库这一个项目，当时把北京的计算机专家请来设计了一套文献处理的方法，就是给文献做标记。这一方法开始是用于相

对简单一些的本草类文献，可以把诸如药名、功效、性味、归经这类词语进行分类整理，但是这一方法推广到医学文献就面临很多麻烦与问题了。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在不断更新文献数字化的处理方法，为更好地将纸质文献变成电子文献付出了很多努力。同时，我们也享受着计算机技术发展带来的好处，尤其是智能处理为文献利用带来的便利。这一时期，我们学校承担的重点课题和项目主要有：中医古籍数字化课题、中医学术源流研究、民间医学特色疗法。

2008 年前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又启动了一个大项目——古籍整理能力建设。最先做的是 400 种古籍的整理，到中医目录里去找以前未整理，或者是整理得不好的古籍，再次进行分任务地整理，我校研究所承担并圆满完成了三四十种古籍的整理任务。

2013 年底成都天回镇老官山出土了西汉医简，这一发现引起了学界瞩目。我们学校第一时间参与研究，我校中医历史文献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和中浚，从出土的经穴髹漆人像以及部分药方中发现，这批医简在医学史上的价值，远远高于马王堆医书。这一批古医简的出土，推动了我校“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这一机构的成立，机构的管理人员初期就来源于研究所，它与中医古籍文献研究所既相互独立又有着密切联系，后续发展需要逐渐抽调与外聘兼职人员。

从宏观角度观古籍文献整理工作的历史，是一个从兴盛到衰落，再转归兴盛的过程。受到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影响，我们能够发现中医存在的不足，于是想要利用现代科技的思维方法去研究和改造中医原有的理论体系，但是最终发现这种研究改造对于中医发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所以又回过头来整理中医古籍文献。同时，国家对传统文化及古籍文献研究的重视，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对于这方面工作都保持了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中医古籍文献整理工作是不会过时的，它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这些经典文献规定了中医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内容，而且随着医学实践的发展，对于经典的理解也会有不断的补充和完善。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责任之重大，影响之深远，需要一代又一代的

中医后来者承担并完成好历史使命，促使中医古籍文献充分发挥其接续过去、滋养现在、开创未来的积极作用。

本文由傅春华口述，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整理。
文章第三部分内容由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原院长李继明提供。
采访时间：2021 年 4 月 21 日
采访地点：成都中医药大学十二桥校区一教学楼
文字整理：赵　荷　梁一禾

讲述人简介：

傅春华，女，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为四川省政协委员，曾任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中西医结合贡献奖获得者、四川省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教育部首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医学与中药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四川省中医药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任刘敏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临床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从事中医妇科学教学、科研、临床及学校管理工作 40 余年，为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主要学术骨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科研项目 16 项，获得 9 项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发表科技论文 50 余篇，参编专著 6 部。

为中西医结合影像学的发展尽微薄之力

讲述人 / 余朝俊

白驹过隙，岁月更迭，中国中西医结合影像学走过了从无到有的艰辛历程，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曾经我也是满怀热忱的青年，过往的时光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我想借此次采访机会向后辈讲述我的故事，希望我的经历对后辈在学习和工作上，有一定的帮助或启迪。

学科初建

1960 年，我毕业于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留在四川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做助教。经过四年的学习，感觉相比解剖，自己更喜欢临床工作。正巧当时有补实习之后重新分配工作的政策，于是我毅然选择了补实习。补实习结束后，被重新分配至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后，我听从组织和领导安排，到四川省人民医院放射科学习、工作，这样便开始了我与放射学的缘分。

工作三年后，我回到成都中医学院工作。在工作中接触到许多知名中医专家、学者，耳濡目染，我学习并了解到一些中医知识，深切感受到中医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传承、发扬中医的愿望在我这个学习西医的年轻人心中逐渐形成。

我刚到成都中医学院时，学院还没有放射学教研室，附院放射科仅有 4 个人，而且不承担影像学课程。我隶属于西医临床教研室，承担放射学的教学工作。1977 年恢复高考后招入了新生，教学任务繁重。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学院才逐渐建立了放射学教研室。放射学教研室的建立为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提供了

条件，奠定了教学基础。

早期的放射学课程，学时少，教师也少，教学内容以传统放射学为主。后来，随着课时的增加，教学内容以自编教材为主。我于1984年参加了中医院校使用的全国统编教材——《西医诊断学基础》的审定工作。后来，我力争将放射学独立成课，并增加了课时。由于我们学院放射学课程独立成课时间较早，且结合学科特点，较早就已经将幻灯片、投影等运用在教学中，成为先行者。

自创立放射学教研室后，教研室就与临床放射科结合在一起，教学、临床和科研也结合起来。当时，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委托我办了11期培训班，培训的对象主要是四川省各地、市、县中医院的医生和少数体育院校创伤学的医生，还有部分外省的医生参加。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还指导了许多研究生，我是全国第一个招收中西医结合影像学研究生的。当时本科阶段的学生只需要了解一些医学基础知识，在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做深入研究。我们帮助研究生确定选题，带他们参与我们的课题研究，以此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当时的研究生后来很多成长为各自单位的骨干，有的成长为中西医结合影像学领域独当一面的专家、学者，如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影像学专委会主任委员、第七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影像学会专委会主任委员侯键教授。



余朝俞教授做学术交流

学会初创

来到成都中医学院工作后，我逐渐思考如何将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我认为，中医和西医不是对立的关系，两者理论上虽有差异，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如能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必将激发各自更强的学术活力。我向四川省人民医院放射科刘承志主任阐述了我的想法，他认为我“胆略兼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我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学习和工作期间，奠定了做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基础，坚定了把中医学和放射学结合到一起创立中西医结合影像学的想法。

在1985年以前，我撰写的文章、研究的课题都是西医方面的。之后，我凭借在放射科奠定的基础和在中医院校与医院工作的经验，开始着手创立中西医结合影像学会。贵阳中医学院的刘庆寿教授也早有此想法，随即我们一起探讨创立学会的工作。

中西医结合影像学会的创立过程可谓一波三折，筹备期长达4年。学会筹备初期，因为创新性太强，很多人还不完全理解，参加的人屈指可数，后增加到几十个人，但是每个人都抱着对中西医结合影像学的信念与热忱。后来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出面组织会议，于1989年7月在天津杨柳青医院召开筹备会议，最终确定成立学会，当时叫作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医学影像学专业委员会，并协商专业委员会顾问、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等人选，同时决定由



余朝俊教授与中西医结合影像学会部分代表

我负责两个月后在成都召开的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影像学大会暨成立专业委员会的筹备工作。1989 年 9 月 18 日至 23 日，如期在成都召开了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影像学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学术大会，参加会议的有百余人，学院和医院对此次会议给予了大力支持。专委会的成立团结了一批从事中西医结合影像学的工作者，搭建起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西医结合影像学专业的发展。随着时代发展，学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全国性学术大会已经召开 18 次，会议规模有时接近 2 000 人。

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我院中西医结合影像学的科研开展比较早，科研经费申请不易。

我曾经申报并完成了几个代表性课题。第一个课题是我与王再谟教授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共同指导王教授的研究生刘文涛完成“慢性胃痛各证候消化道 X 线征象的研究”课题，在四川省卫生厅申报课题时，因为中西医结合影像学还在初创阶段，申请项目经费时仅批准了 1 000 元。当研究成果初步呈现后，再次到省卫生厅申请经费，引起了省卫生厅的重视，当即被立为重点课题大力支持，最终下拨了 8 000 元项目经费。这个课题邀请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以及业界知名专家共同鉴定，这一将中医学和影像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获得一致好评，该研究成果获四川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凭借首个课题的广泛影响，为后续申报研究课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个课题是“肺胀各证胸部平片 X 线征象及血气分析关系的研究”，历时四年完成。在业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使中西医结合影像学得到业界认可，并且获得了四川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第三个是“中风急性期各证头颅 CT 征象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受到四川省教委的关注，审批通过后，下拨了科研经费 3 万元，这在当时是最高的科研经费。这个课题我带着学生一起做，此课题后来升级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风各期各证候影像学研究”课题，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资助经费 3 万元，单位配套资助三万元，课题第一主研是侯键，我是第二主研。这一研究成果，

获成都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候键曾经是我的在职研究生，后来又继续攻读博士，博士期间持续对中医中风的影像学进行深入研究。未来属于新一代年轻人，要想中西医结合影像学事业后继有人，必须大力培养年轻接班人。

最初我做课题研究的时候还没有CT、磁共振等设备，当时做“胃脘痛消化道的中西医结合影像学”课题是用钡餐检查的方式；“肺胀各证胸部平片X线征象及血气分析关系的研究”用的是平片，但运用了多学科研究的方法。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现在放射科的硬件设备与当初早已不可同日而语，CT、磁共振、超声这些先进设备的运用，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范围。

扬帆再起航

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影像学专业委员会长时间的沉寂，民政部向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提出拟于2003年取消中西医结合医学影像学专业委员会。恰好在这一年，山东中医药大学附院创办《中国中西医结合影像学》杂志，邀请我做第一副总编。为保留学会，我们积极联系基层（省、地级）的中西医结合影像学分会人员，并且与《中西医结合影像学》杂志的编委及时沟通，大家都表示愿意通过多种途径向民政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反映情况，让专委会留下来继续发光发热。2000年张东友教授颇具影响力的专著——《中西医结合影像学》出版，这些都展示了专委会的大部分学者还在积极活动。此外，各省的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院、西医院的有关医生、学者主动向中西医结合学会提出专委会是我们中西医结合影像学人的心血，它承载着我们对中西医结合影像学的坚守和希望，这个专委会一定要继续办下去！几经波折，最终专委会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重整旗鼓，不断发展壮大。后来，中国中西医结合影像学会专业委员会为我颁发证书，对于我在担任专委会领导和顾问期间推动学科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国内同行眼里，我是中国中西医影像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2007年，我主张将中西医结合影像学高级职称的评审交予中西医结合学会和省中医药管理局，而非由中华医学会评审。因为突出了中西医结合的特点，所以得到了省人事厅与省中医药管理局的支持。



余朝俊教授接受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

多年来，我对中西医结合影像学的感情很深，我和我的团队对中西医结合影像学的研究做了很多工作，尤其对“中风”“脊柱”等系列研究，发表中西医结合影像学论文约 30 余篇。

如今，我已是耄耋老人，为中西医结合影像学尽了微薄之力。随着年纪渐长，很多事已力不从心，望后辈们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本文由余朝俊口述，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整理。
采访时间：2021 年 4 月 21 日
采访地点：余朝俊教授家中
文字整理：杨福星　张　娟
摄　　影：黄　宇　于凯雯

讲述人简介：

余朝俊（曾用名余朝骏），男，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1937 年出生，重庆市垫江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影像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副主任委员，第四届、第五届专委会顾问；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影像学专业委员会多届主任委员，第五届荣誉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影像学》杂志 2003—2010 年副总编，2011—2014 年顾问。

我与成中医：从图书馆到外事组

讲述人 / 范家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在南京教会大学也就是南京金陵大学上学，先后也在重庆《新华日报》、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过。说起来，也算是“白手起家”，自学中医。

我的中学、大学都就读于教会学校，会讲一口标准流利的英语，这在20世纪80年代并不多见。1980年，我调入成都中医学院，在选择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图书馆，并没有选择教我擅长的英语专业。我个人觉得英语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的专业，而我失去了很多读书学习的时间，自知与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拉开了距离，不拼命学习追赶，怎能赶上时代的要求，做一个合格的高校教师？我不敢贸然走上讲台去误人子弟，决定先当好学生，一切从头学起，从零开始。中医学术艰深，难于准确翻译，必须认真学习研究。

在图书馆工作时，我发现这里处处有宝藏。很多有名的老中医、教授在我们学院授课，大家自愿把自己私藏的中医药相关书籍送到图书馆，大大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由于长时间没有接触到书籍，使得我对知识的饥渴程度日益加深，那时候看到地上一张纸，只要纸上有字，都会捡起来认认真真读。即便是广告都会仔细看，连那些宣传资料书也被我当作宝贝。这样的经历让我非常珍惜在图书馆工作的机会，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如饥似渴地把馆藏的古籍书都看了一遍。

我利用在中学和大学英语成绩比较好的优势，将图书馆已尘封多年的外文书刊资料分门别类清理出来，并整理上架，对外开放。同时，清理积压多年的

外文信件资料，清理出很多可建立交换关系的国外单位，开始尝试着建立对外联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和国外 30 多家图书馆、高等院校以及学术团体建立免费的书刊交换关系，其中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及世界卫生组织（WHO）。一方面扩大了我校在国外的知名度（在 WHO 对中国医学院校排名中，成都中医学院名列第四），另一方面又免费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原版外文书刊资料，为学校节约了开支，这一开拓性工作受到校领导的赞许。

那个时候在学校会讲英语的人不是没有，有人藏而不露。改革开放以后，成都锦江宾馆成立了国际旅行社，接待外国友人参观。有一次一批外国友人去草堂参观。那时候的交通没有现在发达，大家都是走路过去的，在回程路上有一名外国友人与团队走散了，路过我们学院时看到里面的教学楼，就以为是锦江宾馆走了进来。那时能在校园里看到外国人，大家都觉得很稀奇，又不敢上前与外国人交谈，学院办公室想到了我也会讲英语，于是就把我从图书馆叫出来与那位外国友人沟通。我过来一问，才知道这人是走错路了，我们便招了一个的士把他送回了锦江宾馆。那时的成都没有现在那么多旅游景点，看过去看过来的就只有这么几个，我们学校和附院从此就成为他们带人参观的景点了。

由于外国游客经常来学院，学院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接待，经我们学校和附院开会研究决定成立外事领导小组。1981 年，外事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我即受命兼管外事工作，副院长侯占元老师是组长，我是副组长。因为我在图书馆工作，所以把外事组的办公室设在图书馆里，后来学校觉得不妥，才整理出一间办公室给外事组办公，并又招来两个人，外事组的工作慢慢开始理顺。

在白手起家的条件下，一年中完成了“请进来”（我请的第一个来学院讲学的国外专家是全世界最有名国际中医专家，来自美国被称为“时间生物学之父”的哈尔贝格教授）、“走出去”（我校教师多人先后出国考察、参加学术会议或应邀讲学）和开办培训班（吸引外国学员来校培训学习）三件大事，为外事工作开拓了局面和奠定了基础。欧洲的外事工作是我亲自去开辟的。就拿德国来说，现在中医药在德国发展得很好，不过我早就提出来，中医药在国外是低水平的，就是 ABC 水平（注：ABC 的意思为最基础、最简单）。在中国，在素有“中医药故乡”的四川，加强国际中医药是有很大空

间的，我们大有可为。

当时，我们的对外交流工作做得比较好，留学生也很多，在国际上的声誉比较高。外国友人称赞我们是最具中医药文化特点、将传统中医药文化保持最好的中医药高校，是他们来华学习中医的首选之地。

本文由范家永口述，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整理。
采访时间：2019年5月13日
采访地点：范家永家中
文字整理：黄祺钰　苏子夜　贾静雯　任翔

讲述人简介：

范家永，男，1926年生于安徽合肥市，毕业于南京大学（原金陵大学），历任《新华日报》记者、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理事、学术委员，文献研究委员会主任；香港国际传统医学研究会客座教授，德国国际中医学会顾问，德国《中医学报》顾问编委，德国国际科学中医学会理事及中国办公室主任；民盟四川省委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民盟成都市委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调入成都中医学院任中医文献检索教研室主任、教授，从事研究生教学，长期负责学校外事工作。

振兴中医的一方阵地

——记《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公开发行

撰写人 / 陈先赋

经四川省刊物出版主管部门批准，《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季刊）（以下简称《学报》）于 1982 年 7 月起在国内公开发行。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公开发行，是在“衡阳会议”精神的指引、鼓舞下，在全国和四川振兴中医的热潮中问世的。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公开发行第一号）

在发展中医事业的重要转折之际，1982年4月，卫生部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即通称的“衡阳会议”）。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会议总结了我国自1956年中医学院开办25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按中医药特点办好中医学院”的正确方向。全国中医药管理、教育、医疗、科研、学术出版、药品生产等业界，为之一振，振兴中医气象一新。

四川是振兴中医的重要阵地。省委、省政府极为重视中医药事业，在全国较早研究部署振兴工作，副省长康振黄任四川省振兴中医领导小组组长。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政协多位领导同志，多次亲临我校，指导工作。学院领导为贯彻衡阳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对学校各项工作进行了充分研究，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其中一项工作，便是筹备公开发行《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学院领导和专家学者们认为，《学报》不仅是学术水平的体现与窗口，而且具有办学办医方向性的引导作用。要办好中医大学，就必须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 目录

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公开发行第一号）

用衡阳会议精神 办出中医的特色

——为《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公开发行而作

成都中医学院院长 李振华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公开发行第一号）

办好中医学报，要集中学校人力、物力，办好学报。

学院院长常耀五在《学报》公开发行号（1982年第三期）撰文指出：衡阳会议精神，不仅为如何办好中医学院和医院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成功办好《学报》明确了宗旨。为了把衡阳会议精神落到实处，《学报》开辟“怎样办好中医学院”专栏，就办学方向、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安排、教材编写、师资建设、教学基地建设、思想工作、后勤保障等问题进行广泛讨论，以便有助于把中医学院办成真正的中医学院，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的、合格的高级中医师、中药师。同时开辟“怎样办好中医医院”专栏，就中医医院在诊断、急救、治疗、护理、病历书写、医院管理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以便建立一套有利于恢复和发扬中医药特色的制度，把附院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并通过讨论，为全国中医事业探索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编委会名单

主　　编：李克光　袁一揆　侯占元

顾　　问：宋鹤亭　文琛之　王绍周　罗尚田　代锦廷　蒋品珍　余仲权
曾应台　刘耀三　关吉多

编辑委员：李克光　袁一揆　侯占元　郑孝昌　许敬光　曾祝权　宋　捷
肖鼎彝　邱宪荣　徐楚江　李介明　郭仲夫　肖正荣　赵立勤
李明富　陈治恒　邓明仲　郭子光　张荣郁　杨明均　李良信
陈锦祖　阎再忠　邹学熹　张发荣　王明芳　王俊科　陈先赋

常务主编：李克光

常任编辑：邹学熹　陈先赋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编辑委员会

1982年第3期　·1·

关于系统发展中医事业问题的探讨

侯占元

自从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以来，对于中医事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再次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通过两年来的讨论，现在已经明确，即：中医必须按照自己的特点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至于怎样独立发展，则是当前中医界普遍关心并且值得认真探讨的重要问题。现就系统发展中医事业和中医学术上几个带关键性的问题，谈谈个人一些认识。

一、中医事业和中医学术的发展，主要依靠中医队伍自身的建设和努力

建国三十二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中医获得了极为迅速的新生和一定规模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回顾过去的工作，同样也认识在中医事业前进的道路上，实际也走了一些弯路，造成了一些失误。问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把中医事业、中医学术的发展过分寄望于其它学科努力的“帮忙”上，而忽略了中医队伍自身的建设。发展资料人材、学术、组织、科技等系统的发展，如之“四大帮”的结果，也造成了中医队伍行将三无人、中医事业和学术发展缓慢的严重局面。

科技史告诉我们，一门学科，一个学派的兴衰，归根结底是自身的发展，各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在自身发展中相互渗透，互为促进的关系，不能代代相传，或是自成封闭型或组一般理论，多年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过重中医界的一些问题，几乎已经为实施把中医事业的发展，中医学术的提高，开展地寄希望于其他学科努力的“帮忙”上，因而不少中医同行，或一部分领导同志人力、物力、财力的安排，分配上，也基本上成了这种局面。五十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的运动，也都脱离西医学术“帮忙”发展中医学术的意义。不但没有使发展中医事业的“支援”得力，而且，广大西医学习中医的同志们为此都存在了不同的努力，对发扬祖国医学，提高医学发展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相当普遍了一大部分同志的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公开发行第一号）

在本期《学报》中，刊发了学院副院长、著名中医问题专家侯占元的重要文章——《关于系统发展中医事业问题的探讨》。文章重点强调四个方面的工作：中医事业和中医学术的发展，主要依靠中医队伍自身的建设和努力；加强中医人才的培养，切实改变中医人才结构和学术结构的单一化倾向；加强科学研究，提高诊疗水平，促进学术发展；加强对中医事业的领导，健全管理机构。侯占元院长的这些观点，在我看来，不仅对当时中医工作献了良策，而且对新时代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在《学报》申报公开发行的筹备工作中，学校为《学报》自身建设作了许多准备工作，成立了学报编委会。任命李克光、凌一揆、侯占元三位副院长为主任，宋鹭冰、文琢之、王渭川、罗禹田、戴佛延、冉品珍等十位名师、名医为顾问，郑孝昌、曾敬光、雷载权、宋熙、肖崇厚、陈潮祖、邓明仲、李明富、陈治恒、郭子光等学院、附院各教研室及科室主任、专家 28 人为编辑委员，李克光任常务主编，邹学熹、陈先赋任常任编辑。

编委会和编辑室全体同仁秉承办刊宗旨，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对刊物的特点以及内容、栏目、文图、装帧等多方面，作了认真研究、设计。重点是突出两个特色：一是中医药传统特色，刊物要有传统中医味；二是突出四川地方诊疗特点，刊物要有四川乡土味。主要面向四川中医界，重点发表校内知名老中医、专家教授发皇古义继承发扬中医经典名著的心得体会、临床实践经验，特别是疑难病症、典型病案病例以及科研成果。同时注重对四川中医药学术特色的发掘和史料的收集整理，开展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讨论。

根据常耀五院长的提议，针对“中医后继乏人”的状况，响应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倡青年自学成才”的号召，《学报》特设《中医自学辅导》增刊，即刊授教学，面向全国发刊。同时组织学院各教研室力量，先后编写了一套与本科课程相应，更适合中医自学的各学科通俗教材，并在成都市区设中医自学夜校，开班面授，得到各教研室的大力支持。省内外中医自学者十分踊跃，刊授参加者多达 18 000 多人。刊授教学为后来学校“中医函授大学”的建立铺垫了基础。《学报》在对四川各地名医经验的总结和史料发掘、整理中，先后与彭县（现彭州市）、什邡等地卫生局及中医同仁，整理印行了唐宗海遗著《六经方症中

西通解》、王光旬所著的《寒疫合编》等多种著述。《学报》的工作，受到全国中医界的较高评价，在全国中医高校《学报》工作会上，《成都中医学院学报》被评为先进单位。致力于《学报》和中医函大工作，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的邹学熹老师，荣获全国劳模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殊荣。

1982 年 11 月，国家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老局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老会长吕炳奎曾写信勉励《学报》编辑部同志说："成都中医学院要成为复兴中医的基地，你们要成为先锋队。"《学报》全体同仁，引以为训，辛勤工作，不遗余力，感到欣慰。在邹学熹和我任《学报》常任编辑期内，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同志有：段光周、程奇旭、李顺英、金兮、耀文华，财力陈维思、美术设计谢光云（绘图室，兼），田兆新（宣传部，兼），曹芝富（函授部，兼）等。在此一并致意。

撰写人简介：

陈先赋，男，1941 年生，重庆市人，医学史专家、新闻学者。1964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74 年调成都中医学院工作，历任《成都中医学院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报》）主编、《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常任编辑，并任成都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医史文献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成都市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高校校报研究会秘书长、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地方志编委会特聘编辑等社会职务。出版著作有《四川医林人物》《四川名医传》（上集）、《成都中医学院发展简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和新闻作品数百篇。个人事迹录入《中国知名专家学者辞典》等人物辞典。

文琢之与其著作《医林人物剪影》

撰写人 / 陈先赋

著名外科专家文琢之，是我景仰的一位中医老前辈。他青壮年时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成都地区乃至全国中医界活跃人物之一。他对四川中医历史情况颇为熟悉，曾与名医廖冥阶合写《成都掌故》，又曾力创多种中医药刊物，有“活字典”之称，故我每常请教。

1979 年 5 月，我到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和平街古书部查阅资料，方知文先生在 30 多年前，著有《医林人物剪影》一书。此书篇页不多（仅 40 页），纸张较次，且有破损，出版于 1947 年 12 月由成都福利供应社发行。据该馆沙先生讲：不知别处有无，我这里都仅此一册。难怪被视为“孤本”，收藏在“古书部”。

《医林人物剪影》介绍了我国现代 40 位名中医，其中蜀医 13 人。语言通俗有趣，记述精炼，富于文采，加之扉页人物影像和资阳林友春先生绘制的国画“文琢之山林图”条幅，颇有吸引力，令人读之爱不释手。在作者笔下，介绍一位医家，仅六七百字，便将其形容声貌、言谈举止、平生简历、医德医术，为中医事业奋斗之事迹，乃至逸闻趣事，都一一巧妙勾画，描述出来，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给人印象十分深刻。读罢此书，合页闭目，那书中人物，诸如“全国性两大医团领袖”郑曼青等，“中医三哲”施今墨等，“海外三杰”张见初等，“西南医界领袖”余律笙，“蜀中三哲”周禹锡等医界名流，都一一活现脑际，如见其人。这是一本具有史料价值的好书。江苏名医陆清洁评价此书说：“琢之吾兄，医林怪杰，敢说敢为，不避权贵，文笔流畅”，是“立功、立德、立言”之作。

1985年11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都分会医史文献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我们请文老等五位前辈荣任顾问。文老《医林人物剪影》续著之事，专委会同仁十分关心，希望文老早日实现夙愿。但他毕竟年事已高，总结临床经验及参加社会活动，诸事繁忙，晚年又再一次瘫痪，续著一事已力不从心了。

文老病中，我多次到附院看望他。他躺在住院部二楼一个单间的病床上，依然十分乐观。他的一个孙女在侧精心照护他。我每次去都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听他讲述成都名医的故事。文老的身体已很差，说话声嘶吃力，断断续续。他是一个意志力特强的老人，讲一会，歇一会，但总是坚持下去。我深知文老在做最大的努力，我心里难过万分，有时借故离步去止住欲出的眼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老的口述，还是那么谐趣。他讲了一个“顾太医”，又叫“顾半夜”，医术好，但烧鸦片，半夜不归，因此又叫“顾半夜”。老婆要生产了，却外出收账，故又名“顾瓜儿”。但他有一个优点，对母亲十分孝顺，做错了事，自己在头上顶起篾板叫妈打，所以又叫“顾孝子”。我知道，文老也是很讲孝道的，也是一个孝子，他的老母信佛，喜静，文老对母亲十分孝敬，照顾备至。老母寿逾百岁，1980年10月4日百岁寿宴，在人民南路一个餐厅举行。文老自制请柬，我和侯占元副院长、附院穆凤高书记、邓亚平老师，被邀参加寿宴。文母正居席间，慈祥奕采，态若神仙。文老讲，他也是佛门弟子，因幼小多病，拜走马街著名的“和尚外科”灵溪和尚为师，学习中医药。师父给文老取名天然和尚，法名性空。灵溪和尚之师，天应和尚，满族人，官至将军，弃官在成都文殊院受戒，精于骨外科，曾应召进京，治愈禧太后背痛，医名一时。文老还讲了一个神通广大的“中医大王”，易上达，清末民初人，成都徒弟数百人，称“通天教祖”。人高、秃头、健谈、声宏，善扬琴、胡琴、川戏、化学。喜酒，住成都青莲巷。记忆力好，《伤寒论》倒背如流。善社交，常去上海，与黄金荣私交甚厚，在沪亦有医名。其人名气大，学问广，但性高傲。书稿有《上达医话》《伤寒原旨》《金匮新解》。成都名医廖冥阶（成都铁路医院原院长）与他交厚，何伯埙、李斯炽、邓绍先等医界名

人向他学过医。

文老走了，带着喜悦也带着憾事走了。每忆及此，我心情起伏，敬佩、缅怀、遗憾、感叹、百感交集。我不知为什么，深思着、深思着，总想给自己一个答案。

撰写人简介：

陈先赋，男，1941年生，重庆市人，医学史专家、新闻学者。196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74年调成都中医学院工作，历任《成都中医学院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报》）主编、《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后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常任编辑，并任成都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医史文献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成都市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高校校报研究会秘书长、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地方志编委会特聘编辑等社会职务。出版著作有《四川医林人物》《四川名医传》（上集）、《成都中医学院发展简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和新闻作品数百篇。个人事迹录入《中国知名专家学者辞典》等人物辞典。

从十二桥走上中医传播路

——一位成都中医药大学老校友、老员工、老报人的龙门阵

撰写人 / 毛嘉陵

2021 年春节刚过完，就收到 30 多年前我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原成都中医学院）工作时的老领导万德光校长的微信指示，学校正组织讲“成中医故事”，让我将当年创办《中医药信息报》的经历写出来。当时我虽然一口答应下来了，但心里却担心别人会不会认为这是在自我炫耀。不过又一想，这段中医药现代传媒史迹，虽然是我发起创办的，但并非仅靠我个人所能完成的，其背后有着当年学院不少老领导老专家的支持和指导，可以说是一种集体创作的成果，值得纪念。因此，有必要用文字将其记录下来，至少可以为学校校庆增加一点可供回忆的素材。

1983 年 9 月，我毕业留校被分配到图书馆工作。为什么要分配中医本科毕业生到图书馆工作呢？有关部门领导给我的解释是，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要加强图书情报工作，更好地为中医药发展服务。到图书馆工作后，让我负责看管未公开发行的内部资料的阅览室，但并没有情报研究的职责和任务，中医药行业出的内部资料似乎就是当时的中医药情报工作了。这项工作看似很重要，但实际上在当时大家并不清楚该怎么搞。正在迷茫之际，第一届四川省科技情报工作会召开了，我代表学院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写了一个如何做好学院中医药情报工作的报告，提交给图书馆石云锦馆长和当时分管图书馆的学院副院长万德光，受到了两位领导的赏识。在随后正式设立中医情报室时，就任命我为该室副主任，毕业才半年多就上了一

个副科级。即使如此，仍然难以消除对个人未来发展迷茫的焦虑。坐在冷清的内部资料阅览室中，常常独自一人寻思着该怎样突围，闯出一条个人发展的路来。终于在某一天发现，中医不仅已有公开发行的期刊，而且还有非公开发行的内部资料，但却没有报纸，这就给了我企图填补中医媒体空白一次绝好的机会。

1983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编著的《第三次浪潮》由三联出版社出版。由于这是一本既有争议又十分引人注目的著作，其从社会学和科技发展的角度对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的信息时代所呈现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阐述和预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在当时该书的出版，已不是一本新书上市这么简单，而几乎成了一个极有影响的社会事件。在当时的知识界，似乎没读过该书就有很落伍的感觉。在中医领域也是如此，侯占元副院长在其主张中医要发挥优势时，也借用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理论来看中西医学产生和发展的不同特点："中医药学基本上是伴随'第一次浪潮'即农业革命产生发展起来的；而西医学是伴随'第二次浪潮'即工业革命产生发展起来的，由于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所以在方法论上各有特色，也各有优势。"

基于以上想法、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潮，我在1984年上半年向学校提出了创办全国第一张中医药行业专业报纸的想法。为了体现中医药在第三次浪潮中的生存和发展，取名为《中医药信息报》。然而，由于当时成都中医学院的经费十分有限，全年仅有200多万元，因此这让学院领导很为难。在我多次"纠缠"下，李明富院长才终于同意了，但学校在做了很大努力的情况下，也仅能提供8 000元作为办报的启动经费。李院长在学校办公会上说了一句激励我一辈子的话："如果你办报能办得成功，当然很好。如果不成功，就当是学校丢了8 000元。"这无疑给了我巨大的压力。这一关过了之后，我就开始向四川省委宣传部写申办报告。我将起草的申办报告交到学院办公室，没想到院办吕主任在我的申办报告上修改得满纸都是红色。虽然他没有当面批评我，更没有嘲笑我如此语文水平怎能办好报纸，而我却深感无地自容。在感觉很没面子的同时，也暗下决心要从语文写作开始补课。接过吕主任修

改好的申办报告，我非常虚心地认真学习了吕主任的指导意见，从中似乎一下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似乎懂得了如何才能写出精炼的、有逻辑性的文章。说到这里，想起了当年有一个不好意思提及的个人隐私，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的现在，已不怕讲出来，那就是今天谁也想不到这些年以文为生的我，在1978年高考中唯一不及格的科目，竟然就是语文。现在想起来都像是一个冷幽默。

1984年下半年，将学院的申办报告正式呈送到四川省委宣传部，之后的几个月都没有消息，以为没戏了。转眼就到了1985年上半年，突然得到通知，让我去取同意创办《中医药信息报》的批文，当时我的心情可谓欣喜若狂。拿着省委宣传部的批文，又到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办理报刊登记手续，很快就拿到了《中医药信息报》的报刊代号：61-48。

办报虽然有了合法手续，但并不意味着就一帆风顺了，还有一个又一个问题等待解决。首先就是征订和发行问题，那时的报刊还没有自办发行，都必须通过邮政局征订和发行。到成都市邮政局发行科去办理被拒，他们嫌行业报纸的发行量太少，费力不挣钱。如果他们不接手，报纸根本就不可能存活。在寻思如何解决发行问题时，突然想到了四川省于1982年在全国率先召开了振兴中医药大会，被中医药行业誉为“振兴中医之先声”。四川既然是振兴中医的福地，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办一份宣传中医药的报纸却得不到发行渠道的支持，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啊。但用这些理由去给邮政局论理，估计他们也不会买账。这可怎么办呢？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之际，想出了一招，何不给领导写信求助。于是，大着胆子给分管文教卫生新闻出版的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还没过几天，成都市邮政局发行科科长就到学院来找到我，表示要登门致歉，并爽快地承诺一定做好《中医药信息报》的发行工作。由此，《中医药信息报》才被列入1986年全国报刊发行目录，并从1986年1月1日正式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当时，真为省上解决问题的高效而赞叹，后来也一直没有机会向康省长当面致谢。

在当时创办报纸的启动费，一般都需要5~10万元。我们的办报经费只有8 000元，仅可购买两吨多新闻纸。我们创办报纸的这种困境得到了《四川日报》

印刷厂的同情，业务科周科长积极地帮我们想办法，提出每次从别家囤纸中挪出一些来给我们用，印一次付一次款，这样虽然不需要占用大量的购纸资金，但却给印刷厂增加了管理上的麻烦。当然，这种用纸方式，相当于是吃百家饭，有的纸黄一些，有的纸又白一些，因此报纸的合订本就显得很花哨，这确实是当时的无奈之举。

《中医药信息报》于1985年7月1日正式创刊。在1986年正式发行之前，除了创刊号之外，还分别于1985年8月15日和1985年11月1日共印刷了3期试刊。由于从未办过报纸，也不会排版，印刷厂周科长递了一张《文摘周报》和几张划版纸给我，让照着学。创刊号仅4个版的小报，就花费了两天才排好版。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排版，划好版之后，需要交排版师傅捡铅字进行排版，不仅速度慢，而且一旦排好版之后，就不能大调整，否则排版师傅就很不乐意，相当于重新排版。在排版车间高噪音中校对，很是费劲。那时的印刷技术印出来的报纸，图片的清晰度很差，装饰的直线条也常常是弯弯曲曲的。

在创刊号印出来之后，必须想办法来广泛宣传、扩大影响、增加订户，其中最老套的方式是向各主要中医药机构免费邮寄赠送。为了节约开支，我还自己用面粉熬糨糊来封装邮寄试刊，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

1985年，《中医药信息报》还在试刊中，《健康报》记者胡京京在得知我们办报的艰辛后，写了一篇介绍我们几个年轻中医办报事迹的通讯稿在报上发表，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健康报》的这篇报道，对正处于艰苦创业阶段的我们来说，可谓雪中送炭。由此我与胡京京成了一生的挚友。

我发起创办《中医药信息报》，既是一种被迫之举，也是信息社会到来后的一种必然选择。虽然说是办了一份报纸，但却并非是倾向于以新闻为主的报纸，这是因为作为中医药行业，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毕竟有限，因此更倾向于将其办成为一份专门传递中医药行业信息的报纸，这样不仅可以弥补慢节奏的期刊出版在行业信息传递速度上的不足，而且更是为了促进中医药的学术交流，以多维信息激活中医药专业人员的观念和开阔中医药的学术眼界，以独具的有前瞻性的眼界面向未来。从以下由我撰写的《中医药信息报》创刊词就反映出了以

上追求：

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中医药学，以其独有的缤纷色彩和光芒，引来了全球的注目，国内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医热”。在这股热潮中，中医药信息急剧增加，它们急需广泛地扩散和被充分地利用，以造福于人类。纵观中医药学发展史，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闭关自守，学术交流贫乏，信息流通渠道在相当程度上的阻滞，是中医药学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要振兴中医药事业，就必须高度地重视信息，充分地发挥信息的效益，同时还要着眼于未来，通过深入地分析研究信息，预测中医药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这一切就是促成本报诞生的重要因素，经过多方的努力，《中医药信息报》终于在1985年7月1日问世了。

本报的宗旨：传递杏林信息，开发智力资源，振兴中医事业。祖国医药学是千百年来炎黄子孙智慧的结晶，具有一套独特的科学理论体系。本报力图保持这一鲜明的中国特色，努力继承其精华，但更注重祖国医药学的发扬光大，要努力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以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本报将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特别注重传递那些不很成熟甚至与传统理论有分歧但言之有理的新思想新学说。本报还将开辟中医药信息市场，为搞活经济服务。

本报不尚空谈，试图通过今后的不懈努力，及时地传递实在的有价值的能给人一定启迪的信息，以推动中医药学术之发展。我们也期望《中医药信息报》这位杏林信使，能够成为您决策的参谋，工作的助手，致富的帮手，学习的良师益友，健康生活的伴侣，能否做到这些，还要请广大读者朋友都来关心和爱护它，让我们共同为它的健康成长而努力吧！

创刊词中强调“特别注重传递那些不很成熟，甚至与传统理论有分歧，但言之有理的新思想新学说”，这就确定了办报的方向和基本的编辑原则，从而才有可能实现多样化信息的传播和促进百家学术的争鸣。

从我设计的《中医药信息报》报徽就可以看出，当时存在着要对中医“革命”的心态，我将大家熟悉的太极阴阳鱼图案做了一次更改。太极图中间本来是用S线条分割代表阴阳的黑与白，将其S变为Z形放射状的空白，以此

寓意要使中医药的内核发生“裂变”，并产生革命和彻底颠覆传统。多年以后，终于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幼稚，我才活了几岁，能这么简单地就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和文化传统都推翻了？经过多次深刻反省，我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逐渐走上了一条回归传统、尊重优秀文化传统、宣扬传统文化的道路。

《中医药信息报》创刊筹备期间，我很想请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杨超题写报名，因为杨老对传统文化很有研究，而且也写得一手令人称绝的好字。但苦于求书无门，后来得知侯占元副院长与杨老熟识，于是就准备去求助侯老。去之前我想，自己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知侯老是否愿意提携，结果没想到他满口答应，并亲自出面请杨老为我们题写报名。几天后，侯老带着我到了杨老的家。到了杨老的家，杨老拿出了早已写好的“中医药信息报”六个大字，我捧着这幅珍贵的书法作品，在感到异常兴奋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感受到了两位老前辈对我们新一代岐黄传人的殷切期望。

后来，报名的书法多次变更。请杨老为报纸题写报名，在 1985 年 7 月 1 日创刊时启用。由于杨老将繁体字和简体字混写，因此在 1986 年 10 月 3 日改由书法家刘奇晋书写成简体字。刘老师写的是比较清秀的行书，用在报名上似显单薄，遂又请书法家谢季筠书写行楷，线条厚重，结体在稳重中有一定灵动，于 1987 年 1 月 2 日启用。后来发现有报纸使用类似马赛克组合的电脑体，又于 1988 年 6 月 25 日使用我自行设计的电脑体。1991 年 1 月 6 日之后，又恢复使用谢季筠书写的报名，一直到 1995 年 12 月 30 日。在报纸创刊时，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卫生部中医司顾问吕炳奎，知名中医专家高辉远、董建华、方药中、王玉润、黄星垣、李聪甫、哈荔田等纷纷题词祝贺。该报创刊时，报社没条件按一般报社那样组建整齐的队伍，各种级别的头儿、大小编辑、有名无名的记者。实际上就只有我一人，我顶着一个没有正式编制和行政级别的编辑部的主任头衔，后来根据报社的专业称呼改成总编辑，拉了几个留校的同学来当兼职编辑。创刊号一至四版的编辑分别是毛嘉陵、忻路、刘崇云、林齐鸣。后来陆续参加编辑工作的校内兼职编辑有吴军、

刘雪松、刘国辉、王小松等。后来，根据报刊整顿的要求，报社必须由政府部门主管，必须有正规的组织机构，负责人必须有高级职称。因此，中医药信息报进行了大调整，由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与成都中医学院合办，学院李明富院长担任社长，万德光副院长、学院图书馆石云锦馆长和杨霖副馆长任副社长，石云锦任总编辑，我当时中级职称都还没有，只能改任副总编辑，负责具体的日常工作。随着报纸工作量的不断增加，我就不再负责中医情报室的工作，专职负责报纸的编辑管理工作。从最初的我一人干，逐渐增加到3名专职人员，到1988年底我调离成都中医学院时，已有7名专职人员。在办报过程中，得到了卫生部中医司及后来成立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支持，从最先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胡熙明的秘书史宇广处长、科技司原处长沙风桐，到后来的原办公室王凤岐主任，都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大力支持。

当年办报没有电脑排版，也没有电脑美术设计，铅字的字体又很单一，要想有点变化就必须自己给自己搞“手工订制”。很多栏目图标中的图案和美术字，都是我用钢笔一笔一笔画出来和写出来的。也说明，那时候的人，动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做出来的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

创刊号赠送出去之后，似乎走上了顺路，但未曾想到却引来了一场风波。在创刊号上，我选择了当时支持中医且最有影响的科学家钱学森院士的一段讲话，安排在《中医药信息报》第二版上发表，标题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近说——中医很重要，但不是现代科学》：

“中医很重要，宪法上都说要发展传统的医学，但是这样的处境现在很困难，有的同志甚至说中医现在已濒于消亡。我想，问题的症结是：中医不是现代科学，是经验。中医治病确实有效，但是怎么回事，恐怕老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医书上也说不清楚，无非是阴阳二气啦，木、火、土、金、水啦，这些不是现代科学的道理。中医上的东西是知识，但不是科学。也可以用恩格斯的话说，中医是经典意义上的自然哲学，而不是现代科学。自然哲学里虽然有丰富的经验，但包括了很多猜想的因素，因此不是科学，但是我觉得，说不是科学并不等于就不重要。”

这篇讲话引来了一些中医专家的反对，其关键点就是钱学森说“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反应最激烈者是一位知名中医专家，他在讲课时将这个观点猛批之后，又当场将报纸撕得粉碎，以表愤怒之情。

1986年2月19日，《中医药信息报》第二版上发表了中医研究院于卫东的文章《中医研究的对象是人体，还是典籍？！——对中医研究对象异化问题的初步分析》。该文的主要观点是：

自明清以来，由于宋学及清代朴学的影响，中医理论研究出现了一股逆流：把经典著作的注疏、考据视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形式，而忽略对经验事实的理论概况，从而使中医研究对象由人体异化为典籍。

为避免误解，文章最后还专门说明：

中医研究对象的异化只是整个中医研究中的一股逆流，而非全部；中医文献学作为医学的一部分，其研究对象理应是中医文献，这与“研究对象的异化”不可同日而语。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没几天，有一个全国性的中医文献会议召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成都中医学院文献所所长赵立勋会后讲，在开幕式以后的学术交流、小组讨论和闭幕式上，都对该文有激烈的议论和愤怒的批判。由于该文作者于卫东是在中医研究院工作不久的年轻中医，很多本单位的人都还不认识他，所以与会的中医文献专家都在打听他是哪个单位的，敢发此言是否有什么大背景。

《中医药信息报》创办不久，就接连出现这些争议。如果按照创刊词中强调的“特别注重传递那些不很成熟，甚至与传统理论有分歧，但言之有理的新思想新学说”来看，不仅没有错，而且还可以说是很成功的，至少扩大了报纸的影响。但在几乎是死水一潭的中医学术界，无疑是被我们这群年轻的编辑和年轻的学者搅乱套了，难怪引发众怒。很快，学院中就有知名专家找到万德光副院长提意见，怎能将办报纸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来负责。毫无疑问，这肯定给万院长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时至今日，我也不清楚万院长当时是怎样与那些提意见的专家进行周旋的。对此，万院长不仅没有批评我，而是出人意料地对我说：“小毛，以后你该怎么干

还怎么干”。万院长的那句话和处事态度，既帮我顶住压力，又鼓励我继续努力加油干，不仅让我感动万分，而且还让我终生难忘。能成为这样开明而有胸怀的领导的下属，无疑这是我刚踏上人生路的一种福气。同时，这对我一生敢于从事一些具有开拓性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养成了必须具备的勇气。否则，就只能成为一个文弱书生。不过，现在再回首，可以发现以上两个引发争议的风波，确实存在着我们中医专家未仔细理解而又过度解读，甚至知识结构缺陷的问题。

由于有成都中医学院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我能成功地发起创办《中医药信息报》。经过大家的努力，《中医药信息报》在国内外中医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了有关领导和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在创办的10余年间为中医药学术和市场信息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使自我感觉在图书馆中医情报室坐冷板凳的我，在全国中医药界很早就有了一点小名气。

1988年3月8日，作为青年中医代表和中医媒体人，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接见和合影，这可是中医药界至今唯一的一次最高规格的领导接见，我将这张合影照片珍藏至今。2016年全国最先成立的四大中医药院校都在筹备60周年校庆时，北京中医药大学徐安龙校长让我将合影照片复制一张给学校博物馆收藏。于是，我复制了两张，分别赠送给北京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和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

在1985年同时创办的中医药报纸主要有四川的《中医药信息报》、浙江的《中医报》和上海的《上海中医药报》三家。《中医药信息报》以传递中医药行业信息、发表不同学术思想和观点为其办报特色；《中医报》以中医药行业新闻和发表科普文章见长；《上海中医药报》坚持以上海的地方新闻信息和科普为其办报方向。由于种种原因，《中医报》和《中医药信息报》在办了十来年之后相继停刊。《中医药信息报》虽然早已因故停刊，但它作为中医药行业较早创办的专业媒体已经载入现代中医药发展史册。这三份报纸虽然都面向全国发行，但仍属于地方性报纸。直到1989年1月2日《中国中医药报》创刊，才有了国家级的中医药新闻媒体。2000年10月，我到《中国中医药报》工作，能够得到该报陈贵廷社长的重用，显然也是基于我曾经办过还算有一定影响的《中

医药信息报》。2011 年，成都中医药大学准备筹建北京校友会时，党委副书记傅春华力推我担任校友会首任会长，在担任 8 年会长期间，接受了宋岚、陈学先和陈琼三位校友总会领导的直接领导。学校各级领导对我的信任，也许多多少少也与我办过《中医药信息报》有关。

撰写人简介：

毛嘉陵，成都中医药大学 1978 级校友，中医药老报人、中医药评论员。曾在《中医药信息报》《中国中医药报》长期从事中医药新闻采编和评论工作，后又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文化、中医药传播学、中医智库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为中医药现代报媒传播事业的早期开拓者、中医传播学开创者、中医智库建设倡导者、全国第一份中医药行业新闻信息报纸《中医药信息报》发起人、全国第一部中医药传播学创新教材《中医文化传播学》主编及修订版《中医传播学》联合主编、全国第一部中医药智库年度咨询报告集《中国中医文化蓝皮书》主编。曾先后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北京中医药文化传播重点研究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金匮中医药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智库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学术顾问，中华中医药学会国际部学术顾问，中华中医药学会国际智库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专家。

我校在中医院校率先成立五官专业

撰写人 / 熊大经

记得大概是 1983 年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参加学校领导和教务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会上由教务处老科长向质彬同志传达了国家教委（今教育部）欲对现有之专业目录进行修订。专业目录是关系到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内涵和专业培养方向，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核心，关系重大，各级教育部门都很重视。国家教委将有关中医方面的任务也只分配给“老四所”中医院校承担，并按各学校的实力分配任务。

我校负责对“内科”“眼科”“耳鼻喉科”的论证。为什么将这三个科放在我校呢？因当时我校“内科”实力很强，在国内也是名列前茅的；眼科是因为有国内外知名的、中西都认可的陈达夫老先生；耳鼻喉科是才成立不久的新科，本来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们，负责此次论证这也算是沾了陈老的光。可见，大师在一个学校的重要性。

会上分配了任务，内科论证由王开林老师负责，眼科论证由张济南老师负责，耳鼻喉认证自然就落在我这新毛头身上。他们两位都是教学临床经验相当丰富的年富力强的中年老师，他们那两科都有很深的学术沉淀，有很多老先生做后盾，有问题有人可请教，有很多年青老师做帮手。而我是毕业不久的新手，当时之压力可想而知。接下任务后，才发现这是一个烫手山芋。从何下手？怎么写？没有先例，没有现成样板可循，也没有帮手，只能硬着头皮上。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三十来岁的我接下这任务真是要有牛犊之勇。睡不着觉有什么用？吃不下饭有什么用？经过近二十来个夜晚的熬更守夜，终于憋出

初稿来，经过学校组织专家几上几下论证，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再提交专家论证。最后打印成文，才将300余份征求意见稿发至全国各中医院校、中医医院。征求意见稿发出后，收回200余份，收回之意见稿中不乏一些十分中肯之好主意。我们又根据意见修改，开了几次会，几上几下后形成最后之稿件，于1985年8月提交国家教委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专业目录论证会。学校决定由谢克庆副校长带队，我、王开林、张济南组成成都中医学院代表队。

大会会期3天，前2天为小组会，各小组分别对各专业目录进行论证。大家对设立眼科专业、耳鼻喉科专业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应将二者合起来设立五官专业更合适。

然而，第三天进入大会讨论时，会议主持人在听了小组长汇报后立即表态：认为不应设立五官专业，其理由是从来没有这个专业，不应新设立。我们听了后立即蒙了，这几年的工作都白辛苦了，况且小组会上各中医院校的专家老师们都觉得应该设立五官专业，这个大会主持却一言否定。要知道这是有关专业目录论证的最后一次会议了，这就是终审会，急得我们一时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当时我也顾不得许多了，立即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将这2年来我们的工作流程，和各地专家对设立五官专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做了说明。虽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由于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会上据理力争，看得出会场上大家对设立五官专业还是认可的。后来眼科张济南老师、王开林老师他们也相继发言，支持设立五官专业。记得还有其他院校的老师们也发言支持我们，后来又有几位专家发言支持设立五官专业，一度弄得大会主持人很尴尬。

当时，由于我们职称低，出差不能坐飞机。成都无直达哈尔滨的火车，需要经几次转车（成都—济南—沈阳—哈尔滨）才到哈尔滨，舟车劳顿，十分辛苦，当时人年轻好像也没有觉得什么。这下要从哈尔滨返回成都，心里直发怵，要知道那时买火车票是何等的难，更别说卧铺票，还要转几次车，真是头都大了。后来，学校同意我们从沈阳坐飞机回成都，几个年轻人又从哈尔滨坐火车到沈阳，在沈阳待了几天（沈阳到成都的飞机不是天天有），才买好飞机票飞回成都。

回到学校，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国家教委最后的批复文件，经历漫长、无所适从、不知是好是歹的等待。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从其他途径得知国家教委通过了新专业设置，并决定从1988年起开始布点在成都、广州2所试点学校招生。就这样我们国家的中医高等教育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专业——五官专业，我校也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准备，于1988年开始招收五官专业学生，五官1988级也成了我校第一届该专业的学生了。从此我校就成为国内第一个有五官专业的中医院校。

撰写人简介：

熊大经，男，1946年12月生，重庆人，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卫计委首席专家，四川省十大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内首个中医耳鼻咽喉科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同行评议专家，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评审中心核心专家。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耳鼻喉口腔科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研制的“鼻渊舒口服液”等用于临床近50年。先后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厅局级科研项目6项，获省部级奖励3项，厅局级奖励5项，主编《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十二五”“十三五”全国规划教材，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9部。

外语教学随感

讲述人 / 黄嘉陵

我在学校任教 30 余年，见证和参与了学校外语教学和中医药国际传播从拓荒到跨越式发展的历程。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大学毕业来到成都中医学院，得知只有中医和中药两个专业，看到从大门可望及后门的校园，听到人们“啥都烫，只有开水不烫”的调侃，对照大而美的西师校园，倍感失落。“文革”后学校开始设立英语课时，教学条件和师资非常薄弱，仅有六七名英语老师，没有全国统一教材，我们只得使用上海二医大编写的西医院校英语教材。由于中医院校的专业特点，学生没有学外语的传统也不重视外语，英语的起点和水平普遍较低。

随着改革开放，英语教学受到国家和各类学校的高度重视。教育部颁布了



黄嘉陵老师接受全媒体中心采访

新版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强调和促进英语教学。学校也将英语设为必修课程，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和难度可想而知。在如此高的要求和如此简陋的条件下，我们开始了艰苦奋斗。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我校外语教学经历了教研室（教务处直属教研室）、基础部、社公部、国际教育学院和外语学院的管理体系，教师数量也由几名增加到 60 多名。

早期，在学校的鼓励支持下，我们开始摸索尝试各种教学形态和方式去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针对当时学生英语起点和学习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我们决定因材施教，分层级教学，采取分“快中慢班”的教学形式，打破班级界限，将同一年级的学生分成快、中、慢班三个层次，采取不同教学进度与教学方法，对快班的同学增加教学内容和难度，让优秀的学生尽快成长，高效学习英语；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则注重夯实基础，一步步提高英语水平。这样的教学改革无疑增大了教师的备课量和教学难度，教研室的老师们不辞辛苦，同心同力，无怨无悔，在备课上下大力气，用不同教学方式甚至采用不同教材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分级教学对教学管理也是一大挑战，给教务管理带来很大难度。由于打破班级按年级排课，教务科专门留出同年级外语课统一时间，交给我们优先排课，尽管给教务科的全校排课工作增加了难度和工作量，但他们仍然全力配合支持我们的教学改革。在此特别想提及曾经支持和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取得成果的历届教务长及基础部主任们，他们是曾诚厚、杨殿兴、邹士凌和陆懋宣、傅元谋、邓中甲等老师，还有人事处、设备处和后勤处等部门。当年有关管理部门的统一协作，在师资、财力和物力各方面积极支持教学改革是外语教学从落后到飞跃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英语教学大纲注重阅读，当时学生的英语口语与听力被忽略，基本上不能听，不能说，这种“哑巴英语”现象非常普遍。20 世纪 90 年代的全国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在继续强调阅读的同时，提出了读写译并举，兼顾听说的教学要求，首次把听说提到了较为重要的位置。为让学生能够开口说英语，我们要求老师尽量在课堂上用英语授课，但考虑到学生的情况，更多时候会用英汉结合的方式来讲授。在万院长和设备处的鼎力支持下我校首间语言实验室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建成，学生的听力水平得以迅速提高。我们也在校内组织各种与英语相关的

课外活动来提高学生的口语水平，实现课内课外学习与实践的结合，组织学生演唱英文歌曲，排练英语剧，设立学校英语角以及同外事部门共同建立翻译学会等。我一直主张学生要多参加校外活动，例如联谊会和英语角之类，要学生多与外校同学进行英语学习交流，同时也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英语竞赛。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留学生来校学习中医，通用语言为英语。这是一个学习和提高英语的方式，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机会，我们紧紧抓住机会，鼓励学生多与留学生交流，并向外事部门输送优秀学生作口译工作，极力为学生创造提高英语水平的机会，也为他们营造外语学习气氛。

国家从1986年开始举行全国英语四、六级标准化考试，头两年因学生英语功底薄弱，我们不敢参加四、六级考试，1988年我接任教研室主任后向学校提出组织学生自愿参加考试。我校当时的英语教学状况位列省属院校末等，同川音、川美、体育学院同类。我们必须要朝前走，不能甘于落后，虽然学生起点低，还是要走出艰难的第一步，以考促练，以考促学。当年分管教学工作的万德光院长对我的提议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我即让老师们到各班动员学生报考四、六级，最后只有30多人报名。我们将这30多名学生组织起来针对四、六级考题进行突击训练。结果只有两三名同学通过了考试，这让我记忆深刻，但坚定了努力方向：中医学院的学生一定要顺应人才市场需求，在英语学习和语言能力上狠下功夫，全面提升自己，成为懂中医、会英语的复合型人才，提高自己就业竞争力并推动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其后，四、六级报名的人数和过级的人数逐年递增，现在一次性通过率已达到50%，早已摆脱落后排位。

2001年，学校已经扩招，学生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一个检验我们十几年奋斗效果的机会来到面前，那就是“CCTV杯全国首届大学生英语辩论赛”的西部赛区竞赛。我们先在校内举行口语选拔赛，选出不同专业的四位同学，代表学校参赛，同西部地区各大高校对垒。面对着西部地区的国家重点高校和综合大学，而且是英语专业的学生，我们知难而上，只求学习交流，开阔视野，不求名次。那时我校的英语教学虽有极大改观，同国家重点大学的水平相比，我们还有相当大距离。赛前我们组织口语优秀的老师对这四位同学进行了专门

的英语口语培训与辩论操练，除英语老师外，还邀请外教和辩论经验丰富的张新渝老师作指导。比赛地点在电子科技大学，其他参赛队伍都来自重点高校，实力强劲。我对评委和外校同行们声称我校是为学习而来，大家也没对我校有戒备之心。然而几轮比赛下来，我们居然出人意料地进入了决赛，令在场的专家评委眼前一亮。学生们不畏强敌，迎难而上，在决赛中发挥了自己最佳水平，最终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排名仅次东道主电子科技大学。当时在座的专家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颇为惊叹，从这匹黑马见识了我校的实力，也刷新了对我们这所中医院校的认识。此后，大家对我校再不敢小觑，而我们也由此开动了参加各种外语竞赛的战车，成果累累，获奖无数，展示了我院学生的英语素养和风采。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校，恰逢中医随着改革开放春风迎来五洲四海留学生和进修研讨的外国学者，当时负责学校对外交流工作的范家永老师即安排我接待外国来访学者并为留学生作教学翻译。那时我对中医一窍不通，甚至读不懂中医很多汉语表达的内涵。我咬牙仓促上阵，边学边干。业余时间自学中医基础理论、诊断学、中药学等教材，还到中医专业的课堂听课，向中医老师请教疑难词义句义。为学校第一代中医老专家做翻译的过程是我被中医从浸润到理解感悟的过程，令我终身受益。范家永老师的引导，李仲愚老师的开释，还有余仲权老师和杨介宾老师等先辈以及周训伦老师、苏树蓉老师等极其优秀的中医老专家对我的专业方向的影响和潜移默化作用，至今感怀于心。我将所学的中医药知识与英语结合，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参加全国中医药院校第一套英语教材的编写。其后开创性地编写国内早期中医英语教材和中医药辞典，且率先为硕博士研究生开设中医药英语课，我校成为国内首批少数开设该课的中医院校之一，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英语教学和科研成果在国内中医院校为同行称道，也受到在校各届研究生的欢迎。如今，成都中医药大学已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外语学习已蔚然成风，外语教学已成熟有序，不断涌现的优秀青年教师已成为教学主力军。

在学校建校 65 周年之际回望与她同行的三十年职业生涯，抚今追昔，百感交集，然而无愧无悔。如今学校的规模和环境早已跻身大而美高校之列，未

来之路会更加平坦光明。相信学校的明天会更加辉煌，因为她满载着我们的祝福和希望。

本文由黄嘉陵口述，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整理。
采访时间：2021 年 4 月 18 日
采访地点：温江校区行政楼
文字整理：陈治佑
摄　　影：欧阳徐嘉

讲述人简介：

黄嘉陵，女，1950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英语专业 1977 级学生，文学学士，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工作 30 年，现退休。曾任外语教研室主任、社公部副主任、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世中联翻译专委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翻译分会常委，成都市政协委员、常委，民盟成都中医学大学委员会主委，民盟成都市委常委，民盟四川省委委员。

我的针灸人生

撰写人 / 罗永芬

我于 1958 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经过六年的努力学习于 1964 年毕业，留在学院针灸教研室，从事针灸的教学、医疗、科研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针灸人生。

由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针灸这门传统医疗技术日益受到外国人的重视。

1983 年我校接收了第一批从法国来学习针灸的留学生，当时由于法语人才的缺乏，我们请了锦江宾馆的王青山同志来做翻译。从那以后，每年都会接受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加拿大、波兰、挪威、伊朗、新加坡、以色列、希腊、巴西等多个国家的学员，来院进修和学习针灸。



1958 年，罗永芬于成都中医学院



1983年，首批来院学习针灸的法国班负责人与本校教师合影

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培养翻译人员，从研究生中挑选出外语水平比较好的同学担任翻译，一方面可以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同时在教师的指导下临床能力有较大的提高。这些担任翻译的同学，毕业以后相当一部分去了国外，有的开办了中医诊所，有的开办了中医学校。后来这些去海外发展的同学们也组织外国学生来校学习，推动了传统中医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由于我校对外交流工作做得好，每年都有十多个国家的学员来学习，短期的培训班已经不能满足国际上对中医药人才的需要，于是有多个国家邀请我们去国外讲课。我先后去过美国针灸学会纽约荣军医院健康中心、新加坡中华医学会、德国麦滋疗养中心等培训和讲课。并在新加坡挑选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作为博士生培养，这些学生现在都是新加坡的中医药骨干。

首赴亚洲阿联酋

阿联酋是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的西亚国家，属热带沙漠气候，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十分丰富。我们去的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的沙迦。

1985年12月至1988年2月，我参加国家医疗队去沙迦中国门诊部工作。

当地居民住院医疗和吃饭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在那里办的是中国门诊部，主要开展针灸及推拿治疗，来我们这里治疗都是自费，针灸一次100美金，火



1986 年，罗永芬在沙迦中国门诊部工作

罐一次 40 美金，推拿一次 100 美金。我们这个医疗队是国家唯一一个由对方给我们发工资的，每月工资 3 000 美金（由国家收，我们只能多领一份国内自己的工资）。一年休息一个月的假，还有往返的机票。我们在那里开展的针灸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所以当地居民愿意自己花钱来看病，而且看病的人数不少，这个门诊还在那儿开了很多年。

远赴非洲莫桑比克

从阿联酋回国一年多突然有一天省卫生厅通知学校：要我担任国家医疗队第七队的队长，赴莫桑比克工作。据说原定队长是一名西医，莫方要求派一名针灸大夫。卫生厅通知我的时候说，我有出国的经历又是针灸教授很合适，希望学校支持。当时该队学员已经经过半年多的葡萄牙语培训，我因得到通知晚，就未能参加葡萄牙语培训。

我们队由针灸、手外科、烧伤科、口腔科、骨科医师及翻译、厨师组成赴莫桑比克国家医疗队第七队，于 1989 年 8 月 25 日出发，8 月 29 日抵达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中心医院（以前的医疗队都在乡下）。这所医院有 1 500 张床位，还有一个急救中心。我们的医生都分配在医院对口的科室，只有针灸科室要新建。我发现骨科有一套完整的医疗设备，完全可以和专科医院媲美，我要求把针灸

科放在骨科，因为针灸治疗软组织损伤有特别好的效果。骨科的位置在医院大门的侧边，进出方便，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协调，医院给了两间诊室作为针灸科的医疗用房。

在筹建针灸科相关事务的期间，有一天，我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的参赞要我到使馆，大使让我给莫桑比克的一位政要看病。因为患脑溢血 4 年了，他的手指伸不开，拇指不能活动，右下肢运动功能障碍，很容易摔跤，希望我能用针灸的方法给他治疗。经过 20 多天的治疗，效果特别好，他的手可以提公文包，他的脚可以开车。同时另一位政要遭遇车祸以后，颈部受伤，拆了石膏之后，颈部不能前倾和后仰。经过我的治疗，也取得良好效果，颈部活动功能基本恢复。

1989 年 10 月 1 日，我国驻莫使馆召开国庆招待会，多个国家的使节都来我国使馆参会。莫桑比克的外交部部长讲话说："一名来自中国的针灸大夫，治好了我们同胞的病，这是中莫友谊的体现。"有很多人都希望认识一下我这位中国来的针灸大夫。就这样，一不留神我就在马普托"出名"了。后来我走在街上，有的车就停在我面前就说，你是中国的大夫，让我坐他们的车，要送我。

在莫桑比克我先后给多位官员看过病，他们都希望我留在马普托中心医院。一个月以后，医院分配给了我两个诊疗室，我就开始为当地的老百姓看病。当地老百姓看病也不容易，他们要经过一级一级地医院推荐才能到首都中心医院



1989 年，在莫桑比克与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及莫桑比克部级官员参加国庆招待会

就诊。针对这个情况，我就开展了3个月的复诊活动，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病人得到看病的机会。当地较多人都比较肥胖，他们需要用针灸的方法来减肥。我就建议医院提高治疗减肥的收费标准，收点费用来改善医院的条件。我还开展了埋线治疗哮喘，这样他们可以3个月以后再来复诊。

限于当时条件，我们没有办法给家里通电话。和家人的沟通主要就是靠一个月写一封信，写好以后送到使馆，由信使送到北京，再到邮局用航空信寄出，一封信往返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也很想念远在祖国的亲人，在两年的援外工作时间里，我们都没有探过亲，这令当时的其他国家在莫工作的医生以及当地的医护人员感到不可思议。但我们医疗队的全体队员都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这就是中国医疗队的精神，为增进中莫友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圆满完成任务后医疗队于1991年8月28日回到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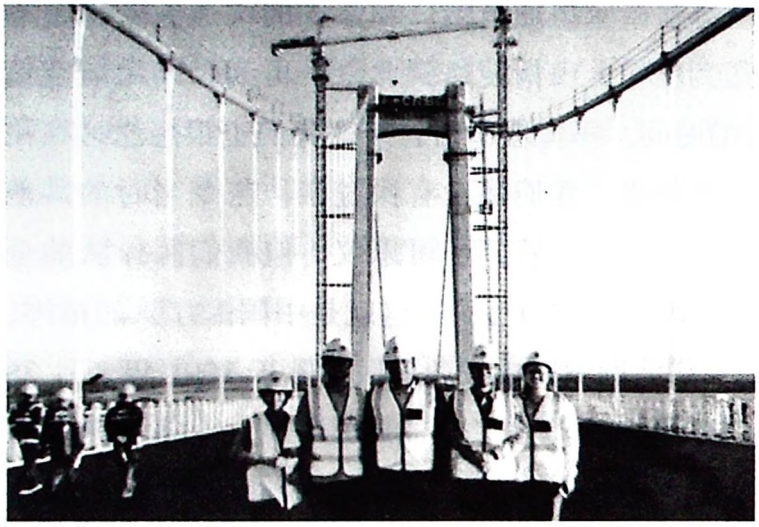
重回故地马普托

当年我就想，现在的援助是我们中国医生去帮助他们治疗，能不能留下一个永久的医疗队？也就是说要培训当地医生，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使他们独立掌握针灸治疗方法，能够充分为当地人民服务。我这个想法在20多年后真的实现了。2018年正好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世界许多国家响应的时候，我



2018年，在莫桑比克培训基层医生的结业合影

又获得了一次到莫桑比克进行半个月针灸培训的机会。参加培训的成员是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选拔的，具有医疗知识的基层医生，经过半个月的培训，他们学会了常用穴位的选择及针灸操作方法、火罐的使用方法。他们认为很实用，特别是对那些需要康复或长时间治疗的病人。



2018年，在莫桑比克国参观中国援建马普托跨海大桥

与27年前的马普托相比，这里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比如，我国援助修建的马普托·卡腾贝大桥，是莫桑比克南部的跨海通道，位于马普托湾之上，是中国与莫桑比克两国基础设施合作领域代表性的项目之一，也是莫桑比克团结的象征。它目前是非洲第一大悬索桥，大桥的建成，使原来要绕行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对岸的交通状况，变成十多分钟就可抵达对岸，这将极大促进马普托·卡腾贝大桥两岸地区的发展。我国还援建了马普托外经凯莱大厦、孔子学院等，也是中莫友谊的象征。

撰写人简介：

罗永芬，女，1940年12月生，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4年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留校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50多年。曾任博士生导师，四川省针灸学会副会长，曾多次应邀赴日本、德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进行讲学及指导临床。1985—1988年曾作为中国医疗队的专家及队长赴阿联酋，1989—1991年赴莫桑比克开展援外医疗工作。2011年1月退休，继续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至今。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讲述人 / 曹泽莉

循着先辈们的足迹前进

作为培养中医药人才工作者的一员，一晃人生80余年，我心中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在这几十年里变得愈发纯粹而深沉。1964年，我从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毕业，被分配到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部任教，直到1996年退休，工作了32年。在此，我想分享我的一些故事。

我是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是受党的阳光哺育成长的一代。年轻时，我就深深热爱党，敬仰英雄人物。保尔·柯察金的一生深深地影响了我，“为民族争气”的铁人王进喜、党的好书记焦裕禄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里。打小我便立志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做一颗



曹泽莉接受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

坚守岗位、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决心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因此，我努力向党组织靠拢，时刻以一名党员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首先就在思想上“入了党”，为党的事业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的信念。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曾被评为“先进个人”“优秀母亲”和“优秀共产党员”。这些红旗下的荣誉，不过是我循着先辈们的足迹在慢慢向前。

教材改革　边学边教

1977 年恢复高考前，我一直为学院医学系本科学生上课，并多年为学校附属医院卫校学生上生理课。1978 年起在针灸研究室工作。许多渴望获取知识的年轻人经过千辛万苦考入了大学，我校也迎来了一批批热爱祖国医学的学生。他们聚精会神、勤学苦练，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这个机会难得呀，学生们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我们当老师的见了这些爱学勤学的娃娃们欢喜得不得了。

我校一直把培养高等中医药人才作为教学目标和义不容辞的责任。虽是一所中医院校，但要想培养一批合格的临床医生，必须抓牢医学基础知识教学这个关键，比如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免疫学等。我所教授的生理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我深深地热爱着这个专业。当时正值新教材改革，这对我们每一个老师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需要重新学习并掌握一些新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边学边讲成了我们的常态。实际上，我们教研室的每一位老师都十分辛苦，当时的生理学教研室总共3位老师，另外两位老师都年长我十余岁，一位是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杨继曾老师，1956 年建校之初就来到我校任教；另一位是教研室主任陆懋宣老师，毕业于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生理学每一学期超 100 课时，在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下，两位前辈仍挤出了大量的时间学习。两位前辈躬耕在前，我作为一位年轻老师更应该努力学习，而且我认为自己应该主动地挑起更多的担子。

我不满足于只学习新的教材。一到了没课的时间，我就往华西跑，见缝插针地去听他们是如何教新的教材、新的知识的，以此丰富我的教学内容，加深我的教学深度。学生们听我的课从不迟到早退，也从不打瞌睡，从孩子们的反

馈来看，大都能跟上教学进度，对生理学也饶有兴趣。我认为，同学们的认可就是对我教学工作最大的肯定。

生理学对大部分同学来说是深奥难懂的新知识，加之孩子们远离课堂十年之久，我担心白天仅有的课堂时间不能让他们充分消化吸收新知识，所以，我每晚都会到宿舍给孩子们补补课。敲开宿舍门，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哪里没听懂，我再给你们讲一次。"有的同学光着刚洗的脚丫子，有的手上还沾着肥皂泡沫，有的正点灯记着日记或写信。一看到我来了，孩子们全都围过来一起听讲……学生们一届届毕业，又一批批涌入，每天晚上我就揣着一本笔记本、一支笔，穿梭在学生宿舍，直到退休。

一心想把实验搞好

针灸学是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在临床实践中疗效显著。我做了许多实验，已经通过人体电生理现象的变化看到了人身上的经络感传现象。但是要想研究针刺镇痛与针刺麻醉的机制，必须深入到细胞生理层面。

当时，全国的中医学院都还没有电生理记录仪，我校为了支持科研工作购进了一台。我也受学校派遣，前往浙江医科大学和上海生理研究所学习相关知识。奈何经费有限，虽说有了电生理记录仪，但其相关设备所需的资金仍然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例如，动物模型实验需要的大脑定位仪就价格不菲。怎么办呢？我们想到，可以对较好的钢材进行加工替代。于是，研究室主任宋开源安排我和另一位实验员开展此项工作。说干就干，我从上海生理研究所带回了图纸后，就和另一位实验室老师魏焦禄一起到 132 厂（现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了工作。

那时的我是一名 37 岁的高龄孕妇，为了节省经费，每天挺着 6 个月的孕肚骑自行车在学校和 132 厂之间往返，十多里的距离跑了很多次。事后有人问我："曹老师，你当时不怕流产吗？"我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只一心想着要把实验搞好。"倘若没有顺利完成大脑定位仪加工这一关键的实验步骤，就无法保证针灸感传机制研究的顺利进行。改革开放之初，科研仪器设备少，所以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当时就有那一种拼命的劲头，一心为了中医针灸事业的发展

而奔波。

我的二儿子出生后，晚上回家，孩子的哭闹声使我心神不宁，无法认真备课，第二天上课时也无法专注、混混沌沌。于是，在和先生一起反复考虑后，我们决定在孩子出生 40 天后视情况断奶，把婆婆从上海老家接到成都照看孩子。恰好一位年轻老师只在集体宿舍睡午觉，晚上就有空出来的床位。白天我还是正常回家，到了晚上就搬去学校睡。那个逼仄的房间常点着灯陪我看文献到深夜。

然而，我常常忽略身体健康，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83 年我确诊得了肠结核和乙肝，肝脏已经肿大到腹腔中部了。终于，我病倒了。即使住院接受治疗也落下了病根，常常复发。学校卫生科的医疗费报账单上，我总是榜上有名。结核扩散后，我经历了 12 次住院，2 次大手术，子宫、卵巢、胆囊、阑尾全切了。才四五十岁的年纪就受此重创，焦虑的情绪也让抑郁症找上了我。终日浑浑噩噩。

好在，亲人的悉心照料、同学们的牵挂和学校的关心成了我的良药。为了继续我热爱的科研及教学工作，不让亲人牵肠挂肚，我积极接受治疗，调整心态，终于健康地回到了岗位。

永远是学生的“曹妈妈”

我爱和同学们在课后聊天，分享新鲜事，也帮着孩子们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不仅是学习问题，更多是生活、人生，还有一些隐私问题。我很高兴他们愿意和我分享这些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因此针灸 1992 级的同学们都叫我“曹妈妈”。

1977 级的一个孩子，叫聂泽谭。学习时潜精研思，一丝不苟。上完实验课，他总会跑来找我：“曹老师，我可不可以再做一次动物实验？”“可以！”他对生理学课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本科是中医学的他，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运动生理专业的研究生。读研后，他还想继续学习，将国外一所知名大学定为自己进一步深造的目标学校。这所大学除了对专业知识有着高要求外，还对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提出了挑战。然而，那时的中国外文期刊少，查阅医学类

外文期刊也不如现在方便。恰好，我的父亲送了我一本全英文的《基本人体生理学》，期望我能进一步深入拓展自己的专业领域。但看着如此可爱又认真的学生，我毅然决定把这本书送给他，后来他使用完又归还于我。果然，他成功被录取了。出国前专程来看望我，感谢我对他的支持与关心。学成以后，他又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成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一直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1982 级的毕业生郑重也让我印象深刻。他目标明确，想在研究生阶段深入学习肌电。因为我曾于 1978 年在杭州和上海生理学研究所进修，在上海生理研究所，我认识了第二军医大学（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的一位老师，他是专门搞肌电图工作的，他曾赠我一本《肌电图学》。它于我来说十分珍贵，但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我还是决定把那本书送给更需要它的郑重。时过境迁，现在的他是四川大学华西医科中心“心理卫生中心”肌电图室的主任、教授、专家。他常向自己的同事和学生提起我说，“曹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

有不少孩子们曾写过许多文字记录我们的师生情分，我深受感动。药 1985 级的唐贤敏写道：“那是我出院后第一次上生理课，我简直犹如坐飞机……真是福从天降，曹老师主动提出给我补课，原来她早已知道我生病住院，晚上，我一切准备就绪到教研室时，曹老师早已在等我了，她询问了我的病情及目前的一些情况，然后打开课本，开始给我讲重点、难点，直到深夜十点过。”还有人说：“在讲解气体溶解度公式时，由于书上仅仅提出了公式，而没有说明公式的推导过程，很多同学感到不好理解，于是，她抽出时间两次与教材作者一起研究，并多方查找资料，然后给同学们再作详细讲解”……

其实孩子们无须言语，这些都是老师应该做的罢了。恰恰是他们的笑颜为我的职业生涯写下了生动的注脚。虽然孩子们已经毕业了 10 年、20 年，但每每回到母校，都会来看我。这一份美丽的情缘一直栖居在我的心中。这么多年我也真正懂得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真正含义。我想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他们托举梦想，看着孩子们拾级而上。

当年这些风华正茂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成了国家医药界的栋梁，为祖国医

药和人民健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看到这些我非常欣慰，他们脚下的路正葳蕤蓬勃、前景广阔。我坚信，在校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我校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果，为我国的中医药事业输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为祖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引擎，这是我的夙愿。

本文由曹泽莉口述，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整理。
采访时间：2021 年 4 月 18 日
采访地点：温江校区行政楼
文字整理：杨雨婷
摄　　影：欧阳徐嘉

讲述人简介：

曹泽莉，女，汉族，成都市人，1941 年出生，中共党员，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1964 年 7 月毕业于四川医学院，被分配至成都中医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96 年 6 月退休。曾担任基础医学院生理教研室主任、成都中医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组织成员。1978 年、1994 年两次被评为成都中医学院“先进工作者”，1992 年被成都中医学院工会女教职工委员会评为“优秀母亲”，2012 年被评为成都中医药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校庆那些事

撰写人 / 马晓蓉

说起每所学校的校庆，对于有母校情结的校友们来说，都是绕不开的话题……我从读大学到毕业留校工作，直到退休，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工作生活了近40年，就连我自己都这样说：40年就没有出过校门。人生经历中的这40年，是见证学校发展的40年，其中最值得珍藏和回忆的是，我参加、参与、组织、策划的学校建校30周年、40周年、45周年以及50周年校庆的那些事。

建校30周年校庆

学校建校30周年校庆日，是1986年10月的最后一天，在十二桥校区举行的。那时，我刚从教师岗位调到学校机关工作，第一次参加这种全校大型活动。兴许是第一次，我感到无名地兴奋又无名地不解。我依稀记得，这是学校建校以来，



建校30周年庆典

最正式、规模最大的一次全校性的大型活动，就连学校发的有关校庆工作的文件都有八大页。工作方案制定非常详细，从指导原则到资料如何发放，到校庆来宾的安排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校庆活动的重头戏当然是那既庄重热闹，又有规矩的庆祝大会了！庆祝大会是在现十二桥校区操场举行的。除了校园内被满目的彩旗装点得很有节目气氛外，在校的学生更关注的是校庆安排的活动内容。校庆当日安排了晚上放电影、录像，还有舞会，这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这年校庆，学校制作了纪念章、纪念画册、院史资料以及学校发展的录像片。最值得记忆的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校庆当天，在校学生的午餐是发的点心，就连校友们的聚餐也是在十二桥学生食堂一楼，分两批进行的。

建校 40 周年校庆

建校 40 周年校庆日，是 1996 年 10 月 25 日，还是在十二桥校区举行的。这时，学校已由原来的成都中医学院更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了。在拟定校庆安排和确定校庆日期时，几番周折才确定下来。因为这年的校庆，定在建校以来刚有的 400 米标准跑道的操场举行。把校庆大会放在室外举行，免不了最担心的是老天爷给不给面子的问题。在此之前，学校一位领导参加完另一所中医院校校庆，回来后介绍该校校庆情况时，感慨万千。说该校校庆当日，也是在大操场上举行，庆祝大会刚宣布开始不久，上级领导还没讲完话，就见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把台下参会的人淋散了，使大会不得不“半途而废”。我记得在选择校庆日子和地点时，就整整研究了一上午，最后有一位校领导，翻开他历年记录得非常详细的成都地区天气情况，信心满满地说：10 月 25 日是不会下雨的……果真如此，校庆当日，天气虽然不算晴朗，但没有下雨！

校庆当天，十二桥校区热闹非凡，人来人往，设在操场的庆祝大会会场布置得很喜庆。上午九点，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省、市领导以及来宾们走上主席台就座后，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在全体起立，奏唱国歌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广播喇叭居然没有声音。站在主席台最侧面的

我，急忙看了看音控师那边，那人给我做了个两手一摊的手势，我明白了，国歌的磁带没有拿到现场。这时，我急中生智，把身边一位年轻女老师往前推了一把，低声说："快！指挥！国歌！"只见这位老师镇定地走到主席台前边，清了清嗓子，起了个音，"起来……"，然后向大操场上的近1 000人两手一挥，全场齐声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整个过程不到30秒，事后站在台下的校友们说，都还没有察觉到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

这年校庆，尝试了把学术交流活动与校庆活动结合。所以安排了诸如大学生学术交流活动，后期临床教学工作交流，针灸、药学等学科的学术交流活动。对来参加校庆活动和参加学术活动的来宾，学校都发了一个很实用的蓝底红字的"三倒拐"拉链包，上面印有"成都中医药大学"几个字。我记得很清楚，校庆结束半年后，一次我去杭州开会时，居然在西湖边上，碰见两位拿着这样小包的男士，边走边说笑，上前一询问，结果是肯定的：这两位是我校1963级的校友，也是来杭州开会的。在交谈中，他们不断地称赞学校的变化和建校40周年校庆，并指着胸前的校庆纪念章说："我们戴上就没有取下来，要一直戴下去，走到哪里都要自豪地说，我是成都中医学院毕业



建校40周年庆典

的学生。”爱校之情，可见一斑。

建校 45 周校庆

建校 45 周年校庆日，是 2001 年 10 月 27 日，在原成都高新西区校区举行的。虽然有“十年大庆，五年小庆”一说，但毕竟是进入了 21 世纪，又恰逢学校有了第二个校区——高新西区校区，还是举办了一个规模不大不小的校庆。庆祝大会是在高新校区最有特点的建筑物——体育馆内进行的。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体育馆内举行校庆活动。由于体育馆特殊用途的限制，在考虑会场布置时，就把看台和内场做了一个很好的安排，使会场的气氛能达到和谐统一。周围的看台上安排的是学生，内场中间安排的是校友和教职工们，主席台当然就是大会的主席台，来宾们就只有安排在两侧的看台上。虽然因主席台面积窄，导致了一位领导差点不慎摔倒一事，但并未影响校友和师生员工们参加校庆的喜悦心情。

这年的校庆，正值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故在校庆期间，举办了“中医药现代化与西部大开发”的研讨大会。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学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相继成立了一些学院。在校庆期间，就举行了省中医医院、药品（中药）反应监测中心、民族医药研究所、护理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授牌仪式。除此之外，校庆当天的晚会，在成都沙湾会展中心的“金色歌剧院”举行了一场“太极之声·庆祝建校 45 周年中外名曲交响音乐会”，并邀请了药学院的一位在校女同学担任独唱。

建校 50 周年校庆

建校 50 周年校庆日，是 2006 年 10 月 28 日，在现温江校区举行的。这时，温江校区建设已初具规模，学校也整体搬到了温江，办学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由于是学校 50 周年华诞，全校都很重视和关注校庆的事，就说领导重视吧，从年初就开始搭班子，抽调专人负责此事，到了临近实施阶段，还专门从准备“三校合并”的那所学校抽调了一位校领导来助阵。校庆筹备工

作也与前几次校庆不一样，突破了传统的“出一本宣传画册、拍一部宣传片、出一套教学科研成果汇编、办一个校史展览”等套路，而是在学校历史上首次明确了校庆日、校训、校歌、校徽等，能彰显学校深厚办学历史文化的标识。在当年4月26日，校党委常委会决定，8月6日为“校庆纪念日”，因为这一天是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全国四所中医学院的日子。在8月中旬，经过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从几千条成都中医药大学校训推荐意见中，经年过古稀的医古文老师“画龙点睛”，学校确定了“厚德博学、精思笃行”的校训。在9月中下旬，酝酿和听取各方意见的校歌也在温江校园里唱响了。但遗憾的是，当时仅是代校歌。校徽的确认和发布也是在当年的8月份。实际上，校徽的图案已经沿用了30年，只是没有明确确认为校徽，在建校50周年时，才得以确认。

这年的校庆庆祝大会，第一次改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建校50周年庆典”，而且是下午举行的。因为在同一天，省内还有一所大学也是校庆，省、市级领导当天上午要去参加这所学校的校庆。领导们分身乏术，那只有我们换时间了，



建校50周年庆典

由于要改在下午举行，所以学校研究，不如改成“庆典”更加妥帖点。庆典活动的地点选择在科技大楼前面的平坝上，老天爷也非常给力，前一天下午在搭舞台时还下着雨，可校庆庆典当天下午却是艳阳高照。

“庆典”活动是聘请专业的文化公司策划的，既有校庆的内容，又有文艺演出的形式，当校友、来宾、在校学生几千人，在充满暖意、欢歌笑语的会场上，体会着、品味着校庆带来的无限欢乐时，为校庆努力了的人们，也就知足了……

撰写人简介：

马晓蓉，女，中共党员，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毕业留校工作近40年，先后任药学院中药专业课教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硕士生导师，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正厅级调研员。退休后，致力于女性社会组织的公益事业，中医药知识传播的科普宣讲工作。现任四川省妇联执委，四川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医疗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成都市女知识分子联合会党支部书记。

画册里的成都中医药大学

讲述人 / 常湖川

韶光流转，斗转星移。转眼间，到成都中医药大学已有 40 多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用相机记载着我们学校的成长史，用每一幅照片刻画出学校发展的点点滴滴，描摹着温暖的人文情怀。如今，我看着过往的一幅幅照片，感慨万千，尤其是我们为几次校庆准备的相片集册，更是把学校的成长发展由“点”到“线”串联起来，绘成一条文化渊源的历史长河。

建校 30 周年第一本彩色校庆画册

自 1956 年建校，我们在前 30 年间从未举办过校庆庆典。一直到后面改革开放，社会开始加速发展建设，我们就想着：我们中医学院自然应当顺应潮流，把文化建设搞起来，把成都中医学院宣扬出去。因此，1986 年，我们决定制作



常湖川接受全媒体中心采访

一册校庆画集作为学校建校30周年的献礼。于是，学校就把这项工作派给我和时任办公室主任的彭永茂，以及刚来学校工作的徐廉（现为学校副校长）了。

那时候，我们3人都没有类似经历，其中徐廉才21岁，又黑又瘦，毕业分配到学校后被派往西安路办事处工作半年，刚回到学校办公室工作不久就和我们一起制作画册，更没有经验。我们只能临时搭一个“班子”。当时和兄弟院校的联系也不密切，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制作的，好在学校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从紧张的资金中抽出足够制作画册的经费供我们使用。当时一盒彩色胶卷26元，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高。学校当真是“耗费巨资”提供了充裕的胶卷，还配备了当时最好的设备：一台尼康F3照相机和德国的杜斯特牌的洗照片的设备。

设备齐全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怎样才能拍得好看？怎么才能体现我们的学校特色？当时拍照只有我是专业的，因此摄影只有我一个人。办学条件也相当艰苦，可以说，学校实验室的墙壁上没有一块是洁净的，教学楼墙上到处是裂纹和一圈一圈的水渍，凡是前来参观我们学校的人都说：“成都中医学院的墙就是‘尿干子’做的哟。”体现我们学校特色的点很少，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与重点学科，哪怕是一般的科研成果——在当时都只是“浮云”。此类种种，如今回想起来仍觉条件之艰苦。

我们一次次推敲方案，一次次地反复商讨，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学校这批“宝贵的财富”上，那就是我们的“人才宝库”——师资队伍。领导听到我们的建议后，也说：“一定要把我们的人物主线体现出来，把我们的学校‘亮点’——老专家们凸显出来！”方案敲定后，我马上着手拍摄照片。但拍照的同时也不能打扰老师同学们上课，以免影响课堂进度，所以我便和老师提前预约好拍照时间，在不耽误工作和教学的情况下，见缝插针式地拍摄。为了拍出高质量的图片，不露出学校稍显褪色的墙壁，我也是想尽了办法，巴掌大的地方都被我利用起来。偶尔看起来效果不好，还得麻烦任课老师挪挪位置，找一块墙壁干净的地方拍摄。整个拍摄过程，历时3个月，我一个教研室一个教研室拍完了。有时为取景，我常背着尼康相机“哼哧哼哧”地爬七八层楼拍摄。回想起来，真是年轻，有使不完的力气，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事业上，也不知累！

拍照这个“力气活儿”一完毕，洗照片这个“精细活儿”便如约前来。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电子版照片，是胶片，需要自己冲洗。更没有电脑分析和处理，全靠肉眼来判断颜色好坏，凭经验矫正照片颜色，反复测试，才能把颜色调对。而冲彩色胶卷时一点光都不能见，不像黑白照片还可以有一点红光，因此，冲胶卷和洗照片的房间是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全靠自己摸索，凭记忆拿需要的东西。偶尔出了差错，还要重新拍照、洗胶卷。不过好在整体失误率不高。虽然这番“全手工工艺制品”的流程一天下来，仅能制作20张，但它们的颜色质地非常不错。

拿着拍好的照片，我们3人挑挑拣拣，挑选出一大摞清晰漂亮的彩色照片，就想着出画册的事儿了。但当时四川省找不到彩色印刷厂。后来是彭主任联系到了他在轻工部工作的同学，于是我们几经颠簸来到北京，轻工部了解到我们要出画册，又把这事批给了中国包装集团总公司。我们只知道门牌号，靠步行和乘坐公交汽车，几番打听，总算找到了这座位于一条小胡同里破旧的、临时的七层楼建筑。我们抱着大摞素材气喘吁吁爬上七楼，找到了总公司的总经理，结果他又给我们批到了天津！我们当时的心情真是几番大起大落，起伏不定！简直无法相信这个东西折腾人到这种程度！

终于几经周折到了天津，又步行几个小时，找到了中国邮票总公司印刷厂。人家一看，我们只提了一捆照片，没有文字，没有排版。那么，怎么编排？什么顺序？只得靠现想。我们就找到我们的兄弟院校——天津中医学院，接待人为我们安排了天津中医学院的招待所一间三人间。靠窗边有两张床，靠门边的床条件是最不好的，彭永茂年龄大，住在窗边，我当时和徐廉还不熟悉，看他平时不爱说话，年纪又比我小，就“欺负”他，把他“赶”到门边上去坐着，徐廉就耷拉着脑袋坐过去。现在想来，当时的玩笑话倒是使得工作情谊愈发深厚了。

第二天我们又去印刷厂，想找到解决办法。印刷厂便派一个人来给我们搞设计。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设计、文字都没有弄。我们还得交600元版面设计费。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工资才几十元，交600元相当于现在的近万元。大家都在口袋里摸索着，加上财务借的公款，东拼西凑，终于设法凑齐了600元。

当时交通不发达，通讯也不方便，若离开了，厂家做好后也没法通知我们，所以，我们没法离开，只能在那等着。终于在七八天后，设计出来了。图下面需要文字说明，于是，配文和前言文字都是由徐廉负责，一字一句他反复斟酌，力求准确完美，写完文字他又帮我编排整理图片。画册封底也没有，就把我在峨眉山出差时拍摄的日出作为了封底。就这样，我们终于凑齐了一本画册。

后来，彭主任回成都了，留我和徐廉在北京等着画册印刷。徐廉是学文的，一支笔、一盏灯，他的工作就开始了。学校30周年校庆，文稿撰写的任务交到了这个年轻人手上，那个时候写作不像现在，一杯咖啡，一台电脑。在北京的几天，为了节约差旅费，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大通铺，人员复杂，环境吵闹，沉闷潮热的空气里，其他人都在以寒暄玩笑打发时间。角落里，只见一盏微弱的灯光，照着这个年轻人刚毅的脸庞，他一只手紧握着老式钢笔在不停修改稿件，另一只手沾满了墨水，还在脸上不停擦拭汗水。那一幕，我记忆犹新，这个可爱的年轻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画册总共做了30天，一共500册。我看着这本彩色画册出版，就像自己的孩子降世一样。至今我一直把它保存得很好，成了我压箱底的宝贝。这可是当时最好的印刷厂印出来的画册！也是当年全国中医院校中第一本彩色的校庆画册！当时，我们愣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了高品质的产品。用最好的印刷技术、永远不会褪色的画页，记录着历史的瞬间，传承着我们的中医药文化！



校庆30周年画册

后5次校庆的发展史

后来制作的几本校庆画册越来越厚，内容也更加丰富。我们不断吸取经验、总结反思，创作出更完美的画册。庆祝校庆的活动也愈发多样、氛围也更为浓厚！30周年校庆时，我们还没有校歌、校训，校徽都是请人临时设计出来的。后来在举办35周年校庆活动时，都还不怎么热闹，当时的活动就是搭个台子，挂块红布，领导上台讲几句话与同学们共勉。再请副省级领导前来参观，会议一完什么都结束了。但领导同学们聚在一起，满怀着共同建设学校的激情，虽然形式相对单调，却不失庄重与严肃，也算得上是“张灯结彩”的大庆典。

在35周年庆典时，有一张名片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这可是一张独具特色的“折叠式”名片，展开后，面积相当于今天A4纸一样大。当时1963级药学毕业的、任学校科研处处长的张重郜要在学校中搞活动，找我给他帮忙。结果我一看他的名片，折了6折，折起来揣荷包里，还会留一大截在外面。打开来一看，第一个名称就是1963级中药系第一任班长，后面就是成都中医学院中药系第一任主任、第一任全国中药学会会员、科研处处长、1963级同学会会长，之后连着一长串，头衔之多，有几十个。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名片，我当即愣住了！后来这倒成了我们建校35周年庆典里独有的乐趣。



历次校庆画册演变

40周年时，就慢慢有了校友会。学长学姐们回来参观学校的建设，慰问老师，与同学们交流。校庆期间有一些校友给我们学校捐赠了许多的教育基金，完善学校的教育设施，帮助有需要的同学。之后，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开始兴起。逐渐就有了学术会，文艺节目，学生搞联欢，一次比一次好。后来的文艺节目越来越专业，舞台效果也更加精美，都像中央电视台办的文艺晚会了。

我们的画册也一次次变得更好，每一次都力求完美。甚至在35周年和40周年时，我们都是在香港制版、深圳印刷的。后来成都有了彩色印刷厂，印刷画册才不用“翻山越岭”了。因此，45、50、60周年的校庆画册我们都在成都制作的，工期也缩短了将近一半！

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也渐渐频繁起来，双方时常互相交流学习。时任党委副书记的马晓蓉老师经常去参加其他中医院校的校庆活动，然后交换各自学校的画册，他们都夸我们做得好，画质优美、内容丰富却不杂乱，谋篇布局很有条理。我们也常从他们的画册中寻找灵感、汲取经验。举个例子，我们到某大学参加他们的60年校庆时，翻阅着他们的画册，我们就发现：他们的内容虽然丰富，可是显得杂乱，就像是“豆腐块儿”拼起来的。后来我们在制作60周年画册时，就汲取了教训：先把线梳理清楚，比如教学成果要表现哪些，科研成果要体现哪一方面……把线理清后再着手，既能让主题突出、重点明显，也不会显得杂乱无章。

几十年来，我们的校庆形式从没有到多样，画册的内容也由简单到丰富，一点一点都渗透着我们学校的发展变化。这正是我们杏林学子们共同建设的成果！我们学校真是有“好基因”，学子们个个都是“根正苗红”的杏林接班人。在这里，我不得不谈谈我们学校的老专家们！当年，我们学校的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加起来只有200多人，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教授只有郑孝昌、宋鹭冰、凌一揆、肖崇厚等，就连冉品珍当时都只是副教授。但老师们心很齐，拿着微薄的薪水，每天认真负责地上课，亲自带实验，为同学们的学业尽心尽力。万德光、刘敏如、廖品正、钟以泽、艾儒棣、宋楚江、贾敏如等老师一直奋斗在教学和科研一线。记得郑孝昌老师改稿子，眼睛眯起，鼻子都要碰到书本了，像是在闻墨香，他一个一个字改，遇见不对的地方，总会反复斟酌，多次修改……

正是在这样一批人的带领下，我们学校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3个专业（中医、中药、针灸）、2个系（中药系、中医系）发展到了如今19个学院、30多个专业、28个博士点；学校建设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成就显著，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各项科研成果近年来如“雨后春笋”。

回顾往事，我感触良多：任何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扬“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把简单的重复劳动做到极致，必成大器。成功的源头一定是勤奋努力坚持到底，只要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坚持耕耘，一定会收获成功！

本文由常湖川口述，学校全媒体中心采访整理。
采访时间：2021年4月23日
采访地点：温江校区博物馆
文字整理：康玓歆　朱婉婷
摄　　影：李　悦　娄鸣凤

讲述人简介：

常湖川，男，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摄影家协会理事。1977年参加工作，1983年调入成都中医药大学电教中心从事教学片制作工作，2003年至今在校博物馆从事中医药文化展示、策划与宣传普及工作。制作《植物器官形态——茎》《植物器官形态——根》《峨眉山药用植物的宝库》等优秀教学片，先后获得四川省优秀电教教材一等奖、三等奖等荣誉表彰。40余年工作生涯中，利用摄影技术特长，以生动的影像记录留存了学校改革、建设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瞬间，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用相机记录、述说历史，作品已成为见证学校改革发展40年的丰硕成果的重要史料。

养生花开遍寰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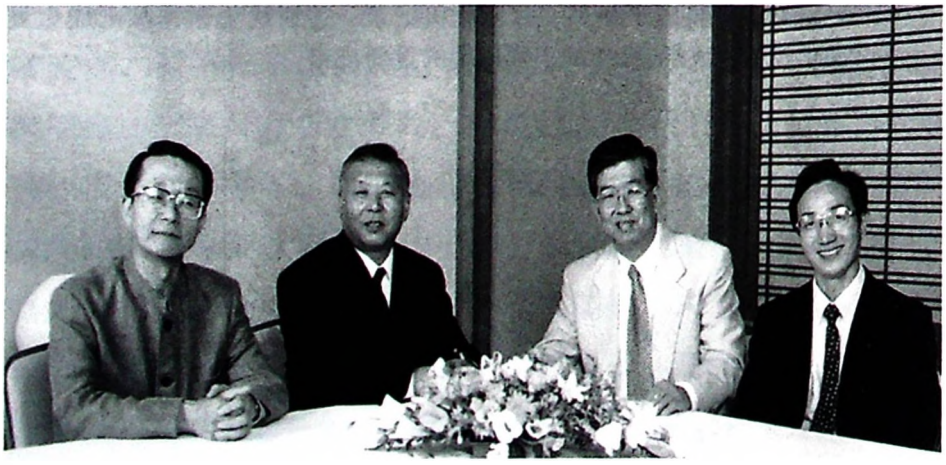
——忆我的国际学术交流之旅

撰写人 / 马烈光

中医养生学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创造，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学科体系。随着近几十年来世界健康热潮的兴起，中医养生学已经受到来自世界的瞩目。乘着这股春风，我也带着这门古老而新兴的中国传统康寿学科走向海外，学术交流足迹遍布全球。现选择印象较深的一些国家逐一进行追述。

一、日本交流行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日本中医界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开启合作不久后，我曾应日本传统医学会之邀请，连续两年赴日讲学并交流。这种同一人连续两年受邀讲学的情况，在历次中日中医交流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也深感荣耀。后来学校与日本医学界每年都持续不断地开展交流互访，我也多次作为联络人和接待人。



与日本中医学会会长小高修司（左一）等合影

养生花开遍寰宇
——忆我的国际学术交流之旅

1998 年 10 月，我应邀赴日讲学。除讲《黄帝内经》学术研究和中医临床经典方剂的运用心得外，还涉及不少合理运用养生和治未病的知识。日本学界对中医研究的侧重在于实用，相对而言，更喜方药，对仲景方极为推崇，不仅认为《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甚至有冠以中医之源的势头。而且他们对《黄帝内经》颇有非议，不承认《黄帝内经》早于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因此，在讲座之后专门召集专家以学术交流之名与我展开了激烈争鸣。其实，我国中医界千余年来早已将这一问题研究得十分透彻，否则，唐代王冰就不会赞《黄帝内经》为“医家之宗”了。争论到最后，年轻气盛的我不禁直言不讳：“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已经明言‘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素问’出自《黄帝内经》。为什么你们还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千余年前的先贤呢？”一番问对，日方参会专家哑口无言，不得不服。当时出席会议的还有一位已年逾六旬的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及日本传统医学杂志社的山本胜旷社长，听完我的宣讲后，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到他的部门去做交流，我欣然应允。在东洋学术出版社与山本胜旷社长等一众专家学者交流后，他当场聘请我担任该社学术顾问，后将此次交流活动在《传统医学》杂志上作了全面报道。报道刊发后，在日本传统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第一次日本之行中涉及的养生内容，日方颇感意犹未尽，因而打破惯例，盛邀我翌年再访日本，并希望专讲孙思邈养生之术。归国后，我仔细整理孙思邈的养生经验，还原出一套孙思邈“真人关节导引术”，并亲自演示，制成录像。1999 年 10 月，我按约二次访日，在日本既作演讲，又放录像，还当场演示导引动作，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日本自然疗法协会山上末人会长也在席间聆听，会后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交流，并邀请我担任该会学术顾问。有感于我的两次日本之行，我在交流会最后即兴赋诗一首作为总结：“一衣带水紧比邻，徐福东渡两情深。黄老轩辕儒孔孟，文出一辙本同根。九州共仰唯仲景，两赴东瀛为苍生。同心同德同研发，中华仁术更昌明。”

二、美国交流行

2013年4月中旬，我应邀赴美主持和参加多项养生学术活动，传播来自遥远东方的养生文化。按照邀请方的安排，我首先在纽约州立大学发表了养生专场演讲。考虑到听众都是当地中医学者，有一定的中医基础，因此演讲内容较深、干货满满，引起了州立大学众多老师和学生的热议和一致好评。随后，美国邀请方安排我在康奈尔大学作学术演讲，后又演示药膳“当归生姜羊肉汤”的烹饪制作。这个药膳方由中国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首创，在中国已经流传千余年，有非常好的养生效果。该药膳经精心烹饪制作，用当归、生姜的辛香去除了羊肉的腥膻，用羊肉的滋润中和了当归的燥烈，堪称药膳方配伍的典范。做成之后，味香、汤鲜、肉嫩，色香味俱佳，能益气，能暖胃，能补血，可食用，可养生，还可用于治疗虚寒证，是药膳中的“全才”。美味无国界，现场观众品尝之后都对汤的味道赞不绝口，对中国药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互动环节中提出了许多问题，我都一一耐心做了回答。



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布《世界养生宣言》

在美国活动期间，我还应邀出席了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世界养生大同修活动，发布了《世界养生宣言》，倡导“爱生之世界人民，闻此宣言，即起而践行养生”，并现场亲自指导养生功法爱好者进行练习。学员们学习养生功法，体会调息、调形、调心的妙处，对来自东方的养生文化有了更感性的认识，对这种强健身体、延年益寿的方法十分向往。

三、欧洲交流行

2015 年 10 月，恰是金秋送爽，应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公共保健学院、德国国际中医协会、法国巴黎东方文化中心、荷兰欧洲中药材经销总部等邀请，我作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会长，与刘达平秘书长等同仁，一同赴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四国进行了交流访问。

首站访问英国，接待方颇为人性化地安排我们参观伦敦著名景区及大英博物馆，用游览缓冲了时差不适。11 月 3 日上午，我们参观了牛津圣莫妮卡养老中心及瑞奇蒙德退休村。按照行程安排，我在养老中心以“真人关节导引术”为题，向在场老年人介绍了中国唐代大医学家、养生家孙思邈所创的导引功法，并作了现场演示。这套导引术，动作舒缓，身、心、息配合甚妙，适合老年人使用。演示完毕，还指导听众现场学习，同时我也发现，在场的英国老年人很喜欢来自东方的这种锻炼方式。看来中国的养生，至少在英国老年群体中，大有推广的必要和前景。正因为如此，演讲活动一结束，我就被养老中心的领导引至会议室进一步交流。养老中心更关心的是中国还有多少这种“神奇而健康的运动”，能否进一步挖掘并在英国推广。其实，这些年为国外所熟知的中国“功夫”“气功”等都源于导引术，只是前者加入了技击动作或以技击为目的，特别讲究刚柔开合、攻防转换、发力收力等，并需要艰苦训练；后者在国外的传播，主要以养生为目的，可说是导引养生术的别称。中国几千年来，发明的导引术不计其数，古人养生尚有“旬月导引”之说，每个月的导引内容都不同，可见其丰富程度。我从养老中心的介绍中也发现，中国的养老和社会福利现状，确实与英国有不小的差距，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迎头赶上。但同时，如何处理高福利待遇带来的社会负担问题，

也是应当考虑平衡的。

11月3日下午，我们在布鲁克斯大学与其公共保健学院、健康与生命科学院、建筑环境学院、国际交流处、研究和商业开发部等院系部门的负责人座谈。这些学院，是我这次来欧洲访问的主要对象，因此，我在会上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发言，介绍了中国养生的历史文化、发展状况，以及世界中联养生专业委员会的情况和未来规划等。2015年是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建校150周年，访问期间，布鲁克斯大学正在进行庆祝活动。乘着庆典的“春风”，我直接提出，希望未来能与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在养生保健方面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布鲁克斯大学各学院院长对于这些规划和想法都表示了赞赏。

11月3日晚，我们从英国飞到德国，4日正式开始在德国的交流考察行程。整个德国行程安排得很满，先后访问了慕尼黑工业大学、国际中医协会及几位名医的诊室，并与慕尼黑工业大学韩鹏教授、梅尔哈特教授、岳瑟甫教授、英悟德博士等深入交流。德国是欧洲各国中，中医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中医氛围自然也很好，他们对中医的了解很深。德方每年都会固定派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交流，考察中医及养生。近些年来，我在成都接待最多的就是来自德国的朋友，与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比如韩鹏教授，是成都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岳瑟甫教授于2015年曾与我在养生杂志社促膝长谈，并力邀我到德国考察访问。德方专家中，英悟德博士和田丽思医生跟我关系更为密切。2015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世界中联养生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他们二位联袂到场，并被选为副会长，为大会增色不少。座谈时，欧洲自然医学会梅尔哈特教授希望能与世界中联养生专委会合作，在德国举办2017年国际养生大会，还希望以后能长期固定在德国举办活动。此事正中我下怀，因为德国的中医氛围很好，养生专委会完全可以在德国固定开展活动，增强德国的养生气氛，并带动整个欧洲普及养生，传播中医养生文化。因此，我向梅尔哈特教授详细了解德国召开学术会议的相关规定和注意事宜，梅尔哈特教授也一一进行了解释。幸运的是，当时商定的这次会议，在2017年时竟然真的实现了。两年后，即2017年6月，经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积极协调，养生专业委员会在德国自然医学会、德国国际中医协会的大力支持下

终于得以在慕尼黑举办学术大会，实现了2015年约定的合作意向。专委会的欧美朋友均出席了会议，我在会上致辞并作“神秘悠久的养生文化”主旨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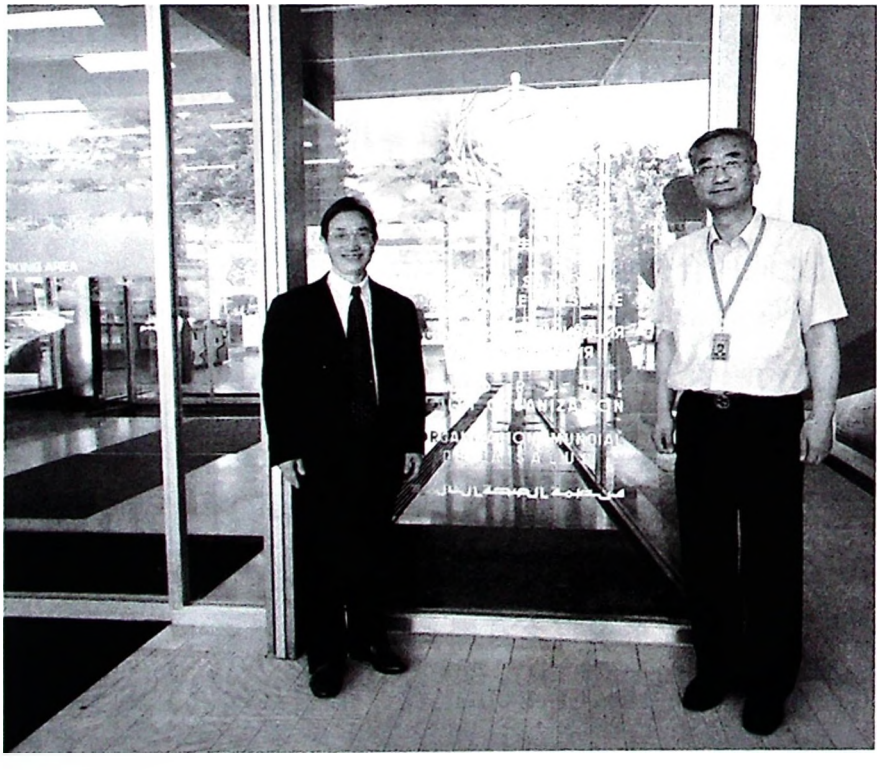
11月6日晚，我从德国慕尼黑飞到法国巴黎，在巴黎访问了2天。法国国际气功协会会长、巴黎东方文化中心主席柯文，专程从上海飞回巴黎，以尽地主之谊。与柯文的交流，令我明白，中国的功法，在国外有多么受欢迎。柯文主席也是四川人，跟我早已相识。她介绍说，初到法国时，空有一身功法导引的本领，法国却没这个行业，“英雄无用武之地”，非常苦恼，因而经历过一段困窘的时期。后来随着苦心经营，“咬定青山不放松”地传播功法，更随着中国功法在国外的市场越加开阔，柯文的东方文化中心方有了当前的规模。每个月开班时，报名者颇多，影响很大。这次恰好有几个班百多位学员正在练习功法，在柯文的安排下，我即兴给几个班的学员讲授养生知识和养生文化，深受学员的欢迎，纷纷要求合影留念。随后，我随柯文主席参观了东方文化中心。中心内确实东方文化神韵浓郁，木板铺地，体现自然风格，四壁悬挂“道”“气”等中国书法大字，及“内经图”等气功经典图画，若不是座下学员都是金发碧眼，真恍若已回到中国。我与柯文主席还单独进行了交流，向她进一步介绍了养生在中国文化和中医中的重要地位，与她商讨养生合作。柯文主席也深感，通过养生，可以将她在法国传播的中华太极文化及养生保健方法融于一体，更上层楼。因此，她近些年来经常带队来成都与我进行学术交流，我们之间的合作愈趋紧密。

四、其他国家交流行

2010年夏季，我曾受邀到新加坡参加世界美容与抗衰老大会，并发表题为“《黄帝内经》性衰老的超前认识及对策”的主旨演讲。我以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为理论源头，从《素问·上古天真论》开始，逐渐拓展到《黄帝内经》其他篇章，同时还大量引用了后世医家的观点，务求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系统宣讲了《黄帝内经》对人体性衰老的认识，并与现代认识相比较，指出其超前之处和防治

对策。

2017年6月20日，我应邀赴瑞士日内瓦参加了在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召开的“WHO世界传统医药发展论坛”，会议期间，与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部张奇主任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我向张奇主任介绍了国内养生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认为在当前的医学发展背景下，现代医学越来越将眼光关注于健康，关注于生命，与中医养生的关注点一致。因此，近些年欧美各国都对中医养生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兴趣，纷纷来中国考察、商谈合作，这也是世界中联养生专业委员会成立的初衷。我向张奇主任提出，希望在健康风潮席卷全球的大势下，能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健康事业发展。张奇主任表示，此次邀我至瑞士交流并参观世卫组织总部，就是希望中医养生能走出中国，得到世界的了解和认可，为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最后，张奇主任对合作提出殷切期望，建议我回国后组织人员，设计形成合作方案，向国家相关部门及世界卫生组织申报，尽快将项目付诸实施。



与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部张奇主任（右）在WHO总部门前合影

“回首向来”，经过多年的四处游学，我感觉收获颇丰，不仅领略了全球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当地对健康长寿的认识与预防方法，更将中医养生学的种子撒播到了全球各地。近年来，这些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开放出了绚丽的花朵，国外来蓉寻求合作者不断增多，已呈繁荣之象。

撰写人简介：

马烈光，男，1952年生，中医养生学科创始人、国家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全国中医药文化建设先进个人。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养生康复学院名誉院长，贵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养生学院名誉院长，《养生杂志》主编，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养生学”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四川省名中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会长等。主编国家规划教材8种及专著40余部，公开发表文章200余篇。

峨眉山游学之旅开启我校短期特色留学生培训班

撰写人 / 黄庆娴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都中医药大学逐步迎来了欧美国家的中医爱好者，由学校外事处负责组织对来访人员的中医学习交流活动。1990 年的国庆节期间，我带着一批来学校交流的欧洲中医药人士拜访了峨眉山。后来，这次游学之旅也成为开启我校连续性、规模化短期留学生培训班的基础和运行方式。

那时交通不便，经过一天的土路颠簸，国庆节头天晚上我们到达了山下的万年场，住在场区的一个小旅馆，一昼夜的劳顿就不提了。

第二天清晨，鸟儿们先醒来，高声唱歌，众多的鸣叫汇成一曲和声，婉转悠扬，弥漫山野；一层薄雾飘在山间，美如仙境；空气又干净又清新，一口吸进直达丹田，又一口呼出立马身轻一分，好舒服呀！人都变得轻巧了！

当时还没有上山的缆车，我们就自己背着小背包徒步上山了。从万年场到万年寺需走 20 多分钟，我们一路上玩山看景，采野花，分享各自带来的小点心，又惬意又轻松。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万年寺。那时，我们并未与万年寺提前约定，我们的旅游是走到哪算到哪。万年寺大门外的和尚看见来了这样多的外国人，起身表示欢迎。我们一行人满脸笑意一身汗水，东张西望地走着跳着进去了。哇！好洁净，好神圣，好美呀！一行人迫不及待地游览全寺，兴奋极了！我与领队柯立德先生商量了一下，当即决定：让外国朋友体验一下别样的文化与生活，吃在万年寺，住在万年寺，次日下山回学校。

万年寺坐落在峨眉山的半山腰，庙堂楼舍依山而建，高大巍峨，金箔门

匾，灿烂辉煌。黄瓦红墙，围绕出一片仙境。寺里绿树参天，园中鲜花盛开，草木葳蕤，在蓝天青山的映衬下美不胜收，真是养眼悦心哦！站在寺内的一个高台，极目远望，群山苍翠，高低错落，清风习习，薄雾飘飘，树涛飒飒作响，真使人心旷神怡，名山真是名不虚传呀！我转眼看看我的外国朋友们，有的双目微闭，有的张大嘴巴，有的双臂伸向天空……全都沉浸于这美妙的时刻！大家都知道欧洲有数不清的、各式美丽高贵又庄严神圣的教堂，可是我们的万年寺使他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圣洁与清新。尤其是砖堂里文殊菩萨骑着大象的塑像，仿佛告诉人们实践是真知的源泉，人人都应该勇于做实际的工作，才会有事业的成功。

中午和晚上，我们一行人在万年寺吃了素餐，每餐都有近20个菜，都是山上的新鲜蔬菜，还有现磨的豆腐，寺里养的鸡下的蛋。外国朋友们好高兴，对他们来说一切都那么新鲜新奇，都是新见识新做派。晚上，我们住在寺里的客房。客房的布置十分传统：两把木椅子、一个小木茶几、一个木衣架、一个搪瓷洗脸盆、一架双人床，床架子上套着一顶雪白的蚊帐，两个亮闪闪的帐钩把蚊帐牵开、棉被套还是那种传统缝制的，枕头上盖有针织棉枕巾，上面印的花儿栩栩如生。地板是木板，洁净如新，还有淡淡的木香。外国朋友们来自发达国家，看见我们这样的“宾馆”，他们大开眼界，高兴满意，笑得嘴都合不拢。有一点欠缺是公用洗澡间和公用厕所，这些他们都不在乎了。

当天日暮时分，寺里鼓声响起，浑厚而悠长，带给心灵一片轻柔的宁静。我告诉他们，在中国的庙宇中好好听听暮鼓晨钟，那是你傍晚入静的开始，清晨阳气生发的肇端。当晚，一夜酣睡无人失眠，人们在晨曦中被钟声唤醒。而此时，和尚们已经在大堂做了两小时的功课了（诵经）。我们洗漱完毕，赶紧去寺内楼堂花园参观，练练气功，看看风景，尽量多地吸进新鲜纯净的大山之精气。

万年寺的主持心定大师和厨师们把我们当上宾，真诚相待，备的早餐十分丰富。有鸡蛋、奶粉、豆浆稀饭、咸菜、豆腐乳、花生米、馒头、白米糕和现炒鲜菜。我们都吃得很饱，很满足。

早餐后，我们大队人马从万年寺开始向金顶出发，沿途看群山绵延、峰峦

耸峙、树木峥嵘、一路花草、一路中草药，又是一路汗水，一路欢声笑语。半天时间，我们征服了金顶，又跑跑跳跳回到了万年寺。吃过午饭，我们打点行装准备下山了。和尚们送我们每人一袋绿茶，是他们自己在山上种的并自己制作的，口感很清香。他们还在山门目送我们，向我们挥手告别，欢迎我们再去。

后来才知道，这批中医针灸外籍人士来自欧洲好几个国家，有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等，而且都是该国中医针灸学习和实践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即各学会主席或校长。其中德国的柯立德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来我国做过多方考察，最后认定我校的师资水平和临床实践是最优秀的，最有传统根基，最能反映对中医的传承，而这正是他们所热爱的所追求的。于是，他组织了欧洲多国的中医界有识之士来我校访问。这次访问之后，会长们、校长们当即与我敲定了第二年带团来学习的计划。要让他们的会员学员来我校学习、实习，提升中医理论和技法，同时也亲身感悟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次峨眉山之旅让我校与峨眉山万年寺的主持和老少和尚们建立了友谊，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国朋友们那样喜欢那样赞美峨眉山的环境、寺庙和善心的和尚们，我校何不把峨眉山作为我们的一个对外教学基地呢？柯立德与我有同感，我们当即决定：后续学员的课程安排之一是在峨眉山万年寺驻留一周，4天听课和操练，2天自由活动。这成了我校吸引外籍学员的特色教学活动。

1991年5月，头年签约定好的一组学员来了，共28人。领队是阿维森纳中医学校校长，法国人迭洛沙先生。外籍学员到来之前双方已商定好学习计划，其中一项是第二周在万年寺学习针灸理论并实习。当然，外事处事前租好了车，联系万年寺食和宿等事项。当时，我们邀请了中医界著名针灸气功专家李仲愚教授为他们授课和操作。万年寺把他们最好的经堂借给我们作教室，教室窗明几净，还有坐佛站佛笑眯眯地陪着我们。教室外院里的牡丹花正次第盛开，幽幽的清香飘进教室。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中医，真把学员们欢喜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这叫享受学习啊！上午李老讲课还加操作表演加翻译，学员们紧张地记笔记和模仿练习。3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中午的素餐恢复了人们的精神。

稍事休息后，下午的学习又开始了。4 天学习，2 天在山上游玩，一周就这样过去了。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带着装满中医知识的头脑，欣赏着沿途的美景回到了学校，圆满地结束了初次峨眉山游学之旅。

从此，我校规模化、有特色的短期留学生培训班就开启了，他们如一条长河，源源不断地流向我校，至今碧波荡漾！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样的异地学习堪称独创。

撰写人简介：

黄庆娴，1967 年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学院英国语言文学专业。1981 年起，在成都中医药大学任教，担任本、硕、博学生各类普通英语和中医药针灸专业英语教学工作。1990 年开始，先后任学校对外开放工作部门负责人、外事处处长、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台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等。曾任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学会常务理事，担任教材《中药药剂学》主审等。

在以色列创办雷德曼中医学院

撰写人 / 方显树

1992 年，以色列青年维拉蒙去英国学习 3 年针灸后，来到我校附属医院针灸科进修。一个星期后，他发现日门诊量达 3 000 人，到针灸科来治病的只有 100 多人，甚是不解。他去外事办请教，老师告诉他，针灸只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更多的病人是服用中药治疗。原来在他的脑海中以为中医就只有针灸，还不知道有中药，于是他要求学习中医药学。他学习了中药、方剂、内科学后就回国了。

1995 年他推荐一名叫尤给夫·阿维的病人来成都治疗。尤给夫·阿维患多发性硬化症 13 年了，先后到美国、日本、印度治疗未愈，呈半瘫痪状态，口齿不清，动作笨拙，生活不能自理，由妻子陪同前来治病。该病属于西医学神经系统疾病，症候涵盖了中医眼科学的内障，内科学的眩晕、痿症、中风等病症。患者肥胖，体重 125 千克。病情复杂，我从未治疗过这种病，建议他到附属医院治疗，他坚持请我为他治疗。我每周去宾馆为他诊病 2 次，服中药治疗。1 个月后，病情明显好转，起居生活基本能够自理。由于家里还有 3 个不满 10 岁的孩子，妻子先行回国。随着治疗深入，病情进一步好转，疼痛明显缓解，行走时可以不用杵拐杖。3 个月后签证到期，阿维回国了。第二年 3 月，阿维又来到成都，一边治疗一边经商，同时又介绍朋友森哈前来治疗。森哈患周围动脉硬化性闭塞症 11 年了，做过手术治疗未愈，表现为间歇性跛行行走和患肢疼痛，只能行走 200~400 米，否则疼痛难忍，外出工作只能开车。该病属于中医学的脱疽，由于瘀血内阻，血脉凝滞，不通则痛。用活血化瘀的方药，治疗 1 个月后痊愈。

需要说明一点，给维拉蒙讲课、临床实习，给阿维、森哈诊病，均由邓勇老师任翻译，配合默契。由于治好了这两个病人，以色列人觉得中医太神奇了。他们的朋友纷纷想到中国来治病。犹太人太精明了，与其到中国，还不如邀请我去以色列为大家治病。于是由维拉蒙所在基布兹向我发出邀请，经学校批准，于 1997 年 1 月由阿维陪同随机前往以色列。由于他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好，一开始病人就比较多，最多时要预约到两周后才能就诊。当时，以色列有四所中医学院，只学习针灸和推拿，没有开设中医医疗专业。每所学院均有 1~3 名中国医师指导学员临床实习。在特拉维夫也有一个中药配方门店，但没有中药饮片。只有少数免煎粉末，是从日本进口的，只有少数（学习过一点中药学的）医生有时开一点此粉末。在此期间，有位叫莎丽的老太太全权委托我办中医学院。当时我感到很惊奇，以色列已经有四所中医学院了，还能再办吗？我分析了以色列的中医现状和办学的条件后，感悟是可以尝试的。一是犹太人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二是当时以色列的中医学院只教授针灸和推拿，学制 4 ~ 6 年，未开设中医医疗专业。三是可将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办学模式移植到以色列，学制 4 年，涵盖中医医疗、针灸推拿专业。前三年半在以色列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各学科，最后半年在我校附属医院临床实习。四是凭借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威望和办学经验。五是莎丽的诚挚邀请和配合。六是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支持。综上有利条件，深信通过努力一定能够办好学校。我将上述想法写信告诉了学



校长李明富代表学校与雷德曼中医学院签署联合办学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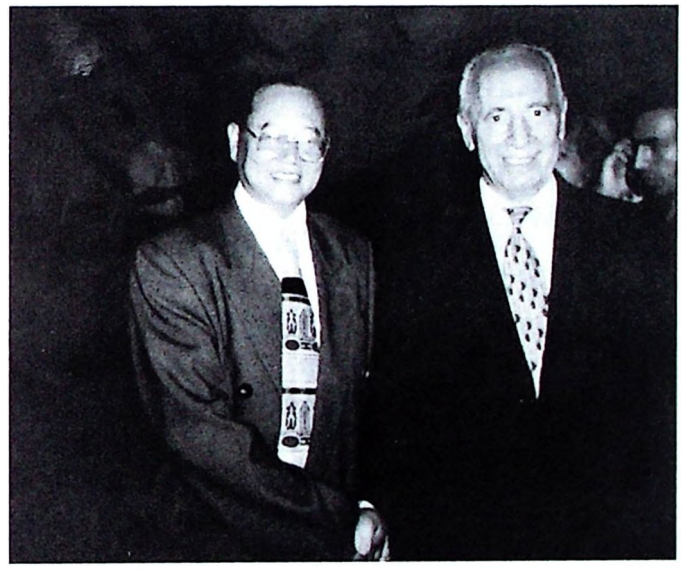
校，很快收到了学校来信，支持联合办学，并责成我与莎丽商谈联合办学事宜。我拟订了联合办学协议及教学计划、开设课程等。经多次协商，最终达成了联合办学协议，确定在1998年春季招生，莎丽为筹办学校创造条件。

1998年1月，雷德曼中医学院正式招生开学了。第一学期招收了40多名学员，属于成人教育，每周学习2天，每天学习7个小时。学员文化程度有高中、大学、硕士、博士等。还有当了爷爷、奶奶的老人也来学习。开学不久，李明富校长，外事处黄庆娴处长应邀来到以色列，在大使馆官员的陪同下，在雷德曼中医学院举行了隆重的联合办学签字仪式。我的职务是中医系主任，执行教学计划，主管教学工作，负责教师应聘，招生宣传，带领学员临床实习等。第一学期中途，有6位学员从其他院校转入。第二学期，又转入几名学员。之后，每年招收新学员60名左右。

在教学中也遇到一些困难。首先，翻译难寻。既要会中文，讲汉语，又要知晓一点中医药知识的人，实在是难找。开始是凑合，两个月后，终于找到一位学习了三年中文，又学习了一点点中药知识的艾娜。在讲授诊断、方剂学之前，我得先给她大体讲授一遍，再讨论一下，她领悟了之后，才在课堂上做翻译。她非常认真，刻苦，尽职尽责。我所讲授的课程均由她翻译。我回国后，由她主讲方剂学，很受学生喜爱。其次，在五年的教学中，学员没有统一的教材，我只有国内的统编教材。我必须认真备课，学员要专心听课，认真记笔记。可以想象，给学员增加了多么大的难度，我佩服他们刻苦学习的精神。当时没有实习基地，我采取每周一次课堂上诊病，病人由学员推荐。有一次，一个学员生病了，他打电话请求来课堂上诊病。原来他患的是丹毒，发病2天，体温39.6℃，面赤气粗，左下肢小腿红、肿、硬，疼痛，舌红苔黄，脉滑数，属于热毒为患。选用清瘟败毒饮加减，外敷清热解毒的药粉，1周后痊愈。在我上门诊时，轮流来两名学员临床实习。有个病员患尿路结石，服药后排出如黄豆大小的一粒结石，学员看了很惊奇，课堂上我将所用的三金排石汤讲解给学员。在以色列讲学时，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最爱提问，而且有深度。有个学员因亲友患肝癌，在课堂上突然提问："老师，肝癌怎么治疗？"我的回答是："在患肝癌之前多有肝硬化，肝又藏血，在治疗中，除考虑抗肿瘤外，还要活

血化瘀。”他紧接着提问：“活血化瘀，会不会促进癌细胞扩散？”我肯定他提的问题好后回答道：“在早期，用活血化瘀是有一定疗效，是否会促进癌细胞扩散，待有条件时，可以做实验研究。”回国后，我咨询了病理学专家，他们曾做过动物实验未发现活血化瘀药导致癌细胞扩散。

第四学年上学期，以色列卫生部对四所中医学院进行了综合评估，包括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社会反响等。评估结果，雷德曼中医学院排名第一，并指出该校办学成功，是与成都中医药大学联合办学和指导密不可分，要求其他中医学院均要参照雷德曼中医学院的教学计划执行。这是以色列政府部门对联合办学所取得成就的肯定。无疑，这是将临床中医药学引进以色列，



1999 年国庆 50 周年，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举行隆重招待会，本文作者与佩雷斯（上届总理）国会议长合影留念



2002 年，雷德曼中医学院为首批学员举行毕业典礼

为中医药学在以色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以色列人民的健康做了一份贡献。

2001 年秋天，首批学员来到我校附属医院临床实习，实习结束后回国。雷德曼中医学院为首批学员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并邀请中国大使馆官员参加典礼。

由于伊拉克战争，中国驻以大使馆，对公派人员动员回国避难。我于 2003 年 1 月返回成都。雷德曼中医学院创办至今已经 21 年，培养了上千名中医师，大部分在社区医院工作，有的办个体诊所，还有到美国去办中医诊所的。其他几所中医学院早在十年前就相继停办了。近闻，3 年前又新办了一所两年制的针灸学院。

2003 年，经以色列政府国会批准，将中医、针灸、推拿的治疗均纳入医疗保险。闻此，我感到很欣慰，将有更多的以色列人民享受到中医药的治疗。

撰写人简介：

方显树，男，教授，四川省郫县人。1962 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在小金县工作，1979 年调回学校，历任教研室秘书、副主任，基础医学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1997 年应邀赴以色列医疗教学五年。先后主持参与研究治疗肿瘤病人白细胞减少的“芪鹿补血颗粒”、高脂血症的“脂必泰胶囊”“龙胆泻肝口服液”等项目，主编参编著作《食疗名方 300 首》《当代中医内科学》《中药学》，发表论文 10 余篇。

养生有了世界舞台

——记世界中联养生专委会成立

撰写人 / 方显树

在我的养生研究生涯中，有一桩具有养生发展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让我久久难忘，这就是 2015 年 5 月 23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会上成立的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简称世界中联）养生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是经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世界中联批准、挂靠成都中医药大学的非营利性学术团体，是养生史上首个展示中医养生人风采的世界性大舞台。这次会议，吸引了 200 余名来自海内外养生领域的政府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和知名人士参加。我作为专委会成立筹备委员会主任和其后被推选出的首任会长，带领团队和学会同仁组织举办了这次会议，其中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片段，迄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世界中联养生专业委员会成立合影



世界中联养生专业委员会成立（一）

好事多磨，筹备波折

专委会的成立并非一蹴而就，从立意到筹备完成，前后共6年时间，几经波折，实属不易啊！成立养生专委会的想法起自2009年8月，当时我受邀担任世界中联药膳食疗专委会副会长并出席了成立大会。在会上了解了世界中联的性质和业务范围后，我不禁想到："养生是中华文化的特色元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健康长寿追求的经验结晶，未来必将走向世界。世界中联恰好是中医向全球传播的权威学会平台，要是能在这个平台上搭建一个属于养生的舞台，岂不是能推动养生更快地走向世界吗？"于是，在世界中联学术部的指导下，当年便撰写、上报了养生专委会的筹建计划书。其后因为2009年到2010年我连续主编国家规划教材，事务繁忙而没有跟进筹备事宜，使得筹备计划书如泥牛入海，再无声息，建立专委会一事出现了第一次波折。2011年初夏，我借着到北京出差的机会，特地到世界中联大楼登门拜访了创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李振吉教授，向他陈述了建立养生专委会的重要性和目前遇到的困难，引起了李秘书长的重视。他立即把主管相关工作的学术部人员唤至办公室，当面反复叮嘱，指示要配合我尽快建立养生专委会。回到成都以后，我在与学术部的反复沟通中，又将申请书修改后上交二稿。但是当时团队人员匮乏，只有我带着学生两个人在做，无人后续跟进联系，因而创会之事出现二次波折。这次一拖就是两年，直到2012年底，随着主编的"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中医养生学》的出版，我的事务少了一些，建立专委会的愿望再次泛起，遂与学术部联系询问目前进展。随后再次进京参加会长会和培训会，按照民政部要求丰富完善资料和硬件设施，多方联系中医健康领域专家组成学会人员核心架构，最终在2013年盼来了民政部的审核通过并备案，学会进入筹备阶段。2014年8月24日，世界中联养生专业委员会成立筹备会议在成都召开，会上确定了成立大会的召开时间，讨论了学会成立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又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会议地点的确定。早先我想在成都召开，既方便又省事，后来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和总会领导都作出指示，希望养生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最好放在北京召开。那么具体放在哪里呢？北京作为首都，最著名的会议地点当然是人民大会堂，如果成立大会能放在那里召开，将多么激动人心啊！然而当我们与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接触时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会议要达到一定的级别和重要性才能进入人民大会堂，像世界中联养生专业委员会这类二级学术组织的会议，只能排队等运气。那时候筹委会秘书处的小同志们就住在北京，几乎天天去问，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不接待”或者“会场已满”。最后形势所迫，我作为筹委会主任只得向世界中联求助，总会又进一步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书面汇报，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大力支持，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名义向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提出申请并作出担保，才使得成立大会面临的最大困难顺利解决。

成立大会，规格最高

2015 年 5 月 23 日上午，大家步入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成立大会，共同见证了养生专委会的正式成立。世界中联主席佘靖，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国医大师刘敏如，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成都中医大学校长梁繁荣，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陈涤平，香港著名武术气功名家朱鹤亭等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辞，大会由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余曙光主持。成立大会也吸引了近 20 家媒体参与，对大会进行了报道。

上午九点，成立大会准时开始。大会首先宣读了国家民政部对养生专委会成立的批复及前一天预备会选举结果，并由世界中联主席佘靖为养生专委会授牌、为养生专委会首任会长授证书。我作为会长，在授牌、受证的时候，看着苦心准备的养生专委会能在人民大会堂办成最高规格会议，心中的激动和感动无以复加。

随后，佘靖主席致辞，介绍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及其专业委员会建设情况。她说，养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创造，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也是中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随着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健康成为全球的关注目标和追求热点。养生以维

护健康、祛病延年为目标，适应当前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改变，符合医卫服务重心前移的要求，将为社会和谐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佘靖主席希望养生专业委员会能够更广泛地调动海内外专家和学者的积极性，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把养生专业委员会办成一个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有影响、有特色的专业委员会，为中医药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作出新的贡献。

会上，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梁繁荣表示，作为挂靠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将以养生专委会为支点，大力弘扬中医养生，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养生向更加规范、科学的方向发展，推动更加广泛的养生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构建新常态下养生健康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更好地守护健康、造福人类。梁繁荣倡议：以世界中联养生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中医养生理论和方法的继承与创新，进一步加强中医养生的推广与普及，进一步促进养生健康产业的发展。

作为会长，我也在会上致辞中讲到，中国从夏商至秦汉，历唐、宋、元、明、清，“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重生思想深植人心；“君王众庶，



世界中联养生专业委员会成立（二）

尽欲全形”的长生追求渗透血脉；“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摄生行为贯穿始终。尤其到了现代，养生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其国际化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可以说，时代需要养生，世界需要养生，人类健康需要养生。最后，我号召同道同心同力，借助世界中联养生专业委员会的力量，携手光大“养生仁术”。

海外会员代表、德国中医药协会副会长英悟德、国内会员代表、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陈涤平也在会上发言，祝贺专委会成立。这次大会还有幸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国医大师刘敏如两位老前辈，他们也分别致辞，除对专委会成立的意义大加赞赏之外，还语重心长地提出许多希望。

成立仪式上，著名青年歌唱家常思思还专门为成立大会献唱由我作词的歌曲《养生颂》。一曲歌罢，成立大会进入高潮，也标志着大会的圆满成功。

四海宾朋，舞动全球

养生专业委员会经过精心筹备，具有明显的国际性、广泛性和代表性。国际性体现在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及会员等各个层次都吸纳海外人员加入，成员覆盖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性除了体现在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还体现在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覆盖面及覆盖层次，会员覆盖了东、南、西、北、中，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涉及一线、二线及中小城市，甚至下探到区县层面，保证了养生事业的梯队建设和平衡发展；代表性体现在理事以上成员中，境内外知名专家有60余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成员有90余人，占60%以上。其中有几位嘉宾的故事颇值得一叙。

其一是莫桑比克共和国原总统、联合国和平大使希萨诺为会议发来了贺信及祝贺视频。一场学术会议得到一国元首的关注，十分罕见，此事仰赖我校老校友江永生教授一力促成，也体现出中医药在全球的影响力。江永生教授与我关系深厚，早在他读书时我们就已相识，后来他回到泸州工作，

又参加中国援非医疗队，在莫桑比克共和国利用所擅长的针灸知识服务当地群众健康近30年，成为总统希萨诺的保健医生，我们的联系从未中断。在得知我申请成立了养生的国际性学会后，他非常振奋，还向希萨诺总统汇报了此事，并代我力邀总统担任学会名誉主席。希萨诺总统在得知学会主要涉及养生健康领域后欣然应允，并主动提出致贺信和祝贺视频。他在贺信中说："我曾听说，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医，在维护健康与长寿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世界中联养生专业委员会的建立，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养生，传播健康。"

其二是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夫人的到来，让人颇感意外。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家代表性的会议中心，其审查非常严格。早在会议召开的一个月之前，就必须将入场人员的名单、所乘车辆全部报大会堂管理处审批备案，且入场安检与机场安检同级别。然而，就在22日上午，遽然接到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的夫人要求参会的通知，只能临时与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沟通，所幸大使夫人最终顺利入场，也为大会增色不少。会后闲时，我总觉惊奇，会期筹备如此之短，大使夫人从何得知大会召开的讯息，更觉惊奇的是，原来养生的影响已如此之大，真是中华文化之幸甚啊！

其三是香港道家养生大家朱鹤亭老先生的莅临，令我十分感动。朱老视我为忘年交，我却不敢以此自居，再加朱老毕竟寿高，有些活动我一直不敢劳烦老人家。这次会议，作为最高规格的养生会议，我盛邀老人家出席。朱老闻讯，慨然应允，并提出要为大会题词，还特意赴香港拜见国学大师饶宗颐，请饶老为大会题字，并声明要为大会送特别礼物。于是大会组委会在成立大会上专门留出时间，以便请朱老展示，也是为大会助兴。果然，朱老亲自将此三样礼物携至会场，当场展示。朱老亲笔题写的"福"字文，饶老先生题写"仁心"二字，特别礼物玉石是朱老特别赶制，亲自设计外封，并以木盒盛放，附以收藏证书，皆精美异常。朱老还手持话筒，即兴引经据典，从中华文化的高度，对养生文化作了精辟总结，并对养生专委会成立的意义大加赞赏，其思维敏捷，语言毫无停顿，条理清晰，真是几人堪比啊！至少我接触过的耄耋老人中，似朱老这般神思不衰者几无。稳坐台下的嘉宾们，

目睹朱老神采，见识了朱老广博的中华文化底蕴，都离座前拥，手机、相机闪烁不停，群情激动。献礼在会议中段，所给时间只有五分钟，又未安排发言，本预计是一带而过、无甚波澜的仪式，却掀起了不亚于献唱《养生颂》的会议高潮，大大出乎意料，却大慰我怀。没有养生家充分展现风采，以树立榜样，坚定“道心”，养生怎能让人信服，养生专业委员会又怎能体现出养生添福添寿的特色呢？

其四是学会副会长、德国田丽思女士。中华数不尽的养生方法中，有一种养生法，最为海外所熟知，那就是“气功”。德国有气功养生医学协会，主席就是田丽思女士。她自 2007 年开始，每年都会带团来中国考察，2013 年考察时还专门参观了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我是接待者，一路陪同，结合博物馆实物，给他们讲了大量中医养生的典故和箴言名句，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参观氛围和效果都很好，由此与她相识。学会筹备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德国的老朋友，于是邀她入会并担任职务，后经选举任副会长，与另一位德国老朋友、副会长英悟德博士成为学会在德国的主要联络人。

其五是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公共保健学院院长Keith Moultrie教授，后来选举成为学会副会长。英国是一个高福利国家，政府行政压力很大，为了解决这一困境，鼓励公民主动保健，减少公共卫生支出，公共保健学院将目光对准了有着养生传统的中国，Keith 教授于是来到了天府之国四川成都考察，经人引荐，找到了我。我用李约瑟的话“长生不老、青春永驻之术，只源于中国”作为开场，向他介绍了中华养生文化和中医养生体系，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认识到，中国民众愿意积极主动地寻求养生，而这种主观意识的缺乏正是现今英国民众养老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英国政府正在急切寻找的解决办法之一。这次考察让他第一次近距离地与中医养生接触，中医的养生观念给他带来了很多启发，也是他这次来访中国的一大收获。后来他又专门邀请我和学校党委书记马跃荣到英国牛津大学考察，我们做了更深入的交流，我当时邀请他进入学会担任职务，他慨然应允。可惜成立大会的时候，他因学院事务较多未能到会，但为成立大会撰

致贺信。

此次大会的召开及世界中联养生专委会的成立，标志着养生界终于有了自己的世界平台，养生开始以独立的姿态走上世界舞台。这是养生界最高规格的会议，对养生的未来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大会的主要组织者，我站在舞台中央，看绿色生命转动蓝色星球，生生不息，“同登寿域”。

撰写人简介：

马烈光，男，1952年生，中医养生学科创始人、国家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全国中医药文化建设先进个人。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养生康复学院名誉院长，贵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养生学院名誉院长，《养生杂志》主编，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养生学”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四川省名中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会长等。主编国家规划教材8种及专著40余部，公开发表文章200余篇。